

出 版 说 明

美国出版的这部著作对我国人民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当今世界新闻人物萨达姆·侯赛因和他领导的伊拉克共和国具有参考价值，故我们将其翻译出版。书中的描述、分析及观点难免偏颇，望读者注意鉴别。

目 录

出版说明

第一章 暴力的机构	(1)
秘密警察.....	(1)
国家军队	(21)
复兴党民兵	(29)
武装力量总数	(34)
复兴党民兵总数	(34)
国家军队总数	(35)
警察总数	(38)
小 结	(40)
政党与国家	(41)
第二章 恐怖的世界	(47)
此起彼伏的“间谍”案	(49)
新的恐怖	(60)
残忍与权力	(69)
清洗奇观	(71)
第三章 复兴党与群众	(74)
思想和组织	(74)

	年轻人的重要性	(78)
	群众教育运动	(85)
	妇女的地位	(90)
	发展与自由	(94)
	落后与暴力	(98)
	思想的退化	(101)
	心理防御体系的建立	(106)
第四章	权威	(112)
	大权独揽的领袖	(112)
	复兴党的权威	(127)
	权威与道德	(132)
	权力的源泉	(134)
	权力源泉的未来	(141)
	塑造新的阿拉伯人	(142)
	再论政党与国家	(146)
	结 论	(148)
第五章	泛阿拉伯主义与伊拉克	(150)
	胡斯里与新道德	(153)
	通往纪律之路	(160)
	军队与亚述人悲剧	(166)
	结 局:1936--1941	(174)
第六章	复兴主义的形成	(183)
	创始人及初期事件	(183)
	复兴党的泛阿拉伯主义	(189)
	1943年7月的声明	(192)
	民族特征与伊斯兰教	(199)

	复兴党思想的一致性·····	(203)
	世俗主义还是教派主义·····	(210)
	世俗主义·····	(211)
	教派主义·····	(213)
	反阿拉伯主义·····	(218)
	建立组织·····	(222)
	领导原则和党的组织·····	(225)
	复兴主义与共产主义·····	(228)
第七章	伊拉克复兴主义的合法化 ·····	(232)
	一则自白·····	(232)
	全国行动宪章·····	(235)
	政治的终结·····	(239)
	从阶级到群众:1958—1968 ·····	(240)
	伊拉克共产党·····	(244)
	阿拉伯复兴社会党·····	(247)
	观念的转变·····	(250)
	帝国主义·····	(253)
	社会主义·····	(255)
	自由·····	(257)
第八章	最后的灾难 ·····	(262)
	罕见的大战·····	(263)
	战争起因面面观·····	(266)
	卡迪西亚·萨达姆之战·····	(276)
	毒气战与人海战·····	(284)
	并非结尾的结尾·····	(293)

附录 1 大事记	(300)
附录 2 1968 年以来被清洗的党政军高级官员名录	(311)

第一章 暴力的机构

秘 密 警 察

撒利姆正要坐下来用餐，突然听到敲门声。他开了门，有两个人站在外边。他们没有进屋，也没有作自我介绍，径直查证撒利姆的身分，然后客气地请他们跟他走一趟，说有一些问题需要他回答。撒利姆的妻子大声询问出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问题，他们做了什么错事，等等。撒利姆故作镇定，似乎知道所发生的一切。他安慰妻子不要担心，然后走出屋，轻轻地拉上门，把妻子关在屋内，跟两个人上了车。他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天气并不热，但他却感到手心冒汗；他也不饿，但肚子却空荡荡的。他们的车在国家内部安全局设在当地的总部门前停了下来。

这是 70 年代初期的事了。当时，巴格达被分成许多安全区。在某些区域内，可疑的居民必须按照政府规定的价格卖掉自己的房子，搬到另一个区域居住。这些安全区内设有安全总部，时刻监视着安全区内和安全区之间的一切活动。许多初次访问巴格达的人都会感到意外：有人竟询问他们是否在傍晚时分拍摄萨达姆的出生地底格里斯河，是否有其它类似的冒

犯行为(伊拉克出售照相机,但没有内政部颁发的使用许可证,一切拍照都会受到怀疑)。一些安全区内的建筑物的顶部藏着摄像机;公共场所、雕像、主要的交通要道、交叉路口和环形路口都装有摄像机。这些摄像机为安全总部形成了严密广阔的图像监视网。撒利姆被带进这样一幢大楼内。

他记得等了好长时间。他不知为什么被召到这里来,只是感到越来越害怕。最后他被带进一间巨大的办公室,屋内众多的监测器和令人目眩的闪光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装置究竟是为了监听拍照还是为创造恐怖的气氛,撒利姆就不得而知了。

有人给撒利姆端来茶,谈话开始了。从外表上看,对方身居要职,言谈举止彬彬有礼,但撒利姆不知道他的姓名。这位要人看了看一些文件,然后问几个月以前的某一天他到哪里去了。撒利姆说他记不清了。对方给他列出几个汽车牌照号,他认出其中有一个是他的车号。对方接着问了许多与日期和车号有关的问题,撒利姆吓得张口结舌,语无伦次。最后他才弄明白对方想知道那天他是否上班去了,因为他们知道他总是开车上班的,但那天他的车却放在家里。

他这才恍然大悟。几个月前,他腿部骨折,卧床不起。伤势好转后他的表弟每天早晨开车接他上班,孩子上学由别人来接送,妻子也调整了日常安排。他在陈述这一切时显得局促不安,口齿不清。不过,对方并没有在意。事实上,对方没有感到意外。接着,对方问了一些更加具体的问题,询问就结束了。撒利姆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宽慰。

那位重要人物要求撒利姆和他的全家在10天内将衣物、家具等一切东西搬到另一住宅去,搬完后将原住宅的钥匙交到安

全总部办公室,并为新住宅登记注册。对方还告诉撒利姆,等他们把他所讲的一切调查证实后,再与他联系。当他进一步询问为什么时,对方不仅拒绝回答,而且有些恼怒。他被带出大楼,送到自己的家中。

撒利姆按要求搬了家,并把钥匙送到安全总部办公室。几个月后,他接到安全总部的电话,说他可以回到原住宅居住,让他来总部办公室取钥匙。

像上述这种不出示任何官方证件的传讯和审查屡屡发生。撒利姆从惊恐状态中恢复过来以后,也没有真正在意,全当碰上了倒霉的天气或自然灾害。

在撒利姆这样的平民百姓看来,在伊拉克这块土地上,秘密警察就像魔鬼一样无时不在,无处不有。但是,类似秘密警察的机构却不为人所知,论述 1968 年以后复兴党的政权方面的书籍都不敢提及类似的机构,但公众早就感受到了至高无上、无所不知的秘密警察组织的存在。它们体现着伊拉克政治的本质。

从 1973 年未遂的政变、1974 年复兴党的《政治报告》、官方对 1979 年有关文件泄密事件和驻外机构的变节的报道、一些局外人的观察、复兴党成员的失言以及流传的有关人士的经历中可以看出秘密警察的阴影。此外,复兴党情报系统的一位负责人在他写的一本书中也提到了秘密警察的存在。政府出版了一些关于公民行动的规定等法律条文。除此以外,根本没有介绍有关警察机构的职能和目的的书籍和材料。在伊拉克的君主政体时期,曾公布过一次有关警察机构的统计资料,但这次统计既包括交通警察又包括实施镇压的组织机构。1968 年复兴党通过政变夺取政权以前,伊拉克的警察系统与

今天的不大相同。

从有关的信息材料来看,我猜想撒利姆在 70 年代末碰到的那个机构起源于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伊拉克支部的一个特别机构。该机构是 1964 年到 1966 年期间成立的秘密组织,其成员都是从精通情报业务、具有忠诚信念的人中严格筛选出来的。在 1968 年复兴党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的战斗中,这些人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个特别机构从一开始就是以复兴党为主的权力基地,受复兴党军事领导人的操纵。1963 年,复兴党的部分军人发动军事政变,赶走了复兴党国民警卫队,推翻了复兴党政权。叙利亚也发生了同样的军事政变。这些政变使阿拉伯复兴党组织损失惨重,四分五裂。1964 年,在复兴党创始人米歇尔·阿弗拉克的提携下,萨达姆·侯赛因被选进复兴党伊拉克地区领导机构,这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在伊拉克的最高决策机构。萨达姆的任职标志着伊拉克复兴党的新开端,因为他是秘密警察组织的创始人;在他的监督下,警察组织逐渐发展成复兴党再次执政以后的那种极其复杂、秘密的机构。

1969 年,萨达姆任命纳迪姆·卡扎尔为国家内部安全局局长。此人冷酷无情,阴险狡诈。他在 50 年代上大学时就加入了复兴党,后来逐渐成为党的实权人物之一。1963 年 2 月,复兴党第一次发动军事政变,夺得政权。同年,政权又被党的部分军人推翻。在复兴党短暂的执政期间,卡扎尔犯下了种种暴行,得了个残酷无情的虐待狂的恶名。他喜欢亲自审讯抓来的人,嗜好在被抓的人的眼睛里熄灭燃烧着的香烟。

在卡扎尔的领导下,秘密警察酷刑折磨、秘密处死的人达几千人,这些人主要是共产党人和库尔德人。例如,伊拉克共

产党的一个支部曾发布一个公告,列出了 441 位“魂归天堂”的共产党人的名字。卡扎尔喜欢暴力审讯,他手下的人曾两次密谋刺杀库尔德人的领袖穆拉·M·巴拉萨尼。这两次谋杀恰恰是在复兴党于 1970 年 3 月份与库尔德人签订了自治协议以后不久谋划的。根据这个协议,复兴党将给库尔德人带来和平和自主权。

但这位秘密警察头子的下场可不怎么好。1973 年 7 月,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1968 年以来伊拉克的最高权力机构)成员主持了一个简短的法庭审判,判处卡扎尔和其他 35 人死刑。政府并没有详细解释处决他们的原因,事实真相被掩盖了。据说卡扎尔筹划谋杀伊拉克总统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谋杀失败后,他把内政部长和国防部长扣起来作为人质,与他的一位亲信带着人质朝伊朗边界逃去,但未逃到边界就被追捕者包围了,他开枪击毙了两位部长。卡扎尔事件引起了党内的一场大清洗运动。

1974 年复兴党的《政治报告》是该党统治的基本准则。不同寻常的是,该报告对复兴党过去的工作作了诚实的评价,对秘密警察头子卡扎尔作了批评:

国家安全部门虽然在党员和无党派爱国人士的努力下得到了加强,但它同时也变成了一个庞大臃肿的机构。在前几届政府中,国家安全部门对党和其它民族运动采取欺骗手段,形成了一种变态心理。所以,要改变这种状态,使其接受新的价值观念和工作方法绝非易事。在过去一段时期内(1968—1973),该部门犯有严重错误,败坏了党的声誉,影响了党的政策在各个领域的实施……这个

令人敏感的部门在行动上放任自由，缺乏严格谨慎的控制和约束，这里面也有领导的责任。该部门的一些官员滥用党对他们的信任，甚至图谋推翻党，1973年6月30日的阴谋就能说明这一点。这伙人肆意篡改党的政策，几乎使党丧失了对安全部门的控制。

卡扎尔事件极大地震撼了复兴党的政权。此外，国家安全部门的“变态心理”日趋明显。复兴党大清洗以后不久，一连串奇怪的犯罪案件接踵发生。这些案件像军事政变一样使复兴党乱了阵脚。复兴党曾经引以自豪的是，巴格达的犯罪率呈下降趋势；紧急警察能够在几分钟内到达市内的任何地方。这一自信被接连发生的入室抢劫杀人案打得粉碎。作案者是一个名为“刀斧手”的人。他组织了一个杀人团伙，其中有过去在卡扎尔手下供职的秘密警察成员。在法庭上，该团伙供认，他们能够逃避警察的追捕，是因为他们对秘密警察的无线电频率了如指掌，并能熟练地使用它来迷惑警察。

在卡扎尔政变和“刀斧手”抢劫杀人案件之前，政府于1973年3月颁布了石油企业国有化法令；同年9月，古巴阿连德政府被推翻。对不熟悉复兴党的统治方式的读者来说，这两个事件似乎毫不相干。然而，萨达姆·侯赛因在同年9月24日的讲话中，把古巴、智利同伊拉克作了一番比较，认为古巴突然变成了帝国主义，智利的帝国主义“潜藏势力”也甚嚣尘上。他说：

我们知道，帝国主义者最终、尤其是在1972年认识到，伊拉克的革命已经走过了初级阶段，即“由秘密革命

到公开革命”阶段，而人们通常认为第三世界的革命正是处在这一阶段……

我们从许多客观证据中看出，帝国主义者对我们国家政策的基本方法感到震惊；同样，他们对古巴以前的做法也感到震惊……不管帝国主义者通过什么方式在伊拉克寻找藏身之处，它绝不能迫使我们革命退步或失败……一些人也许以为革命者对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其实革命者有一双警惕而圆睁的眼睛。一旦革命者决定采取行动，粉碎反革命势力，他们就不会犹豫，无所畏惧，自始至终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我们所听到读到的一切，包括最近发生的犯罪案件，都是对付革命、污染革命者心灵的新花招。这些犯罪不是人们想像的那种虐待狂式的刑事犯罪，而是革命的叛徒犯下的罪行。

那些投靠外国人的人是不可能逃脱惩罚的……这些人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受外国人的利用和雇用进行犯罪活动。不过，我们不能低估我们的力量和思想，也不能忽视帝国主义的腐蚀。我们必须认识、了解并准确地监测帝国主义的动向，预测它的计划、兵力及其国内外的潜藏势力，并做好反击的准备。我们曾制订计划，统一思想 and 观念，动用秘密武装力量，终于使垄断公司在1973年3月1日低头认罪，接受了国有化政策。但要对付蓄谋已久的帝国主义，这些办法是不够的。我们知道，1972年，帝国主义者就对我们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措施感到震惊，他们必然重新分析形势，发起新的攻势。因此，我们必须拥有足够的、超出他们预料的力量。我们向全国爱国的弟兄们保证，……他们不可能像对付阿连德政

府那样使我们轻易就擒。

萨达姆的上述推论，显然是根据强大的秘密警察提供的情报做出来的。当时，他对秘密警察的信任感有所降低。擦亮革命的“眼睛”、撕开敌人的伪装、做好反击的“准备”等只能是某种情报机关职能范围内的事。这篇讲话强调了复兴党已经“知道”的或者具有“客观证据”的东西。这些信息不可能来源于没有根据的言谈和抽象的思想分析，而是从准确地监测帝国主义的秘密活动及其在伊拉克的“潜藏势力”的机构得来的。只有为政治服务的警察情报系统才能提供这方面的信息。

萨达姆在讲话中多次提到“密谋”、“阴谋”等概念，但他真正的目的是强调“叛国”一词的新意义。“叛国”一词具有非凡的魔力，它可以把“刀斧手”的谋杀活动同国外某机构联系起来，这样，其罪行就增加了不应该有的另一层意义。在一些包括复兴党统治前的伊拉克在内的国家里，叛国是一种比较具体的罪行，如向外国出卖国家机密、煽动政变、亵渎君主等。这类叛国罪往往通过法律程序审理，而且能够得到宽大的处理。

但现在，依照复兴党的说法，复兴主义的法律来源于“人民”和代表人民意愿的“革命”。他们这个新国家的使命也就是整个“阿拉伯民族”或“人民”的使命。伊拉克和阿拉伯民族成了一个统一体。个人通过具体的行动来推翻这个整体越来越困难了，他只能反对这个整体的思想。在复兴主义者的心里，冒犯全体“人民”比老式的叛国罪更为严重。它像军事政变一样严重：军事政变攻击的对象是国家的权威领导阶层；而冒犯“人民”则动摇了领导阶层权力的基础。人们往往感到，冒犯“人民”的尊严比冒犯一个邪恶的政权更为严重。其它类型的

政府不会因为“刀斧手”及其团伙曾经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把他们的凶杀案同叛国联系起来。这些罪犯应该以刑事罪而不是叛国罪受到审判。但是，这样的凶杀案引起了所有人的恐惧，人们越谈论它，就越感到恐惧。这种情形是前所未有的，复兴党必须找出导致恐惧的理由。这个理由必须能够最终证明复兴党的正确，而不会引起人民的攻击。萨达姆·侯赛因开始从信念而不是从愤世疾俗的意图出发，寻找这个理由。

他的讲话旨在使“叛国”概念更加含混不清、更加抽象。现在，人们对叛国罪的憎恨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同时，萨达姆又通过对“刀斧手”凶杀案的处理使叛国罪的严重性更加明显，更加具体。萨达姆的这种思想源于复兴主义的思想体系，也与 20 世纪的思想潮流相吻合。它们都起源于本世纪初的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了顶峰。由此看来，萨达姆只是模仿者，不是创始人。他坚定不移地把这种思想传给伊拉克。更重要的是，他扩大了政治犯罪的范围，使它的意义更加含混、更加广泛，几乎到了包罗万象的程度。这是他的突出成就。在他的心目中，叛国罪是一种更大的、针对全体人民的犯罪，而不是狭义上的犯罪。一旦叛国罪具有这种含义，警察机构自然就成了一切政治机构的替代物。

翌年，复兴党的《政治报告》对卡扎尔绑架“政府官员”和秘密警察系统的官僚作风作了谴责，但谴责的调子比萨达姆讲话的调子温和一些。它没有过多地暴露事实真相，以免人们用目的论来解释这些事件。难道卡扎尔不是复兴党自己孕育的人物吗？《政治报告》中提到的心理状态是一种老现象呢，还是新现象？卡扎尔事件和“刀斧手”杀人案难道就是同一类型的犯罪吗？一个人的亲信难道就不可能是另一个人的密友吗？

那些相信帝国主义这种抽象的概念、相信帝国主义的普遍存在及其潜藏势力、相信仅仅局限在叛国和道德范围之内的政治的人，自然不会提出这些问题，因为政府在分析这些事件时掩盖了事实。只有强大而秘密的警察部门有办法“做好准备”，有办法得到对打败帝国主义有用的事实。一般人问一问“刀斧手”案件的情况都会使对方起疑心，成为其有叛国意图的根据。

卡扎尔事件不仅暗示出政府对警察的失控，而且说明了政府机构之间的矛盾。随着警察权力的膨胀，这种矛盾在新政府里更加明显。

卡扎尔最初的职位是模糊不清的。他虽然没有当过兵，却有一个军衔。在一个军官统治的国家里(1958—1968)，让一个穿着军装的人掌握警察，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从名义上讲，卡扎尔的部门受他后来绑架的内政部长和国防部长领导。然而，他在党内的地位却远远高于他们。此外，他对伊斯兰教逊尼派人士在党内占统治地位十分嫉恨，曾经主张限制党的领导机构成员担任部长级干部。他还想清除党内的左派分子和野心家。

除了卡扎尔与部长们的矛盾之外，复兴党军事局局长(此人后来同卡扎尔一起被处决)与国防部长之间产生了矛盾。后者对前者的几次命令漠然置之。总之，党与政府的权威阶层之间产生了矛盾。这个矛盾又导致了日益自信武断的秘密警察与资历深厚的军界权威人士之间的权力斗争。卡扎尔的失败表明，这场斗争以军方的胜利而告一段落。这样的结局虽然对党内文职官员不利，但只是暂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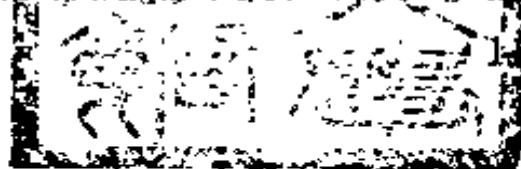
当时的萨达姆·侯赛因担任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助理总书

记和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显然，他是卡扎尔的顶头上司，但也有传闻说他的实权不及卡扎尔。当时的临时宪法迅速得到了修正，总统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拥有更大的权力。贝克尔经验丰富，善于解决危机。从1965年开始他担任复兴党伊拉克地区领导机构总书记。在此以前和复兴党最困难的时期，他都是党最忠诚的一员。从1964年以来，他就是德高望重的复兴党领导人之一。他进入领导阶层以后迅速终止了党内各宗派之间的斗争。此外，他还是1958年推翻君主政权的“自由军官”组织的成员之一，享有崇高的威望。像他这样各种才能兼备的人在伊拉克的领导阶层中是少有的。

贝克尔加强了对国防部的控制，减缓了党和军队的紧张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萨达姆的职位也没有受到威胁，因为他与贝克尔有家族关系，他们都是起源于同一部落的塔克里特人，彼此家族有婚姻关系。1964年，萨达姆依靠他对党的控制，贝克尔凭借他在国家和军队中的威信共同组织了一个领导小组。从此以后，他俩在工作上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但家族和工作关系并不足以使萨达姆爬上权力的顶峰，他的发迹益于他在卡扎尔事件上采取的三个步骤。

第一、他设法把党内的竞争对手阿卜德·哈利克·萨马赖牵扯到卡扎尔事件中去。他是党内重要的理论家，官位仅次于贝克尔和萨达姆。在几乎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萨马赖被判处死刑，但贝克尔拒绝批准执行。他被囚禁在监狱中于1970年被枪决。在此之前，贝克尔已被清除党。

第二、萨达姆果断地整顿了复兴党民兵的混乱局面。民兵里的许多地方官员勾心斗角，四分五裂。他们有的支持卡扎尔，有的支持党内高层人物，有的支持国家高层人物。萨达姆



本人当上了民兵中最忠诚的一部分部队的总指挥，他让这部分民兵在巴格达市大出风头，让他们追捕卡扎尔，查封、捣毁可疑的卡扎尔活动据点。军队没有参与执行这些任务。不管怎样，在1973年6月至7月的这场大搜捕中，秘密警察的势力有所削弱，军队的政治地位至少也受到了萨达姆的措施的影响。在他的领导下，党内进行了大整顿。

第三、萨达姆亲自对秘密警察进行了改组。撒利姆和他的家人碰到的那个机构就是改组以后的秘密警察组织。整顿后的秘密警察分为下列三个独立机构，归属革命指挥委员会的领导：

1. 国家内部安全局，即卡扎尔过去负责的部门。该部门进行了整顿，配备了现代化装备。到1973年末，萨达姆同苏联克格勃头目安德罗波夫签订了一份秘密情报协议。这是萨达姆在1972年与苏联签订的《伊苏友好条约》的条款之一。1979年复兴党的大清洗之后，党内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将这份协议的内容泄露给了西方国家。协议规定：(1)根据克格勃的建议改组国家内部安全局的各个机构；(2)克格勃提供精密的监测和审讯装备；(3)在苏联的克格勃和军事情报局举办的学校里培养伊拉克情报人员；(4)交流情报信息；(5)伊拉克驻外使馆为在与苏联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里的苏联工作人员提供帮助。

2. 军事情报局。它是对付海外伊拉克人及其他侨民的主要机构。它雇用伊拉克驻外国大使馆官员，尤其是武官办公室工作人员为其服务。

1979年，由军事情报局局长哈利勒·阿扎维起草的一份长达40页、名为《战略工作计划》的文件不慎泄密。该计划确

定了该局驻外办事处的目标。它规定，伊拉克驻外国的武官办公室必须定期向军事情报局提供所驻国的“核武器、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的生产机构和部署情况”的报告，“详细介绍该国的这些武器的能量和贮备”。这份红头文件还要求武官办公室收集所驻国的一些特殊的科学实验、合作项目、研制武器单位的科学家的“个人倾向”等情报和海军基地的详细资料，包括该基地的计划和该基地的图片资料。

《战略工作计划》有一部分谈到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它要求军事情报局查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队的结构……及其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地中海地区的空中、陆地和海域的基地、它的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力量、它在中东地区驻军的目的以及该组织兵力的运动情况”。该计划还给情报人员提供了搜集情报的方法。看来该计划的作者似乎认为，如果不把具体业务方法告诉给驻外机构的工作人员，他们甚至不知道如何去买报纸。

读者切不可轻视军事情报局派往国外的组织。1980年2月在萨达姆发出“不管敌人在什么地方出现，革命的铁拳都能砸碎它们”的威胁以后，几位反对伊拉克的领导人在贝鲁特遭暗杀，巴黎还发生了一次自杀未遂案。过去，军事情报局派人在伦敦刺杀了伊拉克前总理阿卜杜勒·拉扎克·纳伊夫（见附录1）。1980年5月，伊拉克驻伦敦使馆遭人袭击。袭击者在伊拉克军事情报局受过训练，袭击行动也得到了该情报局提供的后勤援助。1980年，巴勒斯坦的许多领导人遭到阿布·尼德哈勒一伙人的暗杀，军事情报局很可能参与了这些谋杀活动。1979年，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要求会见正在伦敦一家医院治病的尼德哈勒时，伊拉克人把医院“变成了城堡”，围

得水泄不通。

《卫报》曾揭露，谋杀以色列驻伦敦大使洛莫·阿戈夫的团伙首领是伊拉克军事情报局工作人员。这一事件为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提供了借口。《卫报》还揭露道，巴格达曾派遣了6个独立的敢死队，刺杀逃亡在埃及的伊拉克政治家。英国的伊拉克留学生协会列出了一份伊拉克留英学生在4年内惨遭复兴党政权暗害的名单。英国内政部曾就此事派专门小组调查，并要求保护留英的伊拉克学生。1983年1月11日，伊拉克出生的反复兴党记者纳波仑·巴希在美国底特律被人暗害。1977年到1980年，有一名伊拉克学生和两名伊拉克移民（都是政治活动家）也在底特律被谋杀。这些都是军事情报局所为。一些非伊拉克血统的人如瑞士籍库尔德人伊斯梅特·瓦利等也成了伊拉克军事情报局试图谋杀的对象。

下面的事例更能说明伊拉克军事情报局在国外的活动方式。1979年2月5日，伊拉克在瑞典的情报组织头头汉斯·梅林因为伊拉克驻瑞典大使馆提供秘密情报被瑞典警方逮捕，当天，该大使馆的三位官员被驱逐出境。梅林设法弄到了15万居住在瑞典的外国人的档案，其中包括许多库尔德政治庇难者。收集居住在国外的库尔德人的档案材料是《战略工作计划》的要点之一。一位名叫阿尔内·特雷霍尔特的挪威外交官受雇于伊拉克，为其提供情报而被挪威政府判处20年徒刑。

3. 复兴党情报局。这是三个机构中最强大、最令人恐惧的情报组织。它负责监视所有的情报警察机构和国家、军队、政府各部门以及青年、妇女、劳动等各种群众组织的活动。该局有一个特别安全处，负责由萨达姆的弟弟领导的复兴党民兵

工作。该处的前身就是上文提到的“特别机构”，它是萨达姆创造的。1974年复兴党的《政治报告》中有两段文字描述党的情报局，这是复兴党唯一公开发表的有关该情报局的材料：

在革命的初期，党着手建立一个特别机构。该机构最初叫做关系总局，后来改名为情报总部。党还加强对安全和警察部门的控制，任命党员和无党派爱国人士担任该部门重要岗位的负责人，改组了某些机构，教育了安全警察系统的工作人员，使他们更加明确了革命的思想和新时代的要求。

在近几年中，特别安全机构在党员的领导下，发展成为工作效率高、忠于领导、准确地执行党的安全任务的模范。尽管特别机构的工作人员在革命以前没有做过安全工作，缺乏经验，但这些同志从党在夺取政权以前的工作经历和挫折中吸取经验，学习安全工作的方法。他们在揭露国内外的阴谋活动、镇压和肃清阴谋分子方面卓有成效。这个机构在侦破间谍网工作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复兴党情报局与其它的情报警察机构不同，它不仅是保护国家安全的专门机构，而且是一个具有鲜明的政治特色的机构。该局最初的工作人员虽然缺乏业务经验，但却具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和对党无比忠诚的信念。该局在招募特工人员时着重考察其政治觉悟，至于他们在业务方面是否能胜任工作并不重要。

总之，这三个机构的前身是国家内部安全局。1963年，该局在卡扎尔的领导下干了许多惨无人道的坏事。他们在巴格

达市建立了许多临时总部，雇用未受过正规训练的国民警卫队队员胡作非为，随意抓捕行人，并诬告他们是共产党人或卡赛姆的同情者。1968年，复兴党设立的特别安全处使用同样的方法残害平民百姓。不过，正如1974年的《政治报告》所言，那时安全局的复兴党人还不太多，后来，复兴党政府想方设法在安全系统的重要岗位上充塞才华卓越的复兴党干部，加强其控制。因为他们知道，在这样的重要机构里，像卡扎尔这样的老板如果变坏的话，整个复兴党事业就要受到威胁。

在萨达姆改组以后的情报安全系统里，老板变成了一位不露面的复兴党官僚；整个安全体系更加健全，更加复杂。整个系统不是由一位大老板负责，而是由许多地位和级别不同的人负责，以达到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目的。复兴党通过党的情报局实现了它对情报安全系统的绝对控制，建立了以间谍对付间谍的体系。卡扎尔时期国家内部安全局和复兴党情报局之间的区别在萨达姆时代已经消失了。所有的安全机构都变成了政治机构；党完全控制了国家。在伊拉克，不仅受监视的普通人感到恐惧和不安，就连秘密警察的各级官员也感到恐怖和危险。今天，特工人员及其老板可能得到特权和大笔奖金，但明天这一切有可能被收回；今天他们可能在审讯别人，明天他们则可能成为审讯的对象。恐怖和不安时刻困扰着他们的心灵。

法迪勒·巴拉克博士为秘密警察写了一本描述伊拉克的犹太人和伊朗人学校的书。这本书于1984年出版。巴拉克于1982年被任命为复兴党情报局局长。他在工作的同时坚持写作。

他在书中首先提醒读者，由于他是学者兼党员，又由于他

占据高位，他拥有别人所没有的科研机会。他的书是由总统办公室批准出版的。不管人们怎样看待这本书，它至少体现了秘密警察和情报人员前所未有的“才华”。巴拉克说他写这本书完全是受了萨达姆在 1979 年的一次讲话的启发。萨达姆提醒人们注意：“伊拉克国内邪恶的扩张主义势力正在通过社会和政治手段进行破坏活动。”他指出，包括伊拉克的伊朗人和犹太学校在内的扩张主义势力企图把教育领域作为“从思想和精神上奴役”伊拉克青少年的理想阵地。

巴拉克及其手下的特工人员通过研究认为，伊拉克的伊朗人和犹太人学校是为实现一个长远的政治目标而创办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表明，自公元前 7 世纪以来，在每一个历史时期渴望收复犹太人的国土“冲击着每一个伊拉克犹太人的灵魂”，这一渴望多次使他们投靠英国。巴拉克相信了苏联秘密警察为反对犹太人而伪造的《犹太法老议定书》。他认为，共济会是连接犹太复国主义者领袖、英国帝国主义和伊拉克当地犹太人的野心的纽带。他们密谋要通过教育领域来传播错误的思想，把教育作为主要手段来传播推翻伊拉克政府的思想。巴拉克手下的秘密警察还认为：“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实施占领巴勒斯坦地区的计划中，伊拉克犹太人学校对培养军事和间谍人员十分重视，尽管他们的努力可能是间接的。”

“伊朗第五纵队”的故事也是这样杜撰出来的。伊拉克现在的政府认为，自从公元前 539 年以来，这个纵队就一直密谋推翻伊拉克的阿拉伯主义思想体系。

世界各地的警察组织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看待一切事件。泛阿拉伯主义的警察认为，在历史上，非阿拉伯民族都有谋反的企图。对巴拉克这样的警察头目来说，历史知识仅仅是

从事情报活动的背景知识。在他那长达 300 多页的书中,描述历史的部分仅占 10%。那么,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实际上,巴拉克的这本书是一本档案集。他在书中以表格形式提供了伊拉克所有的犹太人和伊朗人学校的教师、管理人员和职工及其历年的毕业生的详细情况。书中确定了这些人同海外的关系,记载着被指控为“恐怖分子”和“犹太复国主义间谍”的犹太人的名字以及他们同犹太人学校的关系。几十年前逃到伊朗、后又返回伊拉克并设法得到伊拉克国籍、企图占据政府、商业组织和反对党高位的人的名字和这些“经济破坏者”的财产、他们近几年对原教旨主义者的经济资助等材料也被列入该书。此书还探讨了混入中央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 140 位伊朗人后裔对经济的破坏作用,分析了不同时期伊拉克的犹太和伊朗商人总数及他们经营的商品、地点和对经济的影响。50 年代导致犹太商人向伊朗商人变卖存货的阴谋、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伊朗秘密社会组织成员的名字及其活动、伊拉克共产党人中 245 位犹太人的个人材料等均收入此书。

伊拉克的家庭成员姓同一个姓。所以我们必须注意,这本书提到的数字比实际的数字小。譬如:他说 70 年代巴格达共有 3245 位伊朗商人,我们应该明白,他指的是 3245 个商人的家庭。这些家庭的所有成员都被认为是第五纵队的组成部分。巴拉克本人也强调指出,第五纵队成员把他们的孩子和亲属安排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让他们尽可能地进行破坏活动。

这样的分类和归档为复兴党连续不断的驱逐流放运动提供了依据。从 1971 年到 1972 年,复兴党政府将 4 万多库尔德人驱逐出境。库尔德人是伊拉克的少数民族之一,居住在两伊

边界地区,正因为如此,他们被认为是“伊朗人”。在70年代后半叶,共有20多万人被认为是“伊朗人的后裔”,他们被谴责为第五纵队成员和伊朗颠覆伊拉克的突击队。对这些人的驱逐在两伊战争以前就开始了。有证据表明:这些人都是讲阿拉伯语的人。用巴拉克的话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伊拉克国籍,但多数是通过“非法”渠道获得的。对一些人来说,巴拉克提供的“事实”可能会引起法律和道德人士的愤怒;但对他来说,这些这些事实足以证明这些人险恶的用心和深远的渗透力。为了说明问题,巴拉克为每一个可疑的人写了简历,但他没有提供这些人有叛国意图和行为的“证据”。下面就是巴拉克给一个“破坏分子”写的简历:

伊朗人易卜拉欣·穆哈默德:1954年进入伊拉克,在沙利耶地区当搬运工,后来开始倒卖木箱和麻袋。不久,他和熟人合开了一个小商店。1958年后从事茶叶进口生意。由于他垄断了一种当时颇受欢迎的茶叶的进口渠道,所以生意越来越兴旺。他以不真实的宗教习俗掩盖自己的违法行为,扩大他的影响。他曾在他的大住宅前举行隆重的哀悼仪式。在他被驱逐以前,他拥有10万第纳尔,并有一幢价值10万第纳尔的房屋和一崭新的奔驰280型小汽车。

与其它国家的情报警察机构不同的是,伊拉克的秘密警察凭主观臆断办事,善于假定刑事犯罪和政治犯罪的存在。不管是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还是不复存在的伊朗安全局和埃及的党的情报机构,都会派特工人员或密探对可

疑的人或事件进行调查,不管谣言说他们在干什么、目的如何。就连密探在采取行动以前都会想到,单凭怀疑来逮捕或惩罚某一个人是不行的。

相比之下,1975年以后的伊拉克秘密警察凭着想象“创造”敌人。他们不必扮演密探的角色,因为平民百姓不必做任何事情就能成为他们怀疑的对象。自从秘密警察成为伊拉克最强大的机构以来,真正有组织的政党——反对党被取缔了。1975年,库尔德人的反抗被镇压了。共产党的机构被解散,他们的领导人被踢出政府机构。

今天,嫌疑犯不必做任何事情就能成为牺牲品。正如萨达姆在1978年所说的那样,嫌疑犯是“革命选择的对象”:

革命选择自己的敌人。我们应该说,革命从那些反对革命计划、企图破坏革命的人中选择自己的敌人。革命把那些违背革命原则和方向的人当作敌人,而那些保护革命的人自然是革命的朋友。

巴拉克的书只是第一部,显然他准备写第二部。它将反映“伊拉克的外来民族办的学校如美国人学校、希克马大学及其它学校在我们的社会里扮演的卑鄙角色。这些学校把自己同伊拉克人分离开来,以达到损坏我们民族的道德精神的目的”。把主观臆断变成现实成了秘密警察惯用的手段,也是他们的主要任务。

由此看来,撒利姆的看法是错误的。秘密警察实际上没有统治现代的伊拉克。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是统治者,这是因为他们享有最高政治权力机构的无比信任。实际上,他们是权

力机构政策的执行者。这是秘密警察与其它不受重视的机构的不同点。巴拉克并没有明确指出哪些人是国内的敌人。这个选择是由领袖人物萨达姆·侯赛因宣扬的复兴党思想所决定的。但巴拉克却使领袖的一般观点具体化,创造了一个可怕的“敌人”形象,通过这个形象,公众将知道哪些人应该避而远之,哪些人应该被告发。更重要的是,公众将会知道,嫌疑犯一直存在,尽管他们根本没有犯罪。这就是萨达姆讲话的目的,也“证明”了他具有预测事实的敏锐和颖悟力。这样“出色的”官僚警察机构在伊拉克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国 家 军 队

60年来,伊拉克的军队一直是实施内部镇压的机器。在两伊战争以前,伊拉克唯一一次与外国的冲突是1941年5月与入侵其领土的一小部分英国士兵的战斗。在1948年和1967年的阿拉伯与以色列的战争中,伊拉克几乎没有或者说是象征性地参加了战斗。1973年10月,伊拉克只有两个步兵师和少部分空军在叙利亚作战,其主力部队被调回去镇压本国的库尔德人去了。在1973年10月的战争中,伊拉克当局比较卖力,这主要是为了掩饰其军队在1970年9月反对巴勒斯坦运动中表现出来的令人窘迫的被动行为。自从独立以来,伊拉克只是在对付部落民族和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中获得过军事上的成功。这些事件使伊拉克军队的军官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心态。

阿拉伯世界的第一次军事政变爆发于1936年,是由三年前怂恿和指挥屠杀亚述民族的伊拉克军官贝克尔·西德基领

导的。到 1941 年英国人入侵之前，伊拉克曾发生过多政变。此后，伊拉克国王解散了武装力量，恢复了自己的君主统治。1941 年，伊拉克有 1745 名军官和 44217 名士兵，到 1943 年，几百名军官被捕入狱或被解职，士兵人数下降到 30000 名，其中的 2/3 还是叛军。在 1946 年战争结束后的 10 年中，伊拉克的武装力量再次作了新的调整，但由于军队经常卷入政治争端，所以军队内部的清洗总是没完没了。1958 年以后伊拉克政治舞台上的多数活跃分子都是逃脱了 1941 年大清洗的军官们，如 1958 年力主推翻君主政体的阿卜杜勒·卡里姆·卡赛姆就曾在他很崇拜的西德基手下服过役。复兴党政府的第二任总统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于 1936 年入伍，1942 年从军事学院毕业。

从 1958 年到 1968 年，伊拉克曾发生过十几次政变或未遂政变，两次武装起义。此外，伊拉克人和库尔德人之间的内战一直断断续续没有停过。在伊拉克的内阁席位中军人占 25% 到 35%，“上层决策机构”中有 1/2 到 2/3 由军人把持。共和国的三位总统、所有的总理（只有一位除外）、所有的副总统、几乎所有的内政和国防部长及其它的情报部门的头头都是由以前的军界人士担任。从军队来的军官被派去管理国家的工业体系和工厂，充当工业部门的次官。这些人一走出兵营就可在地方上身居要职，而他们的经历却仅仅局限在训练士兵、责骂新兵和屠杀其他的伊拉克人等活动中。除了贝克尔和少数几名军官外，这些人都不是从文官部门和党的机构中逐步进入上流阶层的。从 1958 到 1966 年，伊拉克的军事预算翻了一番，而其它发展项目的经费却没有增加，有的反而减少了。军费开支的增加和职业军人的减员正好成正比。职业军

人的减少在 1967 年的战争中最为明显。这一状况最终导致复兴党人与军人的对抗仅仅持续了 6 天，复兴党人就推翻了军人政权，在 1968 年建立了第二个复兴党政权。

在第二届复兴党政权下军队的情形又是如何呢？从 70 年代中叶起，伊拉克军队镇压人民的作用更加明显，它们用更加残酷的暴力手段镇压库尔德人。用库尔德民主党人的话来说，他们是在进行一场“灭绝人性的种族主义战争”。1969 年 8 月 8 日，摩苏尔省达坎村发生的一起事件引起了联合国的注意。在山洞里躲避炮火袭击的 67 位妇女和儿童被有预谋地活活烧死了。

伊拉克与库尔德人的最后一次战斗爆发于 1974 年 3 月。在战争开始的第一个月里，拥有 25000 人的扎科霍镇和 20000 人的卡拉镇被夷为平地。伊拉克人的飞机用凝固汽油弹对库尔德人的村庄和住地挨个轰炸。上千名库尔德人被迫抛弃家园，逃往山区。他们当中有教师、医生、工人、律师和学生，有时全家人一起出逃。接着大逮捕的浪潮汹涌而来。有人被驱逐出国，有些人被集体处决（如巴格达大学的 5 名库尔德学生被枪决），有些人被暗杀或被公开绞死（如埃尔比勒省有 11 位德高望重的库尔德人被送上了绞架）。在这场为期一年的战争中，除了在战场上丧生的几千名士兵外，据土耳其的新闻界透露，在库尔德人的抵抗失败之后，有 5000 名库尔德妇女、小孩和老人在逃跑中丧命。在向政府军投降以后，有 1000 名库尔德士兵被残酷无情地打死，还有更多的难民逃往伊朗。请看《金融时报》的描述：

阿里·阿巴斯是位库尔德人，在穆斯塔法·巴尔扎

尼率领的抵抗组织中服役。起义失败后,他和上千名士兵一起逃到了伊朗。在那里他以帮助伊朗军官打猎为生。他给自己新出生的女儿取名为“陌陌”,即陌生人的意思。同年8月,当伊拉克政府提出了对库尔德人的大赦以后,他决定回国。他和另外二十几家人回国了……

在跨过边界的时候,他疲惫不堪,面容憔悴。他知道伊拉克政府已把几千名返回家园的库尔德人驱逐到了阿拉伯南部荒无人烟的地区。但正如他对“接待委员会”的官员们描述的那样,他面临的危险不仅是被驱逐,还有可能被监禁,遭受严刑拷打或被处决。他说所有回去的人都面临这种危险。显而易见,他根本不相信伊拉克官方做出的承诺,不相信他会被送回原来的家乡。

衡量一个恐怖政权的标志是该政权在和平时期有多少殉难者,而不是在战争年月有多少伤亡者。1975年3月,阿尔及利亚和伊朗联盟,伊朗国王随即停止了对库尔德人的支持,使库尔德人的抵抗全线崩溃。伊拉克的军队开始全力执行党的政策,把大批库尔德人驱逐到伊朗西南部的沙漠地带。他们被押上军车运到了临时修建的营地,或者被流放到幼发拉底河西部的阿拉伯人村庄,让他们在那里定居。在以萨达姆·侯赛因为首的“北方事务高级委员会”指定的流放区里,士兵们在晚上把村民押上军车,沿着秘密路线运出去。军用卡车到达目的地后,士兵便给每户库尔德人发一顶帐篷,让他们5户为一组在这个所谓的“村庄”里安居,任何人没有公事不得乱走。男人们有固定的工资,干政府指定的工作。

相信政府“大赦令”回到伊拉克和被伊朗军队赶出来的库

尔德人中,有 85%的人连同他们的家人一起被政府流放到荒芜的土地上。伊拉克政府尽力把迪亚拉省、基尔库克省和摩苏尔省内所有库尔德人都赶走。据那些在流放地值勤的士兵们透露,当政府军的送水车沿着指定的路线开过来向他们施舍那一点点宝贵的液体时,这些曾经非常高傲的山里人,跟在水车扬起的尘土后面跌跌爬爬地追着,其场面真让人不堪入目。到底有多少人遭受迫害,只有等一切真相都大白以后才能知晓。《经济学家》的一篇赞扬伊拉克政府“在国内改革中慷慨大度”的文章估计受迫害的人有 5 万多名。而库尔德人和伊朗提供的数字却是在 30 万到 35 万之间。

然而,在 70 年代后半期,执行党的政策的军队与 60 年代进出政府各部门的军队有所不同。它们已变成了复兴党的爪牙,其主要原因有三个:

首先,政府对有影响的高级军官进行了一系列全面的清洗。清洗是从那些党外的军官以及对新政权漠不关心的军官头上开刀的。这些人中有纳伊夫、达乌德、安萨里尔、乌卡里等。然后清洗的矛头便指向了安曼什、纳奇布、纳斯纳特等党内从军队起家的高级官员。到 1979 年清洗运动后,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本人及其追随者也被殃及。在被清洗的 35 位官员中,至少有 16 人是最高层次的军官。清洗的步骤生动地说明了复兴党巩固其统治的手腕。

清洗第一批人是早就预谋好的事,人们只能对纳伊夫和达乌德等人的天真感到震惊。他们在推翻阿里夫政权的斗争中起过关键作用,但却无意加入复兴党,虽然他们相信复兴党的信仰。第二批受清洗的关键人物是哈丹·塔克里蒂。1963 年,他曾任复兴党政府的空军司令,1968 年任该政府的三军

参谋长和国防部长。与贝克尔和萨达姆·侯赛因一样，塔克里蒂也出生在塔克里特镇。1963年，他改变观点，转而反对复兴党内的文职官员。参与清洗他的还有复兴党的另一位显赫人物、他的死对头内政部长安曼什。伊拉克复兴党内的文职官员在萨达姆·侯赛因的唆使下，支持势单力薄的安曼什。随着局势的紧张，贝克尔觉得有必要维护自己的领导人地位，加强党内的团结和统一。1970年4月3日，安曼什和塔克里蒂被任命为副总统。这两人的职务是明升暗降。他们实际上失去了国家重要领导人的职务。塔克里蒂是在国外进行大使级访问时接到这一致命的委任的。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项任命。此后不久，他在科威特遭枪击，而几名凶手一直没有被抓获。复兴党没费吹灰之力便把其他人也都搞下了台。在复兴党执政的早期，对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清洗是司空见惯的事。一位复兴党人对大卫·赫斯特透露说：“当我看见几百名职业军人被开除时，我就为军队的战斗力开始担忧。但‘十月战争’和对库尔德人进行的战争证明，我是大错而特错了。”

1974年的《政治报告》对军队的大清洗政策作了辩护：

党在早期的活动中就注意加强在军队中的领导地位，清洗可疑分子、阴谋者和冒险者，对士兵进行泛阿拉伯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在军队中建立新的思想观念和军事标准，保证军队尽职尽责，不受卡赛姆和阿里夫政权及其在军界的贵族们打着军队的名义而背离党的方向的影响，把军队和人民结合起来，由党统一指挥。

其次，复兴党实行了一种新的责任制，巩固了统治地位。

在这种制度下，复兴党人要是会对非党军官产生怀疑，就可以拒绝执行他的命令。大多数复兴党人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在军事学院里接受过半年、一年或两年的强化训练，受训的时间取决于他们在军队中的职位。在军队中，他们仍受纪律约束，除党的命令外不接受任何重大的命令。这种相辅相成的约束使高级军官阶层权力分散，不能抱成一团与党的政策唱对台戏。

在最近几年里，复兴社会党在军队中扶植和建立自己可靠而行之有效的组织机构。这些机构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下，一直是军队的中坚力量。军队纪律严明，对党无限忠诚。为了加强和扩大党的领导基础，军队开展了大规模的思想教育和组织活动，因而复兴党现在拥有一支强大的先锋队队伍。这些人和爱国的官兵组成了一支革命的力量，他们警惕地保护着国家和人民的胜利果实。

复兴社会党采取的第三个措施就是把意识形态和军事分开。全面化的党组织不能使军官们感到，当国家处于危急关头时只有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的卫士。除了清洗和重新组织以外，复兴党的社会组织大大削弱了伊拉克自独立以来导致军人参政的理论基础。现在只有复兴党党员才可以上军事学院。那些对党不大忠心的军官都被解职了。从事复兴党政治活动以外的任何活动都要被判死罪。复兴党在巴格达出版的一份理论刊物曾对自己的政策作过这样的总结：

我们把军队的政治工作限制在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领导之下，这是因为军队只有在忠于党的情况下才能保

持武装力量的统一，履行保家卫国的责任和义务。此外，这样做还可以使那些与人民为敌的人无机可乘……

鉴于这些理由，伊拉克的革命及其领导人不允许其它政党，包括全国进步阵线，插手军队中的事务。我们从一开始就说过：“在军队中没有什么阵线。”只有复兴党可以在军队中开展合法的政治活动，处决那些不是执政党的斗士而在军队中搞政治活动的人是正义的革命行动。

一位士兵只要被认为与复兴党以外的任何政治组织有牵连，不管他是否参加过这个组织的活动，都要被处以极刑。1976年就有数名士兵被指控参加伊拉克共产党而被处决。死刑也殃及那些在复兴党1968年7月17日夺取政权以前曾在军队和警察机构效力、1968年以后对复兴党以外的政治组织感兴趣或有牵连的士兵和警察。实际上，军队和警察中的任何违法行为，包括休假后不按时报到的都有可能被处极刑。甚至连那些1968年以后曾加入过别的党派而此时正在部队中服役的人也要被判死刑——违反此项法律的人连续不断。

1971年，萨达姆·侯赛因曾满怀期望地说：“在我们党的执政方法下，任何持不同政见者都没有机会开着几辆坦克就可以把我们的政府推翻，那些执政方法一去不复返了。”1982年，在西德《明星》画刊记者的采访中，侯赛因认为新形势的出现是理所当然的：

记者：据说阁下您对伊拉克军队的指挥官不甚满意。最近

有300名高级军官被处以极刑，这是真的吗？

萨达姆：不是，只有两名师长和一名机械化部队的指挥官

被处决了。这在战争中是很正常的事。

记者：为什么要处决他们？

萨达姆：在霍拉姆沙赫尔战役中他们失职了。

《明星》画刊的记者提到的处决属于一次新的清洗运动。这次清洗不是为了争权夺利或政治上的原因，而仅仅是为了显示政府的办事效率。在霍拉姆沙赫尔失守以前，就有传闻说那些与第一次撤退有牵连的军官们将受到大量的清洗。据说有一位军官不忍目睹狂热而年青的革命卫士一个个倒在血泊中，下令从一些阵地上作战术撤退。这位军官被带到萨达姆面前，萨达姆掏出左轮手枪，在众目睽睽之下击毙了他。不论这种事情是否真实，它给人两点启发：第一，它说明这个社会要用高尚的动机武装自己的军官（换言之，军队和军官打败仗是不行的）；第二，这位军官之所以被枪毙，与以前的清洗毫无关系，而是有新的原因——他在战场上打了败仗。他死亡的方式也显示出一个新的现实：伊拉克军队已成为复兴党的工具。

近 10 年来，许多流亡在外的伊拉克人一直等待着国内能够发生变化，使他们逃脱复兴党的控制。军队中产生错觉的根源在于形形色色的泛阿拉伯主义者和左派人物的宣传。他们总是把军队当作恢复国家元气的主力军。长期以来，伊拉克的文职政府总是依赖于军事力量来显示自己在政治中的身份和地位。然而现在，随着复兴党对军队的渗透和控制，伊拉克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前所未有的两伊战争证明伊拉克的政治局势已陷入一片浑浊不清、没有航标的水域之中。

复兴党民兵

“武装斗争”一直是复兴党为了发展势力和扩大影响的一个方针。1951年，乔治·哈巴什向米歇尔·阿弗拉克建议“给复兴党再添几颗武装牙齿”。他建议把他领导的秘密的半军事化的武装力量同复兴党联合起来，阿弗拉克没有拒绝这一建议。但当他一再坚持这样做的前提是所有武装力量的领导成员都必须加入复兴党时，双方的谈判没有进行下去。复兴党的这一条件不仅是他们组织一支潜在的武装力量的第一步，也充分显示了复兴党与秘密的半军事化的武装力量接触时多么注重党的领导。这一态度不只是出于复仇或发泄沮丧感之目的。

在伊拉克，秘密的半军事化的武装组织可以追溯到阿卜德·卡莱姆·纳斯纳特组建国民警卫队的50年代后期。这些部队在1963年首次参加了推翻卡赛姆政权的战斗。在进攻国防部的战斗打响后，首先接到信号出击的是复兴党的民兵组织。民兵第一次套上绿色的臂章做好了战斗准备。他们至少有2000人，大多数人端着冲锋枪，从巴格达的民族区蜂拥而出。其他的人被派去刺杀政府里其他的主要人物。

在3天的巷战中，约有1500到5000人死亡。国民警卫队也向支持卡赛姆政权的老百姓和伊拉克共产党人开了枪。国防部保卫卡赛姆的士兵只有100人战死。此后，国民警卫队拿着提前列出的名单，挨家挨户搜查共产党人。接着，俱乐部、电影院、剧院、整个基法布大街和许多私人住宅均被国民警卫队征用，成了临时监狱或他们的总部。1963年，在复兴党统治的9个月里，被公开处决的共产党人有149名。这只是一个粗略

的保守数字。有几百人被秘密处决。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这些人都是在国民警卫队的总部被处死的。巴塔特根据官方的资料写道：

仅国民警卫队的特别调查局就枪杀了 104 人，其中 43 人的尸体于 1963—1964 年在阿加勒那和哈希沃区被发现。……在特别调查局总部尼赫亚宫的地下室里，人们看到的是各种各样惨无人道的行刑工具，包括电铁钳、逼囚犯就坐的铁钉和一架仍带有切下来的手指痕迹的切割机。沾满鲜血的碎布块到处都是，地下室的地上、墙上，血迹斑斑。

1963 年，复兴党支持的军队把矛头对准了党内的文职官员和自己的警卫队。国民警卫队被解散。此后不久，又发生了一场残酷的冲突。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总统在一次声明中对这次冲突作了解释：

国民警卫队的成员嗜血好斗，他们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无视法律，冒犯神灵，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极大的危害。1963 年 11 月 13 日，他们举行武装叛乱，使国家陷于不可收拾的混乱状态，对我国人民的未来以及整个阿拉伯民族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面对我们的忍让，国民警卫队的恐怖活动更加猖獗。军队清除这些恐怖分子，顺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

复兴党国民警卫队的第二次露面是在 1968 年复兴党发动政变第二次夺取政权的前夕。它是复兴党的下属秘密组织，机构非常严密，成员之间都是单线联系。萨达姆·侯赛因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复兴党情报局。经过精心挑选的情报局成员在政变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许多人后来都成了复兴党决策机构的核心人物。然而与 1963 年不同的是，国民警卫队作为一支秘密的半军事化的武装组织在新政权建立的第一年中，没有起特别重要的作用。他们职责内的许多任务都是由秘密警察代劳的。

然而，国民警卫队作为复兴党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一直存在着，因为他们的价值在于可以和军队相抗衡。复兴党的领导人从未真正信任过军队。这也可以追溯到 1963 年 11 月。1966 年，叙利亚复兴党的内讧导致了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领袖阿弗拉克的下台，党的领导地位被职业军官把持。这一局面更加深了伊拉克复兴党领导人对军队的疑心。1963 年在推翻卡赛姆政权的斗争中，为了平衡双方的势力，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在《政治报告》中强调指出：“我们从事的是一场人民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军队和国民武装力量将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并肩作战，夺取革命的胜利。”然而，“不幸的是，革命道路上的危险因素使我们无法完全彻底地完成计划”。这场“革命”的果实 9 个月后就被“右翼军事武装力量”夺去。1968 年后，复兴党开始考虑“解散旧的武装力量，用一支新的革命力量来代替它”。但这一计划在准备就绪的大清洗政策面前显然不实际，因而被否决了。

民兵组织从未和军队搅在一起，但在 1974 年，当一些民兵和警察系统对党有些不忠时，便遭到了全面的清查。重新组

建的“民兵”或“人民军队”组织直接受复兴党情报局的领导。到70年代后期，军队已不再是一股政治力量，民兵也换了另外一副面孔。他们成了军队的辅助力量，帮助复兴党征兵，在青年人中提高复兴党的威望。民兵的队员从以前年满18岁以上的党员放宽到非党员身上，1976年开始接收女队员。参加民兵的人来自各行各业，有工人、学生、一般平民百姓等。他们每年接受两个月的军事训练。在受训期间，有工作的人政府会给予补助，学生可以不上课。很多队员都参加过黎巴嫩战争。民兵队员都是在民兵自己的学校里接受军训，由本校以前的毕业生任教官。受训内容包括武器的使用、战术的运用、提高政治觉悟和复兴党理论水平等。民兵队伍从70年代早期的几千人发展壮大到1982年的45万人。今天，伊拉克已有几百万人参加过复兴党的民兵组织。复兴党在1974年的《政治报告》中就制定了民兵组织的思想原则：

下一阶段革命的任务要求我们尽最大的努力，为国家和阿拉伯民族的利益壮大势力，我们呼吁那些有胆识、敢于自我牺牲、有责任心的人为这一共同目标而奋斗……

……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对民众进行大规模的军训有特殊的意义。我们要最大限度地让国民，特别是那些有组织的团体和年轻人接受军训。新社会的新一代人应把使用武器当作自己最基本的技能。大批国民参加军训可以保证我们的国家拥有强大的后备军，为保卫国家、保卫革命、完成全体阿拉伯人民的任务做出积极的贡献。

武装力量总数

1981年，伊拉克的武装力量有607000人，今天就更多了。除此之外，它还拥有一支45万人的民兵队伍，这个队伍也在不断发展和壮大。

1980年是评估复兴党第二届政权发展成就最好的一年。也许就在那年春天，复兴党就已经做出了发动战争的决定。直到两伊战争开始以后伊拉克才动用了后备军队。当时伊拉克复兴党正处在全盛时期，国家的前景似乎异常光明。经济繁荣昌盛，金融储备比任何时候都高，石油资源似乎永无终结。从政治上来讲，在萨达姆从菲德尔·卡斯特罗手里接过国家领导权以后，有1/10的反对派人士被处死，伊拉克成了不结盟国家的轴心国。1980年的战争标志着伊拉克复兴党“正常”发展过程的一个终结。

我所说的武装力量指的是那些实施暴力冲突的人。这些人多得难以计数。显而易见，他们用不着随时把枪带在身边。事实上，他们打着“保卫国家”的幌子，拿着政府发的工资，奴役老百姓，压制民众运动，监视和追捕冒犯政府的人，对付复兴党认为对“国家安全”不利的人或事。那么，在1980年，这样的人究竟有多少呢？

复兴党民兵总数

70年代中叶，伊拉克民兵大约有5万人。据美国对外研究机构的报道，到1978年，伊拉克民兵已达10万人以上。伊

拉克的领导人曾表示,到 1980 年,民兵队伍的人数要达到 20 万。他们希望把每一个城镇和村庄的人都武装起来。据局外人的观察,他们早在 1978 年就实现了这一目标。战争一打响,大批人自愿拥向征兵办公室。从 1980 年到 1981 年,民兵人数已达 25 万。1980 年,战时征兵工作开始以前,民兵大约有 17.5 万人。

国家军队总数

两伊战争前夕,许多统计资料表明,伊拉克的军队人数已达 24.2 万人。士兵大多是应征入伍的。伊拉克每年大约有 12 万人达到入伍年龄,1978 年能够在军队服役的人数已多至 150 万。入伍当兵或是自愿短期服役的人退伍后都要在后备役部队里服役 8 年,并定期接受训练。后备役部队常常执行短期的军事任务。据估计,伊拉克的后备役部队有 25 万人,虽然应征入伍的人按规定服役 2 年,但此项政策随意性很大,有的人甚至被迫服役 5 年。

表 1 显示的是 1968 年以后军队的变化情况。在 1936 年到 1941 年和 1958 年到 1968 年的两次军人执政期间,军队的人数迅速增长。在复兴党统治的 12 年中,军队的人数又增加了 3 倍。1968 年以前军人执政时,扩大军队兵力是很正常的,因为那时伊拉克还是一个典型的第三世界国家。到 1977 年,伊拉克的军队人数已是阿尔及利亚的 2.5 倍,而阿尔及利亚在很多方面都与伊拉克相似。到 1980 年,在阿拉伯国家中,伊拉克的军队人数仅次于埃及。每 1000 名伊拉克人中就有 18 名士兵。这个比例是伊朗军队发展高峰时期的 2 倍,是 70 年

代埃及的 2 倍,是拉丁美洲拥有军队最多国家巴西的 12 倍。这一数字表明,到 1980 年伊拉克服过兵役的人数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说复兴党以前曾压缩了军队人数,那么预备役部队人数却大大增加了;全社会的军事化程度明显地提高了。

表 1 伊拉克军队人数的递增与人口比例

年代	大事	军队人数 (千计)	总人口 (千计)	比例 (每千人)
1933	独立以后	12	3300	4
1936	中东第一次军事政变	20	3600	6
1941	泛阿拉伯主义高峰期	46	4100	11
1943	同英国的战争结束后军队分裂	30	4400	7
1949		45	5100	9
1963	卡赛姆政权被推翻	50	7500	7
1967	阿以战争	82	8500	10
1972	复兴党继续执政	102	10000	10
1977	复兴党专政	188	12000	16

1980	9月份两伊战争爆发	242	13200	18
1982	战争继续	342	14000	24
1984	战争继续	607	14600	42

从表1中可以看出,伊拉克军队有三次大发展。第一次是从独立以后的1932年到1941年泛阿拉伯主义运动的结束。第二次军队增加稍有缓和,是从复兴党短期执政的1963年到1968年。卡赛姆执政的1958年到1963年,军费开支虽然庞大,但军队人数无明显的增加。第三次军队人数的增加是在复兴党第二次执政以后。仔细分析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出政治领域泛阿拉伯主义势力的兴起与军队人数的增加有着历史的联系。

尽管如此,第三次军队人数的迅猛增长在1968年还没有开始。军队人数是在高级官员被清洗、复兴党的权力机构稳固以后开始的。这时,军队对复兴党的独断统治没有新威胁了。复兴党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军队发动政变的能力被大大削弱了,军官们的权力非常分散。但这并不能解释伊拉克军队猛增的原因。在过去,军队直接统治国家或者充当镇压国内人民的机器。这两个条件不论是分开还是合二为一,都是伊拉克军队人数猛增的原因。但现在的军队已成了一股政治势力,镇压人民的历史任务已被其它机构所代替。这种变化趋势表明,复兴党已把军队工作的重点放在实现党的目标、发展党的运动

上了。与以前的其它政权相比，复兴党政权拥有更加强大的国家机器。

警察总数

在君主立宪制时期，伊拉克的警察从 1921 年的 2500 人增加到了 1941 年的 12300 人，1958 年又增至 23400 人。这一数字不包括 8368 名机动军官和士兵，他们是君主镇压骚乱的工具。从 1958 年到 1968 年，警察部队主要是军人政权的附属。

复兴党第二次上台后，警察的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无法把这时的警察人数与以前的人数作比较。今天要是说“警察”，那就必须包括许多独立的机构，而这些机构与警察之间的关系永远也说不清。这些机构都独立于军队和民兵之外，其中包括复兴党情报局、军事情报局、秘密警察、国家内部安全局、边防警卫队、机动警察防暴队、国家总局和警察总局。而警察总局又下设一系列特别机构，如交通部、缉毒部、技术调查部、海关部、地方警察部、铁路安全部、政治指挥部、公共设施安全部、警察学院和特警部等等。所有这些部门除了军事情报局以外，都受内政部的领导。复兴党情报局虽然不受内政部的领导，但它的大多数成员又算作是警察，部署在全国各地的群众组织之中，内政部主要负责警方、国家安全、社会秩序等方面的事务。不管怎样，内政部不管琐碎小事。公众事务、住宅、通讯、信息、文化艺术、劳工、外交事务等都由独立的部门负责。

第八情报局由总统事务部掌管。这个机构的成员有的是

复兴党情报局成员；有的是国家内部安全局成员；有的身兼双重身份。这个部是一个特殊的自治安全组织，直接受总统的领导。70年代后期萨达姆·侯赛因当上总统后，这个部的人数迅速增加。

边防警卫队和机动警察大约有5万名。边防警卫队主要驻扎在伊拉克北部与伊朗、土耳其和叙利亚的边界地带，任务是反走私和防止敌人渗透。机动防暴警察主要是协助正规警察部队对付国内的骚乱事件。它配有步兵武器、火炮和军用车辆。它还有一个突击队，该突击队曾被用来对付库尔德人游击队。

内政部是目前伊拉克政府最大的一个部门。其雇员从1976年的102422人增加到了1978年的151302人。总统事务部的人从24073人增加到57768人。在政府的23个部门中，它的人数增加最快。1979年，内政部宣布要继续扩大自己的国内安全力量，“以便能以最快的速度处理内部事务”。假设这两个部的人员在1978年到1980年的增长率与1976年到1978年的增长率相同，那么这两个部门的总人数在1980年就会达到346000人。为了不引起争议，我们假定这些人中有1/4的人所从事的工作与国家安全事务无关，那么剩下的还有26万各种各样的警察和安全人员。即使我说的有一半是错误的（这种可能性很小），警察和民兵加起来也大大超过了现有的军队人数。这绝对是国王礼萨统治时期伊朗军队人数的2倍。

表 2 伊拉克武装力量与其总人口的比例

武装力量类型	武装力量人数	与总人口比例(每千人)
复兴党民兵	175000	13
军队	242000	18
警察	260000	20
总人数	677000	51

小 结

表 2 显示的是复兴党政权在 1980 年全盛时期的武装力量总数。在和平年代,伊拉克有 1/5 的人(约 340 万人)参加过这样那样的暴力机构。与任何一个国家相比,这个比例都是不协调的。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数字揭示了这个国家组织中的一切重要特性。人们只能在内心深处表示自己的不满,而这种不满没有任何意义。由于这个国家政体的特性决定了它必须捏造一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政治反对势力,一旦他们玩弄起这种把戏,与社会有关的一切事情几乎都无关紧要了,如阶级结构、基督教派的忠诚、知识分子的偏见、收入不平等等其它社会和政治上的不公平都算不了什么。

巨额的石油收入并不是伊拉克出现这种奇怪局面的关键,因为收入还用于国家发展和其它消费方面。意外横财也无法解释伊拉克复兴党为何作出这种政治选择。由于这些选择是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作出的,钱财的作用则显得重要一些罢了。复兴党为何建立起如此庞大的军队,如果用因果关系解释的话,那么,这个“原因”就只有复兴党自己知道了。

政党与国家

镇压机构的增设和党员人数的增加是同步的。1968年的复兴党,包括各种形式的非正式党员在内,不过区区几千人。而到1976年时,该党“有组织的支持者”已逾50万,其中正式党员仅1万人,其余的是所谓的支持者,他们履行正式党员的所有义务却不享受正式党员的任何权利。要成为一名正式党员,“非正式党员必须到专门学校听党课”。萨达姆·侯赛因1980年说:“100多万有组织的人员在党内实行广泛的民主,讨论国事以及由其他人作出的关于国事的决策。”1984年出版了一本同情萨达姆当局的书,作者“估计有150万伊拉克人,即占全国人口的10.7%的人是复兴社会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而正式党员仅有25000人,不足全国人口的0.2%。”

如此迅速发展壮大的党派尚不多见。1917年2月的俄国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党员仅有23600人,一年之后,人数增至115000人。内战期间,布尔什维克党员曾一度达到650000人,然而到1924年时,党员人数降至472000人。总的来说,布尔什维克党的发展是“自下而上”的,即入党人是自愿的。但在列宁逝世后的两年内,斯大林发动了著名的“列宁登记”运动,使党员人数猛增到1078182人。这次是“自上而下”的,即把所有非党工人和农民都登记入党。伊拉克的复兴社会党70年代沿袭了这种“自上而下”扩大党组织的作法。

伊拉克的“国有化”进程始于50年代,它与复兴党的发展和镇压机构的增设不同。君主制被推翻以后,国有化进度迅速加快,如表3所示,它越来越依赖于国家的石油收入。由于历

史和地理的原因,中东国家传统上都拥有一具庞大的国家机器并具有高度的城市化水平。但是,到70年代来末期,伊拉克已经与这一传统分道扬镳了。伊朗国王礼萨1977年就雇用了800000人。如果将所有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的雇员计算在内,“政府雇员就占全部就业人员的10%”。在伊拉克这个比例则至少是30%。1980年的文职人员、军人和民兵总数已接近120万,占到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城市就业人员的一半。

各种互不相同而又密切相关的因素相互作用促使了镇压机构、党组织和国家机器的迅速发展和扩大。其具体数字是矛盾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党员都是国家雇员,另外,所有民兵起初都在党内,而到70年代后期民兵中已有相当多的非党人士。秘密警察今天全部属于国家职员。这样,昔日的复兴党情报局今天已成为一个国家组织。1968年,党员和国家职员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人员,到1980年时,二者已毫无区别。在拥有100万复兴党党员的伊拉克,复兴党实际上成了全社会的替代物。政党、国家和社会已经结为一体、密不可分了。

表3 政府工作人员

年代	就业人数	人口(百万计)	比例(%)
1938	9740	3.8	3
1958	20031	6.5	3
1968	224253	8.7	26
1972	385978	10.0	39
1976	526578	11.6	45

1977	580132	12.0	48
1978	662856	12.4	53
1980	835000	13.2	63

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在 1974 年的《政治报告》中写道：

复兴党……任重而道远(1968 年)。没有夺取政权之前，党未建立起一个能够取代国家体制的国家机器，与中国革命当时的情形相同……革命者突然掌权之后，既不能摧毁现有体制，又不能迅速建立起新体制，俄国革命后也面临这种情况。彻底砸碎旧体制或者强制推行新体制将会导致社会动荡。

鉴于此，复兴党采取了迅速扩大党组织的策略，它培养了大批干部并逐渐将他们安插到部队、秘密警察和政府部门之中。正如 1974 年的《政治报告》中所说，“正是通过这一复杂而缓慢的过程，国家机器内部、立法部门、新闻、文化和教育系统才发生了必要的变化”。回头看，复兴党领导人实行这一策略时表现出的坚毅和决心是令人吃惊的，因为实施这一计划面临的困难多如牛毛。尽管有官僚主义这类难以克服的障碍，但是复兴党还是别无选择地实施着这个战略方针。因为：

一方面，客观条件迫使复兴党必须审慎地任命党员担任政府要职，另一方面，党内也缺少称职的干部。许多干部在革命前就已经出任要职，复兴党自身也需要大量

的党务干部。复兴党组织不断扩大,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其它领域的活动。解决干部短缺问题成了燃眉之急……1963年2月的作法显然没有任何指导意义。革命前的斗争使许多党员饱受监禁、流放和饥饿之苦,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没有获得足够的现代行政管理知识和技巧。

有一段时间,人们对党和政府权限的认识模糊不清。……结果是,许多同志认为,他们应该对政府工作中的所有事情负责……这种错误认识制造了许多矛盾并影响了复兴党党员干部与非党干部之间的关系。还有许多党员认为,党的威望和权利决定于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复兴党成员数量的多寡,因而,他们呼吁政府中从部长到通信员应一律换成清一色的复兴党党员……

复兴党过于急切地将本党成员安插到政府要害部门,导致了许多不幸的事件。有些党员突然位居高职便忘乎所以,狂妄自大,工作中差错百出。这些现象迫使复兴党频繁地撤换、任命干部。草率地提升干部的作法导致了党员之间激烈的不能容忍的竞争。

伊拉克处于复兴党两种残暴的夹击之中:一面是暴君和打手,一面是暴政。撒利姆事件就是这两种残暴的具体反映。显然新政府的特色是暴力加暴政,但是,暴政的范围要比暴力宽广得多。

穆斯塔夫·赫加齐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提醒人们注意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与官僚之间的心理关系。他将这种关系称之为“对压迫者使用暴力的默认”。他认为,统治集团的每一个阶层都要求它的下级绝对服从,“安分守己”。国家机器结

为一体，奴役人民，为统治集团服务。所有人员，从职位卑微的普通职员到地位显赫的部长，每做一件事情都认为是对人民的恩赐。公仆观念、奖优罚劣的制度已杳无踪影。公民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常常被践踏。相反，穿小鞋、多重领导现象却司空见惯。有些人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不惜在上级面前卑躬屈膝。人情代替了原则。在这样的国家里，你是谁，跟哪派走，能否左右逢源比起空洞的权利和头衔来要重要得多。

萨迪克·阿兹姆和福阿德·阿贾米用更加充满政治色彩的语调勾画了阿拉伯世界中国家和人民之间疏远和敌对的关系，“人民仅仅希望不受干扰，希望能够躲避领导人随心所欲的统治方法。国家——根据东方专制主义的观点——只行使统治权而不是管理权”。两位作者描述的是1967年中东战争结束后中东国家政治的衰败现象。国家要实行统治就必须使用暴力手段。这样的国家在人民眼里是没有威望的，“阿拉伯人并不忠于国家，他们只忠于家庭和家族”。基于上述观点而制定的法令，若没有强有力的暴力机构支持，是不会产生多大影响的。黎巴嫩内战为人们理解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和统治提供了一个有力而不幸的证据。

这里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第一，在国家和社会这对矛盾中，中东国家鄙视它的人民；第二，国家的权力依赖于它的暴力机构。在一些小国中，如黎巴嫩，以及大国中，如埃及和伊朗，第一个问题尤为突出，并影响着国家的政治形态。但是，在像伊拉克这样的由一个政党统治的中等国家里，情形则大不相同，政治弥漫于整个社会，甚至吞没了社会生活。

复兴党继承了阿贾米和阿兹姆描述的这种政治体制后，对它进行了改革。它为了消除人民对政府的敌意和冷漠情绪，

采取了一项全新的措施，即把人民变成国家的雇员。昔日的政权由于缺乏足够的社会基础，内战和政变此起彼伏，连年不断。复兴党执政后，建立了无数庞大的政治组织，虽然各组织之间时有冲突和磨擦发生，但执政党的统治地位是牢固的。尽管在政府高层暴力事件层出不穷，然而，复兴党所代表的政治体制却逐步建立了它实行统治的社会基础。自1980年后，伊拉克政府赖以存在的基石就是由677000人组成的一具不可一世的暴力机器。

复兴党不仅通过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改变了国家和社会这对矛盾的性质，而且给伊拉克社会注入了“大剂量的暴力”。在国家参与的各种关系中都充满暴力活动。赫加齐描述了伊拉克社会中无处不有的残暴行径，并不是因为昔日人民享有的权利被剥夺了，而是因为原有的能够起到抵抗作用的反对派被无情地连根铲除了。政府领导人的言行曾经是大众文化嘲笑的对象，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也是讽刺诗的主题，一句话，安全的文化避风港为人们发泄对暴政的愤懑之情提供了场所。但是今天，这种气氛烟消云散了。没有人再敢嘲讽政府领导人，人人敢怒而不敢言，个个噤若寒蝉。各种文章都充满了一种对邪恶的和深不可测的力量的意识，这些不可言传邪恶势力笼罩着绝望的人民的生活。人们本能地觉得，他们时刻处于一种奇异的、神秘的力量的打击之中。

第二章 恐怖的世界

1969年10月30日 星期四

当我一手提着两瓶桔子粉，一手拉着女儿准备穿过尼迪哈勒大街回家时，一辆载着黑色大型作战坦克的卡车开了过来。起初，我并没有意识到卡车在蠕动。当我看见卡车的确在朝我开来时，我急忙拉着女儿向街对面奔去。好像命运在有意捉弄我，两个瓶子正好掉在了街道中央，摔得粉碎，金黄的桔子粉撒满一地。来不及细想，我拉着女儿的手站在原地未动。心想，卡车司机也许看到了这一切。如果他真的看得清清楚楚，他一定会起疑心，会以这个小事为借口整整我这个犹太人。

卡车“吱”的一声停在我身边。驾驶员是个40岁左右、肥胖而傲慢的军人，他跳下车，冲过来看“我都干了些什么”。坐在他旁过的另一个年轻些的军人，也跳下车，手里提着一支灰色的半自动枪冲了过来。卡车司机满脸通红，瞪着两只疑神疑鬼的眼睛，不停地看着撒在地上的桔子粉，另一名军人愤怒地盯着我，手里的枪顶着我女儿的头，似乎我们一句不得体的话就会惹他扳动扳机。卡车司机朝我吼道：“你蓄意撒在路上的粉末到底是什么？”我

磨破嘴唇也没能使他相信地上的粉末只是桔子粉，瓶子掉在地上完全是偶然的。无论我怎样解释，他们都不相信。没办法，我只好用手捏了些粉末放进嘴里，心想，这下他们该相信我的话了。可是，仍然无用。卡车司机要我出示证件。他看了我的身分证后，命令我跟他到拉希德军营去接受审问。女儿听到要带我走，吓得直哭。最令我困惑的是，那个年轻军人始终用枪顶着我女儿的头。我气愤到了极点。

许多人围了过来，他们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大约15分钟后，从围观的人群中走出一位绅士。他请求两名军人上车走了算了。因为这是一件小事，也没有产生任何严重后果。一位妇女从旁边的商店拿来笤帚清扫了路面。卡车司机的气消了些，大概也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惭愧，拉上他的同伴上了车。在车上，他大声说：“犹太佬，算你小子聪明站着没动，否则早被车压死了！”

——摘自迈克斯·萨达耶日记

萨达耶为自己的侥幸感到欣慰，因为他碰上的仅仅是个士兵，而不是复兴党的忠实信徒。街上的人并没有因为有他人存在而将自己善良的本性掩盖起来。在后来的几年里，人们碰到这类事情既不会替无辜的受害者申辩，也不会愤怒地盯着仗势欺人者，而是唯恐躲之不及。几年之后，当几辆卡车冲进什叶派地区掠夺了几家的财产朝伊朗边境开去时，几乎没有人出来拦截车辆。人们对待此类事情前后不同的反应正是复兴党执政后实行恐怖政策的结果。萨达耶终生难忘这次恐怖的经历，这只是复兴党执政仅仅15个月里发生的一件微不足

道的小事。

此起彼伏的“间谍”案

1967年6月，阿以战争以阿拉伯的惨败而告终。复兴党正是乘阿拉伯世界处于危机时夺取了政权。伊拉克的政治生活遭到严重的破坏。阿拉伯世界从震惊中醒过来之后，必然要采取一些行动。与以色列毗邻的巴勒斯坦运动正是如此。在遥远的伊拉克，复兴党认为有必要做些具体的事情以配合巴勒斯坦运动。从1967年到1970年的4年间，复兴党不遗余力地向人民灌输反犹太思想，它认为，只要能使成千上万的人接受这一思想，人们就会忘记失败的痛苦。伊拉克的犹太人很少，原来生活得无忧无虑，现在却成了反犹太主义的牺牲品。

1967年9月6日，复兴党领导了一次大规模的反阿里夫政权的示威游行。他们要求当局采取果断措施，狠狠打击当地犹太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复兴党还认为，伊拉克在阿以战争中的惨败应由“第五纵队”负责。这是一个新奇的观点。实际上，伊拉克仅打了6天仗，官方统计死了6个人，伤了30人。微小的伤亡数字本身并不足道，但它们背后所显示的泛阿拉伯主义的势力却是骇人的。阿以战争中，埃及、叙利亚、约旦和巴勒斯坦死伤了数万人，领土被占领，装备被摧毁，甚至全军覆灭。所有这些，经过复兴党的大肆宣传后，连普通的伊拉克人也认为，战争的失败应该由伊拉克的犹太人负责。实际上，这些无辜的犹太人自40年代起就蜗居家中，极少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

伊拉克的犹太人在阿以冲突期间沦为社会贱民。众所周

知,这期间,阿拉伯世界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此起彼伏,这正是泛阿位伯霸权主义抬头的迹象。伊拉克于1941年、1967至1970年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反犹太运动,都与泛阿拉伯主义势力的抬头密切相关。伊拉克共产党、民族民主党,甚至传统的基督教派均未袭击过犹太人居住区。

复兴党成功地向阿里夫政权施加了压力,迫使阿里夫在他执政的最后几个月里实施了一系列敷衍塞责的反犹太人政策:他们的财产被没收;流动资金被冻结;经济合同、政府奖学金、新的就业机会均被取消;伊拉克各个大学颁布了许多限制犹太人人学的规定,并对犹太学生数额作了限制。在1967年阿以战争和1968年7月复兴党夺权期间,大约有100名犹太人被监禁,其中约有40人被陆续释放回家。值得庆幸的是,他们没有受到虐待,也没有惨遭枪决。

几天后,复兴党再次展示了它将思想意识转化为残忍的现实主义作法的“高超”伎俩。可口可乐公司在伊拉克的分公司被洗劫一空,穆斯林公司总裁和他的穆斯林经理被强行带走。这件事说明了什么?众所周知,可乐是帝国主义的产物。这次行动说明复兴党要铲除帝国主义在伊拉克的存在。几星期后,公司总裁残缺不全的尸体和被逼疯的总经理被送回各自的家中。国家很快接管了可乐公司,不知道单纯的人民喝着可乐心里是什么滋味?伊拉克人的理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恐惧感,他们被发生的事震惊了。住在伊拉克的犹太人更是焦虑万分。三三两两的犹太人和前政府部长、企业家、军官、知识分子、医生以及许多其他行业的人士被一道关进了监狱。

1968年10月9日,政府宣布说,在巴士拉粉碎了一个主

要的犹太复国主义间谍集团，17名犹太人被飞机送到巴格达的一个军营，然后又被带到复兴党的审讯中心。11月逮捕的人数直线上升，当月25日，部署在约旦的伊拉克炮兵部队参加了与以色列的消耗战。12月4日，以色列空军进行报复，打死16人，打伤30人。谣传官方的统计数字大大低于实际的伤亡数字。第二天，复兴党组织了一次有4万人参加的从解放广场到总统府的游行活动。党政官员和一批巴勒斯坦游击战士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人群抬着死亡战士的棺材，声势异常浩大。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总统向示威人群发表了两个小时的长篇演说。伊拉克电视台现场直播了演说经过。他说：

在我们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我们英勇的军队遭到不断袭击之时，第五纵队中一帮走狗和美国与以色列的追随者积极从事背信弃义的活动。他们虽然伺机兴风作浪，但终究没有逃脱人民的眼睛。这些可疑的活动无疑是美国的阴谋中的一部分。他们的目的就是制造恶毒的谣言，动摇军心，从事可耻的阴谋破坏活动，向我们英勇善战的前线部队发动进攻，分散我们的精力，使我们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伟大的战斗中。去。

我们将用铁拳毫不留情地砸向剥削者、帝国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走卒——第五纵队。

演讲中，贝克尔不时地大声问群众：“你们需要什么？”狂热的人群每次都喊道：“立刻枪毙间谍，绞死间谍，一个不剩！”

1968年12月14日晚，伊拉克电视台转播了一名复兴党高级官员审讯两名涉嫌参与间谍活动者的实况。两名嫌疑犯

都是穆斯林。他们对自己的犯罪活动供认不讳，被判处死刑。根据交代的情况看，这次活动涉及以色列、伊朗和黎巴嫩三个国家以及黎巴嫩前总统卡米尔·夏蒙和黎巴嫩基督教政治家亨利·费伦。他们将从以色列得到的大批军火经过两伊边境转送给伊拉克的犹太人，然后由一家巴基斯坦造船公司帮助交给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另外，他们还炸毁了巴士拉的一座桥，为以色列在伊朗训练伊拉克的犹太人提供方便，等等。这桩案子牵连的人中还有通用汽车公司在伊拉克的代理人。

伊拉克的犹太人被认为是这起阴谋活动的主角，而巴士拉的一个名叫纳吉·齐尔克哈的犹太人炊具商则被认为是罪魁祸首，原因是他在一座教堂外边用无线电装置同以色列通过话。1968年1月5日，伊拉克当局首次开庭审讯“间谍”时，17个被告中有13个是犹太人。这次审判与卡赛姆执政初期（1958—1960）的马赫达维案件和审判法赫德及其他伊拉克共产党领导人的案件（1947—1949）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被告的申辩权越来越少。

就是在1947年的君主制时代，被告也能够在法庭上反驳对他们的起诉，可以为自己申辩，获取公众的同情，也可以打乱法庭的程序，将法庭当作批评当局的讲坛。那时，死刑必须减为无期徒刑。此后两年内，法赫德一直在库特监狱领导着关押在其中的一间囚室的125名伊拉克共产党人，囚室成了辩论厅。1948年伊拉克人为抗议政府与英国签订的朴次茅斯条约而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活动。此后，法赫德和其他两名共产党人被判处绞刑，罪名是服刑期间仍然领导共产党反对政府。他们的尸体被悬挂在首都长达数小时。从此，伊拉克的共产党人头上就“罩上了烈士的光环”。

原人民法庭庭长马赫达维上校在法庭上据理舌战的文章不计其数。这次，被告没有获得列席者的支持。每当马赫达维厉声诛伐旧体制的累累罪行时，人群都狂呼反讥。但是不管怎么说，当时的内政部长赛义德·卡扎兹还是敢于站起来为被告辩护。他说，他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刽子手准备好的绞索。当人们看到罪犯的双脚在绞刑架下无力地晃荡时，列席审判马赫达维案件的人算是没有白来。这句话已经永远铭刻在伊拉克人的心中。

然而，到1969年，辩护律师在第一轮开庭时因为要替“间谍”辩护而不得不向法庭道歉。他们还要说“叛徒必将受到惩罚”之类的话。至于被告，他还可以在一片嘲弄声中对每一项指控说“无罪”之类的话。在以后的几星期里，不知复兴党使用了什么魔力，被告的意志崩溃了，一个个滔滔不绝地承认他们的“罪行”。

法赫德死后成为人们心目中神圣的英雄，连卡扎兹也受到了人们的崇敬。然而，1968年复兴党执政后，犹太“间谍”仿佛在大街上被人剥光了衣服一样，备受凌辱。今天，他们的名字已经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从现在起，复兴党统治下的受害者将会像冰面上刮过的一丝风一样，引不起一点波澜，他们将会默默地逝去。

1969年1月审判犹太“间谍”案成了复兴党暴力的最后一次大曝光，此后的审判都是秘密进行的。公众只有通过发狂的新闻媒介才能了解一二。秘密审讯第五纵队成员的消息不时地在电台上播出。汽车在巴格达街上被炸的消息时有所闻。人们惶恐不安，新闻界也忙中出错，汽车、楼房尚未爆炸之前，消息已披露于众。一批又一批的“间谍”被抓走。

起初，伊拉克人还怀着极大的热情关注着这种新奇的变化，但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的恐惧感越来越重，热情变成了冷漠。解放广场上悬挂着 14 具残缺不全的尸体，每具尸体各间隔 5 米，共排列了 70 米长。据说前去观看的人多达 50 万，邻近乡村的人蜂拥到广场听演说。尸体在广场上陈列了 24 小时，人群也围观了 24 小时。这期间贝克尔总统和其他社会名流轮番登台发表演说。广场上管弦乐的旋律震耳欲聋，呈现着一派节日的景象。革命指挥委员会委员、政府部长萨拉赫·奥马尔·阿里用充满激情的、沙哑的声音对狂热的人群发表演说。人群中有人欢唱，有人吐痰，还有人扔石头。阿里说：

伟大的伊拉克人民！今天的伊拉克再也不能容忍叛徒、间谍、第五纵队的走狗们大肆猖狂了。弃儿般的以色列、美帝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你们听着！你们所有的肮脏伎俩终将大白于天下！我们绝不会就此罢手！你们的间谍纵然有成千上万，也都会被一个个地绞死！伟大的伊拉克人民！这仅仅是斗争的开始！伊拉克伟大的、不朽的广场上将布满叛徒和间谍的尸体！你们等着瞧吧！

阿里说对了，这只是暴力的开始。在以后的几年里，伊拉克几乎从不间断地审理着一个又一个的阴谋和间谍案。贝克尔连篇累牍地发表演说，声称“人民的手始终伸在罪犯的背后”。仅 1969 年一年，官方公布的处死间谍案件就有 8 起。他们分别于 2 月 20 日、4 月 14 日、4 月 30 日、5 月 15 日、8 月 21 日、8 月 25 日、9 月 8 日和 11 月 26 日被处死。这 8 起间谍案中，绝大部分都是穆斯林或者基督教人士所为，偶然加进几个

犹太人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在2月份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贝克尔一反常态，强调说下次要审判的间谍将全部是穆斯林。贝克尔的有意强调说明犹太人的厄运即将降临。这种作法极富戏剧性。果不其然，审判前总理巴扎兹一案时，13名被告中有两名犹太人。伊拉克犹太人的“地位”随着暴力的加剧不断“提高”，起初是贱民，进而成了第五纵队中的首恶，最后变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代理人。这样，巴扎兹一案牵连上几个犹太人就更能“证明”巴扎兹已堕落成了以色列的间谍。

贝克尔极为赞赏复兴党“挖掘”间谍活动的战略方针。他在1969年7月的一次演说中说：

摧毁间谍网不仅具有深远的革命和阶级意义，因为间谍分子与剥削阶级和压迫阶级（指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亲西方派、国内外的企业界人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具有战略意义，因为消灭剥削阶级是民族解放的任务之一。……消灭敌人、获取胜利的任何战略计划都必须首先是洗劫敌人的腰包，因为金钱能帮助敌人得到情报，也因为金钱能使敌人进行煽动活动，搞反宣传，扰乱人民的视线，动摇人民获胜的决心。长此下去，人们将变得意志消沉，自卑畏缩，消极地等待失败……当我们决心铲除间谍网时，我们就清楚地知道，打击间谍活动必须与打击封建剥削者和资本主义者同时进行，以净化我们的国家，肃清帝国主义在经济领域的流毒。

1970年1月21日，巴格达电台宣布，政府又粉碎了一起阴谋活动。几小时后，枪决就开始了。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

里,共枪毙 44 人,逮捕的人不计其数。无数的财产被没收。他们被指控充当了伊朗的爪牙。伊朗向他们提供了大量金钱、高级发报机和 130 吨重的武器装备。所有罪证,包括武器,都陈列在展览馆了。一堆枪支、一箱箱弹药、一盘盘磁带、一捆捆钞票就是当局提供的铁的证据。当局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借机宣传革命的必要性。两名战士在与罪犯的搏斗中献身,政府为他们举行了大型悼念活动(复兴党最关心这类细节)。政府通过各种新闻媒介播放、报道、刊登、罪犯的口供、大型军火库的照片、用密码书写的信件等等。一时间,妻子们纷纷登台谴责丈夫的罪行。在这个事件中,所谓的阴谋家似乎不是恶魔就是白痴(罪犯们曾计划,一旦不能消灭所有的复兴党成员,就放水淹没巴格达和萨马拉两座城市)。复兴党声称,一年前他们就渗透到敌人内部,并使 30 名党员担任了敌人内部的领导职务。罪犯一批批落网后,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不可辩驳的证据。他们不得不如实交代。他们认罪后,随即被枪决或绞死。他们的口袋里还装着拟定好的出任政府部长和其他重要职务的人员名单。萨达姆·侯赛因在一个庄严的声明中说,早在 1958 年革命之后,敌人就开始酝酿这桩阴谋,目的是要把伊拉克变成英美帝国主义的工具,在伊拉克扶植一个傀儡君主。他们选择现在这个时间就是要动摇我们反对以色列的决心,就是企图破坏我们寻求和平解决库尔德人冲突的努力。

1970 年以前,阴谋案的细节和“证据”均公之于众,而到 1974 年时,复兴党似乎胆量不足了,再也不敢随便公布“证据”。同年,政府逮捕了 160 名著名的企业家、学者、专家等,罪名是他们参加了共济会。事情是这样的:当局打开一个保险柜时,发现了一个叫查德威克的人于 1942 年邀请一些人参加在

他家举行的晚会的请帖(原始档案保存 15 年后可以公开)。查德威克于 1958 年逃离了伊拉克。被捕的人平均年龄在 70 岁以上,其中许多人都是卡赛姆执政时共产党的支持者。首犯已经 92 岁,曾于奥斯曼帝国灭亡前 10 年,即 1908 年在印度的孟买参加了共济会。官方据此认为他与国外有联系,这种牵强附会的作法是十分可笑的,这种“天方夜谭”慢慢地露出了破绽。一桩桩事情表明,复兴党越是要极力根除想象中的反对势力,保持“扫荡”的高效率,它就必然变得越来越疑神疑鬼。

复兴党执政后连续 4 个月的暴政,到 1969 年元月一次绞死 14 名罪犯时达到了高潮。这次暴力行径具有三个主要特征:

第一,它既预示着更多的屠杀的到来,也是对那些寻求建立自由的伊拉克共和国的帝国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发出的“示威”警告。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塔里克·阿齐兹在 1972 年 7 月 17 日发表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坦率地讲,人民经过 40 年代后发生的一切和 1968 年的革命后,对任何一届政府铲除间谍网的努力、意图和能力都持怀疑态度。

他们认为,任何一次摧毁间谍网的战斗都将以妥协而告终。他们甚至觉得,间谍活动已经渗透到历届伊拉克政府的最高层了。鉴于此,我们才决心毫不留情地粉碎所有间谍活动,并将罪大恶极者公开处死。我们不应该认为,数十万到广场观看绞刑架下的尸体的人都是野蛮人,因为那是不公正的,是错误的。这件事情说明,革命政府在巴格达最重要的广场上树起了一个“自信纪念碑”,它

向人民证明，过去办不到的事情今天已成为铁的事实。

第二，虽然 1969 年 1 月的“杰出表演”与粉碎的一次政变以及削弱反对派势力的作法（迫害党内和军队的人士等）并没有直接的联系，然而，它却拉开了此后不断审判间谍案的序幕。1969 年元月的审判与本世纪 30 年代的莫斯科审判有着异曲同工之妙。1937 年至 1938 年的莫斯科审判表面上只牵扯到 10 多个布尔什维克元老。当然，这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小部分，在后来的清洗中数百万苏联人受尽了折磨。虽然复兴党暗藏的敌人很多，但肯定不会有数百万。

复兴党暴政的第三个特征别具一格，与苏联 30 年代的暴政不甚相同。1969 年 1 月，复兴党绞死的人并不多，但却让群众观看了全过程。这对复兴党在伊拉克取得合法化地位至关重要。复兴党虽然相信夺取政权必须经过革命，但它取得政权时却没有经过这一过程，因而，如何使复兴党合法化就成了全党上下最关心的事情。群众如潮水般涌向解放广场，他们在街道上的言行就是对复兴党的认可。然而，“莫斯科审判”却是迫害 1917 年革命中的功臣。斯大林这样做时仅仅为了他个人和曾经领导过俄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而复兴党实施暴政却是为了复兴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伊拉克的犹太人素来被认为是社会的贱民，复兴党枪杀犹太人并不是要向人民证明犹太人该杀，而是要向人民显示，它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人民的安全和利益。

斯大林主义者和复兴党都认为，表象世界掩盖着深刻的历史事实。在复兴党看来，帝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以及阿拉伯联盟概莫能外。在这个日益堕落的世界里，一个人所看到

的、听到的以及接触到的现实，与想象中的现实不同，它反映着现实的部分本质。罪犯的口供及有意安排的审判仅仅是为了证明复兴党早已得出的结论：罪犯本来就是邪恶的罪犯，不管他是否登台“亮相”。

在60年代的伊拉克，复兴党狂热地坚信这种认识，全社会也赞同这种观点。复兴党与社会达成了一种真诚的共识。当然，也只有建立了这种共识后，前文叙述的屠杀事件才可能发生。1969年，复兴党成员有了这种坚定的信念之后，才在一年里枕戈待旦，随时准备粉碎敌人的阴谋活动，以捍卫党和“革命的利益”。而伊拉克人也确信，国家的确粉碎了一小撮间谍的破坏活动，因为帝国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就他们的本质而言，必然要搞间谍活动，伊拉克的犹太人，至少是部分的犹太人也必然要从事犯罪活动。

凡是与复兴党这种先入为主的臆想相抵触的想法都被认为是荒谬的，真理成了一个不能被事实“轰倒”的碉堡。1969年1月的惨案没有得到人们的同情，这并不是因为伊拉克有根深蒂固的反犹太传统。相反，伊拉克社会中从未有过这种传统。这起惨案只能说明伊拉克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伊拉克，人性与民间社会一起被埋葬了。民间社会被复兴党和政权吞没了。复兴党的思想意识取代了人性。

尽管惨案爆发之后人们议论过一阵，然而在这今为止西方所出版的关于现代伊拉克的著作中，几乎没有一本提到这件事，也没有任何作者将“惨案”与复兴党1968年掌权之后争取合法化的作法相联系。当我们透过多棱镜观察复兴党的暴力活动时，就会发现这桩惨案有其独特的意义。这次暴力活动只是整个恐怖世界里的一个小小的窗口。

新的恐怖

1969年“一月惨案”因有无数的群众参加而与此后类似的事件稍有不同。后来虽有过无数次杀戮，但观看的群众却不多。事实上，同年2月20日绞杀6名穆斯林和两名基督教人士时，组织起来的游行队伍已经有点惴惴不安了。人们经过了一个从漠然到悲观再到怀疑最后到恐惧的心理过程。随着暴政的升级，人们的恐惧感日益加深，原来的热情被恐惧感所取代。

在“一月惨案”中，伊拉克人似乎与复兴党建立了一种共谋关系。然而正是由于这种关系，伊拉克人才变得惊恐不安。如果说这种关系仅仅体现在1967年到1970年4年内的多次群众性声援活动中，那么，他们的恐惧感也许不会如此强烈。“一月惨案”中表现出的共谋关系正是复兴党政权多年努力的结果。这期间，复兴党人数不断增加，国家机器日益庞大，人民与复兴党的共谋关系也变得日益牢固。伊拉克1968年之后的“国家化”进程与其它第三世界国家的党完全不一样。伊拉克社会的“国家化”主要表现在，人民踊跃参加复兴党的暴力活动，积极参加秘密警察、军队和民兵等机构。只有了解这点之后，才能真正理解恐怖在伊拉克的作用。

一旦人民群众开始怀着极大的热情建立个体的和集体的世界观而不是仅仅思考诸如帝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泛阿拉伯主义等等抽象概念时，昔日根深蒂固的判断是非的标准就分崩离析了，他们也必然会对经历过的事情的“正确性”作出新的认识。社会的整体意识是由不同的群体意识构成的（原则

上讲,相同的世界观是不允许有不同的群体意识的)。然而,正是从这些不同的群体意识的缝隙中滋生出了一种无所不在的恐惧感。

1963年夏天复兴党第一次执政后组织了一次暴行,目的是消除前总统卡赛姆在什叶派某些地区的巨大影响。在复兴党发动政变的第一个星期里,巴格达的绍拉区居民与复兴党的军队和民兵武装殊死搏斗。这是伊拉克历史上最激烈、最残忍的一次战斗。居民们不相信卡赛姆政权已被推翻。他们认为,卡赛姆暂时藏踪匿迹了,他会像什叶派信仰中的第十二位伊玛目迈赫迪一样突然现身,领导人民与反革命分子作斗争。

复兴党当时由一帮极左派控制着,它在电视上播放了一段卡赛姆弹痕累累的尸体的录像。连续数晚,电视反复播放这段令人毛骨悚然的录像。卡赛姆的尸体被放在一把椅子上,一个战士泰然自若地拨弄着尸体。卡赛姆是在国防部被抓住的,也是在那里惨遭凌迟处死的。摄像机录下了整个过程。摄像师用特写镜头一会儿对着卡赛姆的随从(马赫达维、塔赫尔和其他人)的尸体,一会儿对着房间的弹孔。凡是看过录像的人将会永远记住这次血腥屠杀,尤其是那个战士抓住卡赛姆尸体的头发不住地摇晃和向死者脸上吐唾沫的镜头。

复兴党正是要通过这类残暴行径威胁人民。这类宣传似乎在说:“卡赛姆已经死了,你们最好接受这个事实,否则,这就是下场。”电视上反复播放这段录像,无非是要向更多的人传递这个信息。当然,人民的恐惧也会变成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但是,如果恐惧感只是使人民胆怯,那么,这种恐惧就是暂时的,会很快消失。复兴党夺权9个月后就被推翻了,根本的原因是人民憎恶它的暴行。卡赛姆也曾是复兴党成员,他执政

后期赢得的广泛的群众支持被他的继承者在短短的9个月里葬送了。

复兴党认为,1963年这次暴行操之过急,实施暴行的作法也不可取。因此,当复兴党1969年1月故伎重演时,它制造惨案的技巧就显得无比高超了。自1963年后,公众的态度变了,他们不再是一帮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乌合之众,而是成了狂热的政治信徒。1968年之后,复兴党实施暴行之所以能够“成功”,与公众态度上的巨大变化是密不可分的。

1958年,君主制倒台,人民群众首次涌上街头,奔走相告,庆祝这一伟大的时刻。他们自发地打着阿拉伯和库尔德人的旗帜。巴格达的所有街道上都飞舞着欢呼的标语。在当时的伊拉克政治生活中,还没有库尔德人问题。实际上,在自由军官运动期间(这个运动有泛阿拉伯主义倾向),库尔德人也没有发挥任何影响。伊拉克艺术家萨利姆为新共和国设计的国徽就体现了伊拉克全社会的共同愿望。君主制时由病恹恹的鹰和枪构成的国徽体现着泛阿拉伯主义的意识,而新国徽由几种颜色和太阳、大地等抽象事物构成,体现着伊拉克的特点:太阳和大地象征着工农业的发展;太阳既温暖着阿拉伯人,也温暖着库尔德人。

在此后10年里,这些意义消失殆尽。到1968年时,复兴党铲除库尔德人的“战争”不断升级,其手法也越来越残忍。无疑,这些都是在伊拉克人的支持下进行的。库尔德人不再被当作“合作者”,而成了唯利是图的“小人”,堕落成了以色列、伊朗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代理人。当局于1970年3月被迫作出的对库尔德人的少许让步在伊拉克人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当然,若没有大部分伊拉克人的理解,当局也不会让库尔德人自

治，而会变本加厉地迫害他们。

从1958年到1968年的10年间，伊拉克群众的自信心不见了，基本的伦理标准消失了，几十年来形成的对自己的认识没有了。他们心中的“真理”已靠不住了，被扭曲了。他们完全变了。这种变化正是当局所期望的。在这种情况下，用暴力手段惩处罪犯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就成了维护复兴党统治的强大力量。复兴党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并极大地利用了它。复兴党经过多年的努力，成功地使伊拉克人民对政府怀有深深的恐惧感，这也正是复兴党继续它的统治的保障。

衡量一个政府是否残暴的标准就是考察这个政府是否允许人民畅所欲言地议论国家的政治生活。议论有口头的、书面的、新闻媒介的等等。政治行为的意义就在于让人们议论它。

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复兴党都用充满谎言的“分析”取代了人们发“议论”的本能。不了解复兴主义的局外人当然不懂其中的奥秘。他们憎恨复兴党的作法，却不相信这些作法会产生如此大的效力。这说明局外人完全不了解伊拉克的情况。在复兴党统治下，人们惶恐不安，但求自保，岂敢对公众事务乱发议论！原来，人们聚集在一起时都在议论国事，然而，到70年代后期时，政治对话和这种街头议论已完全从伊拉克消失了。顶着强大的压力而不愿加入复兴党的敏感人士，做梦也不敢想象参加政治活动的事。坚信“一切都是政治的”的复兴党政权今天已将一个最不关心政治的民族牢牢地控制着。这样，伊拉克人就成了既不会“思考”也不去总结自己经验的“群盲”，他们只知一味地相信世界上最荒诞的弥天大谎了。

要想彻底制止人们“闲谈”国事，就必须建立一个庞大的

“告密网”。告密者的主要任务不是指出某人是坏分子，而是千方百计地使更多的人在暴政统治下惴惴不安。如果在一个社会中，人人都是精神上的警察，那么，当局就能够取得极大的成功。谁是告密者？在复兴党统治下的伊拉克，每个人都是告密者。复兴党最基本的告密群是它的成员和有组织的支持者。1976年，这两类人共有50多万，到1980年时，已接近100万。他们与出卖情报的人不同，那些人只是为了钱，而复兴党的告密群纪律严明，训练有素，他们监视着所有认识的人，包括他们的同事。

伊拉克学生联合会的所有成员以及10年来享受政府奖学金的所有学生（即几乎所有在国外学习的学生，因为私人赞助是不允许的，接受国外赞助者将被处以5至15年徒刑）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告密者。1979年5月，伊拉克学联向它的数千名成员发出密令，要他们报告英国各大学反对复兴党的积极分子的情况。英国全国学联发现此事后，随即中断了与伊拉克学联的关系，并指示它在全国的分会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非伊拉克学联所属的伊拉克学生。英国全国学联还呼吁英国大学的行政部门和外办以及其它国家的学联保护受监视的伊拉克学生。

绝大多数遭受过监禁的人都定期地向有关部门汇报情况。“汇报”本身就是考验他们对政府忠诚与否的标志。告密者即使发现所听到的情况不真实，但为了报答政府对自己的“信任”，还是要积极地汇报，竟是乐此不疲。70年代初期，伊拉克共产党中的一派就断然中止了其所有通过安全部门审查的党员、支持者和同情者的往来。

现在，全社会就仅有小孩是无辜者了。一个不到10岁的

孩子在会上说，他的父母对某种事情有自己的看法，第二天，他的父母就被拖去“审讯”。一位小学女教师在课间休息时和其他教师一起看报，发现萨达姆·侯赛因作为总统穿的衣服与他的身分不符。这位教师和他的全家失踪了整整两个星期。

一名访问过巴格达的记者描述伊拉克的恐怖情况。他写道：

外交人员异口同声地说，他们无法与普通的伊拉克人交谈。“有人在这里工作了三年，一个伊拉克人也不认识”，欧洲一个中立国的大使感慨道。在外交人员与伊拉克政府的国事往来中，伊拉克方面安排的时间是非常紧张的，几乎没有会谈前的闲聊时间，通常在场的也不止一名伊拉克人。

饭店走廊的椅子上不分白天黑夜，永远坐着许多“闲人”，他们拨弄着解闷念珠，眼睛盯着住店的客人，尤其是与伊拉克商人洽谈业务的客人。旅居伊拉克的所有外国人都承认有一种恐怖感。伊拉克禁止外国出版物入境并不是导致他们产生孤独感的根本原因。

对外国人的监视不论有多么严密，也比不上复兴党政权对人民的监视和控制。欧洲一名外交官说：“我觉得，至少有 300 万伊拉克人监视着其他 1 100 万人的言行。”

在伊拉克社会中，人们互相猜疑，严加防范。用西方一位阿拉伯问题专家的话说，人与人之间到了“谁也不认识谁”的地步。

打“小报告”无疑是造成这种恐怖气氛的原因之一。写各

种形式的报告是党员的重要任务之一。心怀叵测的人会乘机反映朋友和同事的情况。报告分必须写的、自愿写的和常规性的三种,但都必须交给各级党组织。绝大部分报告都是为了讨好报告人的直接上级而写成的。政府为了消除人们“议论”国事的“恶习”而不惜煽动它的支持者干尽撒谎、影射、诽谤和背叛之能事,而打“小报告”是其中最重要的手段。报告的内容是否真实无关宏旨,这种作法本身就足以造成猜疑和恐怖的气氛,就足以把更多的人卷进当局的暴行之中。

要分裂一个集体,要挫伤一个集体的自信心,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集体成员觉得他们中间出了告密者。因此,当全社会的成员都成了精神上的警察后,这个社会就不再是一个与统治者相对立的独立的整体,而是不可避免地分化瓦解了。庞大的告密网侵犯个人的隐私,使人们不敢在公开场合谈论政治,甚至连站出来说话也不敢。在这样的社会里,人性被压抑了,人们在行动上变得格外小心。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政府越残暴,枪杀、“失踪”、谋杀、报复事件越多,它们就越是具有更大的社会意义。这时,一切都变形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事都可能发生。

暴政统治下受害者数量的多少远远没有暴政在人们心中造成的心理影响重要。大赦国际报告中说,伊拉克官方 1981 年共处决了 350 人。伊拉克的反镇压委员会提供了 789 名受害者的简历(另外还附有一份 264 名情况不详的被杀者名单以及一份 428 名关押和失踪者名单)。数字并不能反映伊拉克国内恐怖的真实情况,因为数字反映不出受害者的惨状和活着的人的心理压力,不同受害者的厄运是不同的。通常的作法是,安全人员将受害者从工作岗位上或晚上从家里带走。安全人员不作任何解释。在伊拉克的“失踪”与在中美洲的“失踪”

不同。中美洲的政府否认参与这类事件，而复兴党却是公开屠杀。几星期或者几个月以后，受害者的尸体被装在封闭的箱子里，由警察和一个平民送到受害者的家里。家长要在写着死因的死亡证明书上签字。死因通常是火灾、游泳溺水等。交接手续之后，那个平民和警察一起举行悼念仪式。但不管这个平民是谁，他（她）都不得看一眼尸体。悼念仪式的费用由死者家属提前支付。从警察敲门到悼念仪式结束，只需几个小时。

表面仪式和死亡真相之间的巨大差异就需要谎言来填补，甚至死者家属也参与制造谎言。经过这个仪式之后，家属就可以宣布死因，可以举行公开的悼念活动。谎言掩盖了棺材里的真相。当社会公众始终如一说着这类谎话时，就连口是心非的人也困惑不解了。撒谎成了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条件之后，即使有了确凿的证据，人们也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就显得无力而浅薄。

70年代后期伊拉克发生的重金属中毒案就清楚地说明了这点。嫌疑犯，或者叛逃者的亲属接受审讯时，喝的软饮料中含有慢性致毒金属（铊和铅）。大赦国际自1980年5月起不断收到反映这一情况的报告，到9月份时，它已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并给萨达姆·侯赛因写信，呼吁他公开过问此事。英国医生确认，至少有两个人，其中一人已死，是铊中毒。大赦国际1981年的年度报告中还提供了15名死于铊中毒的伊拉克人的简历。这15人都死在伊拉克国内。

英国的《新科学家》杂志调查了伊拉克科学家中毒的情况后写道：

绍卡特·A·阿卡罗耶，工业化学家，里兹大学毕业

业，曾“偷偷地”从巴格达一家医院给《新科学家》调查人员打了电话。他用库尔德语说：“他们安排的事没有置我于死地后，就在我接受治疗的医院里给我服铊。请向所有人说声再见。”随即电话就中断了。

自1968年起，伊拉克的审讯中心就使用着一系列严刑拷打和其它奇怪的逼供方法。这些情况几乎从未在国外报道过。尽管当时的伊朗国王礼萨与西方国家关系甚好，伊朗学生的类似情况也常常见诸于西方的报端。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伊拉克比伊朗更封闭、更神秘、更恐怖，而是因为，70年代流亡在国外的伊拉克人由于对政府怀着极深的恐怖感而不敢去大赦国际这类组织叙述他们的不幸。直到1981年4月，大赦国际才在一篇题为《伊拉克：虐待的证据》的专文中，报道了15名自愿到这个机构叙述他们被致残的经过的人的情况。复兴党提审这些人之后，认为无罪，便将他们释放回家。他们后来逃离伊拉克。15名不幸者中仅有两人经过了审判程序。他们说，严刑拷打的目的是为了调查其他人的观点。另有几人被致残是因为拒绝加入复兴党或者拒绝在谴责其他党派的声明上签名。

伊拉克人脸上流露着深深的不安全感。只有见过这种表情的人才能理解70年代的伊拉克人，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离群索居，才能理解这种悲剧的深刻含义。新的恐怖使人们变成了条件反射式的“动物”；新的恐怖取代了人们的公民价值、同志之情、民族意识甚至思考的能力。当然，人们的情感并没有消失，只是每当这种恐惧感攫取了他们的心理后，这些情感就被忘却了。请想一想下而这种情况：普通的无党派伊拉克学生

到大使馆履行常规手续时,总要找几个朋友站在街上,然后定时地向他们露面,以证明他没有遭绑架。

残忍与权力

谁若被认为是异端分子,谁就要遭受系统的、按惯例的严刑拷打。拷打是逼出“事实”的有效手段(伊拉克的刑事犯几乎从不遭受拷打,监狱的条件相对而言,还很不错),也是获取情况的捷径。拉丁美洲的拷打狂也是这样认为的。伊拉克调查机构的组织原则就是拷打。这类机构在反对党被剔除、反对势力被粉碎之后大量涌现,这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思。复兴党执政初期,其政权基础不牢固,这类机构尚不太多。但自1975年之后,这类机构迅速遍布于全伊拉克。

第三世界国家严刑拷打的“技术”和器械通常都是进口的。美国向三个拉美国家不仅提供了技术和顾问,而且还负责人员培训。伊拉克的拷打技术和器械都由苏联和东德提供。不论是拉美还是伊拉克,总是在国内大量需求这类技术和刑具后才与那些急于提供技术的国家洽谈“业务”。

在当代伊拉克,严刑拷打司空见惯。不论是在预审、实施绞刑、悬尸示众或者是枪决时都离不开拷打和折磨。这样做的目的,既是威慑和恫吓,又是对权力的炫耀,也是对政府向国家的敌人宣战权利的扩展。1969年1月的暴政曝光,既起到了法律作用,又起到了政治作用。被认为是叛国者的人受到了“惩罚”,政权又得到了巩固。复兴党政权曾经由于内部的原因而摇摇欲坠,而当局认为是由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外部捣乱所致。悬尸于广场的大型“活动”以及群众的踊跃参加说明政

权稳固，政府的权力剧增。1月6日是伊拉克的建军节，每逢这天都要举行游行和阅兵式，但1969年1月6日却是个不寻常的日子。它是庆祝一种开端，而不是政权的稳定和延续。由于千千万万的人观看了绞刑，目睹了残忍的情景，它的意义就更加深远。政府这样做的意图并不是要维护法律的尊严，而是要向已被定罪的人头上压下一吨重的砖头”。一方面让人们“欣赏”，一方面又要恫吓，权力正是在这种不平衡状态中得到了巩固。因此，政府表现得越残忍，这种不平衡状态就越严重，政权就越稳固。

那么，其它形式的暴力活动（如折磨和将装在封闭的箱子里的尸体送回受害者家中后举行仪式等）有什么意图呢？这时，政府的意图正好相反。在伊拉克，逮捕、指控、审讯、逼供、审判、定罪、判刑、枪毙直到送回尸体的全过程，现在都是秘密的。原来那种公开的、能感觉到的惩罚不见了。昔日风雨飘摇的政权今日已成了一种恐怖的、驱之不散、无处不在的存在物了。人们通过与政府的共谋关系使政权日渐稳固，人们心中新型的恐怖也成了稳定政权的前提。

复兴党原来动员群众用自己的感官去感受公开的暴力行为，现在却将死者的尸体秘密地送回家中，要死者的家属在诚惶诚恐中感觉政府的威力，让人们从感官到心理上都觉得政府的权力无所不在。这种手法的变化，说明复兴党自身已经有了变化，它不再是一个只知用残暴的手段滥施淫威的政权，而变成了一个知道控制人们心理的现代政权了。不同手法的社会作用是迥然不同的。复兴党扭曲的现代手法是它的官僚政治的产物。政权不再是一种外在的力量。因为那样的话，人们可以通过躲在家里不去观看政府的暴力行径而无视政权的存

在。今天，所有人，包括政府镇压机器中的人，都能时刻感受到政府权力的存在。谁也摆脱不了这种感觉，因为它已深深地印在了人们的心里。现在，政府处死罪犯时已不再是公开的，而是秘密的了。

毫无疑问，复兴党统治手段的变化说明它的权力越来越大，控制越来越严。当然，它现在控制的社会与伊拉克近代史上的任何社会都不相同。政府认为，它的控制主要表现在严格的出版审查、取缔各种形式的自由和铲除异端邪说等方面，一句话，就是抹煞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国家的区别。而从受害者的观点出发，昔日的统治只是使人“偶然有点害怕”，而今天的统治，却使人时时刻刻都处于恐惧之中。

清 洗 奇 观

复兴党 1979 年大规模的清洗运动，与 1968—1969 年间它为了争取政权的合法性而实施的暴力活动截然不同。1979 年的清洗纯粹是在党内秘密进行的。截止目前，唯一确切知道的仅是，萨达姆·侯赛因于 1979 年 7 月的某个时刻清洗了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总统。他将革命指挥委员会中 1/3 成员的家属扣作人质长达一个月，这期间，他强迫这些成员出面签发文件、在电视上露面，等等。与此同时，萨达姆还清洗了他们的几百名随从。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高层于 7 月 20 日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会后，被清洗的所有人，包括一些家属均被杀害。到 1979 年 8 月 1 日，已有 500 多名复兴党的高级官员被处死。

一般认为，萨达姆·侯赛因之所以发动这次大规模的清

洗运动,主要是因为他与贝克尔在怎样估计伊朗革命的作用、对伊拉克什叶派应该采取什么严厉的镇压措施、是否应该与叙利亚结盟等政治问题上观点相异。

其实,这种认识并没有揭示问题的实质。70年代前半期,贝克尔是伊拉克政治生活的中心。他在党内的资历以及他在军官中的威望使他成功地实行了几次清洗。在他的影响和作用下,复兴党内部的非军方势力超过了军方势力。他与萨达姆合作了整整10年,萨达姆从中受益非浅。到70年代后半期,政府的权力已从军人手中转移到了复兴党手中,当然,作这种区分意义不大。因为,所有军官都是复兴党党员,必须首先接受党的指示,并处于复兴党情报局的监视之下。即使我们详细考察部分受到清洗的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的背景,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断言说,复兴党开展清洗运动是为了解决党内的政治纠纷。因为至少有两名受害者即阿德南·侯赛因和加尼·阿卜杜勒·贾利勒不是复兴党成员。事实上,他们都是萨达姆的亲信。他们俩原来是基层办公室的一般职员,正是在萨达姆的扶植下才平步青云,进入了革命指挥委员会,并在萨达姆的办公室工作。不管怎么说,他们身上都有普通百姓的影子。他们被枪毙,绝不是为了解决所谓的政治分歧问题。

实际上,1979年的清洗运动标志着萨达姆·侯赛因的“领导”地位已经确定。这也是萨达姆·侯赛因发动两伊战争之前复兴党实施的一次比较重要的暴力活动。两伊战争是所有暴力活动之最。

1969年1月,不论是党内还是党外的群众都积极“参与”政府的暴行,而10年之后,在复兴党1979年7月实行大清洗时,群众已变成被动的旁观者,这次清洗的目的,就是要将群

众与复兴党的共谋关系转变为群众与萨达姆·侯赛因的共谋关系，这种新型关系成了推动伊拉克政治的主要力量。历史经验表明，一旦所有的政治反对势力被剔除，独裁专制就必然应运而生。这时，权力分担就只剩下它的抽象意义了。

萨达姆现在大权独揽。这一过程自始至终都打上了萨达姆个性的烙印。第一个“认罪”的是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穆赫伊·阿卜杜·侯赛因·拉希德。他的全家已被扣作人质。拉希德的认罪过程有录像。从全国来的几百名党的领导人看了录像。会上，面容憔悴的萨达姆满含热泪，用沙哑的语调“补充”了拉希德交待中遗漏的部分，并点出了拉希德的同党。卫兵把同党一一拖出会场，萨达姆然后命令政府的高级部长和党的主要领导成员组成一个行刑班，将拉希德的同党一一枪毙。这些人执行的是“上级的命令”，“上级”成了他们的避难所，他们中有谁还再敢篡夺“上级”的领导权呢？除了萨达姆，谁还能想出一个更妙的拉拢势力、消除隐患的计策呢？此后，复兴党的领导人便将他们的前途系在萨达姆身上了。这与他们当年让人民积极参与暴行，使人们将自己的命运系在复兴党身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1969年1月的绞刑中，复兴党与人们建立了共谋关系。10年之后，萨达姆·侯赛因与党的领导人也建立了这种关系。昔日的施暴者成了今天施暴的对象，这倒是少见的“奇观”。

第三章 复兴党与群众

思想和组织

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乔治·索雷尔在其《暴力的反思》一书中说：

经验告诉我们，人们对未来的设想如果合适，在某个特定的时期可能是特别灵验的，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对未来的设想和愿望往往是以神话的形式出现，并带有强烈的民族、政党或阶级倾向。这种倾向同人们在各种生活环境中的本能一起时时浮现在心头，并迫使人们把希望或设想付诸实践，人又通过实践不断改变自己的愿望、激情和思维活动。

拿破仑称那些不赞成他的帝国理想的哲学家是“空想家”，对他来说，这些人都是些没有用处的知识分子。自从马克思主义问世以来，西方传统下的芸芸众生就认为，一种思想及其倡导者从结构上来讲，与产生这种思想的社会息息相关。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种结构是以阶级为中心的，但对迪尔凯

姆或莱维·施特劳斯来说,它却是另外一回事。一种思想通常被认为是不完全的、带有偏见的意识体系的产物。因此,自诩为思想家的人只能使人觉得他们看问题缺乏客观性,在决策上违反常理。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拥有自己的“思想”已成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了。他们已不再像从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时期西方思想家那样去追求普遍的“真理”,而是去寻求一套能够激发国民的政治行动的思想体系。如果这一套体系行之有效,那么它比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真实。他们的思想体系代表的是一种从第三世界利益出发去观察现实的世界观。像其它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如反帝国主义和现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一样,第三世界的思想不能从更广泛的角度去考虑人类自身条件。他们并非对此有敌意,只是没有兴趣罢了。不管怎样,第三世界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和拿破仑的哲学家们的思想相去甚远。

复兴党的思想更加极端。他们认为,一切都是相对的,都处在变化过程之中。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合乎情理的,是他们的运动所迫切需要的,萨达姆·侯赛因曾对复兴党的勇士们说:“你们要时刻牢记,对于你们来说,这些特殊的原则和经验是唯一的真理,它能够帮助我们为阿拉伯民族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他在其它场合发表的演讲中宣称,要在每一个复兴党的勇士们的身边筑起一座能抵御坏思想的铜墙铁壁。这样,在外来的观念面前,他们就能成为一个“超人”,不受任何影响。在谈到革命斗争中的灵活性时,他谴责了那些认为采取灵活手段是自取灭亡的人。他说他们根本不理解,革命者面临的任务永远是“暴力和对抗”,面在这种暴力和对抗中,完全可以有

策略地采取灵活手法。

复兴党的指导思想如果不是处在一个独一无二的阿拉伯社会里，就不会成为一种真正的社会观念。这种狭隘的世界观是独立于社会现实之外而拼凑起来的思想体系。其根源仍在阿拉伯和伊斯兰教的传统以及从左派势力那里挪用的许多概念上。这两者的结合产生了新的观念。他们的口头禅就是，维护阿拉伯的统一、自由和阿拉伯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复兴党的神话和“帝国主义”一类的概念把阿拉伯社会同外界完全隔离开来。但这却未能给阿拉伯社会提供一个楷模，也未能表明阿拉伯民族将怎样现实地改变自己。它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幻想罢了。

这种思想的重要性不在其本身的观念，也不在于它和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而在于它的“首创精神”。它被认为是一个新的开端，而不是一大堆谎言。从这一点看来，复兴党并非是像斯大林主义那样，坚持认为自己的主张是“科学的”、“客观的”，而是在不断地编造“神话”。

1977年，萨达姆·侯赛因说：

那些自以为是很客观的历史学家和研究员的人在解释某一事件时肯定会有不同的观点……让读者自己去寻找结论……我们复兴党人永远不会这样来处理历史、社会和其它思想问题。……

……对历史的描写应当像我们复兴党人这样有特性。换句话说，对阿拉伯历史的描写应当从我们复兴党人的观点出发，把重点放在分析上，而不是放在现实的说教上。

比如说,在讨论阿拉伯统一问题时,我们不应该让青年学生花大功夫去研究琐碎的细节,不必让他们讨论我们是不是同一个民族这个问题,而应当让他们知道,阿拉伯人属于同一民族,这是一个绝对的真理。我们要给学生简明扼要地总结一下帝国主义为了削弱和控制阿拉伯人所从事的分裂活动。……在谈到国家的执政党时,我们应让学生认识到复兴党是伊拉克的执政党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要给他们宣传为什么我们会成为执政党的细节,宣传时要结合我们党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及党通过革命拯救伊拉克人民的职能。用不着担心学生们在这个阶段还会有什么复杂的理论、哲学和政治分析。

狭隘的地方观念和杜撰的神话是复兴党指导思想的两大支柱。因为这两点都源于一种统一的信念:一致对外,永远忠于复兴党。复兴党的最高目标就是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复兴主义民族,但这一崇高的目标却受到阿拉伯世界传统的限制。因为,即使复兴党人排除了所有的绊脚石,完成了阿拉伯世界的统一,也无法消除阿拉伯人之间的相互敌意。事情的本质就是如此,现在是这样,将来也不会改变。相反,唯一能保护自己不受外界分裂主义者进攻的方法就是不断地加强统一,提高组织水准。只有组织的力量才能对付外界的敌对势力。但目前这一力量似乎还不够强大,还有必要继续发展。复兴主义的好斗和不安正是来源于这一具有强制性的动力。

对于复兴党人来说,思想是他们采取政治行动的一个框架。虽然思想最终会证明一切事情都是合法公正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能够证明复兴党及其领导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

的。这种政治家和思想家之间的分歧早在拿破仑及其哲学家时代就已出现过。复兴党组织与它创造的神话世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种统一意味着神话是至关重要的，思想只不过是可有可无的东西。那么，这个越来越强大的组织在伊拉克是怎样把神话变为真理的呢？

年轻人的重要性

真正的复兴党人不相信 1968 年 7 月 30 日以前的人思想已很成熟。萨达姆·侯赛因 1976 年 2 月 15 日在伊拉克青年联合会的讲话中说，虽然“我们的目标是让全伊拉克的人相信并加入复兴党”，“但我们更希望所有的阿拉伯人都能成为复兴党人”。我们的党应当清楚地看到“年轻的一代今后的日子更长”。因此，在今后的革命转变过程中，他们为我们国家的将来做出贡献的时间也就更长一些。除此之外，年轻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在“转变过程中，调整和发展自己，适应新的观念和思想”。

复兴党强化自己的政治主张的做法表现在对年轻一代的培育和发展上。小学生们有少先队组织。10 到 15 岁的少年可加入先锋队，15 到 20 岁的青年可加入青年组织。他们不是童子军，但他们对革命和复兴党能够做出贡献。阿拉伯复兴社会党 1974 年的代表大会对这方面的工作作过如下总结：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取得的成就只是一个开端，远远没有达到党的要求和新形势的需要……我们的党仍需花大力气来促进青年组织的各项活动。党应该关怀我们的年轻一代，积极培养他们的泛阿拉伯主义和社会主义思

想，开阔他们的眼界，教育他们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保卫国家、建设革命、完成泛阿拉伯主义的大业中去。

复兴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后的几年里，大多数伊拉克年轻人都加入了各种各样的青年组织。在入组织仪式上，他们身着统一的服装宣誓，同入党仪式一模一样。伊拉克少年先锋队成立于1973年，是全国三大青少年组织中最重要的一個组织，分为中央、省区和地方组织。通过选举产生“中央总部”，然后再选举总部的“核心委员会”。这些组织不是党的正式机构，但却受伊拉克青年联合会的领导。复兴党有自己的青年阵线组织。学校的该组织每周举行一次基层会议，由复兴党的高级官员或拥护者给他们上党课，讲解“转变过程”中党的总路线和方针政策。党要求这些人写思想汇报，向党提供有关信息和情报。现在伊拉克10岁以上的青少年多年来一直接受这种组织的教育。复兴党从孩子们5到6岁，即刚刚入学时就开始向他们灌输党的思想。

复兴党驾驭着这些组织，并通过它们的力量来摧毁约定俗成的社会层次结构。让我们听一听萨达姆谈论阿拉伯人家庭中至今还属于私生活问题的讲话吧，这些话听起来使人毛骨悚然：

为了防止父母用一种落后的方式主宰家庭，我们应该培养孩子们抵制父母的意识。由于种种原因，有些做父亲的已悄悄地背叛了我们，但他们的孩子还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把他们培养成为家庭中有影响力的中心人物，并通过他们与家人的接触改变家人的观点和态度。我们也

要防止青年一代受坏思想的影响。

……家庭的统一不应当建立在落后的思想上，而应当与建立新社会的革命传统和策略保持一致。不论什么时候，当家庭的统一与新观点发生冲突时，……都要从有利于新观点的方向解决这一冲突……

我们应该通过孩子们把成年人监视起来。教育学生在听到父母亲谈论国家机密时要提醒他们这是不对的，当听到父母亲谈论党和组织的秘密时，敢于进行理直气壮的批评。我们要让革命的孩子遍布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使他们带着信任的目光和坚定的信念迎接来自革命大本营的任何指示。……我们要教育他们，当他们的父母亲挥霍浪费国家财富时，应对其进行有理有节的反对，应让自己的父母亲知道这些财富比自己的生命还宝贵。因为，如果国家不富裕，个人也不会富裕……我们还要教育孩子们警惕外国人，他们有可能是间谍，有可能是阴谋破坏革命的坏蛋。因此，未经允许，不准个人请外国人做客或同他们交谈。我们要在孩子们的心灵深处埋下警惕的种子，不向外国人透露党和国家的任何机密。同样，孩子们也要提醒别人遵守这一纪律。……孩子与老师的关系，犹如雕塑家同一块未成形的大理石的关系，雕塑家有能力把它变为美的化身，也可以把它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伊拉克的革命运动始终一贯地强调对孩子们的这种教育。米歇尔·阿弗拉克、萨拉赫·比塔尔和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等许多复兴党领导人都是从事这一教育的职业老手。由于萨达姆·侯赛因是在教育部召开的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

讲这番话的(当时他还严厉地指责了教育部门的弱点),因而他的这次讲话比以其它形式出现的宣传更具有尖锐性。在以萨达姆为化身的复兴党的主张后面,在庞大的教育部的各种机构后面,潜伏着强大的秘密警察,他们在教育界安插了大批走卒和亲信。

在这场永无止境、为建立“新秩序”而奋斗的运动中,每一代人都注定要成为下一代人的牺牲品。前一代人使复兴党在伊拉克取得了做梦也没想到的地位,而现在,这些人不是被杀害就是被迫流亡在外,成了革命祭坛上的牺牲品。复兴党的其它罪孽,从对外国人的憎恨到残酷消灭真真假假的反对派等,都在这一罪行面前黯然失色了。复兴党统治下的伊拉克,童心遭到侵犯和亵渎。这不是说课程设置有什么问题或者说孩子们没有上学的机会,而是说他们的心灵和性格遭到扭曲。

每个家庭都有一本苦难经。一位刚满 11 岁的孩子对我说,有一次他在学校里讲话时不小心说了错话,便立即受到审查。结果他的父母亲失踪了两个月。父母回来后,一切又恢复了正常,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没有加入复兴党的父母亲们不得不在孩子们的面前说一些支持复兴党政权的话。有的甚至强迫孩子参加青年组织。这种随大流的做法可以避免招惹是非,也可以减少孩子面临的危险。

萨达姆在讲话中暗示的紧迫感体现在他对形势的分析上。他说,虽然复兴党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我们的抱负比我们取得的成就还要大”。萨达姆在演讲中还提到:“第三世界的实验失败了,这是因为第二社会阶层的人的思想没有改变,他们也没有使其他人的思想发生革命转变。”他们没有在社会中创造一个根深蒂固的革命观念,因此,萨达姆认为,伊

拉克小学教师的责任比中学教师的责任重大；而中学教师的责任又超过了大学教授们的责任，因为大学教授们教的是道德观念已形成的学生，不能再使学生发生“质的变化”。

在伊拉克，传统的地位和权威等级制度，如大学教授在上，中学教师居中，小学教师在下的等级不是被萨达姆颠倒了，而是被废除了。小学教师只是更加接近革命的原始“材料”罢了。所有的教育者都要接受党的审查和监督。这种在政治权威面前的平等被萨达姆称为民主。萨达姆在题为《民主：个人和社会力量的源泉》的讲话中解释了他的观点：

民主与合法的权利之间并没有矛盾。但愿你们当中没有人认为民主会使自己变弱，会剥夺自己的尊严和合法权利。这是不对的。众所周知，民主与中央集权制是相辅相成的；实行中央集权制与民主无任何相悖之处。只有那些理解力差的人才会认为两者是矛盾的。

萨达姆·侯赛因想取缔的是金字塔式的权威结构。在这个金字塔上，塔顶象征最高权力，其它的权威依次下延。金字塔每一层的人都比下一层的人权力大，比上一层的人权力小。这种形式的权力结构表现在父系氏族社会和独立以后的阿拉伯官僚国家中。在伊拉克，传统的金字塔权力结构上每一阶层的权力虽然渐渐缩小，但仍有一定程度上的实权。在萨达姆的体制下，权力实体犹如一个空管子，散布在空管表面上的小点都是相同的，都平等地集结在空管的中轴线上。在这个世界里，孩子们本来是传统的伊拉克家庭中最没有自由的人，而现在，他们和自己的父母亲是平等的，父母亲的权威被剥夺了。

在所谓的“民主”体制中，“权力要求人们积极、准确地执行命令。在这种情况下，权力不是一种涉及个人的东西，而是一种条件、一种原始的客观力量。而其它象征权力的一切东西都是虚假的，与特定的年代和地方息息相关”。

萨达姆在讲话中鼓励年轻人做“有条理的人”，并赞扬说这是“我们建设新社会取得成功的秘诀之一”。它将最大限度地保证复兴党的实验不会像其它第三世界国家那样失败。那么“有条理”指的是什么呢？萨达姆在讲话中提供了部分答案：要珍惜时间；勤俭节约；坐有坐相；遵循餐桌上的规矩（他的讲话中有一段强调了用刀叉吃饭的重要性，反对传统的阿拉伯人用手抓吃的习惯）；要尊敬父母；爱护“社会主义”财产；憎恨一切资产阶级的生活习惯等等。最后他说：

习惯了有条不紊的办事方式的学生，在国家处于危急关头时，会毫不畏惧地拿起武器，日夜为国尽忠。当国家号召他们与帝国主义或一切来犯者战斗时，他们会履行自己的义务，因为他们从小就已习惯了有条不紊的工作方式。

1983年夏，英国广播电视公司在电视节目里播放了记者在伊拉克军营采访伊朗少年战俘的情景。当时，电视导演别出心裁，在画面上加了一些从电影上剪辑下来的镜头：身着迷彩服的伊拉克少先队员，随着口令，唱着歌颂复兴党和萨达姆的歌曲，昂首阔步地走着，他们的而前站着一群神采奕奕、肥头大耳的军官和党的领导人。此时电视里响起了记者采访一位13岁的少年战俘的声音。他衣衫褴褛，头上扎着绷带，瘸着腿

走路。他很平静地看着记者，两人的对话大致如下：

问：在作战中，当你知道自己和许多别的同志会死时，你感到害怕吗？

答：那些死了的人是很幸运的，他们对得起上帝，上帝把他们招走了。我打得还不够勇敢，下一次再冲锋陷阵吧！

问：你的父母亲不为你担忧吗？你不愿意离开这里和家人团聚吗？

答：我没有为伊斯兰人战死在沙场，这一定会使他们伤心的。

这个孩子身上体现了一种原始信念，而比他年长的伊拉克士兵的表现则是绝对地、毫不犹豫地服从命令。对于交战的两伊双方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显示各自思想和组织力量。战争一开始就显示了伊朗革命的广度和深度。复兴党的基础不是群众革命，因而他们不得不经各种各样的组织和机构向人民推行其政治思想。但对于霍梅尼来说，一切信念都是很自然地来源于“下层人民”。

参战的伊拉克有40%的人年龄在25岁以下，所以，被复兴党推向战场而丧生的人的世界观是在1968年7月30日以后形成的。战争的考验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复兴党用自己的偶像教育和培养伊拉克青年人所得到的成功。然而，从另一方面讲，在伊朗领土上，至少也发生过几支伊拉克部队畏缩不前的情况。当上司下令年轻的士兵开枪扫射那些为了自己的信仰，越过雷区涌上前来的伊朗童子军时，有些伊拉克士兵后退

了,一些经过萨达姆严格训练、接到命令会“毫不犹豫地拿起武器”的士兵们确实犹豫了。从这一点人性味来看,我们还有必要对伊拉克的未来抱有希望。

群众教育运动

要想造就一批时刻准备在残酷的战争中献身的人民群众,就必须让他们对大体制下的个人地位有一个新的理解。宗教团体、传统的民族和亲属关系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东西。1958年前,伊拉克的政治团体被当作社会的组成部分被人们接受了。这一团体虽然只是一个行政管理机构,而它作为社会整体的组成部分还是真正存在的。但是,当这些像保护伞一样的团体观念被抛弃之后,怎样才能使人民大众与复兴党的观念保持一致呢?复兴主义是以泛阿拉伯主义思想为基础的,要求人们永远忠诚、永远效忠。那么怎样才能使国家的每个人从内心深处接受新政权的思想,改变令人惊讶的落后状况呢?

在君主政体时期,“现实说教”是最重要的传播思想的途径。通过这个途径,伊拉克社会里众多的平民百姓就能得到一种更为广泛的政治思想。而萨达姆·侯赛因却要废除这一途径。无线电广播和电视是另外一种途径。在复兴党的统治下,政治言论、民族党派、自发的群众运动以及对国事世态的闲谈,都随着暴政和遍布人民生活各个角落的恐怖而消失了。复兴党不得不找一些东西来填补这些空白。

西欧民众团体的迅速发展是16世纪人们大胆“想象”的结果。然而,印刷品的大量增加,公众文化水平的普及同时也对传统的权力和权威造成了危害,尽管它们能够增强人们的团体意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伊拉克等国,政府一方面全

面压制群众的言论和不同政见，一方面大量出版书籍。当然，这些出版物必须为新的目的服务。在俄国革命的历史中，斯大林对托洛茨基派的迫害就是压制不同政见的突出例证。这种悲剧有可能在当今重演。如果说在将来苏联人还能“记得”托洛茨基，那也仅仅是因为他活在西方人的心中。

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人与今天的苏联人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在斯大林死后，压制人们说真话的恐惧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地下式的闲谈国事现象。这就是团结一致的真谛所在——人们可以，而且也想改造或创造一个全新的属于自己的小天地。在这个天地里，人们可以有自己崇拜的哥萨克英雄，有谈论波兰官僚统治的自由。在黑暗中摸索了多年以后，人们体验到或者说正在体验在公开场合闲谈国内外大事的乐趣。佛朗哥以后的西班牙、萨拉萨以后的葡萄牙、1983年10月大选以来的阿根廷等都成了人们公开议论的话题。

在伊拉克，在党和国家的控制下，大量的出版物和印刷品从上至下给人们创造出了一个幻想的世界，这一切使复兴党的权力与以前的苏联和波兰的官僚统治一样令人敬畏。1980年，复兴党宣称，通过驻各国的大使馆、国内的文化中心和党组织的努力，伊拉克最大的两份全国性日报，《革命报》和《共和国报》发行量已达975万份。除此之外，他们还宣称出版的各种期刊发行量达423.5万份。教育部发行的各种小册子和书籍发行量都在1.8万册以上。复兴党还宣称，伊拉克内部每年专门为孩子们出版1000万册书和1.764亿本杂志。1978年，萨达姆·侯赛因的19篇讲话发行了300万册。

相比之下，从1947年到1948年，即伊拉克共产党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时候，它那被查禁的月刊发行量只有3000册。当

时,伊拉克没有几份发行量很大的合法的报纸和杂志。我们可以把复兴党在 1980 年大量发行的两份报纸与下面的数字作一比较:从 1908 年到 1909 年,在伊拉克,用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和波斯语出版的报纸有 18 种(这还不包括用六种文字在当地出版发行的书刊)。1917 年,有 69 家地方报刊每期的发行量都在 500 份以下。这些报刊只有 3 家是官办的。在 1958 年革命以前的半个世纪里,大约有 350 种不同的期刊和杂志。从 1958 年到 1963 年,又有 33 种新报纸问世,其中包括第一次用库尔德语出版的几家报刊。

怎样清楚地解释 1980 年发生的变化呢?首先,复兴党为了根除和清理各种各样的舆论组织和机构实行了全面的审查制度,许多独立的报刊和杂志受到了影响。其次,复兴党通过义务教育法案和接连几次持久的扫盲运动打破了报刊新闻界传统的办报方针和政策。

虽然义务教育法在 1958 年以后就颁布了,但直到 70 年代,所有的伊拉克儿童才都有机会入学。教育内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政治报告》写道:

在今后的五年中,我们要致力于建设与我们党的思想和革命目标相适应的教育体制……

毫无疑问,在下一个阶段中,我们将不能容忍近年来教育界的缓慢发展。革命是不等待时间的……

我们必须在党的政策的指导下,立即起草从幼儿教育到大学教育的各种新的教学大纲……要根除旧的教学大纲和教育机构中一切反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观点。新的一代人要有阿拉伯人的志气,维护阿拉伯的统一

和自由，反对与之对立的思想和文化。

伊拉克的文盲人数，在奥斯曼统治的最后几年中占总人口的 99.5%，1957 年占全国人口的 81.7%，80 年代初下降到 50%。这一变化主要归功于伊拉克 1968 年后采取的一些措施。在成年人的扫盲工作上，复兴党人的决心也是十分惊人的。1978 年 5 月，政府颁布了关于开展“全国性义务扫盲”的法令。教育部和国防部、国家内部安全部以及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代表们成立了一个“最高委员会”，下设与其相应的地方委员会，开展扫盲工作。复兴党早在 1963 年就提出了这种形式的扫盲运动。在 1974 年复兴党的第八次伊拉克地区代表大会上也曾做出过类似的“历史性抉择”，并强调了军队和国家内部安全部门在这一运动中的作用。

所有 15 岁到 45 岁的文盲都要参加成人教育班，学习期限是 21 个月。这种做法很不切合实际，只是一场“恶梦”，但对复兴党人来说，的确是很有意义的。法律规定国家和私人部门不得雇用没上过扫盲班的人；政府不给文盲提供任何就业机会；银行不得向这些人贷款。不参加扫盲的人也有被罚款和坐牢的危险。到 1981 年，大约有 200 万人上过国家的扫盲班。伊拉克全国有 1779 个扫盲中心，21853 所扫盲学校。而在 1965 年，伊拉克只有 368 所教育中心。1979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伊拉克扫盲“最高委员会”一块奖章，表彰他们“动员全国一切力量，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一场意义深远的扫盲运动”。

曾有一段时间，整个伊拉克都陷入扫盲的狂潮之中，成千上万的人涌进各式各样的扫盲学校。南方的沼泽地区有“水上学校”，偏僻的村庄和牧区有“流动学校”。影响较大的宣传工

具、工会和国家组织都是流动的。电台和电视台每天播放扫盲的特别节目。

服刑的囚犯如果在扫盲运动中成绩突出，还可以考虑减刑。由于南方的文盲最多，所以大多数上扫盲班的人都是什叶派穆斯林成员。当然，各种层次和各种形式的扫盲教育都是免费的。1974年，学员的书籍和一切学习用品都实行免费。

后来，伊拉克总统办公室颁布了一项扫盲管理法，落实了扫盲官员们的职责和任务。每个扫盲中心都必须有档案，并向每一位学员公开。扫盲管理法的第12条提出了对参加扫盲运动的教师的要求和标准，以保证他们在完成任务时“切实按党的原则办事”。

1978年的扫盲法规定，不会写字和不能读书的人是“没有达到文化标准”的文盲，一个人只有达到国家规定的“文化标准”，才能“履行公民的义务和权利”。学习“应当持续不断，有所发展”，学习还应该与社会的发展以及阿拉伯民族的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

复兴党通过这些措施，造就了一大批前所未有的忠实信徒。这样，清除“老一代”知识分子的恐怖运动与培养新一代的有文化的信徒同时进行，这就为复兴党建立一个拥有集体意识形态的社会打下了基础。

在创立了这个社会的人的心目中，伊拉克的确是一个“新社会”。这个新社会的合理性在于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忠于人民大众，或者说每个人的忠诚都会受到同胞的检验。个人出身、宗教信仰、出生地甚至阶级成份已不再是决定一个人身份的东西了，因为这些东西在过去曾经产生了不同类型的“忠心”，对此复兴党当然不能容忍。

泛阿拉伯主义的本质就是抹煞阿拉伯分裂的既成事实，幻想一个统一的阿拉伯世界。同样，伊拉克的教育运动也是为了让个人跳出自己的圈子，进入复兴党幻想的“纯洁的”世界。复兴党及其一切宣传工具一直强调要造就一个新的群众阶层。它开展的扫盲运动旨在“把教育转化为社会行为”。

妇女的地位

1965年，虽然伊拉克女性文盲是男性文盲的一倍，但只有12%的扫盲中心是为妇女开设的。1980年在全国再扩大对妇女的扫盲范围是不可能的。但据《共和国报》的报道，762个扫盲学校中，有416所是为妇女开设的，31所是混合班。到四年级时，女学员的人数有所增加，这也许是因为男学员退学的多（伊拉克的扫盲中心和学校实行各自的分级制度）。此外，在新的扫盲中心上学的人大多是幼儿园或托儿所里的保育员。

妇女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教育体制是复兴党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成就。从1970年到1971年，小学有318524名女学生，中学有88895名女生，大学有9212名学生。从1979年到1989年，学校里的女生的数量为：小学：1165856名；中学：278485名；大学：78647名。

到1980年，伊拉克有46%的教师、29%的内科医生、46%的牙科医生、70%的药剂师、15%的会计、14%的工人和16%的政府公务员是女性。另外一个女性人数很多的部门是国家建设部。1980年，高层次的管理人员中，女性仍占4%。总的来说，女性从事非农业劳动的人数从1968年的7%上升到了1980年的19%。

劳工和公民法颁布后，女性和男人享有同样的工资和就

业机会,甚至有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优先权。产假期间,她们仍享受工资待遇。妇女们工作的地方设有幼儿园,妇女的退休年龄也被放宽了。

和青年人一样,伊拉克有妇女联合会。该联合会共有 18 个省级分会和 265 个地方分会,有 755 个活动中心。200 户以上的村落和 6000 人口以上的市区都设有活动点。另外,在其它村庄和市区还设有 1612 个联络点。妇女联合会通过选举产生总部成员,当选的 36 名总部成员组成该会的执行机构。简而言之,妇女们不仅在学习文化、接受高等教育和在劳动中冲锋陷阵,而且也和别人一样有自己完整的组织。

妇女社会作用的重大变化与复兴党 1978 年颁布的个人地位法规修正案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修正案声称,新的法规是“以伊斯兰法典为基础,但只吸收了该法典中与时代的精神相适应的部分”。这种与传统的决裂对妇女的影响最大,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国家任命的法官有权力制止父亲逼女儿早婚;其次,新的法律废除了强制性婚姻,极大地削弱了传统的男人对女人的控制权。此项法规的目的在于减少家族里男性的统治力量。

复兴党的一大发明就是,在每个法庭里安插一个或更多的“民众委员会”来实施个人地位法。这些委员会由 5 名来自群众组织的成员组成。法律规定该委员会的成员中必须至少要有两名女性。此外,还有一些合法的、受伊拉克妇女联合会领导的群众组织。它们的一部分任务是考察加入各组织成员的政治觉悟(特别是要考察他们对阿拉伯复兴社会党 1974 年《政治报告》的学习情况)。“民众委员会”主要管的是家庭纠纷或离婚夫妻的孩子的监护等问题。他们作了直接的调查后向

法官提交建议。虽然对民事的仲裁是由法官决定,但这些委员对法院的裁决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总的来说,伊拉克的妇女已经在各个新领域明显地参与决策。这一切只是为了提高女性的整体地位和“政治化”程度。“民众委员会”的作用之一就是向人们施加压力,强迫夫妻们接受党认为合适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案情、法律条文和个人“权利”都被抛在一边。除此之外,不论什么时候传统的男性对女性的权利被削弱或被废除,政府总是站在女性一边,但这并不是为了提高由于性别而遭受歧视的女性的个人地位。

1977年,法律规定允许妇女参军,但却只字未提她们在军队中的作用。尽管如此,凡是参军的妇女必须完全遵守军队的一切规章制度。法律规定,在军队卫生系统服役的女兵有大学文凭就可以当官。职务的高低与所受的教育程度有关,军衔从最低级开始。很清楚,军队之所以接受女兵是因为她们在卫生系统起着很大的作用。1976年后,妇女开始加入民兵组织。到1982年,已有4万名妇女参加了民兵组织。

这些激进的法律是针对与女性地位相关的一夫多妻制、离婚、继承权等问题制定的。这些方面的改革进展缓慢,但这些法律仍然以伊斯兰法典的精神为基础,男性的统治地位没有得到彻底废除。当然也有一些变化,如“通奸”罪被改成了“背叛婚姻”罪。在这些真正的个人领域,复兴党的观点还没有1956年突尼斯法典的观点那样激进,也不如伊朗国王对阿拉伯家庭观念改革的主张,更不能与1926年阿塔土尔克提出的与伊斯兰家庭教义决裂的激进主张相比了。

有关妇女的法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与传统决裂。伊斯兰

教法典一直认为女性的地位比男性低。法律的焦点不应该是保留还是取缔家庭的美德或神圣的男性权威问题。即使“民众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和其它方式改变了传统的家庭结构,削弱了根深蒂固的阿拉伯社会传统,但从观念上讲,伊斯兰教的价值观仍然完好无损。复兴党的做法虽然表明,它与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彻底决裂了,但它并不想真心实意地把妇女变成劳动力,变成伊斯兰的异教徒。伊朗的伊斯兰运动使大批妇女戴上了面纱,任何女权运动者和反对戴面纱的人对此都无可奈何。

传统的思想观念与复兴党激进的思想之间存在着极其明显的区别。复兴党残酷无情地根除延续了几个世纪的社会障碍与偏见,但在个人地位问题上的改革仍是比较温和的,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害怕保守的宗教势力的攻击。伊拉克妇女个人地位的改革与复兴党在妇女社会地位问题上的其它激进措施是自相矛盾的。1978年,复兴党激进的法律修正案看不出他们有继续提高妇女自主权的意图。妇女地位的提高也许会使复兴党的指导思想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发生更大的冲突,使复兴党陷入进退两难的僵局。那么,复兴党人为什么在一些方面大胆激进,在另一些方面畏缩不前呢?

复兴党的做法不应当被夸大。在伊拉克,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团体(包括妇女在内)向复兴党施加压力。然而,复兴党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独特”的立法,既体现了它的观点,又不会被“现代化社会发展和真正的文化”之间的矛盾逼上绝路。人们只要仔细考虑一下复兴党人不得不说的话,就会发现进退两难的局面不可能发生。因为复兴党始终如一地按照自己对现代化和伊斯兰教义的理解行事。它的泛阿拉伯主义与伊斯兰

的传统在观念上是有联系的,这一点将在本书的第六章中探讨。在伊拉克,我们应当时刻注意复兴党人的独特观点,而不是用我们自己对现代化的理解来看待这一问题。

复兴党的理想是和他们伊斯兰教的看法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理想是权威的源泉,也是检验一切合法行为的标准。领导人的权力也是从这一理想中衍生出来的。理想之外的一切东西都会给复兴党造成威胁。复兴党人憎恨的是,伊拉克人的真正权力有一半掌握在诸如父亲、兄弟、叔父、表兄弟等男人手中,因此要想培养人们对领导人、党和国家的忠诚,就必须首先把妇女从忠于丈夫和家人的传统中“解放”出来。这才是复兴党 1978 年颁布个人地位法的主要目的。这项法律削弱了男人在家庭中的权力。这样,妇女像孩子们一样获得了一些地位,但她们又很自由地把自己交给了复兴党,失去了她们得到的地位。从政治意义上说,复兴党对妇女的利用和萨达姆·侯赛因对孩子的利用是一样的。实际上,在传统的男人占统治地位的阿拉伯家庭中,妇女仅有的一点自由也被复兴党人剥夺了,而男人的统治地位依然如故。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的成员都是男性,而男子气比谁都足的萨达姆·侯赛因肯定比大多数父亲更威严可怕。伊拉克人效忠的对象发生了变化。就妇女而言,她们不仅要屈服于男人的独裁统治,而且面临一种新的恐怖统治者——复兴党。复兴党的立法措施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他们根本不管这样做最终会带来怎样的社会影响。来自“下层”的压力也许会迫使复兴党改变方向,但这种压力绝不会来自伊拉克妇女。

发展与自由

复兴党动员人们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并出版了几百万本书籍,开办了许多学校,安排了大批女性劳动力。后者主要是通过行政手段取得的成就。复兴党告诉全社会,克服落后现状与限制政治自由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同样,文化水平的提高与经过审查的出版物也有必然的联系。这种因果关系似乎成了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社会经济标志之一。一个恐怖政权居然全面提高了伊拉克人的生活水平,改善了大多数贫困者的命运,进一步减少了贫富收入的差异。总之,伊拉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政府的补贴政策,大多数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价格稳定;每天的最低收入超过了很低的通货膨胀率;学校毕业生都能从国家这个大老板那里获得工作;教育和医疗实行免费;人均国民收入从1970年的195第拉尔增到1979年的7564第拉尔。

这些成就应当归功于石油收入还是明智的经济管理方法?这虽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不属于本书探讨的范围。伊拉克群众扫盲运动完全是政治问题,与群众的收入多少无关。同样,医疗事业的发展、农村电气化的实现、全国四通八达的公路网、深思熟虑的社会法规、运输设施、电信、工业化和住房建设的发展等,都不是本书探讨的主题。

然而,这些发展似乎揭示了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在共产主义传统中尤为明显。苏联的经验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政治自由和落后国家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思考。托洛茨基在他写的攻击斯大林主义的《背叛了革命》中,揭示了这个矛盾。他认为,专制的产生是因一个政府觉得在落后的条件下,有必要采

取铁的手段创造并维护一个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认为国防、工业、科学和技术发展必须依赖他们。当时代的任务成了满足他们的主观意愿的东西时，一个民主的政府将会变成专制、独裁、令人难以忍受的政府。托洛茨基暗示出一种超验的因果关系：为了求得经济发展，必须牺牲政治自由。上述观点不是经济学家、科学院士或者空头革命家的观点，而是出自一位苏联革命的政治活动家、杰出的思想家之口。他本人也被后来的“铁的手段”清除了。

对托洛茨基来说，经济的发展与自由的丧失是一个普遍的、人为的矛盾。他认为，只有坚持世界革命的思想，才能解释这个矛盾。随着民族主义思想的削弱，一切革命的地方观念的增强，这个矛盾变成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第三世界的意识形态接受了帝国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性，但却对资本主义自由的“虚伪性”和“真正的”自由同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相分离的普遍趋势十分挑剔。本世纪后来的一切革命（如越南、古巴、阿尔及利亚的革命）和二次大战以后的民族主义运动（如纳赛尔主义、复兴主义）总是面临这样一个主观选择：要发展还是要自由？

叙利亚律师、信仰泛阿拉伯主义的文学评论家阿里·巴达尔公开评论了1952年以前的埃及在多党制政体下的自由。1957年，他在两篇颇有影响的文章中指出，1952年的埃及革命先废除了殖民地时代留下来的传统：多党制，然后才着手解决经济问题。多党派之间的分裂和争执给帝国主义提供了“供给线”。他认为阿拉伯世界的“领导阶层染上了一种疾病”，建议给他们动一次大手术，并呼吁建立专制政权，以促进阿拉伯的统一和经济的发展：

我们相信专制的价值，这个信仰不是由一种空泛的理论发展而来的……为了阿拉伯的统一，为了建立一个固定不变的、非民主的体系，我们需要专政的铁拳。自由和民主的定义不一定相同……自由意味着充足的衣食、充足的住房、充足的卫生设施、充足的文化意识和对民族问题的关心。我不知道，今天的埃及人是否比他们在君主制、多党制、立宪制和新闻自由时代得到的自由更多。一切自由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在政治上，伊拉克共产党与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观点一致。它相信复兴党正在履行巴达尔阐述的历史使命。自1958年以来，知识界完全被复兴党的思想软化了。如果说他们具有根深蒂固的抵抗力并对复兴党僵硬的思想有过抵抗的话，那么，这个抵抗力也被复兴党推崇的斯大林主义或最时髦的暴力模式击败了。文化精英和广大群众被迫接受了复兴党的思想。在1958年复兴党上台、取缔议会机构以前，伊拉克的社会舆论就趋于一致。1958年到1968年的10年里，接连不断的政变证实了这么一个假定：全社会渴望国家的权力能够通过专制方式稳定地移交下去，而不渴望政治方面的民主，只有这样，经济的稳定才能保证。这一假定的意义就在于它为复兴党的暴政提供了口实；复兴党一旦夺取政权，并依靠石油收入和暴力手段强行实施它的政策，经济必然会得到“发展”。这不只是复兴党的宣传，社会对其条件之性质的理解在复兴党执政以前就形成了。

社会的效验和力量超过了简单的宣传和灌输所能达到的

程度。复兴党的思想和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联系。这种联系源于复兴党和社会的共同体验：发展与自由相对立。它是联结复兴党思想和社会假想的基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简单纯粹的政治行为最终要通过立法使其合法化。复兴党故意制造出一种假象，以说明某个行为不完全是党自行做出的。从50年代到60年代，群众对泛阿拉伯主义“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以及进步和发展的“力量”或“规律”等“神话”十分崇拜，而在70年代，复兴党强调的似乎正是这些东西。

落后与暴力

即使伊拉克还不具备自由的条件，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暴力？这些暴力的历史作用是什么？让我们先审视一下伊萨克·多伊奇的观点。人们普遍认为他对这个问题能够提供一个满意的答案。

伊萨克在他论述斯大林主义的著作中写道：

毋庸置疑，斯大林主义是革命以后、工业化以前孤立落后的社会的产物。这个社会正在进行“原始的社会主义积累”。换言之，这个社会以国家为庇护，把公有制作为生产手段，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作为一种政体和思想，斯大林主义代表了国家条件的落后和对落后条件的改变。所以，斯大林主义的特征具有双重性或两面性。一方面，斯大林主义残忍无情，具有原始的孤立主义思想意识；另一方面，它在用现代计划经济和大规模的群众教育运动代替苏联旧的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和毅力。当然，这些因素不可能全面地解释

整个斯大林主义现象，但它们却能说明斯大林主义最基本的特征。

伊萨克的论断确实具有普遍性。如果我们把“斯大林主义”一词换成“复兴主义”，这个论断仍然是正确的。伊萨克认为，斯大林主义是大多数意识到自己的落后并力图改变落后状态的国家所采用的普遍模式。实际上，伊萨克只是从历史的角度对托洛茨基“铁的手段”的论述作了总结。时过境迁，30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已经减退了，苏联发生了新的变化。

从伊萨克的观点看，斯大林恐怖统治的高峰时期是在30年代和40年代末，直到斯大林去世、贝里亚被处决为止。但是，斯大林主义是我们理解复兴主义的典型模式。它是复兴主义和二战后的民族主义竞相效仿的“最初的”第三世界思想模式。我们暂且不谈生产方式方面的问题，就“政体和意识形态”而言，斯大林主义和复兴主义这两个原来不同的现象在结构上是趋于一致的。

即使斯大林暴政的原因与复兴党暴政的原因完全不同，但两个政府统治的形式是相同的：暴力。即使其中一个暴政有着高尚而奇妙的动机，这个动机也不能削弱他们在结构上的相似性。现在的复兴党无论是在开展运动还是在执掌政权时，都在有意识地把斯大林主义作为准则。更重要的是，复兴党已经“战胜了”广大群众，削弱了伊拉克共产党的力量，并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

然而，事实证明，伊萨克的解释有些肤浅。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即使没有自由，为什么有如此多的暴力？伊萨克和托洛茨基仅仅证实了一个普遍的命题：贫穷和落后创造了暴政的

条件。然而，从原则上讲，落后问题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自行解决。即使就苏联的落后条件而言，革命后的社会里的特权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消灭，那么，蓄意制造的、消灭了几百万随意挑选的无辜者的大清洗运动和这种暴力政府是必不可少的吗？

那种认为总结斯大林主义的“最基本的特征”不必考虑其政治特征的观点是令人费解的。斯大林主义只是“一种政体”吗？它的独特性只是政体和生产方式之间的一系列关系的派生物吗？即使把斯大林主义最基本的特征全部找出来，它的本质仍然是个不解之谜。人们在总结斯大林主义特征时，明显地忽视了以下方面的问题：深思熟虑的行动、判断力、思想意识、偶然事件、没有预见和可以预见的问题等。简言之，政治领域的问题被完全忽略了。此外，必然性领域——经济与劳动——即所谓的“原始的社会主义积累”也被忽视了。伊萨克在这里用了引号，因为他知道原始积累总是原始的，因饥饿而死亡的数百万苏联农民也证实了这个事实：斯大林的方法并不比他的资本主义前辈们文明。

落后竟然成了施行暴政的借口。那些高举地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和第三世界思想旗帜的复兴党人和“进步的”民族主义者总是用经济落后来为自己的暴政辩护。如果说斯大林主义的暴力由于苏联跃身为超级大国而得到“补偿”的话，复兴主义者就可以从这个先例上找到理由。这个理由比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更有说服力。斯大林不得不寻找暴力的根据，而复兴主义的辩护士们只要回头一看，就能找到高人一筹的辩护词。总之，在伊拉克，苏联的历史经验成了复兴党巩固政权的依据和样板。

思想的退化

20年来充斥报纸、新闻媒介、工作场所、大街甚至家庭的复兴党的说教，对人民、尤其是曾经没有文化的人产生了什么影响？复兴党自始至终的谎言对处在恐怖状态的人的判断力产生了什么影响？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人寥寥无几。局外人只能在表面现象上纠缠。生活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并且有勇气探索的人才能够了解一些常人所看不到的内幕。这也是一个冷酷的世界，一切真相都被掩盖了。

像伊拉克这样的社会扼杀了普通人活跃思想、交流看法的一切途径。社会里美好的思想已经不存在了。诚实正直、不出卖他人的人不是死了就是被关在流放政策创造的劳改营里，干着无穷无尽的苦活。在这个社会里，语言的使用也有了限制。我说的限制不是对一个社会的交流符号本身的规则和约定俗成的结构的限制，而是指除了日常生活用语以外，表达思想和观点的用语受到了限制；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和范畴必须得到使用。

被流放的反对派人士最近罗列了伊拉克政治和哲学概念方面的一些重点词汇。如：“人民”一词是指社会里各个阶层的人。这些人依靠他们在“各自的阶层和政治领域内的位置”，“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带来进步和发展。显然，在原始社会里，“居民和人民之间不存在差异”。但随着阶级社会的产生，产生了概念的分支：“居民”和“人民”。换言之，一些长期生活在伊拉克的居民，根据他们的思想或者凭借主观的社会经济标准，可以被排除在“人民”的范畴之外。复兴党认为，这就是

“人民”一词“准确、科学的意义”。在伊拉克，文化不是“杰出人物精神的产物”，而是“科学的思想”。这种思想认为：“需求的物质生产是一切精神文化的基础和起源。换句话说，文化是群众活动的产物。”

伊拉克学生协会是颇有影响的反复兴主义组织，但他们也完全陷入概念的陷阱之中。他们天真地认为，只要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一个世纪以前马克思的原著和言论上去，一切概念上的混乱都可以得到澄清。然而，复兴党赋予一切词汇的意义已根深蒂固。学生们对复兴主义的攻势还没有开始就夭折了。

奇怪的是，帮助人们理解现实的概念本身具备了生命力，成了它们本来要解释的世界的替代物。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概念进入复兴主义世界观以后，就被穆斯林教士和伊拉克人（包括复兴党人和反对派人士）用来解释复兴主义者与伊朗伊斯兰政府交战的原因。同样，“社会主义”、“自由”、“左派”、“右派”、“反革命者”、“资产阶级”等词以及“群众利益”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等短语，也被复兴党挪用，为其政治目的服务。

当国际红十字会对两伊战争中双方虐待俘虏的行为提出谴责时，伊拉克社会的反应是：为什么现在提出谴责？从这个谴责中哪一个超级大国受益最多？谴责的背后有什么新的阴谋？他们根本不考虑红十字会提供的信息有什么价值，因为在他们看来，折磨、杀害战俘是理所当然的事，一切国家都会这么做。

伊拉克社会想的就是如何提防阴谋。这种心理源于整个伊斯兰文化一个特征：极端的宿命论和对个人主义的嫉恨。服

从真主的意志的思想在伊拉克变成了为真主的事业而殉难。这两种思想都反对把人作为行动者、历史的创造者和自然的驾驭者以及人最终向自己负责的现代思想。泛阿拉伯主义发展了这两种思想，它把人的目的和存在的现实相分离。这就进一步创造了提防阴谋的气氛。

此外，阿拉伯社会对政治思想的崇拜到了狂热的程度。这种狂热与当时的条件有关：一切激进的言论，只要不损害阿拉伯人的利益和固有的价值观念，都可以发表。但这种激进主义与 18 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不同。当时，欧洲处在与伊拉克相似的历史关头，启蒙主义者主张与传统决裂。但许多阿拉伯思想家在赞扬社会主义或者“群众的利益”时，摆脱不了泛阿拉伯主义和“阴谋”范畴内的陈词滥调。他们的观点平淡无力，缺乏伏尔泰的道德普遍性。除了涉及国家大事的言论外，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思想完全是超现实的。

在最近的 25 年里，伊拉克的政治经历使公众运用语言的能力进一步退化。整个民族，包括反对派在内都缺乏一种能够帮助他们理解现实的概念体系，更不用说提出新的、更令人满意的理论了。

1967 年以后，阿拉伯社会开展了对埃及的纳赛尔政权和复兴党政权的批判。复兴党认为，在这两个“进步”政权下，报刊充满了蛊惑人心的宣传和装腔作势、浮夸华丽的语言。1968 年，一批阿拉伯激进主义者对语言的传统提出质疑，认为华丽、消遣性的阿拉伯语言趋势对表达政治思想极为不利。黎巴嫩作家阿道尼斯撰文嘲讽了不顾意义而一味追求音韵效果的阿拉伯诗歌传统。另外一些激进分子批评了 1967 年阿以战争导致阿拉伯失败的有关宗教和传统的社会思想，但这些激进

的批评在像伊拉克这样遥远的阿拉伯国家里没有引起反响，渐渐销声匿迹了。

1967年以后阿拉伯社会对纳赛尔主义和复兴党传统及其政治思想的批判虽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也没有摆脱地方观念的限制。1967年阿以战争结束后，有一部电影把阿拉伯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内部的贫穷与落后。它提出的主题是：“他们为什么能打败我们？”“他们”与“我们”在当时的条件下也许是最恰当的措词。当时阿拉伯世界高度意识到外部世界的侵略，强调全民族的团结和统一。在这个背景下，这部影片对阿拉伯内部世界落后现状的抨击不可能深刻。人们对当时的英雄如法农、格瓦特、德布雷等人的评价有褒有贬，看法不一，但整个阿拉伯世界基本上把他们看作是抵御外来侵略的英雄，而不是内部世界里的腐败分子。所以，这部电影的观点同第三世界思想观念一样，没有从人的角度提出新的见解，没有摆脱令人窒息的地方观念。由此看来，任何向复兴党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挑战的尝试都是枉然的。

自从黎巴嫩内战开始、宗教的原教旨主义兴起以来，阿拉伯的政治和文化进一步退化。大多数善于思考的阿拉伯知识分子私下承认，这种退化的深度和宽度是惊人的。在一些相对自由的国家里，如埃及，国家对出版物审查的范围虽然有所放松，但规规矩矩的“自我审查”悄然而起。例如，埃及作家路易斯·阿瓦德曾经断言阿富汗尼出生在伊朗，此后一年内，没有人出版他的文章，评论家甚至怀疑他不是埃及科普特基督徒，并要求剥夺他评论伊斯兰教的权利。

在这个退化过程中，根本不存在两种思想的撞击和对峙。曾经信奉马克思主义、激进的民族主义和左派思想的人正在

不断地清除自己从 60 年代后期无意染上的一些“不受欢迎的”价值观念。实际上，他们的做法与早期的阿拉伯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人士如出一辙。这些人也向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和左派人物作过让步。伊拉克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以同样的方式接受了复兴主义。方兴末艾的原教旨主义又吸收了左派和民族主义思想中有用的东西，如帝国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发动群众同资本主义剥削者进行斗争等思想。总之，原教旨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左派人物结为盟友。这一点在黎巴嫩内战中表现得最明显：穆斯林、泛阿拉伯主义者和左派人士结成忠诚的同盟，共同反对黎巴嫩的基督教派，把他们诬蔑为以色列或西方国家的代理人。

伊拉克社会思想的退化与泛阿拉伯主义霸权思想的影响密切相关。纳赛尔主义在宣传其政治思想时采用温和的民粹主义手段，而复兴主义注重的是强硬的组织手段，所以，人们在考查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活动时，还必须考虑到用伊拉克复兴主义者强硬的组织手段对政治的影响。

1978 年，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颁布政令，要求“所有的大学、学院和其它类型的学校必须招收武装部队、安全部门和情报系统的工作人员进校学习”。该项政令根本不考虑这些人的年龄、学业、上学期限和课堂出勤的可能性。“国防部、内政部和情报部门将在适当的时候向学校提供本部门工作人员入学的名单”。7 个月内，3000 多名上述机构的工作人员被招收为学生。如果把成千上万名以同样的条件进入大专院校深造的复兴党人计算在内，这些人的入学总数占 1978 到 1979 年度所有大专院校招生人数的 1/5。此外，复兴党人及其支持者还可以通过正常渠道进入大专院校学习。

意识形态本身不能改变现实,但是,当它与一种组织结合时,它就具备了剔除那些仍然带有非正统的思想余毒的社会机体的能力。复兴党采用强制手段给人民灌输其政治思想,这进一步加深了阿拉伯政治和文化思想的退化。

心理防卫体系的建立

当恐怖、暴力和思想的一致成了社会准则时,每个人都必须拚命地挣扎和反抗。这并不是说起来推翻周围的暴政,而是说人们为了生活下去,必须设法获得心理的平衡。当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受到威胁、一切私生活都受到干扰时,生存就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自我防卫的第一个办法就是隐藏所有的思想和感情,假装一切事情都是非常正常的。与其它“正常的”落后社会不同的是,在伊拉克社会里,人的外表非常重要。在公众场合,伊拉克人避免引人注目的一切装束和举动。而在其它的海湾国家里,人们以显赫的社会地位和引人注目的消费水平为荣,这几乎成了海湾社会的“弊病”。在伊拉克社会环境里,一切东西都失去了应有的真实名称。例如,普通人都认为暴力“是正常的”。否则,在暴力的攻击面前,人们就会失去控制,闯下弥天大祸。在与政府官员打交道时,在工作单位、街坊,甚至家里,人们似乎戴着“面具”,把自己严严实实地遮盖起来,使人难以辨认。伊拉克人像蜗牛一样,躲在壳子里,个性和自我完全萎缩了。

自我防卫的另一个办法就是与权力阶层保持一致,积极参与复兴党的活动,争取入党,为党的事业做出贡献,相信自

己所做的这一切是正确的。一个人一旦被认为有欺骗的迹象，他将被任意牵入另一个案件中，以同谋罪论处。但袖手旁观、不参与政治活动也不行。市民们发现，他们在心理上不得不对独裁集团及其价值观念无比忠心，个性和自我丧失殆尽。这种心理构成了复兴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础。

群众的效忠的确为复兴党的存在奠定了强大的基础。这种效忠与表面上忠心耿耿、内心却保持着距离的机会主义者不同。一些落后国家政权的存在大都依赖于伪善的支持，基础极不牢靠，伊朗国王礼萨的倒台就是因为他的支持者都是社会里伪善的“寄生虫”。他们在平民百姓中没有根基，极易动摇。这不是针对某个人而言，全社会都持这种态度。霍梅尼上台后，伊朗社会掀起了一场对礼萨国王的“警察国家”的批判。这似乎是对新的伊斯兰共和国忠心耿耿的表现。然而，经历过礼萨王国和伊斯兰共和国鞭笞的伊朗逃亡者将会证明，全社会对礼萨的抨击和对霍梅尼的效忠都是虚伪的。相比之下，伊拉克复兴主义已经获得了内在的支持，极端的暴政已深入人心，得到认可；人们的心理完全扭曲了。这种支持与机会主义不同。

然而，在伊拉克社会里还存在着其它一些重要的自我防卫手段。不管复兴党在政治、文化和工作单位内多么彻底地消灭了企图取代它的势力，但要对付来自私生活如家庭、家族以及宗教方面的力量是十分艰难的。在任何人类社会和文化中，只要社交活动和政治相分离，这种力量是永远存在的。众所周知的阿拉伯家族和宗教团体势力对复兴主义的渗透形成了巨大的障碍。

在中东的历史上，“社会”一词的定义非常宽广，包括宗

教、伦理和社团方面的因素。民族感含有部落宗教的成分，这在西欧是不存在的。20世纪的新国家从法律、经济和社会意义上缩小了“社会”的范围，但是，这些国家从来没有发生过政治与社会关系网和传统价值观念之间的正面冲突。换句话说，尽管社会经济发生了变化，价值观念上的“启蒙运动”或革命还没有发生。这可以说是激进的中东政治领域内相对自由的地方。从理论上讲，中东政治已经改变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实际上，政治总是在传统主义的攻势面前畏缩不前。根深蒂固的传统势力不会轻易屈服于任何强大的政治力量。

霍梅尼主义打着振兴伊斯兰教的名义，把两个分割的世界——公众与个人、政治与社会——有机地结合起来。此外，穆斯林思想潮流的推波助澜使霍梅尼主义运动更富有革命性。宗教和政治目的合二为一，调动穆斯林的积极性将是霍梅尼留给中东世界政治的遗产。相比之下，复兴党在这一方面还只是个学徒。

在伊拉克，人们躲避复兴党攻击的另一个办法就是回到原来的家族或宗教集团的怀抱。这种“回归”现象表现在较为独立的、经济上富裕的人身上。他们可以筹划如何逃出这个国家，耐心地等待好几年时间。成千上万的伊拉克人已经逃到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还有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历尽千难万苦，最终逃到了欧洲。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宗派主义和家族观念在伊拉克方兴未艾的原因。这一势力为一直受复兴党压制的原教旨主义政治思想的重新出现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些现象在伊拉克的逊尼派和什叶派社区中非常普遍，尽管政治性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它与宗教宗派主义相对立，后者不一定是政治性的）在什叶派社区中发展迅速。逊尼派原

教旨主义与复兴党的泛阿拉伯主义和逊尼派伊斯兰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什叶派原教旨主义绝不是像复兴党宣传的那样是来自伊斯兰共和国伊朗，尽管它受到了伊朗的影响。

一般而言，宗教宗派主义为受到惊吓的人提供了结交群体的途径。他们可以在这个“新社会”里进一步淹没个性，找到共同点。否则，他们就寂寞得要命。除了那些真心实意要成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信徒的人以外，这种逃避社会的方式大可不必。伊拉克大部分宗教宗派主义者相互嫉恨的趋势日益明显：逊尼派憎恨逊尼派；什叶派憎恨什叶派。他们避免相互干扰，压制青春活力和自我防卫、坚强不屈的个性。在他们的日常谈话、玩笑和闲谈中，宗派倾向日益强烈。显然，他们没有任何政治倾向。

什叶主义的地下政治组织中最大的一个叫做“伊斯兰号声”。该组织在复兴党上台以前就成立了，复兴党上台后被镇压，主要领导人及其家庭成员被处决。1983年5月，哈基姆家族的90位成员（年龄9至60岁不等）被警方逮捕，因为该家庭的一个名叫穆罕默德·巴奎尔·哈基姆的人领着一群反对派人士逃到了德黑兰。复兴党向他发出最后通牒：停止在电台上作反伊宣传，他置之不理。5月20日，哈基姆家族的6位主要成员在其他成员的面前被枪决。剩下的84位成员中，只有5位年纪大的人被释放。杜贾勒村是什叶派政治活动的基地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地下组织的据点。该村因有人试图谋杀萨达姆而被捣毁。复兴党政府随即重建了这个村庄。这件事说明复兴党对全国的控制是多么严密、多么全面。

这样的反抗和蔑视行为实属罕见。如前所述，复兴党的政权获得了众人的支持，两伊战争期间又得到了纳杰夫省宗教

界名流的支持。

历史上的伊朗什叶派和阿拉伯什叶派教士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紧张关系。在 8 位公认的什叶派权威人士中,只有穆罕默得·萨德尔是阿拉伯什叶派人士。1980 年,他和他的全家被处决,伊拉克什叶派又多了一位殉难者,少了一位唯一可以继承霍梅尼衣钵的人。从此以后,伊拉克什叶派处于分裂状态。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失去了一个“霍梅尼”,而且是因为他们没有独立的机构或组织体系,一切活动因缺乏动力而陷于瘫痪。1979 年以前,伊朗就有 18 万教士和信奉什叶派教义的学生,他们是伊朗革命的组织干部;而在 1958 年,伊拉克的纳杰夫省只有不足 2000 名注册的什叶派学生,其中大多数人还是伊拉克的伊朗人。所以,他们还不是伊拉克政治生活中的一股力量。

宗教宗派主义对世界的看法与复兴主义有相同之处,这就是两者共存的基础。伊拉克的逊尼派和什叶派阿拉伯人对采取什么方法统治伊拉克有着相同的政治观点,这种观点根深蒂固,由来已久(参见第四章)。两个教派的原教旨主义者像复兴党的理论家一样,把自己看作“人民”“精神”的支柱,共同抵抗外来的“帝国主义”、“实利主义”的污染,防止道德和文化的颓废。对一个逊尼派的阿拉伯人来说,伊斯兰和阿拉伯的民族主义能够和复兴主义完美地结合起来。就连一直在为自己的民族地位而奋斗的伊拉克什叶派也不愿意声明复兴党人不是好的穆斯林。他们所能做的只是依赖逊尼教派的高层人士替他们说话。此外,“人民的伊斯兰教”的各派人物都从复兴主义思想中找到了与理想的民粹主义相似的东西。他们对国内自由受到践踏的现象置若罔闻,漠不关心。他们自己遭到不公

正待遇时，也是一声不吭，毫无怨言。

总而言之，随着复兴党对公众生活的全面控制，社会和私人生活领域内的宗教宗派主义倾向日益明显。正如复兴主义能够和失去了“兄弟般友爱”、沦为告密者的市民共同生存一样，复兴主义与宗教宗派主义现在还能共同生存下去。但是，宗教宗派主义与日益兴旺的基督教思想有相似之处。而基督教思想正是复兴党政治思想所不能容忍的东西，将被复兴党无情地剔除。复兴主义不是从宗教或基督教的角度看世界的，它长远的目标就是消除没有经过它允许的一切宗教组织和任何形式的团体；它的理想就是把每一个人都变成驯服的工具。所以，在复兴党统治的伊拉克，满腹牢骚的宗教宗派主义暂时还拥有—个生存的天堂，但最终是要失去立足之地的。

第四章 权 威

大权独揽的领袖

在中东地区，领袖人物的肖像也是权力的象征。在这一方面，复兴党统治下的伊拉克堪称楷模。伊拉克每个村庄都矗立着萨达姆·侯赛因的巨幅彩色画像。晚上，这些画像闪射出一种令人敬畏的荧光。在巴格达市中心，萨达姆·侯赛因的雕像高达 30 英尺。巴格达市的大街小巷、商店、学校、警察局、军营、办公室和私人住宅里都悬挂着萨达姆·侯赛因的画像。每一位政府官员拍照时都要以总统的画像为背景。在公众场合，一提起总统的名字便会博得热烈的喝彩。

萨达姆·侯赛因是伊拉克共和国总统、内阁首脑、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伊拉克地区领导机构总书记、最高计划委员会主席、协调委员会主席、义务扫盲最高委员会主席。除了在军队和政府中的这些职务以外，他还有一大串给人印象颇深的荣誉称号，如：英明的统帅、斗争的带头人、阿拉伯领袖、阿拉伯民族的骑士、民族解放英雄、领袖之父、英勇无畏的斗士等等。

在广播中,尤其是在政治节目中,他的名字伴随各种各样的头衔,每小时出现 30 到 50 次。新闻广播几乎全部播放向他致敬和歌功颂德的文章。萨达姆一离开总统府,巴格达大街小巷喧闹声顿停。警报声中,卫兵们肃立路边,人们你追我赶地涌向广场,一睹总统的风采。学校的学生朗诵赞扬和歌颂萨达姆的诗文。献给总统的大幅标语随处可见。学生的练习本封面上印着他的画像,背面印着他的最新指示。伊拉克的青少年身着萨达姆·侯赛因式的 T 恤衫;有些狂热的青少年还戴着镶有萨达姆头像的金表。

在中东地区,领袖的画像随着权力的交替而变换。到 70 年代后期,复兴党统治下的伊拉克已不存在这种现象了。萨达姆·侯赛因的画像一直矗立在祖国各地。1979 年,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被清洗以后,他的画像渐渐消失了,而萨达姆·侯赛因的画像越来越多。复兴党第二次上台后不久,贝克尔的标准像曾流行一时。70 年代中期,他的肖像常和萨达姆·侯赛因的肖像挂在一起。到 1982 年夏天,贝克尔的肖像全部被取了下来。贝克尔从未有过一座 30 英尺高的彩色雕像;伊拉克的每个村庄也未曾出现过他的塑像。1979 年以后,当伊拉克人看到贝克尔的肖像并听到他还被称为“萨达姆·侯赛因之父”时,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位儿子仍恪守着自己 1977 年的诺言。他虽然讲“父亲”的坏话,但仍带着必要的敬意。

望着贝克尔的肖像,回想自己在孩子们面前失去的威严,伊拉克人更加害怕萨达姆·侯赛因了。在萨达姆·侯赛因的所有肖像后面潜藏着一种巨大的政治力量。贝克尔被清洗后不久,人们都“自愿”地在办公室和家里挂上了萨达姆·侯赛因的画像,期望以此来“驱巫降妖”。成年人不但不敢在孩子们

面前闲谈国事，还得给他们灌输热爱伟大领袖的思想。称霸伊拉克社会的原始力量已经变成了一种主宰每一位公民的灵魂的权威。这种权威不再是一种象征，而是无所不知、绝对正确的东西。它旨在羞辱每一个人，使每一个人在言论、行为及信仰上都必须服从它的意志，不管事情的本来面目如何。

新领袖对身边的人也不屑一顾。在萨达姆·侯赛因参加的任何会议或群众集会上，伊拉克最有权势的官员们总是两手合在一起，目光低垂，给萨达姆鼓掌时比谁都卖劲。政府各个部门的部长不敢背对着萨达姆离开，只能不声不响地蹑着脚悄悄走开。两伊战争打响以后，在复兴党的政治宣传录像中，曾出现过萨达姆·侯赛因羞辱如绵羊一般驯服的部长和政府官僚的镜头。这些人因不愿上前线作战或战斗热情不高而受到萨达姆的斥责。为了鼓励在前方作战的将士，这个录像带被下发到一定范围的复兴党人手中。但当这种录像带在海湾地区流传起来以后，复兴党人立即收回带子，并意识到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这一错误跟录像带一样清楚，因为它表明：在复兴党创造的神话似的世界里，一丝不挂的皇帝在出门时常忘记自己还光着身子。

萨达姆的画像、大塑像和在影视中的镜头是有威慑作用的。在没有这些东西的场合，人们对他的敬畏就变成了对他的嘲弄。复兴党人的主导思想就是创造神话。在伊拉克，未来神话中的理想和目标已成为格言，但富有奋斗精神的人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个人的观点常常被各种组织以及统治集团名目繁多的活动所掩盖，从而显得群众组织成员都是忠于党和国家的。但在群众组织以外的人中，有的人效忠复兴党；有的人持中立态度；还有人反对复兴党。在这种鱼龙混杂的环境中，

整个神话世界的中心人物对此十分了解。统治集团中的中层人物和群众组织的领袖一方面给比他们地位更高的统治阶层提供了解现实的小窗口,另一方面给下层人培养自信心。起初作为反对派的复兴党就是这样强盛起来的。夺取了政权以后,复兴党就以同样的方式组织社会。

最初的愿望实现以后,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复兴党把重点放在了发展更加秘密的机构上,而不是党员上。秘密警察是伊拉克最令人恐怖的机构,在没有任何反对势力存在的情况下,他们的任务就是用复兴党的政治思想监督和审查人民,看他们是否在政治上与党保持一致。对于像复兴党这样的政权来讲,秘密警察与政治领袖之间的关系是特别重要的。秘密警察和特工人员常常直接向领袖汇报情况;而领袖人物的地位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而得以保证。

在这一点上,领袖似乎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实际上,党组织与领袖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劳动阶层,从表面上看,这个阶层就是文职阶层。文职阶层的发展注定要威胁复兴党庞大而又笨拙的组织。现在,复兴党党组织的发展时刻都要受到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的约束。权力上的分化促使党加强对整个社会和官僚机构工作效率的监督,使党更加“合乎理性”。现在,一切超凡的政治魅力都集中到现在党的领袖身上。要是自己的同事或领导上班迟到,人们就可以批评他对党的事业不忠诚,因为这种批评(以及其它各种各样的自我批评)已不再是破坏党的路线的举动,他与领袖说什么或没说什么关系不大。但以前,人们是不大敢这样做的,因为它牵扯到“党性”问题,危害党的核心思想和组织的存在。

领袖人物的角色应扮演得十分恰当,因为领袖权威已不

再是“纯粹的”超凡魅力的象征，也不是独特的英雄主义或显示权力的个人特征的表现，而是经过幕后策划、精心组织以后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东西。领袖人物超凡的魅力与官僚组织紧密联系在一起。领袖的光辉形象至少应该像秘密警察一样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相比之下，秘密警察的工作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领袖的形象则是一个看得见的实体，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1983年10月，新闻媒介中萨达姆·侯赛因的形象一度消失了。伊拉克政府的内部消息证实，萨达姆的异父兄弟、情报局局长巴尔扎·塔克里特发动了一次未遂的政变。数月后，伊拉克驻阿拉伯的外交官批驳了类似的报道，宣称萨达姆和他的弟弟只是在萨达姆女儿的婚姻上发生过口角。与此同时，萨达姆本人也在一次新闻采访中露面，证实说他的那位被革职的异父兄弟不是“阴谋家”，没有参加任何“阴谋”。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1983年至今，除了萨达姆本人外，无人知道事实真相。更重要的是，即使有人非常愚蠢地打听，也不会有任何结果。这正好符合萨达姆的专制主义手段。但这一蛛丝马迹使老百姓感觉到、或者说促使他们推测有可能发生了什么事。不论萨达姆·侯赛因编造什么谎言，他作为领袖在新闻媒介中消失就能够证明所发生的一切。以前，在伊拉克发生的阴谋事件中，复兴党为了巩固政权，往往要炮制大量的“证据”证实所发生的阴谋活动。1983年，伊拉克人比以前更加容易上当受骗、轻信政府的谎言。那种认为“只要军队里的上层官员施加压力就会发生政变”的观点是错误的。感觉灵敏的高级时政评论家也弄不清楚伊拉克的政体是多么古怪。

萨达姆的形象一天 24 小时以各种各样的名义不停地出现在电视节目中,这不过是复兴党经过精心策划、用来蛊惑人心的杰作。外界的人以自己的观点看问题,所以不会认识到电视里放来放去的领袖形象对人们产生了什么影响。这种宣传如此“糟糕”,一些伊拉克人也似乎不喜欢;但他们却要把孩子们叫到跟前,为领袖喝彩。让我们欣赏一下萨达姆·侯赛因在电视中的形象吧:第一天他穿着当地阿拉伯人的服装;第二天又换成了库尔德人的装束。一会儿他穿着战地伪装服蹲在战壕里,一会儿身着军服站得笔直。过几天后,他又穿着由法国时装设计家比埃·卡丹设计的流行时装在机场拥抱外国高级官员。他开机器,读《古兰经》,会见什叶派穆斯林,为新修的大楼剪彩,作有关建筑与环境的讲演。他冷酷的表情中带着一丝微笑,叼着古巴雪茄训斥政府官员,抚摸小孩,到“毫无准备”的市民家里吃早餐,视察新近缴获的新式武器等等。萨达姆·侯赛因的家谱是公开的,他的老祖宗是什叶派的伊玛目,伊玛目的第四世主人叫阿里。阿里当然是与“圣贤”有联系了,但这个家谱却没有把他喻为圣贤。侯赛因这样做不是出于疏乎,也不是为了避免把自己与什叶派的地方观念和政治行为联系在一起。相反,这恰恰显示了他对广大民众的轻蔑。他知道有很多人会相信他的这个家谱,要否认是办不到的。

在复兴党长时期的宣传和统治下,伊拉克人不仅容易上当受骗,而且有些玩世不恭了。轻信和玩世不恭的态度开始在伊拉克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抬头。阿伦特对此作了精辟的描述:

在一个变幻莫测、莫名其妙、不可理喻的世界中,人

民群众什么都相信,什么都不相信;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切都是虚假的……大众宣传机器发现自己的听众和读者不论是多么荒谬的事情都能相信。他们不在乎被人欺骗,因为他们相信一切宣传都是谎言。而极权主义领导人把自己的宣传建立在一种假设的正确心理基础之上。在这种条件下,领导人可以使人们相信最荒诞不经的言论。领导人也相信,当人们有了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些言论是谎言时,他们也不会断定领导人是在撒谎,只会用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漠然处之。

为了证明自己是一贯正确的,复兴党总是四处游说,谎言连篇。领袖也像在舞台上演戏一样,极力表现自己。萨达姆打破了国家的惯例,向人民施加恩惠,建立了一条热线电话,定期与市民通话,听取他们对党和政府的意见,随时赦免被秘密警察判处无期徒刑的市民的丈夫或儿子。在南部乡村视察时,他向人们赠送电视机,发放崭新的纸币,走访贫苦家庭,和他们一起吃早饭,听取他们的抱怨。他这些自由活动甚至打破了自己制定的一些条例。他的目的只是更大地限制别人的自由,突出自己,而不是人民。

复兴党把遍布各地的组织和封闭的思想体系结合起来,以达到巩固政权,削弱人民权利之目的。广大人民好像处在悬崖边上,急需找到一根保护生命的安全绳。对伟大领袖的“崇拜”正是人们自我保护的措施之一。现实中没有英雄,他们不得不想象一个英雄。这是完全可能的、甚至是必要的手段。因为个人的自由已经与国家的主权系在一起,只有伟大的领袖享有绝对的自由。国家主权是不可分割的、独一无二的,个人

自由应该遵循国家的需要，与国家主权的要求保持一致。自由的概念作为一个政治条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的能力是有差异的。在伊拉克的社会中，“自由”思想是要招致死罪的。在现代的伊拉克，自由的火花刚一闪现就会被立即扑灭。日益强大的泛阿拉伯主义霸权思想和复兴党第二次执政后的社会组织根本不允许自由的存在。伊拉克不仅没有自由，而且连自由的概念也消失了。这正是萨达姆·侯赛因的统治卓有成效的原因。

思想建设与社会组织的分化是在萨达姆·侯赛因地位的上升和民众的地位消失时发生的。现实与幻想之间、统治者与民众之间固有的区别在伊拉克消失了。社会成功地按复兴党的路线有条不紊地前进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了，伊拉克人在变化莫测的统治者权威面前丧失了保护自己的重要武器。伊拉克人民对领袖人物的需要就像他们渴望摆脱领袖人物的控制一样强烈。

人们的不满体现在他们的外表和举止上。有的伊拉克人放荡不羁；有的身着奇装异服；有的留着阴阳怪气的胡须；有的人性格发生了变化。复兴党人为的恐怖统治愈广泛，人们对它就愈加恐惧，不得不向它靠拢。萨达姆·侯赛因可以为所欲为，他可以像什叶派穆斯林那样向真主祈祷，可以宣扬先祖阿里的美德，甚至可以信奉新发现的伊拉克爱国主义思想。跟局外人不同，伊拉克人民并不是被骗到这一地步。他们在经历了一切之后，渐渐认识到，他们在政治舞台上毫无任何价值，而萨达姆·侯赛因的政治观点是，要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阿拉伯民族的分裂和落后状况，就必须采取“铁的手段”。

随着宪法、法律条文、政府机构和日常事务的更替变化，

来自上层的法令像暴雨一般降落在普通老百姓的头上。这些法令涉及日常和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庞杂繁琐，令人捉摸不透。现实中的政治大厦给人民的印象越来越模糊。人们在与政府机构和同事打交道中，也会觉得一切都是假的。门卫的实权也许要比上司的实权大。复兴党的新指示是任何人都得接受的绝对真理，这些指示既不代表人民，也不代表党本身的利益，而代表的是伟大领袖的意志。在领袖的个人意志下，所有一切短命的东西就会在幻想中被组织起来；群众与领袖的思想通过组织手段达成一致。无论是民粹思想，还是多么残忍的专制手段，都不会取得侯赛因这样的统治效果。

在第三世界的国家中，那些最受欢迎的领导人都无法像萨达姆·侯赛因那样死死抓住领导权，保持自己的领导形象和地位。在1967年的阿以战争中，埃及的失败使纳赛尔领导艺术黯然失色，但埃及共和国依然完好如初。1979年，这个自信心十足的共和国与以色列签订了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和平条约》，有几千人上街迎接耶路撒冷归来的萨达特总统。我们无法想象，伊拉克在两伊战争中失败后是否会出现与此相同的结局。

萨达姆跟纳赛尔不同，他的发迹不是靠自己的成就，而是靠他与复兴党的关系。作为领袖人物，萨达姆缺乏纳赛尔身上的一些非凡才能。纳赛尔魅力超群，能言善辩，有外交家的风度。更重要的是，他还拥有苏伊士运河。当然，萨达姆·侯赛因也具有独特而超凡的魅力。

萨达姆·侯赛因也知道，他和纳赛尔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和党之间的关系。1978年，他和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作过如下的谈话：

卡斯特罗：现在的局势对伊拉克很有利，因为你们正在把全国人民统一起来，正在发动群众。而埃及做不到这一点。

萨达姆：埃及没有革命党，有的只是纳赛尔。他是位革命者，但他们国家的情况跟你们古巴不一样，你们在夺取政权以前就有了革命力量……党为此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很多人献出了生命，还有很多人遭监禁和折磨。当然，要造就一批革命者，就不免要做出牺牲。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埃及革命的吸引下，中学时代的萨达姆加入了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伊拉克组织。入党后不久，萨达姆在自己的家乡暗杀了一位支持卡赛姆政权的显赫人物，在政界崭露头角。随后，党组织便吸收他参加1959年暗杀卡赛姆的行动小组。从此以后，他的经历总是和神话掺杂在一起。有关萨达姆的传记和伊拉克电视台宣称，萨达姆10岁时就能娴熟地使用各种枪械，还说他在1959年的暗杀活动中表现得非常勇敢，对党特别忠诚，他曾勇敢地驾驶着汽车，冒着枪林弹雨解救自己的同志；他曾偷偷地从自己的伤口里取出子弹，忍着疼痛继续战斗；铁的纪律曾使他把枪对准了那些抛弃自己受伤同志的软弱分子；凭着老练和机警，他躲过了警察的追捕，最后身负重伤，从城里跑到乡下，越过沙漠，长途跋涉，来到了叙利亚的难民营……

萨达姆·侯赛因是一位典型的斗士，除了参加复兴党的活动以外，他没有别的个人经历或工作成就。在上中学和大学

时,他就积极参加党的一切活动。缺乏军事训练使他显得与同时代年轻人格格不入,而他性格中受压抑的狂暴成份总是受政治判断力的驱使和指导。他继承了复兴党的传统;巩固势力,消灭反对派,在伊拉克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会秩序。他善于组织计划周到、纪律严明的暴力活动,以此来实现他的目的。他的言词就暴露出他性格中的狂暴和幻想成份。他通过组织手段,把暴力和幻想神秘地结合在一起。

这种人不会受人爱戴,只能使人恐惧。他们之所以使不少民众肃然起敬,是因为民众能够忍受痛苦。由于来自原始暴力的疯狂在伊拉克社会中如此普遍,即使人们多么不情愿,他们最终也不得不在恐怖面前让步。人们对领袖的敬畏和自我价值的丧失,在萨达姆·侯赛因的追随者们看来,正好说明领袖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这些人之所以有这种看法,也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自己的个性。由于与复兴党思想不符的一切思想观念被彻底扫除了,人们失去了一切保护手段,丧失了对是非和真假的判断能力。

萨达姆·侯赛因的飞黄腾达象征着复兴主义的逻辑得到了实现。长期以来,复兴党对军队既恨之入骨又恋恋不舍,这几乎使复兴主义的逻辑成为泡影。从思想上来讲,复兴党对军人统治极为不满,然而,复兴党领导人也是通过操纵军队才获得了今天的地位。军队里的上层军官总是倾向于泛阿拉伯主义,所以,在叙利亚,复兴党差一点被军人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继承了复兴党的传统,保存了复兴党纯洁的观念,并使这些观念在自己的国家得以实现。他一方面抓住军队不放,另一方面却大挖军队的墙脚,最终把军队变成了复兴党的工具。复兴党的思想培育了他,他终生都为复兴党的思想所着迷。

萨达姆·侯赛因把自己的发迹建立在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其他领导人的牺牲之上。1979年7月的清洗是冲着党内的一些政治权威人物而来的。通过这次清洗，萨达姆完全控制了思想和决策机构的权力，建立了领袖人物至高无上的地位，并把革命指挥委员会确定为伊拉克的最高决策机构。实际上，萨达姆·侯赛因早就控制着伊拉克所有的实权。革命委员会中的分歧正如党的社会组织一样给复兴党带来了威胁。所以，他必须清除革命指挥委员会内部的反对分子，因为两个人撒谎总是没有一个人撒谎好，一群人作为神话世界的象征没有一个人好。随着最后一些障碍的清除，整个历史舞台都按领袖的意志准备就绪；他成了党组织和整个社会的唯一领导人。人民群众的自由与萨达姆·侯赛因个人绝对的、无所羁绊的自由完全联系在一起了。在这个时候，伊拉克复兴党就能把它在国内的暴力行径转化为一场更大的战争，而又不会导致党内出现分裂和人民对党的不忠。

萨达姆·侯赛因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他的形象超出了复兴党和伊拉克社会组织的范围。他成了伊拉克人民倡导的伊拉克民族“特征”的化身。一位泛阿拉伯主义政党的领袖在伊拉克社会中树立了自己的形象，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这个事实并非矛盾。我们应该分清伊拉克的民族“特征”和伊拉克民族主义。

伊拉克民族主义分子叫嚷国土统一，认为伊朗根本就不存在。由各种团体和宗教宗派组织起来的国家永远也不会像埃及人那样，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民族之间的差异。这也是复兴党的统治得以稳固和合法化的原因之一。

伊拉克民族的“特征”是一个拥有几百年历史，极其复杂

的整体概念，与伊拉克人在社会和文化中的许多感觉和情感都有联系。这里，我只想谈一谈伊拉克人对“用什么来统治伊拉克”这个问题的看法。伊拉克的逊尼派和什叶派阿拉伯人总认为统治伊拉克的是他们。在闲谈中，他们总是把自己与埃及人和印度人作比较，说这两个国家的人的“天性之一”就是受人统治。这种偏见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影响最为深远。

对伊拉克统治权的看法可以上溯到导致古代帝国与阿拉伯伊斯兰的伊拉克分裂的一些重大事件：如穆斯林的征服、伊拉克什叶派的产生、公元680年侯赛因的殉难、伊拉克从波斯统治下的一个省沦为大马士革倭马亚王朝的统治地、以阿拉伯人为中心的哈里发统治区的分裂以及后来阿巴斯王朝的统治等。阿巴斯王朝的大本营设在新建城市巴格达，虽然当时的主要统治者都是阿拉伯人，但却受到了波斯人的侵扰。伊拉克什叶派和逊尼派的思想与这些事件密切相关（详细情况参看本书第六章）。

在伊拉克几个世纪的历史转变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哈吉贾吉·伊本·优素福·萨奎福。哈吉贾吉先在大马士革哈里发阿卜杜·马利克手下的警察局当头子，由于成绩显著而被任命为伊拉克省的省长。他使动荡不安的伊拉克逐渐稳定下来，并在经济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历史学家们认为，他为阿巴斯王朝的文化繁荣创造了基础。在石油收入给阿拉伯的君王们带来富裕以来，哈吉贾吉就开始修建城市、铸造阿拉伯钱币、提高农业生产率。他采取果断措施，阻止人们向城市迁移，强迫穆斯林教徒回到原来的土地上。他还以向穆斯林征税的办法强迫他们入教。为了制止神学家之间的争吵，哈吉贾吉下令出版了第一部《古兰经》，并把它定为权威版本，强行使人

们接受。

萨达姆·侯赛因与哈吉贾吉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逊尼——什叶派诞生在萨珊王朝的一个省，是由大马士革的阿拉伯人组成的霸权组织。出人意外的是，复兴党企图成功地重演伊拉克的历史。复兴党不仅要像逊尼派那样，宣称忠于伊斯兰教及其政治传统，而且要重现伊拉克在阿巴斯王朝统治下的辉煌成就。众人皆知，这种成就是哈吉贾吉通过残暴的手段取得的。

因此，在80年代两伊战争爆发以后，萨达姆·侯赛因重新强调伊拉克主义。和伊斯兰历史上其它朝代相比，萨达姆的统治是以阿巴斯王朝的光辉统治为基准的。复兴党在伊拉克的革命胜利以后，开始强调泛阿拉伯主义。1979年，萨达姆·侯赛因在南部什叶派居多的省份宣讲时吹嘘道：“阿拉伯人的荣誉来自伊拉克的繁荣昌盛，整个阿拉伯民族也会兴旺发达，这就是我们现在不遗余力使伊拉克繁荣昌盛的原因。”

萨达姆·侯赛因并没有呼吁伊拉克人在国土统一的旗帜下团结在政府的周围。他对伊拉克民族主义思想最为敏感。他清楚地知道今天的民族主义思想完全是1941年到1958年那个令人憎恨的反动政权的产物。同时，萨达姆也觉得复兴党的现实主义思想已经过时了；阿拉伯的统一越来越渺茫。许多复兴党人现在想抛弃“阿拉伯革命”的口号。70年代后期的口号是“只在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伊拉克政府的宣传机器、艺术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开始寻找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伊斯兰特征，试图以此来证明什么是真正的伊拉克民族主义。然而，相信这些人的民族主义和萨达姆在1979年以后的讲话中提倡的民族主义，无异于上当受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俄国伟大的民族主义思想并不是斯大林发明出来的，他只不过是在“火上”浇了些油。在两伊战争中，不管萨达姆·侯赛因是否希望依赖伊拉克民族主义获胜，他的政权实际上早已停止了煽动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对抗的宣传。

相比之下，萨达姆与哈吉贾吉确实相似。1975年，阿卜德·萨塔·纳赛尔在贝鲁特出版了一本名为《我们的真主哈里发》的书，讽刺性地揭露了复兴党统治的实质。

他可犯下了弥天大罪，此书出版不久，他就被指控为外国间谍而被捕，遭受严刑拷打。

萨达姆·侯赛因对人民大众言论的控制与几百年前哈吉贾吉的手法极其相似。哈吉贾吉当了省长以后，立即处决了一大批持不同政见者，并把他们的尸体陈列示众。在这种场合，他通常还要对围观者发表演讲，其中有几句不朽的话每一位伊拉克小学生都记得清清楚楚，在老百姓的心目中，这几句话也是伊拉克统治者残酷心灵的表白：

我看见人头在我面前晃动，急不可待地渴望被人砍头。我就是专砍脑袋的人。我看见他们的头巾和胡须上鲜血淋淋。

真主啊！伊拉克人民！那些内部不和、四分五裂的人，那些邪恶的家伙，我不能像无花果那样被你们压榨，不能像骆驼和水袋那样任你们摆布……忠实的君主已射空了他的箭袋。他发现我是世上最强硬、最坚强的人，所以他让我对付你们。长期以来，你们一直在搞骚乱，违背了真主的神明教诲，不断地犯错误。我将像剥树皮一样剥你们的皮，像捆树枝那样把你们捆起来，像对走上歧途的骆驼

那样处置你们……真主啊！我一定履行自己的诺言，完成自己的夙愿，尽到自己的责任……我对真主发誓，将保证你们走真理之路，我将以他的名义惩罚任何一个叛逆者。

复兴党的权威

有比较才会有鉴别。萨达姆·侯赛因与哈吉贾吉之间的区别也是很独特的。哈吉贾吉的库法演讲是一份宣战书，标志着他要和本国人民作对；但萨达姆·侯赛因 70 年代后期的演讲的言辞与哈吉贾吉的不同。萨达姆厌恶直接了当的陈述方式。富有洞察力的人不会注意这一点，他们注意的是两位统治者完全不同的思想观念。

世上的权力并非都是合法的。政治权威不同于原始的权力，它来自一连串法律程序的保证。哈吉贾吉当时没有真正的实权，因为库法的人民并不忠于他，他们对谁来统治库法有自己的看法。大马士革派哈吉贾吉到库法就是为了收拾这一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从某种程度上说，哈吉贾吉的统治与战争相似，他的任务就是消除库法人内心深处对权威的态度，而不是把自己未来的臣民斩尽杀绝。

萨达姆·侯赛因拥有真正的权威，复兴党官僚统治下的社会组织和人为的建立在个人崇拜之上的政治领导体制使萨达姆的权力至高无上，合情合理。换句话说，萨达姆之所以大权独揽，是因为复兴党内的人都认为这是合法的。在伊拉克，这是一种与复兴党的经验相符的权威观念。

如果权力没有得到合法化的话，所有的权威也就不会集中在一位领袖人物身上，而是由党或几位领导人同时拥有。在

一个一党制的政权中，一位领导人独揽大权，是防止党内出山头、闹派性的诀窍。虽然这是极其荒谬的，但事实的确如此。一位有权有势的领袖如果不独揽各种政治大权，就不可能避免党内的冲突，就会在人民的心目中失去“一贯正确”的印象。如果领导人能够很顺利地实行独裁，保持自己“一贯正确”的形象，他就会再次成为权力至高无上的领袖。

从1968年复兴党的第二次执政开始到70年代中期，复兴党内曾经多次发生冲突，但毫无疑问，这些冲突未能动摇萨达姆的地位。此后伊拉克虽然经历了7年的战乱、成千上万人颠沛流离、二三十万人死亡、更多的人受伤，更不用说战争给伊拉克的经济和其他方面造成的损失，而萨达姆·侯赛因的领袖地位却安如磐石，从未受到影响。当然，从人们的心理和不太明显的举动中可以看出，复兴党与领袖或者说党与政府之间确实存在着斗争，专制与一贯正确对于我们所说的领袖人物来讲，是一种可望不可及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时间一长就会使人觉得难以忍受。但这对复兴党来说无关痛痒，因为在政治斗争中，宗派之间的冲突只有公开表现出来时，才有其作用和力量，否则，就称不上是冲突。

萨达姆领袖权威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一切权力应归于党，党再按其意志任命他人执行这些权力。其次，复兴党吸收大批党员，创立阵线组织，发展自己的后盾。人民的权力成了党的一种标志，党的权力随着党的队伍的发展和壮大渐渐从虚名走向实在。党组织取代了社会，社会名存实亡。第三，随着这一转变，党的思想的创立者面临陷入自己组织的泥沼这个危险。为了避免这一危险，领袖独揽大权，取代了其它一切政治力量。尽管如此，取代了社会而又把权力让给领袖的

党组织仍旧是新权威者赖以存在的基础。

从逻辑上来说,复兴党的第二个阶段的转变尤为重要。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加入复兴党呢?这里面有许多复杂的原因,但我认为对复兴党的恐惧是迫使人们加入复兴党的根本原因。当然也有人出于信仰自愿入党。通常只有后一类人才会使党拥有真正而合法的权力。欺世盗名的选举只能使自己倒霉,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的倒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说极大的恐惧能使权力合法化的话,那么萨达姆·侯赛因就是通过恐怖而得到实权的人。伊拉克复兴党政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此。

400年前英国内战期间,在生活“令人作呕、野蛮和极端困苦”的情况下,托马斯·霍布斯把恐惧纳入合法权力的分析之中。他是第一个这样分析合法权力的思想家。他认为世界是由相互平等、独立存在的个体组成的,这些个体组合形成了社会。当个体缺乏义务和责任感时,社会就分裂了。在这种“自然状态”下,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争斗就形成了生存的主要条件。

霍布斯认为,每一个人都受自己的感情和理性的支配。理性使人认识到要想保全自己就不得不放弃个人天生就拥有的某些权力,甚至有时不得不把这些权力转让给自己不喜欢的人。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通过永久放弃个人天生就拥有的某些权力,每一个人从整体上来说就有权运用集体的权力,从而抱成一团,保持整个群体的和平。霍布斯认为,国家权力是把人与人联系在一起的一种天然契约。这种契约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每个人用不着依靠他人。只要大家同时把自己手中那点小小的权力转让给他们认为合适的第三者,让第三者去干

预别人就行了。至于正义、义务和道德观念等在这种“自然状态”中，都是毫无意义的。在新的国家政体中，统治者不受约束的意志就代表着正义和道德，受自然契约约束的老百姓为了自己的安全只好义不容辞地忠于统治者。在这里没有什么高尚的美德。“理性”要求一个政体中的所有人思想一致，不能违背统治者的意志。

支配个人行为的感情比理性更有“潜在力量”。人们“渴望和平的激情”常常是出于对“死亡的一种恐惧”。国家权力不论是来自群众的默许还是武力，其合法性仍旧是从人对死亡的恐惧中衍生出来的。新政体下人们享受的自由与恐惧是一致的，人们只能在统治者不愿意控制的领域按自己的愿望自由行事。

霍布斯在他的分析中强调，国家权力总是建立在垄断暴力之上。他指出老百姓中有一种潜在的一致性，这就是让第三者拥有垄断暴力。他没有提及建立在人类天性之上的义务和责任感，因为这受国家权力机构的制约，带有政治色彩。

赞同霍布斯的假设就等于是接受了他的观点。显而易见，他认为除了政治领域之外，社会是不存在的。而实际上，民间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确实存在，它拥有许多得到的和继承下来的层次、分工以及个人之间的种种联系。这些由于出身、信仰、劳动分工、生产方式或其他因素而出现的“团体”，比霍布斯那种鲁宾逊式的团体更为复杂。霍布斯式的教条观点认为人类的一切义务都应是“合理的”。与霍布斯那站不住脚的哲学逻辑相反，19世纪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以自由国家的形式出现了。在这样的国家中，人们的争论愈来愈激烈，民主权力愈来愈广泛。

然而，在伊拉克复兴党的这面镜子下，霍布斯的观点是“正确的”。复兴党就是要建立一个霍布斯提出的那种社会。它的目的就是要打碎它继承下来的社会现实，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新社会——把担惊受怕、无任何根基、脱离传统团体的个人，用以国家政权为中心的组织网重新组合起来。这样以来，无任何差别、人人平等的民众便会对任何非复兴党的观念抱有敌意或置之不理。

复兴党只有一点可以说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他们坚持要创立一个真正的属于人民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个体特征完全消失了；人们与自己的过去彻底决裂了。人民群众的个性特征含有非常激进的因素。此外，在这种社会下的个人和那些通过自己的努力扩大个人空间和自由的个人是不同的。复兴党理想社会中的个人缺乏资产阶级社会中个人的文明特征，好象抛到一块无人地带，既很现代化，又很原始。这就是霍布斯所说的那种“自然状态”。

为了实现这种想象中的大跃进，复兴党人必须从现实中铲除霍布斯的楷模中不存在的文明社会。要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必须拥有本书第一章描述的那些暴力机构。霍布斯的目的一正好相反，他们关心的是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怎样使个人摆脱萦绕在心头的“对死亡的恐惧”。他认为垄断权力所建立的社会秩序，可以通过剥夺人们的行动的自由，来消除人们的恐惧。但复兴党人剥夺了人们的自由以后，又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恐惧。

总而言之，现实社会中的复兴党和抽象理论中的霍布斯都认为，统治者的权威来源于“广大人民的同意和支持”。这样，统治者的所作所为与每一个人都有联系；每一个人都是统

治者权威的创造者。所以，抱怨统治者的人应首先抱怨自己，因为是他赋予了统治者的权力。

权威与道德

专制和独裁者在他们的权威受到威胁时，就会诉诸于武力。但对于复兴党来说，使用暴力并不是他们偶尔用来对付反对派的手段。复兴党总是设想有人反对自由；暴力已经成了它的代名词。复兴党政权的特征就是怀疑一切、制造暴力和恐怖。暴力带来的恐惧使人们不得不与党保持一致。党随之拥有一切权力。而这一切权力又统统掌握在萨达姆·侯赛因手里。在其它情况下，恐惧可以使权力瓦解（如士兵拒绝作战，内战期间中央政权戏剧性地突然垮台等）。但伊拉克的权力不会从内部瓦解，而要走向专制领导的无底深渊。

伊拉克的军队和情报人员越多，复兴党就越是觉得自己的组织比任何反对派更加完善，领袖就更加威风。领袖的权威是独一无二的，但权力却是全国人一致支持的产物。所以，权力和暴力是有区别的，暴力是一种工具，为了达到正当的目的有必要使用它。甚至在复兴党统治下的伊拉克，暴力本身不是什么主要问题。伊拉克的局势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80年，伊拉克为什么会有100万复兴党员和67.7万军队呢？是谁“迫使”他们加入的？人们是不得不这样做呢，还是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伊拉克的告密者、逆来顺受者、党的追随者、工人、学生、被组织起来的妇女和儿童又是怎样的呢？伊拉克宛如一片漆黑的水域，我们只能按照深深扎根于伊拉克人思想中的政治观念来探索这些问题，而不是用人们心理中不可言喻的东西来解释这一切。

复兴党上台以前，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给人们的教训是，合法的权威与人们的屈从和支持密切相关，不管这种屈从和支持是出于自愿还是不得已而为之。纳粹分子的集中营、斯大林的大清洗都是政权正当而合法的产物。法律和道德之间极为重要的分界线被废除以后，政治权威不论是打哪一种幌子、做任何事，都和社会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区别从来就与他们赞成什么和反对什么无关，而只能显示出他们怎样改变人们的行为。法律是一种强制性的命令，是隶属于国家专制政权下的暴力手段；而道德体系却没有这些特征。30年代德国所发生的政治问题与德国人民的道德无关。人们只是接受了一种观念，认为国家暴力可以使日耳曼民族更加纯洁，提高“民族的良知”，发展“健康的民族情感”。所有的一切都在为道德服务，不论它多么令人讨厌。当时，大批的德国人与纳粹分子同流合污，肩负起消灭其它国家这个合法而道德的任务。此外，德国资产阶级拥有足够的钱财来完成这一令人生畏的任务。在近代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像德国那样富有。行政命令大于法律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有能力做自己想干的事。要是有人不认为希特勒对德国人民撒了弥天大谎，那么德国统治集团在当时发明的毒气室就是合法的了。不论我们是否喜欢，了解这些经历给人们带来的道德上的困惑可以使我们抛弃幼稚的观念，不再像以前那样相信，强迫我们的一切统治者都是不合法的。

从一个更小的范围说，伊拉克复兴党再一次把合法性问题与人的自愿问题分离开了。复兴党把恐惧变成了合法行为的前提。在很多社会和历史中，人们不愿为被迫的行为负责。在今天的世界上，谁也不会把严刑拷打下得出的口供当作证

据(当然,这是指理论,不是指实践)。但是,凡事都有例外,罗马法律和后来的宗教法庭就认为,通过体力惩罚得出的“实情”比任何证据都有力。体力惩罚当然是不道德的,未来的伊拉克人肯定会解开复兴党的合法化之谜。但现在,他们不得不这样活着,一点也不从法律的角度考虑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伊拉克人虽说有自己的“权力”,但他们的“权力”已无任何现实意义了。现实的政治世界没有人权世界那么温和。即使植根于恐惧和共谋关系之中的权威与自由选举的权威有本质的不同,伊拉克人将会发现,不管在什么条件下,权威永远是有权威的。

权力的源泉

即使复兴党最终形成的政权形式属于极权专制的范畴,复兴党仍然需要确定一些与复兴主义不大一致的原则作为指导思想。这些原则必须在被广泛接受之后,复兴党的最高领导者才能泰然处事,才能用这些基本原则解释他的言行,才能解释人们对他的恐惧感。复兴党确定的原则与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极为相似。霍布斯认为,政权是在一系列政治和道德义务中产生的。复兴党政权确立的原则充实了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欧洲内战时期,雅利安主义、反犹太主义以及国家崇拜等等都与社会契约论有关。今天的伊拉克复兴主义又是怎样的呢?1977年第35期《法律》杂志载文写道:

政权并不能独立地发挥作用,实施政权并不是为了统治。没有人民的同意和支持,政权便无法发挥作用。它

将失去合法性。人民才是一个政权合法性的源泉。

伊拉克宪法第二条中写道：“人民是权力的基础，又是权力合法性的源泉。”果真如此，复兴党就有必要对“人民”这个概念做出它的解释。

革命者和执政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认为，人民是享受同等权利和义务的一切社会成员。在实行民主的过程中，任何人，只要他的政治观点、经济观点或者学术观点对革命者有害，都将被排除在人民的范畴之外。这一部分人的社会地位将由有关部门依法规定。革命的政治意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足以使人民免受敌对思想的侵袭。我们必须改变社会的性质，因而，如何使人民具有高度的政治自觉性则显得尤为重要。

规定政治社会中的成员资格是一切政权首当其冲的任务。1977年，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公布了一份长达43页的《法律改革法》。这个“新法”为彻底改变伊拉克的法律体制制订了基本原则。“新法”的前言指出，《改革法》根据复兴党“伊拉克地区第8次会议通过的《政治报告》中的思想和观点，对法律改革的概念、涵义和目标作了规定”。换句话说，“新法”的出台是政权内部的需要。它不仅具有极其严肃的意义，而且是对伊拉克地区第8次会议通过的《政治报告》的补充。《报告》对复兴党执政的历史作了回顾。

法律改革的目的是要界定“人民”这个概念，即规定政治社会中的成员资格。世界上许多地区的革命成功以后，新政权也面临着制定“资格”标准的任务。由于一系列特殊的原因，复兴党制定“资格”标准的任务尤为严峻。它不能根据出生地、

居住地、宗教信仰(如以色列)或者种族(如南非和内战前的美国)界定“人民”的涵义,但由于人民是政权的源泉,因而,如何界定“人民”这个概念则显得刻不容缓了。

最使复兴党束手无策的是,它没有界定“人民”这个概念的任何客观标准。它既不能将出生地、户籍、居住地和居住期限、肤色、种族等作为标准,又不能将是否讲阿拉伯语或者是否信奉伊斯兰教作为客观标准。因为1968年颁布的宪法认为对革命和复兴党的坚定信仰比讲阿拉伯语和信仰伊斯兰教更重要。

萨达姆·侯赛因1973年作了一次关于伊拉克库尔德人问题的讲话。他说:“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并不认为它仅仅是阿拉伯人的执政党。实际上,复兴党认为,它既代表着阿拉伯人的利益,又代表着库尔德人的利益。换句话说,它代表了全体伊拉克人的利益,他们包括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及其它少数民族的人。有人认为我们的国民政府是争执的一方,而我们的库尔德人是争执的另一方。这种观点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就在这个时期,伊拉克的内战即将爆发。库尔德人破天荒地第一次紧密地团结在他们的库尔德领导人周围。令人惊异的是,许多人都认为,政府和库尔德人是争执的双方。政府怎么能和它的部分人民交战呢?根据这一观点,在1974年至1975年的内战期间,库尔德人敢与政府作战,他们不是外国的雇佣军便是外国的代理人。当时,所有伊拉克人都持这种观点。就因为库尔德人不愿追随原来的领导而转而拥护库尔德领导人,他们便被排除在复兴党界定的“人民”这个范畴之外。但由于他们住在伊拉克,他们便理所当然地成了阴险狡诈的“外人”。

伊朗国王礼萨和土耳其暴君阿塔蒂尔克都曾血腥镇压过

国内的民族暴乱，手上沾满了几十多万人民的鲜血。且不论他们的功过如何，他们实行镇压时心里都认为这些叛乱分子是他们的臣民。直到今天，住在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仍被称作“山区土耳其人”。1915年，土耳其的年轻人企图用灭绝住在土耳其的150万美国人的作法解决“美国人问题”，他们决心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一个美国人永远不可能成为土耳其人。以上这些作法都与萨达姆解决伊拉克的库尔德人问题的作法不同。

复兴党认为，一个政权原则上不必一定要与某一种族或者信奉某种宗教的人群结合才能发挥作用。但在实践上，它却正好相反。在伊拉克，库尔德人实际上是不可能被吸收为复兴党党员的，然而，复兴党的理论上却不能作各种限制：对党的忠诚才是唯一的条件。萨达姆·侯赛因在1977年出版的《论时局》中写道：

党章并未对申请人的种族作任何限制。任何人，只要对阿拉伯民族的未来充满信心，只要为阿拉伯民族的利益奋斗，都允许加入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都可以认为自己既是阿拉伯人的领导人，又是全国人民的领导人。国家对所有公民负责，不论他们是阿拉伯人、库尔德人还是其他少数民族的人。

在实践中，拒绝接纳某人入党的理由可以有千条万条。萨达姆·侯赛因的“慷慨大度”并没有掩盖他的真实观点。他吸收党员的标准是极其主观苛刻的。怎样才能成为一个阿拉伯人？其先决条件就是必须信仰阿拉伯主义。一个人在任何时

候，只要“相信阿拉伯人的未来并为阿拉伯民族的利益奋斗”，就变成阿拉伯人了。这无异于要伊拉克的库尔德人抛弃他们的民族特色而“硬充”阿拉伯人。

《法律改革法》认为，“对革命抱有敌意”的人就像瘟疫，如果公众的政治意识不强，他们的思想就会受到毒害。在《改革法》中有关刑法一章里，对革命怀有“敌意”的人不享受公民的权利，他们的公民权已被剥夺。《改革法》中规定，惩罚一名非政治犯时，“有必要对被告从轻处理……并应该教育他痛改前非，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司法部门应该考虑犯罪事实背后的“社会和个人因素”，从轻定刑。但是，一旦罪犯损坏了社会的利益，将从重从严处理。这样，“凡是威胁国家安全、践踏人民权利、损坏国家形象”的罪犯必将严惩不贷。在实践中，同是怀有“敌意”的人，因其公民地位不同，量刑也不同。

谁是“自己人”，谁是“外人”——这个问题始终令复兴党感到困惑。复兴党于1968年、1975年和1976年3次颁布法律和决议，在全国掀起了清除已经不存在的共济会成员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运动。复兴党多次颁布大赦令，但每次都不包括“从事间谍活动、参加共济会、搞阴谋破坏活动”的人。政府为这些怀有“敌意”的罪犯颁布了新的法律。不过，每一项法律都是短命的。新的法规层出不穷。唯一不变的是，对复兴党的绝对忠诚是衡量一切的标准。

这种思想方式必然会导致奇怪的结果。复兴党自70年代后期共将20万人驱逐出境，因为他们是所谓的伊朗第五纵队。在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伊拉克人都有一个公民证，上面记载着持证者的祖籍：奥斯曼或者伊朗。任何一个被逐放的伊拉克什叶派人都有伊朗祖籍。党的情报局头子巴拉克在他1984

年出版的一本书中认为，这些人“不论从历史上、心理上、社会习俗上还是从政治上和经济方面都与伊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言而喻，将人按祖籍和出身划分的作法是十分危险的（许多祖籍伊朗的伊拉克人因害怕被逐放而冒险逃离了伊拉克）。伊拉克人是怎样被分为奥斯曼人和伊朗人的呢？

奥斯曼帝国灭亡之后，伊拉克进行了几次人口普查。年龄大的人还记得普查时的情况。普查时，伊拉克托管地的居民必须填写自己的祖籍。南方各省的许多什叶派人都填了“伊朗”，他们误以为，这样就能免服兵役。几十年来，这种误解并未给他们带来麻烦。然而，复兴党执政后，一切都变了，他们的厄运随之降临。

一名曾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说，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认为，共有 200 万伊拉克人的祖籍是“伊朗”。如果这个估计有丝毫的现实意义，它的意义就是，复兴党大大地压缩了必须逐放的人的数量。即使是纳粹时的德国也不可能逐放 200 万人，何况是只有 1400 万人的伊拉克？巴拉克认为，在复兴党 1963 年执政前的伊拉克，所有民族法都过分宽容。复兴党执政后号召人们“一切为国家服务”，并将是否“为国家服务”作为能否取得公民权的条件。巴拉克还认为，在伊拉克大约住着 2 万 5 千名伊朗人。显然，所有有伊朗祖籍的人都受到怀疑。可幸的是，复兴党当局还没有断定祖籍伊朗的人就是第五纵队的成员（如果这批人的总数高达 200 万，他们怎么可能全部是第五纵队的成员呢）。那么，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不幸的是，自伊拉克驱逐什叶派人之后，国外出版的所有关于现代伊拉克的书，都将这些人称作伊朗人或者“伊朗籍”人，并将驱逐归结为战争的需要。其实，早在两伊战争爆发之

前,伊拉克就开始驱逐这批人了,当然,即使经常高唱“人权”的美国也在二战期间将日籍美国人大批监禁。何况根本就不讲人权的复兴党当局!伊朗的宗教领袖霍梅尼曾说,只要伊拉克能允许这些人回国,他就同意结束两伊战争。实际上,遭驱逐的人成了“无国籍”者了。

在复兴党统治下的伊拉克,剥夺国籍成了当局限制人们活动的有效手段之一。即使享有特权的人出国旅行时,也时刻担心被政府剥夺了国籍。没有国籍的人无异于一粒随风飘荡的尘埃。所有伊拉克人都是他们护照的“人质”,但他们手上的护照却有可能被宣布无效。伊拉克人出国旅行受到各种限制。出国旅行的条件是随意的、因人而异的。政府对一些人的旅游限制长达数月、甚至数年。高中学生毕业前两年内不允许出国旅行,政府不仅拒绝给他们办理护照,而且拒绝出具学生证明。伊拉克人要想出国旅行仅有一个有效的护照是不够的,他还必须有一个出境签证。出国者若要干政府不同意的事情,如长期在国外学习或工作,麻烦就来了。他们不得不伪造或者购买其它国家的护照,甚至违心地与当地入结婚。凡是想回国或者不得不回国的伊拉克人,都必须将护照藏在身上最安全的地方,若装在口袋或者包里,就要时刻查看,以免丢失。任何伊拉克人也不许将任何官方文件(如护照)遗忘在饭店里。即使是被其它独裁政府(如伊斯兰共和国和礼萨国王统治时的伊朗)驱逐出境的政治犯也不怀疑他们手上的官方文件是“自己的”。然而,出国旅行的伊拉克人却不能这样想,因为他们的护照会随时成为一纸空文。

要想成为伊拉克政权统治下的一员,要获得伊拉克政治社会中的成员资格,人们不得不如此谨慎小心。因为不论是统

治者还是被统治者，他的成员资格都随时有可能被剥夺。不论我们如何憎恨这种非人的统治，也不论我们多么期望生活中少一点政治色彩，隶属于一种政治体制却是摆脱不了的事实，因为这是文明社会的基础。

权力源泉的未来

《法律改革法》认为，权力应该由能够体现“全民族愿望”的机构来掌握。此外，它还认为，权力应该集中而不能分割，因为“一个政府的权力只能由一个机构掌握，这个‘一’就是对‘三权分立制’的否定”。这两种观点相辅相成。一个机构只要代表“全民愿望”，无论它有多么庞大都无关紧要，因为全民的愿望与这个机构的愿望是一致的。萨达姆·侯赛因在《论时局》中说：

任何党派，包括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在内，从数量上讲都无例外地仅占一个国家总人口的少部分……但是，当这个党用它自己的意愿和日常工作表达人民的意愿时，当这个党的行为符合人民的愿望时，它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代表着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因而又可以说这个党是由绝大多数人构成的党。

“人民的意愿”有时也称作“群众的利益”，与未来的发展有关。判断一个政府是否伟大不能仅仅依靠它现在的行为或者人民现在的状况，而必须考虑它将来的行为以及它现在和将来的福利政策等等。《法律改革法》写道：

实施权力就是要实现目标……宪法规定的实施权力的方法受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现实的影响。由于这些因素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在这个具有宪法作用的文件中不断重申它们的作用……不过，话说回来，这里包括的原则，不论是社会的、经济的，还是政治的，都应该是我们实现的目标，而不应该仅仅当作基础。因此，“宪法”不仅是政治领导行为的指导，而且是政治领导在实施权力过程中，努力实现其未来政策纲要的指导。

这里，宪法不是被当作一系列不能改变的法则看待的，它的作用不是协调各机构之间的关系，更不用说是对滥用权力的限制了，而是与一个党的政治纲领毫无区别的文件。宪法成了一个政党未来的蓝图，它与一个政权如何实施权力毫无关系。一个革命政权为了建造一个新社会，就必须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如果宪法不能赋予革命政权这种权力，它就形同虚设，它对国家政体的限制就失去了意义。

塑造新的阿拉伯人

复兴党制订《法律改革法》时，为什么没有像法国革命之后的其它民族主义者那样，开宗明义地宣布人民是权力的源泉？因为从这点出发，复兴党同样可以像前面叙述的那样界定“人民”的涵义。

复兴党首先考虑的是“实施权力并不是为了统治人”这句话。“人”在这里只是个抽象的概念。复兴党这样做就是要排除资产阶级“自我”的观念，因为资产阶级的“自我”有着“天赋人权”，因为这些“人权”先于社团和政治信仰而存在。复兴党

对“人”的认识是，个人，若不置于具体的社会中，若不有意识地与社会结合，就不可能成为有道德、有意识的人。信仰是个性存在的要素，信仰“占据”着个性（否则，个性就可以选择信仰了）。政体先于个人而存在，因为政体为个人建立了道德标准。

复兴党弘扬集体的价值观念而压抑个性发展。《法律改革法》指出，一切有关个人权利的法律都立足于“维护社会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利益”，“政府代表着社会的利益，而个人的利益由全民的意愿所体现”。它还指出，“私人法案”，源于自由的和资本主义的思想。

阿拉伯复兴社会党 1974 年的《政治报告》认为，伊拉克社会已经是一个净化了的社会，过去一切有害的思想都被扫除一空。在昔日的伊拉克社会，人们缺乏爱国思想，集体意识淡漠，对社会没有责任感。到 1974 年时，伊拉克社会已焕然一新，“人们的民族情感日益深厚，在阿拉伯民族面对挑战和危险之时，人们的爱国义务感大大增强……人们怀着极大的热情自愿参加集体劳动”。《政治报告》还说，人们“坚信泛阿拉伯主义、英勇无畏、大公无私、具有很强的牺牲精神，这些就是复兴党在长期斗争中建立起来的道德基础”。当一个政权从外部开始腐败时，或者当一个人在思想上与集体格格不入时，有害的思想就会泛滥。

萨达姆·侯赛因指出了这个严重的问题。他在《共同的还是对立的战壕》一文中说：

尽管我们反复重申，外部势力企图颠覆我们的革命政权，企图消灭阿拉伯民族，然而我们保护自己的首要手

段就是增强我们自身的免疫力。

复兴党作了许多努力，试图说明什么才是权力的源泉，“因为改变社会的必要性要求我们尽快解决这个特殊问题”，然而，许多年过去了，答案仍然遥遥无期。由于反对势力一有机会就会“兴风作浪”，因此，“提高自身免疫力”的任务要求复兴党必须能够预测“身体上哪些部位最容易受感染”，尽早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这样，政治权力的执行者们——秘密警察便必须发现新的第五纵队成员、外国代理人、破坏分子等等。虽然复兴党现在用“手术摘除祸根”的方法不流行了。但它“预测易受感染部位”的能力却未减弱。从政治角度讲，复兴党这样做只是为了提高“自身的免疫力”。然而，与大多数人观点一致，复兴党就能保持自身的免疫力吗？对一个坚定的复兴主义者而言，这个问题正好问反了：与大多数人观点一致，复兴党难道还不能保持自身的免疫力吗？复兴党的目的不是赢得人民的支持，而是改变人民的观点。

萨达姆·侯赛因曾说，人总是为了实现肉眼看不见的、美好的事物而改变自己，这是人生固有的本能。个人并不“因为来到地球上能够坐享其成”而感到满足。亘古以来，人们就在具体的事物中寻找“精神”。无数年之前，人们拣起石头，在上而刻上图案，并把他们理解的“精神”倾注其中。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们体内有股不可遏制的力量，有股向美好的方面改变自己的力量。萨达姆对他的传记作者说：

我们对能看得见的事物了解越多，对这些事物的支配能力就越强，我们从中获得的乐趣就越大。当我们的物

质愿望得到极大的满足后，我们会感到非常空虚……正是由于这点，人类才永远希冀着地平线以外的美景。换句话说，当人们上到一定高度时，就希望能上得更高、看得更远。

萨达姆·侯赛因的传记作者说，复兴主义革命是由“一连串变革的愿望构成的……一旦愿望变成现实，新的愿望又会产生，通过新的斗争方式改变新的现实，如此反复、连续不断”。萨达姆认为，由于人有极强的想象力，因而现实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将这种认识纳入了他的政治哲学。由于政治的艰巨任务是改变可憎的现实，所以，政治就是“斗争”。复兴党内普遍流行着这种认识，因而它拒绝正视现实，不关心“人民”的想法，即使这些“人民”符合复兴党规定的标准也不例外。今天，萨达姆这种个人心理已经渗透到伊拉克的各个角落，使一切都处于永久不息的变化之中，这样，提高“自身免疫力”就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事，一是因为“人的天性”是“变”，二是因为外部的“敌对”势力还很强大，这些不利因素使复兴党把界定“人民”这个概念的“任务”作为例外，一推再推。

萨达姆·侯赛因前而的一席话指的不仅是现代伊拉克，而且是他自己。当他说“人民”这个词时，他的双臂猛地交叉在一起，就像前而那个石刻者拣起石头一样，他也试图将“精神”注入到“人民”之中。由于“人民”的成份复杂，复兴党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现实中的“人民”。然而，复兴党与厌世者不同，它不会因为无法使国民变成清一色的人而半途而废，而是改变策略，剔除不符合复兴党理想的人。

再论政党与国家

复兴党政权的唯一目标就是创造一个新型的社会,改变阿拉伯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复兴党坚信,它的任务不仅是实施权力,统治国家,而且还肩负着“改造”的伟大任务。这些宏伟理想就是这种信念的产物。复兴党与意大利法西斯党的不同之处在于,复兴党区别对待它的目标和国家的目标,而法西斯党认为国家是至高无上的,拥有绝对的权力。墨索里尼认为,个人和集体若离开了国家,就成了无源之水,是“不可想象”的。复兴党觉得这是无稽之谈。复兴党在本质上与纳粹极其相似。两者都认为,政治权力的目的是缔造一个“纯粹”的国家。只是复兴党要缔造的是同一信仰的国家,而纳粹要缔造的是同一种族的国家。凡是相信泛阿拉伯主义“永恒的启示”的人,就要绝对相信复兴党,这才是建设一个纯粹的阿拉伯国家的关键。

《改革法》要求“重新考虑国家机器的作用,以确保它不折不扣地执行党的命令”。《改革法》是一个纲领性文件,它的基本内容是规定国家机构的权限,使国家成为一个非政治性的社会“机构”,按照政治领导人的意图行使管理权。复兴党的情报局是政治性最强的国家机构,它贯彻执行党的长期战略方针。而其它事务,如清扫垃圾和城市建设什么的,才由国家负责。即使如此,负责这些事情的人也处于复兴党情报局的监视之下。

从理论上讲,区分党和国家的职权并不会影响国家在实现复兴党的目标中发挥它的作用。然而,作了区分之后,国家各部门中就可以有库尔德人和共产党员出任部长了,他们将

执行复兴党革命指挥委员会下达的命令。

复兴党坚信的原则就是“不断变革”，国家仅仅是执行“变革”使命的工具。因此，上至宪法、行政区的划分，下至政府部门和各种所属机构的数量、名称、功能等等，无一不是处于变化之中。在伊拉克没有一成不变的事情，革命指挥委员会的命令每天像雪片一样飞舞在伊拉克上空。革命指挥委员会负责伊拉克的所有事务：劳动就业、货币发行、旅行限制、各级领导的任命、街道名称的更换、建设项目的实施、国际经济合同的签订、颁布命令处死在墙上书写标语者、修改退休金、公布达到初中程度者名单、不经过入学考试安插他们上大学、部队军官的体重限制等等，不一而足。

法令都是根据领袖的旨意颁布的。它们的巨大作用就在于削弱了国家的权力，瓦解了各行政机构按照程序和法律办事的制度。革命指挥委员会原来颁布的法令都与军队事务有关，而今天的法令已涉及到了任何部门。国家本来是个人和组织的权力基础，这个基础今天已倒塌，而领袖一人，通过党的作用牢牢控制着国家的所有事务。

党政分开能使人民享受“革命社会里的新型民主”——即人民的民主，它与“自由民主截然不同，因为那种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复兴党通过群众组织和各级人民议会表达它的观点。1974年的《政治报告》规定设立人民议会，因为人民议会“通过吸引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国家行政事务，将地方需求与国家的总任务联系起来，能加强群众和政府机构的联系”。“人民议会执行有关经济、文化、公共事业的决策，在国家的经济规划和预算范围内参与行政单位的经济计划，完成预算”。各级议会不能作政治决策。《改革法》的其它条款赋予了政治

领袖大量的权力，它们包括监督和领导议会选举及日常工作；向议会发布命令、否决议会决定、暂时中止议会领导的领导权，“若发现议会的决定不符合国家的总路线精神”，暂时中止议会的全部工作等等。一句话，人民议会仍然是由复兴党控制的一个群众组织。它与劳工、青年、妇女等许多先锋组织一道使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国家事务。

党政分开在实践中是不可能持久的，各种分设的机构都趋于联合，人员也不断地交错更替，自1973年重新组织了秘密警察以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党的情报局成了党和国家共同的安全系统。军队实行的复兴党化运动也说明，军队和秘密警察从分庭抗礼的“对峙”状态进入了联合阶段。党政结为一体的最大标志是萨达姆·侯赛因1979年清洗革命指挥委员会后自荐出任了伊拉克总统。表面上看，复兴党负责制定各项方针政策，而社会组织执行政策，然而，各种社会组织仍然由复兴党控制。从本质上讲，党政已结为一体了。复兴党党员已占到全国人口的10%，它已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实际上，复兴党当局的权威也正是来自于由党组织的“人民”。民间社会的标志已由党组织代替。权力从群众组织转到复兴党手中，再转到革命指挥委员会，最后集中到了萨达姆·侯赛因一人身上。萨达姆出任总统标志着国家的权力正式地转到了复兴党手中。1968年的军事政变终于获得了合法性。1977年颁布的《改革法》实际上为1979年的大清洗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其它国家，清洗通常是在革命或者大选成功后进行的。

结 论

为了通过保密法，革命指挥委员会为什么要“多此一举”

地先于 1977 年颁布一个公共法呢？答案是明确的，因为复兴党对待它自己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他们对悲观厌世者或是虚伪者的平庸观点不感兴趣。复兴党的道德体系与天启教（与自然教相对）里的道德体系一样，认为世界是由“好”和“坏”两部分组成。复兴党认为，好的方面只有泛阿拉伯主义、社会主义、不断斗争等，而坏的方面只有帝国主义、外国代理人、犹太复国主义和反动派。当然，与天启教不同的是，复兴党的权力源泉不在天堂，而在于“人民”——在这点上，复兴党也挺会赶时髦。不过“人民”的涵义有待复兴党进一步界定。颁布这两个法令说明复兴党急于为自己的行动寻找理论根据。

伊拉克当局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的努力不会遭到大多数人的非议。文化人士和知识分子更是全盘接受复兴党假想的关于“人民”的定义。政治对话消失以后，人们只能接受《改革法》中体现的基本原则。人们也许会说，政治对话会妨碍人们接受这些可憎的原则，其实不然，伊拉克的反对派已被同化，不会对这些原则的合理性提出异议，即使有政治对话，反对派还是会默默地接受。

到底是什么传统势力才使这些原则得以产生？为什么人们会不假思索地接受？它们又是怎样成为复兴党政权合法性的源泉？这些都是历史性问题，我只能作些简单的类比。

第五章 泛阿拉伯主义与伊拉克

复兴主义的基本内含是泛阿拉伯主义。泛阿拉伯主义者只允许阿拉伯民族存在,呼吁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当然,他们在一些问题上也有分歧。如阿拉伯人的特征是什么,设想中的统一阿拉伯国家的领土包括哪些地方,以及实现这个目标的道路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泛阿拉伯主义迅速崛起,一时间得到许多支持者的热烈响应,不过自1967年阿以冲突以以色列的胜利结束后,泛阿拉伯主义的影响迅速减退,原来支持它的许多党派和组织纷纷解体;原来支持它的政治家也改变了初衷。今天,只有复兴党一家信奉泛阿拉伯主义。阿以冲突结束后,泛阿拉伯主义在中东两个政变频繁的国家——伊拉克和叙利亚——获得成功,取得了政权并稳定了这两个多事国家的政治局面。对两国人民而言,自1967年至今这一阶段,坚信泛阿拉伯主义的复兴党的兴起成了两国现代史上的最大事件。特别需要一提的是,复兴主义在伊拉克获得了合法地位。

1918年10月3日,阿拉伯起义的领袖谢里夫·侯赛因的儿子费萨尔率领他的贝督因部队进入大马士革,从此结束了奥斯曼帝国对阿拉伯的统治。在以后长达4年的战争中,仅有400万人的叙利亚——黎巴嫩共死伤100万人,其中大多

数人死于饥饿和疾病。那些年间，土耳其在叙利亚的统治是极其残酷的。费萨尔成了阿拉伯人的救星和美好未来的象征。事实上，在解放叙利亚的战斗中，英国军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英国将军艾伦比根据英国政府的指示没有进入叙利亚的城市。

英军虽然在解放叙利亚的战斗中功劳卓著，英国政府却没有接管叙利亚的准备和计划。法国的叙利亚政策导致了1920年的马艾萨鲁姆战争。费萨尔领导的贝督因军队装备落后，被法国军队击败。英国为了维护它在奥斯曼一些省份的利益，将费萨尔扶上了伊拉克的君主宝座。

法国和英国的殖民主义政策大相径庭，导致了叙利亚和伊拉克30年代在阿拉伯世界地位的变化。尽管费萨尔在与法国人战斗中连吃败仗，阿拉伯人仍然把他尊为崇拜的英雄。赫拉兹由于是阿拉伯起义的爆发地而成为泛阿拉伯主义的中心。费萨尔率部队进驻大马士革后，大马士革随即成了泛阿拉伯主义的中心。随后，费萨尔成了伊拉克的君主，巴格达取代了大马士革成了新的中心。费萨尔统治伊拉克达20余年。在一个相信表面现象的文化里，泛阿拉伯主义中心的几次转移有着不寻常的意义。

费萨尔从未放弃过他的泛阿拉伯主义信念。由于他从前的坎坷经历，他现在在行动上谨小慎微，在思想上成了渐进主义者。费萨尔在伊拉克取得的成就不能归于他的这些思想，而应归于他的个人影响。伊拉克原来是个部落割据、民族矛盾尖锐、宗教争执激烈的地区。费萨尔凭个人的才能将四分五裂的伊拉克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他的主要功绩是结束了英国对伊拉克的托管权，使伊拉克于1932年获得独立。与此相反，叙

利亚和巴勒斯坦却一直受法国和英国的直接统治。法国统治叙利亚期间,不断阻挠叙利亚的独立运动,直到 40 年代,叙利亚的民族独立运动才得以蓬勃发展。

独立给伊拉克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军队已经成了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激进的改革者与土地所有阶层的矛盾日益激化;伊拉克共产党力量日渐壮大;泛阿拉伯主义吸引了大批军官,形成了一个政党。到 1936 年时,阿拉伯世界终于爆发了现代史上第一次军事政变。被英法两国驱逐后流亡到巴格达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哈吉·阿明·侯赛尼、耶路撒冷的穆夫蒂、叙利亚的舒克里·库瓦特里和贾勒米·马尔丹等,将伊拉克发生的这一切带到了阿拉伯世界的其它地区。那些年间,泛阿拉伯主义的中坚均是伊拉克的议员和政论家。拉希德·阿里 1941 年以复活的阿拉伯主义的名义率军队与英军周旋。他作为“阿拉伯解放运动的英雄”永载于复兴主义的历史年鉴中。米歇尔·阿弗拉克和萨拉赫·丁·比塔尔在大马士革成立了专门委员会,全力支持伊拉克,揭开了复兴主义运动的序幕。最后,费萨尔任命从叙利亚来的泛阿拉伯主义思想家萨迪亚·胡斯里为顾问。胡斯里后来成为教育总监和法学院院长。大多数伊拉克第一代政治家都毕业于该法学院。胡斯里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聘请了几十名教师,奠定了伊拉克教育系统的基础。1941 年拉希德事件后,胡斯里被剥夺了伊拉克国籍,驱逐出境。

上述分析说明,在 20 年代和 30 年代期间,伊拉克在泛阿拉伯主义运动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然而伊拉克的社会现象与泛阿拉伯主义思想不吻合,因此,伊拉克成了那一时期泛阿拉伯主义的试验基地。各种粉墨登场的政治派别、国家机构和社

会力量推波助澜，进一步加剧了伊拉克国内的紧张局势。伊拉克发生的情况表明，泛阿拉伯主义容易在一个表面上平静的社会立足。在 1920 年到 1941 年的 20 多年间，伊拉克的现代社会阶层尚未出现，人们关心的最基本的政治问题不是“谁将统治伊拉克”？而是“我们是谁？”

胡斯里与新道德

阿拉伯内战期间，知识分子中各种思想相继产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泛阿拉伯主义思想逐步形成。知识界第一次有系统地开始了对阿拉伯人的研究。这个问题以前虽有触及，但都过于零散。最后一个真正的伊斯兰政权分崩离析后，讲阿拉伯语的人第一次对自己的生存感到困惑。黎巴嫩的基督教人士 19 世纪曾经谈论过这个问题，但终因曲高和寡，没有引起多大反响。这时的阿拉伯世界动荡不安，知识界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时势造英雄，胡斯里脱颖而出，成了现代泛阿拉伯主义的鼻祖，他在 30 年代创建了这个“主义”。胡斯里认真研究过费希特等德国哲学家的著作，深受它们的影响。胡斯里坚信，民族是人类有机的、自然的分类，不以人们的意愿为转移。不同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思想方式。民族早于国家、地理范围，甚至宗教团体面存在。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主义相比，只能屈居第二。

胡斯里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家，又是一个资历深厚的社会活动家，他 1941 年后的许多颇有影响的著作是根据他在伊拉克时的论文、讲演稿、信件等写成的。这些文章收进了他的自传。胡斯里以编年史的形式在《自传》里详细记载了伊拉克

20年代和30年代政坛发生的所有事件，人们褒贬不一的观点、针锋相对的党派和部落斗争等等，不一而足。

他叙述了他20年代与叶派诗人迈赫迪·贾瓦希里的一次冲突。贾瓦希里公认是伊拉克本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直到70年代中期始终支持伊拉克共产党，但最后也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接受了复兴主义。

教育部长要胡斯里聘任贾瓦希里为巴格达一所小学的阿拉伯语教师。贾瓦希里面见他时，他们的对话如下：

我说：首先请你告诉我你的祖籍。

他毫不犹豫地说：我是伊朗人。

我说：那我们就不能聘用你。

他说：为什么？我们不是聘用了叙利亚和黎巴嫩人当教师吗？

贾瓦希里还详细地问胡斯里，他若成为伊拉克人会有什么好处。胡斯里怒气冲冲地说，他不会雇用贾瓦希里，因为贾瓦希里对自己的国籍竟采取如此轻率的态度。胡斯里的话被他的部长否决了。部长给了贾瓦希里一份伊拉克护照，并雇用他当了教师。几天后，贾瓦希里写了一首讽刺诗。诗中写道：“伊拉克有一帮人/没有他们我也不会爱上伊拉克”。

胡斯里发怒了。他与他的部长通了许多信，在信中对贾瓦希里的诗作了严肃的批评。他还找来伊拉克的逊尼派诗人马鲁夫·鲁萨夫一起分析贾瓦希里的诗，鲁萨夫说，诗中弥漫着“反阿拉伯”情绪。

萨勒曼·鲁什德在《羞愧》一书中说，无法翻译的词常常

表达一个社会的内在秘密。“反阿拉伯”就是这样的词。这个词的大概意思是反阿拉伯，或者拒绝接受阿拉伯主义。它与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笔下的“自怨的犹太人”有相似之处。“反阿拉伯”这个词还有主动脱离所有阿拉伯社团的内涵。一个犹太人不论他是怎样自卑自恨，从犹太人社团的观点出发，他都无法抛弃自己身上的犹太人特性，就像一个人不能走出自己的躯体一样。早在阿巴斯王朝，伊拉克就出现了一个叫“反阿拉伯主义”的文学思潮，该思潮强调非阿拉伯人作品的文学价值，贬低阿拉伯文学传统。批评家认为，“反阿拉伯主义”文学作品粗糙，缺乏文学价值。

今天，若一个人被称作“反阿拉伯主义”者，那无疑是对他最严厉的指责和谩骂了，无异于将他和出卖国家机密的人相提并论。自40年代起，复兴党经常使用这个词。当然，胡斯里和鲁萨夫分析贾瓦希里的诗时，“反阿拉伯”这个词可能还没有“泄露机密”的内涵。虽然胡斯里的第一语言是土耳其语，他却不遗余力地学习阿拉伯语，因为他认为阿拉伯语是阿拉伯人的特性之一。胡斯里《自传》中叙述上面故事那一章的标题是“给我们带来麻烦的伊朗教师”。在这一章中，胡斯里使用“反阿拉伯”这个词时的意义是不明确的。贾瓦希里是伊朗人还是一个“反阿拉伯”的阿拉伯人？胡斯里认为，是否讲阿拉伯语是衡量一个人对阿拉伯主义信仰的重要标准，这个标准过分“客观”，按照这一标准，他，而不是贾瓦希里，才不是一个真正的阿拉伯人。当然，好在思想家们没有注意到这个细微末节。

胡斯里只是设法消除阿拉伯人的外来影响，和部分阿拉伯人身上的“向心力作用”，因为这种力量会导致团体和部落

原始主义。不管贾瓦希里对阿拉伯主义的信仰到底如何，胡斯里都认为，他的世界观是狭隘的，不符合能够体现民族利益的“宏伟”理想。用这种严格的标准衡量，贾瓦希里和伊拉克的阿拉伯人一样是“落后的”，他的身上反映了阿拉伯民族几百年来之所以不能强盛的原因。

泛阿拉伯主义是严肃的，不允许相信它的人对它进行嘲讽。因此，不论贾瓦希里有多么卓越的语言才能，他的作法都不符合泛阿拉伯主义的要求。这样的人怎么能当为人师表的教师呢？这才是中东地区的典型讽刺！胡斯里这个被当作土耳其人养大的叙利亚阿拉伯人认为，讲阿拉伯语是阿拉伯人的特征之一，但他却将本世纪最伟大的阿拉伯语诗人贾瓦希里排除在泛阿拉伯主义之外，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他在《自传》里还叙述了一个能说明 20 年代伊拉克社会多元性的故事。什叶派地区有一所学校，校长是前奥斯曼帝国的军官。由于这个军官“为伊朗服务”而憎恨阿拉伯人，胡斯里为了削弱他的影响在同一地区也建立了一所由什叶派人管理的学校。几个月后，他将大部分学生都吸引到了新学校。“军官”校长不甘失败，开办了晚上成人教育班。开学之前，他必须获得胡斯里所属的部门批准。他第一次的申请被胡斯里拒绝。校长后来乘胡斯里不在，通过关系使一个年轻官员批准了他的申请。胡斯里非常“悲痛”，但还是接受了既成事实。作为对抗，他也积极开办了成人教育班，而且抢了“先”。这点令他感到欣慰。

胡斯里坚信，教育是建立新道德秩序的基础，而家庭和文化传统却不具备这种功能。教师犹如一个道德传播者，不仅启迪学生的头脑，而且会使学生第一次知道他们的阿拉伯人特

性以及这个特性的涵义。早在 1922 年，胡斯里就在小学开设了“道德和社会义务”课和“合唱”课。他的“道德”课不同于宗教课，而“合唱”课只要选的歌合适，也能起到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小学的历史课主要是关于伊拉克的过去。6 年级学生才开始设意大利和德国统一史课程。

20 年代的伊拉克人相信道德权威。个人不能“自由”发展，个人的言行必须符合传统社团、组织和部落的习俗和要求。国家和个人的联系远远没有传统组织、部落等与个人的联系紧密。一个人生来就属于某个宗派或部落。这个宗派或部落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个人必须接受它的习俗，否则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甚至被处死。当然，死并不是最可怕的，被自己所在的宗派或部落驱逐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在这样的社会里，具有现代意义的“自律”是不可想象的，谁也不能“自我”发展，不能建立个人的道德标准，因为这是“资产阶级”的道德。阿拉伯民族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才渐渐地建立了个人的道德标准。胡斯里清楚这点。他不像后期的民族主义者，不是落后文化的卫士，而是宽容这种现代趋势。

内战期间，一种新的政治观念在伊拉克的社团和世俗派的夹缝中萌芽了。国家提倡新型的自由，开始批评社团的“门户”观念，并为被驱逐出社团的人提供了发挥才能的机会，使他们的个性得以发展。在 20 年代和 30 年代，知识分子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他们为什么只能当官员而不能成为企业家？那时候当官员是否与政府倡导的新型自由有关？农民可以为了寻找自由而大量涌进城市，为什么个人不能冲破社团的“门户”观念而自由发展呢？

不论胡斯里认为教育的功能是什么，但绝不允许人们无

休止地探讨这类问题。他关于个人和社会的许多文章说明，他认为道德的威力是一种理想，只有在抽象的“社团”中才能体现，在实践中这种道德权威经常受到挑战，因为阿拉伯人太个性化。国家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怎样将这种分散的、个人的忠诚凝结起来，使人们同心同德，帮助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怎样将一盘散沙式的人群变成一个有统一目标和理想的集体。胡斯里并不关心现代意义上的个性发展。

一些知识分子和政治家高兴地发现，个性主义这时初露端倪，崇尚个性发展的人，企图打破传统力量的桎梏。伊拉克20年代的政治气氛相对宽松，各种观点并存。然而，胡斯里为个性主义的兴起感到不安，因为“它与社会意识相悖”。他也为人们顽固的社团意识感到不安，因为社团意识妨碍国家通过教育手段建立新型的道德秩序。

有观点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们独立思考的能力，使受教育者成为自足的、有自己的思想和价值准则的人。胡斯里撰文严厉谴责了这种观点。他也不同意“教育的目的是维护现有社会秩序”的观点。

胡斯里一心推行新道德秩序的努力是可嘉的，然而收效并不大。即使是贵族和富裕阶层也不怎么理睬他的“新道德”，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胡斯里清楚地知道这点。对他而言，教育“既要启蒙统治阶级，又要向其它阶级传授知识”。

极左的民族主义者认为，胡斯里“仅仅关心一个特定阶层的政治和社会利益，即权贵阶层的利益。”这是不顾社会现实的妄谈，他们误以为伊拉克当时有一个统治阶级。贫穷和财富不均的现实并没有分化出有意识的不同阶级。不可否认，胡斯里是费萨尔的思想顾问。但是，费萨尔，他的随从和支持他的

族长并没有形成一个能够统治伊拉克的有意识的阶级。

伊拉克教育部的英国顾问(1920—1931)莱昂内尔·史密斯离开伊拉克时写了一份不寻常的备忘录。他严厉批评了英国行使委任统治权时的伊拉克政策,他认为,英国对伊拉克的事务采取撒手不管的策略是错误的。根据史密斯的观点,英国要么从一开始就不参预伊拉克的事情,要么实行相应的殖民政策。他在备忘录中列了英国统治伊拉克的三大障碍:

1. 统治阶级过于弱小,“现代政治史中还没有第二个这样的国家:伊拉克有影响的人总共不过二、三百名”。
2. 缺乏“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
3. 尤其在受过教育的穆斯林人中缺乏社会和民族价值观念。道德的“不完整性助长精神上的不忠”。在这样的国家里,真诚的和直率的处事方法常常使事倍功半。

虽然史密斯和胡斯里在伊拉克的独立问题上观点不一,但是俩人还是互相尊重的。史密斯称胡斯里是伊拉克“唯一的具有行政管理才能而又积极倡导教育的人。虽然他的许多政治观点是错误的,但他也有难言之处,我很钦佩他”。

不论他们在其它问题上的分歧有多大,他们对伊拉克的社会、政治和道德结构之间的关系有着基本相同的认识。俩人都认为,公共教育将促使未来的上流社会建立起新型的道德观念,会使社会的政治气氛变得宽松,会促使各种观点出现,能帮助人们树立新型的集体道德观念。这些都是现代社会必备的条件,俩人都觉得,伊拉克社会二、三十年代出现在道德领域的自由气氛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希望普通的伊拉克人能

像他们一样胸怀远大的理想，思想犀利，行为有明确的目的性，然而他们却失败了。人民的行为依然缺乏目的性。

虽然史密斯在20年代中期就承认他的努力失败了，但却仍然闷闷不乐地工作着。费萨尔在绝望中死了。他死时终于意识到，他的理想落空了。除此之外，1933年的亚述人悲剧也是导致他绝望的原因。费萨尔临终前写道：

我不得不悲痛地承认，我们并未塑造出一个伊拉克“人民”，我们有的只是涣散的人群，他们没有爱国精神，只有宗教传统；没有共同的纽带，一味屈服于邪恶势力；不反对无政府主义，却随时准备推翻任何形式的政府。我们本希望将这些人群塑造成一个可以教育和改造的人民……形势严峻，我们任重而道远。

通往纪律之路

胡斯里与费萨尔和史密斯不同，他没有灰心，而是更加成熟了。他也许突然意识到仅仅靠教育无法建立新的道德秩序，只有通过行政手段才能使人们真正约束自己，而约束自己是人的现代化的本质。欧洲一些著名理论家持这种观点。胡斯里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他们的理论。约束自己不是惩罚而是帮助人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自律也不是用新的纪律简单地代替旧的行为准则。毫无疑问，教育行政部门执行新的纪律能帮助人们养成新的习惯，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摒弃传统，实现自身现代化。

胡斯里和他的继任者萨米·肖科特在伊拉克的国立学校实行着英国式的教育和纪律。学生按级和班分开，要接受考试。学校开设的课程与奥斯曼帝国时的完全不同。尽管胡斯里等人竭尽全力推行英国式教育，而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他缺少得力的助手和支持者。如果他不得不依靠贾瓦希里和什叶派地区那位校长等人贯彻他的教育思想的话，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胡斯里终于认识到不首先建立一个真正的阿拉伯社会，泛阿拉伯主义就很难生根、开花。

欧洲的寺院在封建主义的缝隙中培养了人们的自我意识和劳动道德，欧洲的工厂和学校使人们实现了自身现代化。伊拉克直到最近也没有这类纪律严明的机构。伊拉克的人口在上个世纪的前半叶始终处于负增长状况，直到上个世纪的最后25年，这种趋势才得到遏制。伊拉克上个世纪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过着游牧生活。西方式的公共卫生系统、学校、医院、监狱、救济院等机构直到本世纪50年代才在伊拉克缓慢出现。早在这些具有现代意义的机构在西方兴起之前，议会和军队就已经在西方出现。

一般的民族主义者认为，伊拉克在托管时期移植英国的议会制只是为了扩大英国在伊拉克的利益。议会制在伊拉克这样的国家并不能加快民主进程。伊拉克的君主制于1958年被推翻时，议会制随即被废除，没有一个人对此提出过异议。复兴党执政后，民主是在人民议会的作用下通过使更多的人参与国家事务实行的。议会“代表制”不同于人民议会的“参与制”，它要求人们必须用基本准则约束自己的言行。

英国在伊拉克建立的议会是由一个非伊拉克人的君主领导的，他不相信议会“代表”范围的合法性。事实上，伊拉克议

会“代表”的范围是不确定的。在伊拉克，穆斯林占绝对多数。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教义不同。伊斯兰教徒选择“参预”制，而基督教选择“代表”制。

尽管用西方的观点衡量，伊拉克的议会制是不完善的，但它仍然在 1941 年之前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使越来越多的人具备了自我意识，摆脱了社会的巨大影响。另外，伊拉克议会也是当时最崇尚自由的机构，在它的作用下，象征社会自由的新闻自由得以实施。在这种气氛下，各种各样的观点，正统的、非正统的、进步的，甚至荒诞的都可以见诸报端。伊拉克 20 年代和 30 年代的绝对“自由”与 70 年代的“非自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二者都对传统社会构成了威胁。

伊拉克的年轻一代学者尖锐地批评了那些年的政治状况。优素福·伊兹丁在《现代伊拉克诗歌：社会和政治影响》一书中写道：

委任统治期间，有些人对政治的狂热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于国于己都是弊多利少，使伊拉克的民族问题“黯然失色”。有些志士仁人——只可惜是凤毛麟角——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阿里·沙尔奇就是其中之一。诗人沙尔奇说，从表面上看，伊拉克全国除了政治组织以外，什么也没有。清真寺、寝室、咖啡馆、商店、街道、学校、律师事务所、军营……无一例外地被政治这块大磁铁吸引着。

伊兹丁谴责的正是“外国枷锁”强加给伊拉克的“自由”。泛阿拉伯主义者认为，伊拉克议会与导致伊兹丁鄙视的这种

“自由”有关。然而普通公众却另有所想，他们觉得议会的错误主要是因为议员的无能所致。当时的政治家号召人们在服饰、习惯、语言、行为等方面学习英国人。在他们的“循循善诱”下，公众终于可以把握大英帝国强盛不衰的原因了。他们心目中的英国人个个感情冷漠、不徇私情、自行约束、崇尚理性。20年代的伊拉克人大概觉得英国人是自由的，因为他们严格地约束自己，而他们的同胞伊拉克人性情暴躁，在议会中吵翻了天也没吵出个所以然。公众有时嘲笑他们这种偏颇的认识，然而，嘲笑也说明：公众心里还是认为，人的现代化离不开英国人代表的那些特性。不论伊拉克人怎么憎恶委任统治时期，这一时期极大地开拓了人们的思维和想象却是事实。后来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就与人们新的思维方式有关。一个健全的人既可以有自我认识，也可以有反帝国主义思想，两者并不矛盾。独立的个人第一次登上了伊拉克的政治舞台。政治既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也成了一门学问。

随着泛阿拉伯主义的兴起，一切都变了。自本世纪30年代起，伊拉克政治行为中的“轻松”和“趣味”，连同伊拉克式的幽默一块消失了。泛阿拉伯主义一味沉溺于它所看到的“假象”，试图消除腐败的帝国主义影响。30年代的泛阿拉伯主义和后来的复兴主义不同，它对待这些西方影响采用的是讽刺的手法。

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的伊拉克是一个传统势力十分强大的国家，只有军队称得上是现代化的。军队是一切政治的基础。在军队的支持下，城市陆续建立，拥有土地的阶层也受到军队的影响。中东地区的现代化进程还是在军队的支持下完成的。费萨尔1916年正是和前奥斯曼帝国的军官，而不

是和说空话的政客与教育家，领导了阿拉伯起义。

伊拉克正是借助军队的支持实现了社会和人的现代化，其意义是不寻常的。欧洲甚至埃及走的都不是这样的路。在1921年的伊拉克，军官，尤其是阿拉伯起义中的元老功臣，是全民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他们的政治经验最丰富，财富也最多。从1922年到1932年的10年间，伊拉克共换了14位总理，其中有9人是弃戎从政的前奥斯曼军官。

关于强制性兵役制的争论早在20年代中期就爆发了，当时伊拉克还没有获得独立。库尔德人、什叶派人和英国政府都强烈反对这种兵役制。库尔德人和什叶派人的强烈反对使费萨尔没有立即实行这种兵役制。然而，胡斯里却认为，在部队服役是强迫公众接受教育的有效办法。部队成了一个能“生产”现代人的“工厂”，也能消除社团在人们身上的影响。胡斯里写了许多文章，他认为，学校和军营在培养人们树立新的道德观念方面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他写道：

战士服役期间离开了他原来工作的环境和亲属，摒弃了昔日我行我素的生活方式，将属于自己的或者家庭的统统抛在了脑后，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其他青年同吃同住。这些人家庭出身不同，阶级成份不同，信仰不同，职业不同……他们生活在同一信条之中，为了一个不同于个人、家庭、甚至地区的目标工作。这个目标高尚得多……

军营和学校一样，能将人们从自己的小天地里解放出来，胸中装着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能使人们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有意义的牺牲……

人在本质上是离不开他人的……他不能生活在孤独

之中，必须和趣味一致的人交往，这就叫人以类聚。当然喜欢交往的程度是因人而异的。不同的人，社会意识也有强弱之分。社会化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们的社会化精神，提高社会劳动意识。从这点出发，教育青年人为国旗献身的军队生活就成了普及这种教育的最好方式之一。

伊拉克当时没有目标一致的统治阶层，教育又无法独立完成缔造这样一个阶层的任务，整个社会成了一片大沼泽。在这种情况下，军队的重要性必然引起人们的注意。部队成了公众心目中现代化的象征。要使自己成为一个现代人和有作为的人，最好的方法就是从军。无数的人争先从军，因为他们要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在伊拉克，现代化与互相杀戮相得益彰。伊拉克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走的路都不同，埃及和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在伊拉克独立之前一个世纪就独立了，传统与现代的决裂经过了一个缓慢的过程，伊拉克却不是这样，任何事情都没有孕育的过程。军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了现代化的象征。军队不是政府的工具，不是民族的救星，也不是与官僚机构、党派、社团等抗衡的一支力量。当兵服役成了人们实现自身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教育改革步履维艰，新思想纷纷出笼，议员的对话变成了无意义的争吵，腐败现象比比皆是，豪门权贵对下层人的赞助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利。正是在这种混乱之中一批年轻的军官在 20 年代应运而生，他们全部毕业于军事院校。

昔日奥斯曼帝国培养的军官与新一代军官达成默契。在胡斯里的鼓励下，年轻军官接过老一辈的传统，准备在军队中大展宏图。

关于军队作用的争论枚不胜数。什叶派对逊尼派在部队中占多数的局面耿耿于怀，而逊尼派人士，如胡斯里等，则认为什叶派反对强制性兵役制就是反对实现人的现代化。最后，什叶派在争论中放弃了原来的观点，因为他们不能因拒绝服兵役而拒绝实行自身的现代化。关于兵役制和军队在实现社会和人的现代化方面的决定作用的争论远远没有结束。1933年夏天爆发的亚述人悲剧就是一例。

军队与亚述人悲剧

住在伊拉克北部山区的亚述人有闪米特人的血统，自认为是尼尼韦城的古亚述帝国的后代。亚述帝国的废墟就在伊拉克的摩苏尔市郊。他们讲由阿拉米语发展而来的叙利亚语。他们在礼拜仪式中现在仍然使用阿拉米语。他们信奉聂斯托里宣传的基督教。奥斯曼帝国官方于1845年承认了他们的信仰。土耳其人于1915年占领了他们的居住地，将大约5万名亚述人赶到了伊拉克。他们住在英国人资助和管理的难民营里。1920年，亚述人被组织起来，有效地镇压了一次大规模的反英起义。英国于1922年征募了大批亚述人，将他们组成了一个“伊拉克军团”，他们的军饷由英国负担。当时亚述人和库尔德人一样，不认为他们是阿拉伯人，而以亚述人自居。他们的精神领袖马尔·沙穆恩直接与英国总督讨论亚述人的问题和要求，而拒绝与伊拉克当局打交道。沙穆恩直到1932年才加入了伊拉克国籍。

1933年爆发的亚述人事件的根源是，亚述人觉得英国人

背叛了他们,因为英国在结束它的委托统治以前对亚述人的未来没有做出决定。沙穆恩于1931年向国际联盟呈交了一份请愿书,建议在伊拉克为亚述人拨出一片飞地,让欧洲的所有亚述人能有一个家园,如果在伊拉克拨不出飞地,就在叙利亚拨。与此同时,他们还对伊拉克政府施加压力。伊拉克后来也加入了国际联盟,但条件是必须保证保护国内的所有少数民族。

沙穆恩1933年7月又建议,伊拉克政府承认亚述人是伊拉克人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一个宗教团体;伊拉克的阿马迪亚等地区应该允许世界上所有亚述人居住,被解散的亚述人军团应重新组建,作为伊拉克军中的一个独立军团;1925年割让给土耳其的地区也应该成为亚述人家园的一部分;最后,国际联盟官方应该承认马尔·沙穆恩是亚述人的族长,并支付年度津贴,至于由谁支付是无关紧要的。费萨尔与沙穆恩进行长期的、耐心的谈判,然而拒绝了前3个要求。争论的结果导致了一场对亚述人的大屠杀。部队乘费萨尔不在之机,在内政部长希克迈特·苏莱曼和总理拉希德·阿里(狂热的泛阿拉伯主义者,决心成为1941年抗英“革命”的领袖)的默许下,由贝克尔·西德基领导部队进行了这次屠杀。西德基后来于1936年领导了阿拉伯世界现代史上的第一次军事政变。

人口稀少的亚述人社区从来没有对伊拉克构成威胁。几百名亚述人穿过伊拉克边界进入叙利亚,试图寻找他们的“家园”。法国人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在边界上伊拉克军人打死了十几名亚述人。伊拉克军方、政府以及胡斯里的儿子、后来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哈勒登·胡斯里都认为,亚述人的行动是一次“起义”。哈·胡斯里出面为部队的行为辩护。库

尔德部落组织了自己的武装。亚述人被围在一块，遭到了疯狂屠杀。库尔德、阿拉伯和耶齐迪部落的人将亚述人的村庄浩劫一空。反对这样做的官员遭到军方的恫吓。一句话，亚述人在1933年夏天遭受了巨大的灾难。哈·胡斯里估计有600名亚述人被枪杀，而亚述人则认为有3000人被杀。

难民潮水般涌进摩苏尔市和其它一些大村庄。8月11日，在贝克尔·西德基将军的命令下，一个机枪班开进苏迈艾勒，缴了所有亚述人的枪。他们的灾难降临了；斯塔福德在《亚述人的悲剧》中写道：

部队没有发出任何警告，突然朝手无寸铁的亚述人开枪射去，人们纷纷倒下，没有被击中的惊慌失措地向屋子里跑……

部队并没有立即射击，他们有的是时间，另外，亚述人孤立无援，邻近地区没有人会帮助他们。机枪手将枪架在窗户上，房子里挤满了人。一切准备就绪后，机枪手疯狂地朝人堆射击，直到将所有的人都打死。在以前的几次屠杀中，杀人如麻的士兵将人们从房子里拖出来，要么用枪击毙，要么用棍棒活活打死。尸体推成了小山。

亚述人事件的历史意义不在事件本身，而在于伊拉克人是怎样看待这次事件。所有资料都一致认为，伊拉克人都狂热地支持军队的作法。摩苏尔城建起了凯旋门，“上面挂着血染的甜瓜，瓜上插满了匕首，甜瓜代表亚述人的头，也反映了伊拉克人的情绪”。哈·胡斯里当时还是个小男孩，目击了巴格达欢迎凯旋部队的盛况。他后来在《亚述人事件》中写道：

8月26日那天，全巴格达市倾城出动欢迎凯旋而归的英雄。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老人小孩，挤满了街道、空地和临街的房顶。几个小时内，街上水泄不通，人声鼎沸。部队从街道上通过时，庞大的人群沸腾了，狂热地将手中的鲜花撒向战士。我记得，那天父母允许我和妹妹采摘花园里的玫瑰和所有其它花。我们站在临拉希德大街的一家诊所的阳台上，将手中的花尽情地撒向游行部队。伊拉克飞机在头顶上盘旋飞行，散发传单。其中一张上写着：“欢迎祖国的卫士！狠狠打击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工具！消灭一切敌人！”太子加齐公开支持这一欢迎仪式，顿时成了人们心中顶礼膜拜的圣人。人们把他和游行部队捧上了天。不知为什么，赞扬费萨尔的人寥寥无几……5天后，当加齐、贝克尔·西德基和拉希德·阿里参加摩苏尔市的欢迎仪式返回首都巴格达时，全城人走出家门欢迎他们。费萨尔9月2日离开巴格达时，到机场送行的人不足50，而两天后却有5万人涌进同一机场欢迎加齐的归来。

贝克尔·西德基从摩苏尔回来几天后，我第一次见到了他。他拍着我的肩膀问我毕业后想干什么。我不假思索地说：当军官。

委任统治期间，伊拉克的军队由三部分组成：英国的空军和地面部队；1921年成立的伊拉克军队；伊拉克军团。伊拉克军团由清一色的阿拉伯人组成。他们是从幼发拉底河下游一个什叶派省征募的。在1920年起义中，这支部队“绝对忠于它

的英国指挥官,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当一批亚述人于1922年扩充进这支部队时,该部队曾犹豫不决。到1928年时,这支部队变成了清一色的亚述人,人数最多时达到4000人。而到1933年时服役者仅有800人。

费萨尔曾极力敦促英国同意他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却遭到了英国的谢绝。英国的态度导致了一批军官的觉醒,他们到伊拉克独立时已经常谴责英国的对伊政策。费萨尔希望拥有一支15 000到20 000人的军队。伊拉克军队在1922年仅仅有3 500人,到1927年时,人数已上升到7 000人,而到1932年时,军人总数已达到11 500人。1933年屠杀亚述人后,部队征募了大批军官,到1936年时,军队人数已翻了一番。这时,库尔德人和其它部落的人纷纷揭竿而起,与政府作对,部队几次出兵镇压都以失败告终。部队连遭败仗,每次都是在英军、特别是在亚述人部队的援助下才摆脱困境。亚述人和库尔德人与生活在平原上的阿拉伯人不同,他们都是骁勇善战的游击战士,对山中的地形了如指掌。伊拉克军队连吃败仗后滋生了一种自卑和恐惧感,在英军面前感到自卑,在亚述人面前感到恐惧。这种情感与胡斯里鼓吹的“神话”在这个时期相吻合,又使部队觉得伊拉克是中东的普鲁士,是泛阿拉伯主义的中心。

对亚述人的屠杀说明,伊拉克这个前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第一次表达了它的民族独立要求。群众对费萨尔的支持锐减,而对部队抱着极大的期望,这说明群众对费萨尔处理亚述人问题时的作法不满。与此同时,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的反亚述人情绪愈加强烈,其原因是亚述人在伊拉克军团中的作用过于出色。伊拉克热烈欢迎的唯一的现代机构是军队,赞

赏处理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武力,并且认为这才是“民族”方式,他们反对英国的“少数民族问题”的提法。在伊拉克内战的危机关头,许多人都觉得英国的提法不利于伊拉克的独立要求。

贝克尔·西德基在摩苏尔市的演说预示了他在1936年发动的军事政变。屠杀了大批亚述人后,西德基在讲演中说:“这次行动表明了部队要在将来发挥更多作用的决心。我们的部队顺利地完成了它认为必须完成的伟大义务,并将一如既往地履行它的职责。让我们和我们的部队与民族一起,等待那个日子的到来吧!”他的话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屠杀亚述人事件被认为是为了促进伊拉克的统一和团结。伊拉克的宗教派别、部落、不同民族迅速联合,形成了一个无缝的大网,全社会都崇尚军国主义。亚述人事件终于使伊拉克人团结到了“反帝国主义”的大旗下,要求摆脱英国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亚述人的生命换来了伊拉克人的反英决心。尽管英国在亚述人问题上极力偏袒伊拉克政府,尽管英国官员曾极力敦促政府将马尔·沙穆恩召回到巴格达并在必要的时刻将他拘留(政府不顾费萨尔的反对,将沙穆恩从他在日内瓦的病床上捉住并拘留在巴格达),尽管英国首先建议在北部集结部队,向亚述人施加更大的压力,然而,英国人在伊拉克早已名誉扫地。当时流行的一首歌曲唱道:加齐占领伦敦,让它痛哭吧!英国允许伊拉克独立不久,报纸披露说,英国殖民主义者招募基督教雇佣军,企图奴役伊拉克;费萨尔的随从T. E. 劳伦斯到处从事间谍活动。几个人被指控充当英国的代理人而被处死。贝克尔·西德基的部队公开处杀了所有替英国情报机构“卖命”的伊拉克人。

1933年夏天，一个具有很强的号召力的政治术语——反帝国主义，进入了伊拉克的政治生活。“反帝国主义”运动在本世纪始终与“民族独立”运动相联系。复兴党第二次执政后，推行1969年1月的暴行时仍然使用这个术语。反帝国主义的内涵仍然是争取“民族独立”。伊拉克走过的历史历程说明，今日伊拉克犹太人的悲剧就是昔日亚述人悲剧的重演。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以及美国人质危机证明，反帝国主义这个术语并不是伊拉克一家独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非殖民化运动蓬勃发展，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者和左派人士都喜欢使用这个术语。“反帝国主义”也常常用来描写赤裸裸的侵略战争（如越南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然而，在伊拉克，“反帝国主义”与反对英国在伊拉克的所作所为有着本质的区别。伊拉克在1920年的抗英起义中就没有使用这个术语。

亚述人事件说明，伊拉克的“反帝国主义”术语仅仅是一个比喻，是符号学家笔下的一个偶像符号，在伊拉克人的反帝情绪和仇恨的对象——英国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二者的关系是表面的、近似的，而不是必然的。

那么，“反帝国主义”到底指的是什么？1933年夏天，伊拉克的“反帝国主义”者是怎样的心情，有什么样的意识？伊拉克仅经过10余年的努力就从一个封建国家变成一个现代国家，激烈的社会变革带来了人们心理上的巨大变化，“反帝国主义”就是这种心态的体现吗？军队成了这种意识的体现者，在军队的作用下，伊拉克这个四分五裂的国家终于联合起来了。人们意识到，他们必须追赶世界“潮流”，却从未考虑过首先要实现人的现代化。他们寄希望于“属于”他们的外在力量——希望军队担当起他们实现现代化的代理人。英国人是外国人，

是基督教徒。他们关于自由的观念对伊拉克的传统构成威胁，不能指望他们。尽管伊拉克人接受了一些现代意识，传统观念和宗教的道德准则仍然支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反帝国主义”正好体现了人们的矛盾心理：既渴望实现现代化，又担心现代化的步伐太快。

英国在委任统治期间帮助伊拉克建立了许多现代机构。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机构既不是缓慢建立的，也不是伊拉克人民聪明才智的产物。从这点出发，我们可以说，尽管在伊拉克的英国人有自己的权利，他们却是推动伊拉克现代化进程的人，而不仅仅是殖民主义者。伊拉克的军队也是在英国的帮助下建立的，它与伊拉克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胡斯里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点。胡斯里倡导的新道德秩序显然没有得到全阿拉伯社会的响应，却在部队得到了体现。

哈·胡斯里决心重写他父亲帮助创造的这段伊拉克历史。他认为，虽然人们常说历史是胜利者宣传的产物，但在伊拉克正好相反，“历史绝对是受害者宣传的产物”。他要证明的是，亚述人确实对伊拉克构成了威胁；他们有组织，有预谋地“首先”发动了进攻；贝克尔·西德基和最高统帅部是被迫做出“反应”的；他们并未策划对亚述人的集体屠杀，是费萨尔等人煽动了亚述人的叛乱。他承认伊拉克官方对事件的叙述是“赤裸裸的谎言”，然而，他重写这段历史的目的是不是要否定“事实”，而是要美化军队，谴责费萨尔和他的一切政治主张。

斯塔福德的《亚述人悲剧》是促使哈·胡斯里重写这段历史的契机。斯塔福德与哈·胡斯里不同，他当时在摩苏尔市，是与冲突双方谈判的政府检查员。在《亚述人悲剧》中，他认为冲突双方，包括英国，均有责任。他坚决反对亚述人提出的各

种要求，而赞成伊拉克统一。而哈·胡斯里的观点却与其他不在现场的英国高级军官的观点相似。驻巴格达的英国将军黑德拉评价西德基时说，他“勇敢坚毅，朝气蓬勃，富有远见，伊拉克政府和人民有充足的理由感激贝克尔·西德基上校和他的部队”。

不幸的是，哈·胡斯里关于“历史绝对是受害者宣传的产物”的观点与现实不符。在他和其他知识分子的帮助下，伊拉克人早已不阅读“帝国主义”作品了。在复兴党政府主持下出版的《现代伊拉克百科全书》中，哈·胡斯里的观点不见了。书中只字未提对亚述人的集体屠杀，而是详细叙述亚述人有组织的“叛乱”和对部队的多次大规模突然袭击。

让我以一件小事结束这一节。马尔·沙穆恩几十年前去了美国，于1970年4月24日重新回到伊拉克，两星期后，库尔德人自治协议签订了。沙穆恩之所以回国，是因为革命指挥委员会赦免了他的罪行并恢复了他的公民权。《百科全书》记载道，沙穆恩回国后说，他衷心地感激革命的领导人，衷心希望世界和平。看到亚述人今日生活愉快，有安全保障，享有同等权利时，他说：“阿拉伯人帮助我们享受博爱和平等。巴格达的文明曙光照亮全世界时，欧洲仍然生活在黑暗的中世纪。”

结局：1936—1941

与费萨尔不同，贝克尔·西德基是伊拉克新政权的先驱。1936年的政变使他一跃成为民族英雄。在政变发生的那天，支持政变的游行队伍像1958年7月14日的情形一样，把伊拉克的大街小巷挤得水泄不通。这主要是左派改革家——民

众派的功劳。民众派当时在政界的地位相当高，20世纪40年代以后，他们的地位逐渐被伊拉克共产党所取代。后来成为伊拉克共产党领袖的几个人当时都是民众派组织成员。但与伊拉克共产党不同的是，民众派当时是由于“亚述人事件”时的内政部长希克迈特·苏莱曼而卷入这场政变的，希克迈特·苏莱曼在政变后被贝克尔·西德基任命为内阁首相。

民众派组织是1931年由一批年轻的自由民主人士组成的，他们拥护法国革命的理想。该组织从未声明是一个政党，但他们办的刊物影响很大。1934年，他们曾一度倒向社会主义，称社会主义为民粹主义。在30年代中期，该组织挂名的领导人物是一位年长的伊拉克什叶派民族主义者加法尔·阿布·蒂曼。民众派的宣言提倡伊拉克爱国主义，而不主张民族主义。因为民族主义拥有“血迹斑斑、专制和虚伪的”历史。早在民众派改头换面以前，它的主要成员都在卡里姆·卡赛姆政府任职，拥有很大的势力和影响。1936年，民众派通过苏莱曼向西德基施加影响；他们的领导人和军官在政府内阁中占多数席位，形成了一股改革社会经济的力量。阿拉伯国家的作家和记者纷纷来到巴格达，庆贺新政权的报刊和小册子广为流传。

布哈迈德·苏莱曼想让军队在伊拉克建立一个基马尔式的政权。直到1935年，他一直是拉什德·阿里的祖国同胞党成员之一。祖国同胞党成立于1930年，目的是反对英国——伊拉克条约。当时，该党内的非军人泛阿拉伯主义者人数最多。一批地主和苏莱曼以前的泛阿拉伯主义者同行对苏莱曼的内阁首次发起攻势，他们的目的是要弄清楚新政府意欲实行的改革到底是“共产主义的”改革呢还是“民族主义的”改

革。最后，迫于西德基等人的压力和阻挠，苏莱曼放弃了改革。

新的泛阿拉伯主义政府成立以后，对军队过分迁就，民众派随之与政府分道扬镳。后来，西德基遭人暗杀，“人民阵线”组织只存在了9个月。民众派由于和不受欢迎的西德基有过联系，加之他们推行的改革没有成功，力量和声誉直线下降。新成立的伊拉克共产党组织崭露头角。

军队内部也形成了两种民族主义派别：伊拉克民族主义和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贝克尔·西德基是库尔德人，渴望按照土耳其阿塔土尔克政府和伊朗礼萨国王的模式建立一个强大的伊拉克政权。西德基以屠杀亚述人和残酷镇压什叶派穆斯林部落而闻名，不少伊拉克军官都把他看作是伊拉克最能干的军官。后来，他在竞争中占了上风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暗杀了。卡里姆·卡赛姆上台后，再次提倡伊拉克民族主义，25年后，在复兴党的手中，他的命运和西德基一样悲惨。

1933年夏季以前，伊拉克的当权者是泛阿拉伯主义的文职官员。他们的暴政终于使他们丧失了政权，政府中的主要成员，包括拉什德·阿里在内，被迫流亡国外。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更加军事化的泛阿拉伯主义，但这也未给费萨尔培养起来的那一代阿拉伯人带来任何威胁。

泛阿拉伯主义思想家萨迪亚·胡斯里的学生、教育部长萨米·肖科特在1933年作了一次题为《死亡制造者》的演讲。这一演讲大受新的泛阿拉伯主义者的青睐，在整个伊拉克的学校里广为流传。他在演讲中指出，伊拉克这样的社会有必要完善“死亡制造”的能力，以实现阿拉伯的统一和恢复“哈鲁恩·拉什德的精神……伊拉克必须迅速建立起一支50万人的军队，制造数百架飞机。难道还会有不响应这一号召的胆小

鬼吗？”在肖科特看来，制造死亡的能力比拥有财富和知识更重要，因为这一能力可以“保护国家的荣誉，免遭奴役之苦”。埃及和印度也许很富有，他们的文化博大精深，但他们都在别人的殖民统治之下，没有能力“打碎屈辱的枷锁”。而阿富汗人似乎还“生活在 14 世纪”，沙特阿拉伯人还是“以骆驼奶为生”，但他们却获得了独立。这些国家知道“武力是真理发芽的土壤”。“一个没有武装力量的国家注定要受人奴役和欺辱”。他在演讲中说：

如果墨索里尼没有数万名专门制造死亡的黑衫党党员，他就不会把罗马皇帝的桂冠加在维克多·埃马努埃利的头上。肖科特号召年轻人遵循“生活朴素”的教义，仿效早期伊斯兰教时期阿拉伯人的生活方式。

1935 年，穆萨纳俱乐部成立，肖科特是最有声望的成员。该俱乐部以 7 世纪征服伊拉克的穆斯林领袖的名字命名，常常组织颇有影响的演讲活动，宣传阿拉伯主义。泛阿拉伯主义政府也仿效希特勒的青年运动形式，成立了“福图瓦”青年组织。肖科特作为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声誉不断上升，最后终于迈进了政府的大门。肖科特的青年组织是 60 年代和 70 年代复兴党的军事化的青年组织的先驱。通过福图瓦青年组织，肖科特规定，所有的学生和他们的老师都要穿军服、接受军事训练、像军人那样遵守纪律。肖科特在对学生们的一次演讲中，给“国家”下过一个定义，这一定义和 50 年以后复兴党对国家的定义如出一辙。他说：

根据伊拉克福图瓦青年组织的价值观念，外国人并不是指没有伊拉克国籍证件的人，而是指那些与我们的感情和观念不一致的人……即使一个人有 90 张国籍证明书，但只要他和我们信念不一致，他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国家的墓地里几千年以前就有了他们祖先的尸骨。对于我们来说，外国人就是那些反对阿拉伯统一的人。从教义、信仰和精神上说，他们不仅是外国人，而且是我们最残酷的敌人。

骗子穆萨拉玛虽然是阿拉伯也门人，但他是个叛徒，所以，我们阿拉伯人瞧不起他、杀了他……真主赞颂萨勒曼·法西里，他是位波斯人，却加入了伊斯兰，成为阿拉伯人，并坚信我们的信仰。因此，阿拉伯人尊敬他，给了他很高的荣誉。我们的青年组织认为，萨勒曼已成了真正的阿拉伯人，他在为这个民族服务，而穆萨拉玛及其败类肯定会被我们抛弃。

1936 年的政变清除了费萨尔一手培养起来的民族主义政治家，这些政治家曾试图把泛阿拉伯主义和对伊拉克国家的忠诚结合起来。政治家们一会儿倒向泛阿拉伯主义，一会儿倒向伊拉克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1933 年以后，贝克尔就成了人们、尤其是左派人士的英雄。到 1936 年，贝克尔的伊拉克主义发展到了顶峰。后来，他遭到清洗正是因为他信奉伊拉克主义，而不是因为没有进行社会改革。此后，泛阿拉伯主义与伊拉克爱国主义相抗衡。在奥斯曼以后的政治领域内，军队的地位不断上升，接二连三地插足政府部门。从 1936 年到 1941 年，伊拉克发生了 6 次军事政变。

西德基被暗杀以后，泛阿拉伯主义飞速发展。流亡在巴格达的阿拉伯人广泛传播泛阿拉伯主义，加深了伊拉克政治团体的分化。耶路撒冷前任伊斯兰教大法官和拉什德·阿里一起成立了“阿拉伯委员会”，企图使阿拉伯与纳粹结盟，而伊拉克民族主义者坚决支持英国和同盟军。穆萨纳俱乐部及其分组织巴勒斯坦防卫联盟和福图瓦青年组织都与阿拉伯委员会和泛阿拉伯主义军官同流合污。萨米·肖科特的弟弟、阿拉伯委员会内部的一个秘密组织成员纳吉受命执行一项特殊使命：和冯·巴本谈判与纳粹德国合作事宜。而在同时，纳吉在内阁中的同僚努里·赛义德正在与英国就合作事宜进行谈判。

这些阴谋最终导致四位泛阿拉伯主义将军在1941年4月1日宣布伊拉克进入紧急状态。这四名将军，有三位是阿拉伯委员会的成员。在新政权下，阿拉伯委员会成了国家的决策机构。摄政王阿卜德·伊拉、努里·赛义德以及亲英的政治家们登上英国炮舰，逃出了伊拉克。由拉什德·阿里和四位将军成立的“国防政府”立即得到了轴心国和苏联的支持。当时希特勒还未进攻苏联。一个月后，英国部队在伊拉克的巴士拉省登陆。5月2日战斗爆发。伊斯兰教大法官公开站出来发表反对英国的演说，号召向“伊斯兰世界最大的敌人”发起一场圣战。5月12日，德军在叙利亚基地的飞机开始袭击英国在伊拉克的空军基地。虽然有德国空军的支持，伊拉克部队5月19日在法卢贾还是被一小股英国军队击溃了。伊拉克士兵根本无心打仗。军事上的无能和后来接二连三地遭镇压使军队在后来的17年中始终未能在伊拉克成为一股政治力量。英国人对自己的胜利也大吃一惊；他们一帆风顺，直捣巴格达。拉

什德·阿里、大法官和所有的将军 5 月 29 日逃到德黑兰。

伊拉克独立史上的这一章从大屠杀中开始，又在大屠杀中结束。

伊拉克犹太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6 世纪。他们是富有的异教徒，从乡村转居到城市。多少个世纪以来，伊斯兰教徒都在同化犹太人。所以，伊拉克的犹太人大都聚集在巴格达。在 20 年代，巴格达的犹太人占总人数的 1/3，到 40 年代，伊拉克讲阿拉伯语的犹太人已达 12 万，是阿拉伯东部犹太人最多的国家。

30 年代后期，随着泛阿拉伯主义势力的日益扩大，反犹太人倾向渐渐抬头。1938 年 8 月，爆发了反犹太人的示威游行，犹太人住宅区不停地发生爆炸事件。有人甚至诬陷 1939 年苏克舒尤赫大火是犹太人放的。阿拉伯委员会与德国纳粹分子勾结以后，伊拉克的福图瓦青年组织和穆萨纳俱乐部等组织都掀起了反犹太人运动。在拉什德·阿里的“国防政府”统治时期，这种局面更加恶化。伊拉克共产党曾给内阁首相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人们“破坏犹太人的自由，闯入犹太人的家中掠夺财物，打人甚至杀人”。拉什德·阿里逃走两天后，反犹太人的浪潮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福图瓦青年组织和下级军官开始了有组织的掠夺和抢劫。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对阿卜德·伊拉和英国人重返伊拉克的报复。第二天，部落居民也涌进城，加入到掠夺和抢劫的行列，由于警察与暴乱者同流合污，使几百名犹太人死于非命。

从拉什德·阿里事件中冒出了两个新的、永久性的神话：第一，泛阿拉伯主义掀起了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斗争；第二，这场“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革命的先锋队“军队中的反政

府派”对广大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没有信心。1982年跃身复兴党情报局长的巴拉克博士早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就提出：“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应该重写历史。”1941年，他在政府的国防政府刊物上发表了自己的论文，把这一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相提并论。人们都认为，拉什德·阿里政府“的确”是现代阿拉伯民族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的“巴黎公社”。我并不想玷污人们的智力，在此讨论巴拉克博士的论证。但不管怎样，谎言并非都是谎言，有的可以被“证实”为真理。从广义上来讲，整整一代伊拉克人就是以巴拉克所说的历史“知识”培养出来的。在那一代使复兴党第二次政权得以稳固的人的心目中，这一谎言已成了真理。要想得到与之不同的历史事实，我们不得不去查“帝国主义”的资料，或者是询问相信自己而不是相信政府出版物的作家。

复兴党把谎言变成了新的真理。在巴拉克博士论文发表以前，复兴党就以1933年、1936年到1941年的局势为样板，对1958年到1968年夺权进行了彩排。卡赛姆扮演着西德基的角色；伊拉克共产党就是民众派；当然他们都支持拉什德·阿里的政权。这些扮演者以及事件的结果令人不可思议。这两个时代的相似性说明了什么呢？它是否意味着人们又回到了30年代一个没有得到解决的认识问题上去呢？为什么伊拉克的主权总是要用大屠杀（1933年）和公开的绞刑（1969年）来维持呢？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没有定论的。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的推断都是不过分的。在这一段间隔很长的时间里，至少有三点基本的区别：第一，1958年以后更多的人参与了政治活动。第二，1958年议会废除以后，政治本身也就有了新

义,政治现在与人民大众息息相关。人们的忠诚随着政党和政变的交替而变化。相形之下,1936年的议会制更顺应民心。第三,复兴党抹煞了历史真相。他们相信有组织的群众运动,相信群众中的反帝国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思想,并以此为基础夺取了政权。正是这一点使他们相信自己可以“根据新的形势而重写历史”。复兴党就是这样把谎言变成了真理。对此,伊拉克的每个人都负有责任。

第六章 复兴主义的形成

1941年，费萨尔在伊拉克发起的泛阿拉伯主义实验结束了；30年代的军国泛阿拉伯主义思想消失了。随着政治镇压活动的不断升级、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以及伊拉克共产主义的兴起，泛阿拉伯主义思想进入低谷。40年代后期，泛阿拉伯主义在伊拉克再次抬头，不过范围很小，只表现在叙利亚复兴党煽动的几所大学里的一部分学生身上。这种思想从巴格达逊尼派的生活区渐渐流传到学生中间。伊拉克复兴党作为叙利亚复兴党的一个支部正式成立于1952年。当时仅有100多名成员，大多数人都是以前入党的。1955年，有10%的伊拉克复兴党人还是非伊拉克阿拉伯人。1958年，在君主制被推翻的前夕，伊拉克复兴党也只有300多名成员。1941年到1958年，泛阿拉伯主义组织在伊拉克几乎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的注意力必须转向40年代在叙利亚成立的复兴党组织。当时，叙利亚自然是中东泛阿拉伯主义的中心。

创始人及初期事件

复兴党公认的创始人米歇尔·阿弗拉克和萨拉赫·丁·

比塔尔出生在大马士革的迈丹区。在 1925 到 1926 年的起义中,这个地区的人因用武力对付法国人而声名远扬。阿弗拉克是希腊东正教会基督教徒的后裔;比塔尔出身于逊尼派穆斯林家庭,祖上是宗教界的达官显贵。他们两人都接受过基督教式的教育,1929 年在巴黎上大学时初次相识。

在巴黎上学的 4 年中,他俩建立了密切的政治关系,一起创立了阿拉伯学生联合会,接触了很多阿拉伯国家的学生。席卷整个欧洲各大学的激进思想把他们也卷了进去。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尼采、列宁的著作,大量地阅读马齐尼、安德烈·吉德、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罗曼·罗兰的作品。阿弗拉克可能还接触过伯格森活力论的哲学著作。伯格森的哲学思想是从索雷尔的群众暴力具有创造作用的观点演绎而来的。但至今还没有合适的阿弗拉克的传记,没有人真正知道他的思想是怎么形成的。与以前其他阿拉伯民族主义分子不同,阿弗拉克从来也不承认西方思想家对自己的影响。在与埃里克·鲁洛的会晤中,他甚至宣称,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他就不再追随西方的思想潮流了。

阿弗拉克和比塔尔从巴黎回到大马士革以后,定期为共产党人的一家周刊撰稿,比塔尔曾宣称这个刊物是他们自己创办的。阿弗拉克和比塔尔是否加入过叙利亚共产党仍然是个谜,公众对此没有定论。阿弗拉克则坚决否认自己和共产党有任何联系,但他却从未否认他对共产党军队和组织的羡慕。1936 年人民阵线政府的产生和叙利亚共产党的出现使阿弗拉克开始明白了共产主义的政治目的。

1936 年,法国发生的事件——法国对亚历山大勒塔省的邪恶企图——对阿弗拉克和比塔尔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人们

还不大清楚。不管怎样，他们两人转而攻击叙利亚共产党，指责它为法国共产党和法国政府收集情报。后来，他们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反思和良心上的自我反省。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大学生们开始聚集在他俩的周围。阿弗拉克在与巴特士谈话时说：

每一个人都意识到出现了空缺，旧的领导集团已经垮台……我们必须发起一场新的运动……

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核心组织是在 1940 年 9 月法国被打败以后成立的。1941 年 2 月，复兴党第一次散发了反对法国人的传单。因此，像 20 年代和 30 年代的伊拉克泛阿拉伯主义一样，复兴党也是在叙利亚独立以后出现的。

复兴党宣称该党诞生在 40 年代反对法国人的斗争之中，然而，阿弗拉克在 1939 年曾被捕过，另外，他至少被独立以前的叙利亚当局逮捕过 4 次。1954 年出狱以后，他才成为一位闻名全国的人物。因此，作为一个政治家，阿弗拉克经受的战火考验与被纳粹分子占领的法国无关。他和比塔尔都因为反对“倾向于帝国主义”的教学制度和计划而被叙利亚的教育部长罚过款。1942 年 10 月，他们辞去教师职务，全力以赴投身于政治运动。与此同时，阿弗拉克和比塔尔创立了叙利亚委员会，支持伊拉克的拉希德·阿里政权。这个委员会就是复兴党的先驱组织。

根据半官方的党内资料，复兴党的建立是为了反对“三个背离正道的组织”。这三个组织从 30 年代起就一直是叙利亚当局的反对派，并参加过反对法国人的斗争。到目前为止，这

三个最主要的组织就是叙利亚共产党、叙利亚民族党和穆斯林兄弟会。复兴党与这三个党派的主要分歧体现在对泛阿拉伯主义思想的理解上。

阿弗拉克和比塔尔曾于 1943 年、1947 年和 1949 年三次竞选叙利亚议会议员，但都没有成功。此后，阿弗拉克发誓不再竞选议员，而比塔尔于 1954 年竞选议员成功，成了大马士革的代表，后来曾几次担任部长职务。从 40 年代到 50 年代，他是复兴党的谋士和实际组织者。

阿弗拉克只担任过一次为期三个月的部长级职务，但他在复兴党内的地位却比比塔尔重要。他是复兴党的理论家和政治哲学家。他不愿意做行政领导人，但在党的支持者中影响很大。他是一位坚强的苦行主义者，就连那些贬低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非常热衷于自己的事业。他生活俭朴，不计较钱财，深受追随者的爱戴。他和比塔尔在 10 年（1933-1942）的教学生涯中，培养并改变了一大批学生的思想，这些学生在大学时代或整个一生中追随他们。阿弗拉克在叙利亚各种报纸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扩大了复兴党的影响。正如巴特土描述的那样，在复兴党创立后的 10 年中，“米歇尔·阿弗拉克的笔杆子壮大了复兴党的力量”。

除了伊拉克在 1936 年到 1941 年间发生的事件外，法国对土耳其亚历山大勒塔省的阿拉维派穆斯林、亚美尼亚人、逊尼派穆斯林和土耳其人的让步，对早期复兴党的创立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法国 1939 年的让步，是为了让土耳其加入同盟国。从 1936 年起，另一位中学教师扎基·阿苏齐脱颖而出。他当时 30 岁，是一位阿拉维派穆斯林教徒。他发起了一场种族主义与阿拉伯专制主义相结合的运动，攻击当地的土

耳其人,也包括他们称之为“土耳其化的阿拉伯人”,如亚美尼亚人和逊尼派穆斯林教徒。阿苏齐在评论法国人对待阿拉伯人和少数民族的态度时说:“外国人害怕失去他们在阿拉伯的利益,所以便用犹太人来抵制阿拉伯人。好像他们把世上的残渣通过世上的老手倾倒在我们的头上。”这种为阿拉伯主义服务的自白从“所有泛阿拉伯主义的神话中”都可以找到。1939年,阿苏齐被驱逐出该地区后成立了一个组织,加入这个组织的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撰写或翻译对复兴阿拉伯传统有贡献的书。这一文化组织被称为“阿拉伯复兴党”。

1944年,该组织与阿弗拉克和比塔尔在大马士革创立的组织合并,阿苏齐由于和阿弗拉克积怨很深,没有加入。但阿苏齐有时称自己是阿拉伯主义的“先智”和“命运之神”。阿弗拉克从未使用过这种溢美之词。他的文章虽然缺乏超脱凡人的魅力,但逻辑性很强。奇怪的是,这两个人的阿拉伯主义思想内容倒是相同的。逊尼派伊拉克复兴党人现在称阿弗拉克是他们的“精神之父”,而他们在叙利亚的阿拉维反对派则谴责他是个篡党夺权者,称赞阿苏齐是“精神之父”。

在发展复兴党时,阿苏齐的追随者给阿弗拉克和比塔尔周围的人注入了群众政治运动和军国主义的强心剂。后来,他们脱离了阿苏齐的领导,转而追随瓦希比·加尼姆、阿苏齐的弟弟和其他来自亚历山大勒塔省的阿拉维派穆斯林于1949年在巴格达首次创立的复兴党组织。亚历山大勒塔人没有给复兴党带来新的“理论”,只是带来了一批组织力量和一种可以称之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思想。这一点我们在1933年的亚述人事件中探讨过。

在20世纪40年代,复兴党的成员大多是出身于贫穷阶

层的学生、教师、律师、医生和知识分子。1943年7月,大约有10位复兴党人发表了一个声明,大多数作家都认为这标志着复兴党的正式成立。1947年4月,当复兴党与亚历山大勒塔党组织联合召开第一次复兴党代表大会时,复兴党的总人数只有几百人。这次代表大会确立了以阿弗拉克为首的5人领导小组。

在40年代,控制复兴党领导权的是逊尼派穆斯林教徒,但1945年以后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阿拉维派穆斯林在复兴党中人数很多,但党的领导阶层中只有一位是他们的人。1952年,复兴党和阿克拉姆·胡拉尼及其大批的逊尼派农民和官员联合以后,党内的教派分布与叙利亚各教派人数比例基本吻合。到60年代后期,阿拉维派穆斯林教徒通过向叙利亚军官阶层的渗透,渐渐控制了叙利亚复兴党。而伊拉克复兴党的非军人传统依旧未变,这是因为该党把阿弗拉克当作党的创始人。

胡拉尼的组织虽然庞大,但却从未与复兴党完全合并。1941年,该组织支持拉希德·阿里;1948年组建了巴勒斯坦非正规部队,这些行动使胡拉尼声誉大振,成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1943年,胡拉尼当选为哈马省的议会代表,直到1958年,他一直是议会议员。胡拉尼在1950年创立了阿拉伯社会党,其宗旨与复兴党在1947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主张一样。当时,阿拉伯社会党的成员还不到1万名,但同年,该党在阿勒颇召开叙利亚历史上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时,招收了4万名农民党员。

在与胡拉尼联合以前,复兴党组织已拥有4500名党员,并在伊拉克、约旦和黎巴嫩设有支部。复兴党虽然在叙利亚势

力较大,但仍缺乏群众基础。1952年与胡拉尼联合以后,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才算初步形成。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复兴党已发展成为叙利亚的一个庞大的党组织。1958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诞生与复兴党的暗中帮助是分不开的。1963年,复兴党在伊拉克第一次尝到了权力的滋味。

简而言之,在复兴党创立后的10年中,众多的因素使复兴党的领导权掌握在受过教育的城市中下层成员手中。党的影响面广,党内的宗教派别多种多样。在与胡拉尼联合以后,复兴党得到了许多农村根据地,在叙利亚的军队里有了自己的立足点。阿弗拉克和比塔尔的家乡和大马士革的中产阶级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基督教徒出身的阿弗拉克、逊尼派穆斯林比塔尔和胡拉尼,以及阿拉维派穆斯林中阿苏齐的追随者,都在向人民显示,他们的组织是一个新的团体,有能力摆脱传统的束缚。复兴党通过培养人们对阿拉伯民族特征的意识,逾越了叙利亚社会中宗教派别带来的障碍。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复兴党对传统主义并没有构成威胁。实际上,复兴党人仍然使用传统的语言和传统的民族思想。亚历山大勒塔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受压迫、受苦难的亚历山大勒塔人构成了复兴党第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当然,在阿拉伯政坛上,复兴党也有一些新东西。有限的普遍性与宗派主义的结合是复兴党泛阿拉伯主义思想的一个标记。

复兴党的泛阿拉伯主义

复兴党的泛阿拉伯主义思想起初是为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中的其它思潮而产生的,这些思潮在一定程度上效仿

了西方思想模式。萨迪亚·胡斯里和康斯坦丁·祖拉克等知识分子毫不犹豫地指出了阿拉伯民族意识发展中的障碍。

在1939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祖拉克找出了“当代阿拉伯人的一些弱点”。在这本书里，他不仅赞扬西方取得的科技成就，而且赞扬西方的“思想模式和分析方式”。他说，西方人“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理，勇于怀疑一切与常理不符的东西。在我看来，我们阿拉伯人与西方人的科学态度相差甚远，我们最好谦卑一些，勇于接受西方人的科学思想”。胡斯里的观点比较温和，但他总是运用西方的事例，强调建立在僵化的假设之上的“理论”，这些“理论”使他认为一个民族的存在应注重科学客观性。

在对那一代阿拉伯知识分子的批评中，阿弗拉克在1940年写道：

我担心民族主义只是人们的口头禅，成为人们脑海中的空想，失去应有的力量和感情动力……

这些知识分子相信狭义上的民族主义，讲究准确性，卖弄自己的学说。然而，信仰可以超越一切知识，嘲笑任何学说。是信仰照亮了知识，而不是知识给信仰带来了光明。

我们所说的民族主义是一种高于一切的爱……爱是不必去追寻理由的。如果的确有人要追究理由，他也会一无所获。那些有了明确的理由才能产生爱的人，内心的爱已经枯萎和死亡了。

我们的年轻人怎样才能证实自己对阿拉伯民族的爱比对俄国的爱强烈呢？我们怎样才能使他们相信阿拉伯

人拥有值得人爱的美德？

对阿拉伯民族的爱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对国家的爱。

1941年，阿弗拉克说：“民族主义不是一种科学，而是一种应该牢记的东西。”任何试图打破这种观念，凭空想象，或从书本里、抽象的思想以及外国的经验中得出的观点都应被拒之门外。他认为阿拉伯民族面临的最大危险是来自西方的观点，这些观点极其抽象，与现实相去甚远。那些持欧洲民族主义的人备受“抽象思想”的折磨。这些观点“枯燥乏味，苍白无力”。

阿弗拉克反对就语言和历史的首要性进行讨论，因为这种唯理性的分析本身就是荒谬的。辩论也毫无意义，因为辩论意味着有问题存在。阿弗拉克着眼于一种新观点：给民族主义分子一个全新的感情基础。从民族主义者的观点出发，如果说民族主义是一种压倒一切的爱，那么，阿弗拉克就有话说了：民族主义知识化只能削弱民族主义的活力和情感。

阿弗拉克给穆斯林社会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民族主义首先应是一种爱，高于一切的爱。这并不是基督教徒的一种联想，而更像《新约》对《旧约》的挑战。《新约》要求令人胆寒的、无处不在的犹太人上帝以及清规戒律让位于基督教的基本信条：“热爱上帝”。

对阿弗拉克来说，人们对待信仰的态度极为重要。就阿拉伯的民族特征而言，仅仅接受或者与它保持一致是不够的，还有许多人不是泛阿拉伯主义者。阿弗拉克下了更大的赌注，他要人们从内心改变观念，“爱”只不过是被他首次用来代替民

族主义的一个不幸的词。不久，这个词就被换成了另外的词，但最基本的意义却没有变。

把民族主义当作一种宗教体验的做法显然与基督教教义不符。这里，我不过想作个类比。阿弗拉克并没有劝说人们信奉具体的宗教教义。他的泛阿拉伯主义思想首先是对由民族和国家组成的国际秩序这个问题的回答。在阿拉伯内战期间，国际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阿弗拉克正在通过宗教途径寻求这一问题的新答案，以前的“世俗派”阿拉伯知识分子从未这样做过。

1943年7月的声明

1943年7月24日，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发布了第一个纲领性声明。这一声明是阿弗拉克为1943年叙利亚的大选而写的。这次大选由委任统治国安排；大选的目的是建立叙利亚国民议会和政府，进而与法国协商独立事宜。33岁的阿弗拉克作为大马士革东正教候选人参加大选。下面我将对原声明的5个标题作一探讨：

1. “我们代表阿拉伯精神，反对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阿弗拉克肯定认识到了“爱”的否定意义，所以他用“阿拉伯精神”代替“爱”。对民族的爱除了带有基督色彩外，意义十分狭隘，因为它并不包含对敌人的仇恨。以前，阿拉伯精神的内在实质和力量是通过爱的行动来实施的，而现在这种精神变成一种纯洁的信仰，没有任何感情色彩。在1941年的一篇文章中，阿弗拉克再次强调“我们事业的永恒基石是不会改变的，永远也不会被别的观念所代替。这个基石就是信仰”。此外，“在我们所处的时代里，有一个永恒的真理，那就是信仰高于

知识”。这是复兴主义与西方后启蒙主义价值观念势不两立的原因之一。阿弗拉克在声明中写道：

即使帝国主义能给我们土地，或者能给我们一个与复兴党的目标相同的统一、自由、社会主义的阿拉伯国家，他们也不会在这一个理想社会中让人民拥有自己的信仰。如果是这样，我们倒情愿受殖民、受剥削、受压迫、受奴役，与我们的命运痛苦地抗衡，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寻求真正的人性。

在这里，阿拉伯精神被看成一种客观的历史力量，这很像黑格尔的学说。然而，对黑格尔来说，这种力量存在于一个国家之中，而对阿弗拉克来说，它则存在于一个民族之中。所以，这种力量与政治的兴衰和变化没有关系。阿弗拉克写道：“阿拉伯人接受了民族主义思想之后，不会成为民族主义者，只不过是给阿拉伯众多的派别中又增加了一个派别……阿拉伯人不必学习任何东西就能成为民族主义者。他们只需要忘记过去学到的东西，以便与纯洁、原始的自然建立一种直接的关系。”阿拉伯精神不是“从西方进口来”的东西，它的精髓只有那些信仰坚贞的人才能领悟到。

2. “我们代表活生生的阿拉伯历史，反对僵死的保守主义和虚假的革新主义”。1943年，阿弗拉克写道，阿拉伯精神的丧失导致民族特征的丧失，出现了许多“歪曲”和“抽象”的思想观点；共产主义运动中阿拉伯知识分子的观点基本上来自西方文化，是“虚假、伪善的革新主义”的产物。这些人虽然“和我们同属一个民族，但他们的思想和精神已全部欧化了。尽管

如此，他们自作主张，对我们的问题、我们的过去，甚至我们的现在指手划脚”。在1943年7月的声明中，阿弗拉克说：

来自西方的哲学和学说不仅侵蚀了阿拉伯人的思想，而且在阿拉伯人的领土被掠夺以前，就夺走了阿拉伯人对民族的忠心。我们要建立阿拉伯民族统一的教育大纲，以确保阿拉伯民族的特征和过去的精神，满足民族未来的需求。我们要保证对阿拉伯国家和阿拉伯事业的忠心不受任何外来势力的影响。

如果说“虚假的革新主义”使人们丧失了阿拉伯精神，那么，“阿拉伯活生生的历史”就可以使人们重新拥有这种精神。只有理解阿拉伯精神，才能理解活生生的现实与历史之间的区别。

西方的一切都被全面否定了，这不仅仅表现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而且表现在文化领域，因为西方的“哲学”和“学说”对讲阿拉伯语的人造成了危害。复兴党的泛阿拉伯主义思想在坚持本民族利益的名义下，把落后的阿拉伯世界带进了一个新天地。复兴党在西方文明的侵蚀面前毫不让步。相形之下，他们的民族主义思想在西方人手里却从未遭到类似的厄运。这种狭隘的保守思想波及教育战线：封闭式的教学，防止外界思想污染学生的心灵。他们不认为进步以及能促进人类进步的思想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总的说来，阿弗拉克对西方的全盘否定与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的做法有许多相同之处。他们两人只是世界观不同罢了。霍梅尼主义反对伊斯兰教以外的任何不良的影响，包括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思想在内；阿弗拉克

则强调建立一个民族大家庭,让不同的物种一起生活在一片没有共同准则的丛林里。

3.“我们代表富有特性的、完整的民族主义思想,反对与整个民族行动不符的口头民族主义”。“完整的民族主义”富有阿拉伯精神,并通过整个民族的行动表现出来。“民族行动”是检验一个人是否信仰阿拉伯精神的试金石,也是检验一个人是否信仰阿拉伯主义的唯一准则。我们不能片面和孤立地根据一个人的举止来判断他的观点和态度,因为一个人的态度与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一样,不是孤立存在的。判断一个人的态度和行为应该从反映信仰的意图和动机入手。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塔里克·阿齐兹在谈到复兴党党员并非一模一样时作过同样的论述。

4.“我们代表阿拉伯主义的精神,反对在政治上搞阴谋诡计”。复兴党认为自己是“奋斗者”,是一种新的战斗精神的创始人。“我们的任务是开路,而不是铺路……是撒下不朽的种子,而不是收获果实。因此,我们不急于参预政府,而要在斗争的前沿阵地奋斗很长一段时间”。政治是一个贬义词,政客们也总是不怀好意。在早期的政治声明中,复兴党从未直接反对那些持不同政见的党派。

“这是一个英雄的年代”,阿弗拉克在过去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天真的年代,因为准备投入战斗的这一代人像孩子们一样正直诚实,不知道政治是何物。”我们的英雄不会想方设法取悦人民,相反,要激怒“那些他们认为是腐化、堕落的人”。

所有与复兴党的观点不同的思想都会在堕落和腐朽中解体。有些反动政客虽然“智力过人,才华横溢”,但他们的“诡

计”没有任何效果，丝毫不能消除“腐蚀民族肌体、带来痛苦的疾病”。阿弗拉克喜欢用人体来作比喻。他把阿拉伯的现状比作失去了“灵魂”的人，这个人从骨子里患上了一种疾病，阿拉伯人的“政治权术”使这一疾病日益恶化。复兴党就是要根除这些疾病，这也是复兴党发动革命的主要原因。

5. “我们代表新一代阿拉伯人”。 “新一代阿拉伯人”肩负着“阿拉伯的历史使命”，是阿拉伯精神的化身，以理想社会的准则作为行动的指南。新的一代阿拉伯人将从“一部分年轻人”中产生，他们当中无疑会有“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但年轻人也有可能成为新一代人的敌人。

在 1944 年的一篇文章中，阿弗拉克说：

现实社会总是以最大的危险来威胁年轻人，因为一方面，社会促使他们上进，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另一方面，社会也有可能使他们一事无成。不管怎样，我们别无选择，只有不顾现实中的一切困难，完成历史交给我们的光荣使命。所谓“不朽”不是指从现在走向未来，而是指从现在就埋下不朽的种子。

阿弗拉克的文章中常常出现“不配”二字，并常把它们和“活生生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一切事情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不会改变。阿弗拉克喜欢把这一被动的声明转变为主动的宣言。他常说：“将要出现的东西，将会永远存在。”所以，阿拉伯民族将会一如既往地发展下去，因为新一代人已经出现了。从阿弗拉克所有的观点来看，他总是把一个意义同另一个意义联系起来，这是他保持“民族”定义的一致

性的唯一方法。他说：

民族并不是数字的总和，而是指一种思想。这种思想体现在整个民族或个人的身上，一个民族不会因其人数减少而遭毁灭，但限制人民的思想则可以使一个民族灭亡。

在人们的思想观念薄弱和受到压制时，领袖人物不是呼吁大多数人或全体人民保持思想一致，而是呼吁那些反对派和敌人转变思想。他不会以人数来代替“思想”，而是让人们都信奉他的“思想”。他不仅是一个召集者，而且是一个统一者。换句话说，他是独一无二的“思想”的主人，能够分辨并抛弃一切相对的思想观念。

“新一代”是阿拉伯“民族”的象征；“阿拉伯人的使命”、“完整的民族主义”、“阿拉伯活生生的历史”、“阿拉伯精神”等纯洁的“信仰”在人民大众中普遍传开了。阿弗拉克认为，一个民族是由拥有同一正确信仰的人组成，整个民族的客观性就在一种完全主观的愿望中形成了，尽管这种主观愿望出自一人——领袖。

从胡斯里的泛阿拉伯主义思想中衍生而来的民族概念，作为一种社会学思想，与阿弗拉克的民族概念不同。在理论上，胡斯里抱着一种自我憎恨方式生存，因为他是一个阿拉伯人，却不按泛阿拉伯主义的主张行动。然而，阿弗拉克则认为，没有“爱”、“精神”和“思想”，社会本身就不存在。社会秩序的存在与道德秩序的绝对性是不可分割的。胡斯里以前一直满足于教育对建立新道德的作用，后来又转而认为军队也是推

行新道德的代理人。但对于复兴党人来说，这些途径是不够的。信仰是一个前提，而不是目标。这是复兴党最基本、最独特的指导思想。

30年代后期，伊拉克也有阿弗拉克式的民族主义先驱人物。胡斯里的得意门生萨米·肖科特就曾以同样的口吻给“民族”下过定义，但他的着重点有所不同：

我们这个民族和其他民族一样有自己的敌人。民族的敌人和家庭的敌人一样有两类：内部敌人和外部敌人。内部敌人往往比外部敌人威胁更大。一个民族要复兴，必须首先打败和清除所有内部的敌人。内部敌人有团体，也有个人，他们吸收了学校和社团的一些观点，认为自己在大多数人和崇高的国家政权面前是一个陌生人，认为国家伤害了他们的利益，降低了他们的地位。由于他们的力量不够强大，无法公开站出来与国家为敌，他们便采取秘密手段反抗，暗中与外部的敌人勾结，充当他们的间谍。他们的心中充满了嫉妒、愤怒和复仇的欲望。国内外敌人就这样达成协议，互相勾结，制造混乱。

肖科特的话特别实际，也很清楚。而阿弗拉克在强调“阿拉伯精神”时就不像肖科特这么实际、这么清楚了。肖科特也认为民族主义首先是一种爱。在政治上，人们不会用如此清楚的方式表达爱。阿弗拉克通过曲里拐弯的推理把肖科特的原始观点发展成一种完美而令人尊敬的学说。这是阿弗拉克留给阿拉伯政治的伟大遗产。

复兴党正式接受了民族特征概念。1942年，在复兴党成

立大会上,复兴党人在章程中把下列信仰作为一个最基本的准则写了进去:“阿拉伯民族之间存在的一切分歧都是表面的,是虚假的,随着阿拉伯人民的觉醒,一切分歧都会消失。”复兴党的章程第 10 条规定:“阿拉伯人是指那些相信自己是阿拉伯民族的一员的人”。“任何信仰或参加种族主义组织的反阿拉伯团体的人,或为了殖民目的移居阿拉伯国家的人都应该排除在阿拉伯人之外”(见章程第 11 条)。政治权利只限于那些“忠于阿拉伯、与其它宗教派别分道扬镳的人”(见章程第 20 条)。一切活动以及各种形式的组织都应限制在“泛阿拉伯主义思想的范围之内”。因此,这个章程从几个方面进一步确定了阿弗拉克提出的基本观点,即民族主义是高于一切的信仰。

民族特征与伊斯兰教

复兴党在 1943 年 7 月的声明中说:

教派之间的分歧使一部分阿拉伯人与国家的精神和传统疏远了。我们衷心希望这些阿拉伯的基督教徒觉醒过来,从伊斯兰教中受到教育,增强民族主义意识。阿拉伯人正是在民族领域内证明了他们的思想力量、道德力量和精神优势。

阿弗拉克号召基督教区的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教的名义下反对教派主义,这并不是为了虚张声势、扩大复兴党的影响,而是为了扩充复兴党早期的思想。早在复兴党还没有群众基础以前,复兴党的早期思想就开始形成,并一直伴随着复兴党

泛阿拉伯主义思想一起发展。复兴党 1943 年的声明和《纪念阿拉伯的先知》一文清楚地表明了复兴党对伊斯兰教的观点：

西方抽象的民族主义观点把民族主义与宗教分开是符合逻辑的。宗教是从中东传入欧洲的，所以对于西方人来说，宗教是外国的东西……阿拉伯的伊斯兰教不只是一种永恒的信仰，也不是一种抽象的伦理说教，而是阿拉伯人表达普通情感和生活观的最高形式，也是表达他们完整个性最有效的方式。这种表达方式既表达感情，又表达思想；既反映劳动，又反映命运。伊斯兰教是他们的语言和文学的精华，是他们民族历史中最宏伟、最壮观的一部分……所以，伊斯兰教与阿拉伯主义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其他宗教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

阿拉伯主义是“肉体”，伊斯兰教是它的“灵魂”。阿弗拉克多次提醒阿拉伯人注意：“民族意识的觉醒与宗教启示不可分割”。阿拉伯人从未因领土、种族或经济问题进行过扩张。他们的行动出自精神上的道义。西方之所以害怕伊斯兰教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伊斯兰力量”已经呈现出一种新姿态，这就是阿拉伯民族主义。

阿弗拉克提醒人们不要把穆罕默德仅仅当作崇拜的偶像，他认为每一个阿拉伯人都应该重温自己的人生意义。他想让每一个阿拉伯人都成为穆罕默德，“因为每一个人都属于孕育了穆罕默德的这个伟大民族，或者说每一个阿拉伯人都是穆罕默德用毕生精力创造出来的民族的一员……穆罕默德是所有阿拉伯人的化身”。今天，我们要让所有的阿拉伯人都成

为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在与其他阿拉伯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中成了领袖，他不是在与非阿拉伯世界的斗争中出名的。真主选择了阿拉伯人来检验穆罕默德带来的启示，他要消除的缺点也“是阿拉伯人走向毁灭的缺点”。今天的穆斯林也是阿拉伯人，是新一代的阿拉伯人，比以前更加完整、更加发达。

所有的穆斯林阿拉伯人都代表穆罕默德，都是各自的民族团体中的一员，他们的先知也是他们的政治领袖。上帝和凯撒的旨意仅仅体现在一个真正的人身上，这个人既是基督教的创始人，也是第一个国家的领袖。然而不管怎样，基督死在了十字架上，基督教世界的政治权力与宗教道德渐渐疏远了。然而，阿拉伯人早期的思想不会这样轻易地与政治分离。

伊斯兰文明把各种民族凝结在一起，在这一方面，罗马帝国和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都是无法企及的。虽然种族集团曾利用政治优势统治广大的伊斯兰地区，但就文明而言，特别是“从高层次”文化（如艺术、哲学、科学、神学等）意义上说，伊斯兰教是鲜为人知的跨文化的结晶。

阿拉伯特征的意识根源在泛阿拉伯主义的思想体系，而这一思想体系又起源于这样一个事实：讲阿拉伯语的各民族曾经是政治上统一的“历史”民族。他们大多数仍旧信奉以前的宗教，对统一时期的历史记忆犹新。阿拉伯历史上的辉煌时期是非常短暂的。阿巴斯王朝结束了阿拉伯种族的霸权主义后，阿拉伯文化很快发展成一种更加广泛的伊斯兰文明。在这个文明中，土耳其人、波斯人、柏柏尔人、西班牙人、犹太人和基督教徒们混杂在一起；阿拉伯主义和伊斯兰教之间难解的怨恨消失了。然而，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人和其它种族集团融合在一种富有活力的新文化范畴内，本身就说明了阿拉伯主

义者将“外国人”“争取了过来”。伊斯兰教是阿拉伯主义最伟大的创造，肥沃的新月地带和北非讲阿拉伯语地区也是伊斯兰文明的摇篮。阿拉伯主义找到了丰富的历史传统，这个传统后来成了阿拉伯主义魅力的源泉。

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总是宣称他们在某一方面与伊斯兰教有联系。像阿弗拉克这样的世俗派泛阿拉伯主义者，曾作过题为《纪念阿拉伯人的先知》的演讲，表达了他们与伊斯兰教的联系，但他们缺乏心理上的悟性，信念不那么坚定。也许这些演讲对于基督教泛阿拉伯主义者来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仪式。胡斯里对阿拉伯主义和伊斯兰教的评论是比较随和、比较实用的，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他和阿弗拉克都在建造自己与伊斯兰教间的桥梁，使自己免遭宗教的伤害。但他们心里也很清楚，泛阿拉伯主义不得不承认有愧于伊斯兰教。其它的民族主义是不会遇到这类问题的。阿弗拉克通过对伊斯兰教半神话似的理解，创立了一种新的泛阿拉伯主义。在泛阿拉伯主义思想和理论家中，阿弗拉克独自一人，完善了一种新的现代民族观念，这一观念不是来自遗传、个人出身或语言传统，而是来自伊斯兰教基本的存在前提：对信仰的忠诚。

巴特土发现，阿弗拉克的民族概念与宗教特征之间存在着一个矛盾：有时候，阿拉伯主义似乎高于伊斯兰教；有时候正好相反。巴特土注意到，矛盾的出现不是因为“阿弗拉克不注意逻辑，而是因为他那华丽的辞藻后面隐藏的真正目的：伊斯兰教对情感的驾驭恰好符合阿拉伯民族运动的要求，更确切地说，恰好能为复兴党服务”。

在阐明了问题的症结之后，我想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如果阿拉伯主义与伊斯兰教之间确实存在矛盾，那么这一矛盾就

在阿弗拉克的推理形式之中了。但在这里，一切问题都必须用阿弗拉克的话来说：宗教代表了阿拉伯人的天才，“与阿拉伯人的天性是一致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不会与宗教发生冲突，也不会与宗教分离，因为从根本上讲，这两者都是“发自内心的、代表了上帝的旨意”。宗教与泛阿拉伯主义超常的起源暗示出，不可知的事物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因为两者都是不可知的。但是，阿弗拉克又对他的同代人胡斯里说：民族主义是高于一切的信仰，不必寻找别的东西。这才是他的真正思想。然而，大多数受伊斯兰教驾驭的阿拉伯人盲目地接受了他所说的话，反而认为巴特土的问题奇怪而荒谬。

、复兴党思想的一致性

阿弗拉克擅长用华丽的辞藻和救世主式的口吻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福阿德·阿贾米曾说：

读一读阿弗拉克在 1976 年后的大辩论中撰写的主要著作，人们就会发现复兴党的政治思想破绽百出，缺乏一致性。他那 300 页的长篇大论对过去的错误和今后应该改进的方面没有提出任何真知灼见。全书只能显示出他对华丽辞藻的迷恋。他号召党放弃权力，恢复“纯洁的本质”。

阿弗拉克对客观地分析过去和现实地看待未来从来就不感兴趣。他有自己的世界观，认为自己扮演着一个鼓动家的角色。阿弗拉克把现实局限在党内这个小圈子里。从这一点看，他的言行是一致的；他的文章也非常适合他的目的。他的思想

与政治现实也许不符，也许是吻合的。这和《圣经》刚问世时的情形差不多，更确切地说，它和中世纪后期西欧教派和运动纷乱杂陈、层出不穷的局面有些相似。在40年代，阿拉伯人面临的问题从非常抽象的意义上讲，与下面问题有关：该不该加入复兴党？从独立以后逐渐走向现代化的阿拉伯国家的观点出发，复兴党思想的一致性和独到之处表现在什么地方？复兴党的神话和象征本身的需求和愿望是什么？连接复兴党的行为和思想的契机是什么？

让我们暂时不谈阿贾米的观点，看一看下面一些问题：复兴党的民族特征概念合乎情理吗？如果不，它的一致性的根源又在何处？一个民族之所以存在，也许是因为它本身认为自己是存在的。政治哲学中一个最古老的观点就是，政治社会起源于统一的认识和一致的道德观念。然而，阿弗拉克并不是从一个统一认识或“自然”的趋势来创立一个政治思想的。实际上，他渴望建立一个四分五裂、无自我意识、腐败不堪的社会。“已知”的事实告诉我们，社会没有共同的道德。从表面上看，建立在个人利益（霍布斯）、大众利益（洛克和罗素）和经济作用（马克思）之上的“理性”也没有机会创造一个共同的社会道德标准。物质的丰富和社会经济的统一不是阿弗拉克设想的动机。

阿弗拉克除了推崇信仰以外，还持有一种否认现实与幻想之间的差异的世界观。他认为现实是人创造出来的。他的思想是一种空想，原因就在于此，而不在于他信仰的泛阿拉伯主义。建立一个统一、廉洁、富有阿拉伯精神的社会只不过是拥有这一信仰的人的幻想罢了。阿拉伯主义的“永恒使命”不是“从现实走向未来”，而是“在现实中树立未来”。新一代人身上所体现出的“活生生的阿拉伯历史”纯粹是受信仰支配的结

果,这是阿弗拉克思想的精华所在。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各民族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社会中的邪恶成份(如帝国主义、反阿拉伯主义等)只有公开时才会产生影响。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太平盛世,一切将按复兴党的思想和观点向前发展;未来虽然不可知,但注定跟他们幻想的一样。

从外界批判的角度看,闭关自守的复兴党思想是完全荒谬的。阿弗拉克本人也许接受这一批评,但这一批评对他来说无关紧要,因为在复兴党内部,人们追求信仰的热情很高,党的思想与其支持者的热情一样,是合乎情理的。那么,复兴党思想的一致的根源是什么呢?

在 40 年代,阿弗拉克及其追随者的战斗精神和思想的一致性,迷惑了大多数叙利亚的阿拉伯人。他们首先向城市里贫困阶层的知识分子和没有组织的城市贫民宣传阿弗拉克的思想。在民族和教派感情高涨的时候,复兴党的宣传确实很有吸引力。复兴党并不鼓动工人、农民和地主等利益集团的人加入复兴党,而主要吸收不属于任何利益集团的个人或者那些因人口增长、城市发展、生活现代化而感到传统的生活方式受到威胁的人。但是,人们为什么对复兴党的泛阿拉伯主义思想产生兴趣呢?

归根结底,复兴党的思想也许是不合理的,但却具有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在中东地区宗教派别的道德秩序中屡见不鲜。阿弗拉克的泛阿拉伯主义思想实质上是一种极其明确、众人皆知的道德观。在 1950 年的一篇文章中,阿弗拉克写道:

我们的大多数人由于目前的腐败局势无法过上正常而体面的生活。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得到改变,相信正义的

的人就不愿意生活在他们认为是压抑的、不合理的社会中；他们就会选择自己的生活。

不容否认的个人奋斗和生活准则不允许实现远大的目标，不提倡巨大的进步，不主张付出代价的彻底革命。这个代价就是牺牲。

阿弗拉克的泛阿伯主义政治思想与费萨尔不同。他不主张妥协和让步，也不主张建立一个真正的阿拉伯社会。他的泛阿拉伯主义思想旨在建立一个把所有的道德统一起来的理想标准。在他看来，40年代现实社会的一切东西都腐败不堪。他甚至对他周围真正的阿拉伯人感到恐惧，这些人都是普通人，有自己的弱点、偏见、简单的需求和欲望。阿弗拉克蔑视这些人，憎恨这种现状。

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对别人的一举一动不屑一顾。阿弗拉克认为这种轻蔑与价值观念的冲突有关。而复兴党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把人们的轻蔑转化为政治动力。从一开始。阿弗拉克不仅蔑视自己的同胞，也瞧不起那些讲阿拉伯语的其他人。

但不幸的是，评论家们总是发现，阿弗拉克在强调个人和民族主义的关系时矛盾百出。诸如此类的问题只要回过头看一看阿弗拉克的言论就会明白。我们可以假定他的话出自真心实意。在1950年的一篇文章中，阿弗拉克阐述了个人与民族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为：

我一直认为，我们的哲学决不能把人类奉若神明。人类与个体之间是有区别的。我们应当重视个体的价值，而

不是人类的价值。把人视若为神是异教徒们干的事。换句话说,这样做会使人失去信仰。一个人可能信仰另一个人,因为这样做会使人失去道德标准和更高的理想。个人的重要性与建立在良心和道德情理之上的精神哲学是一致的,而不是与群体观念相一致。精神可以从受良心驱使的独立的个人身上找到。我们并不提倡一个人为自己的民族和人类而牺牲,而要为他个人而牺牲。

在复兴党 1943 年的首次声明中,“完整的民族主义”和“行动一致”等词语旨在攻击那些把特殊的信仰和个人行动分割开来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个体”的道德准则虽然不同,但从道德意义上讲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阿弗拉克拒绝接受这一点,他认为“个体”可以有某种独一无二的道德准则,而“人类”的存在否认道德准则的可能性。他对“个人”和“人类”的区分完全符合他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一创造性观点闪现着才智的火花。

不管历史原因多么复杂,阿弗拉克成功地把令人震惊的现代生活与人们面临的腐败现象联系起来。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建立一种道德规范,这个道德规范就是阿弗拉克主义的道德观念。这是复兴党的基本准则或组织原则。复兴党的思想不是来自当地的客观现实,也不是来自奋斗目标的可行性,而是来自阿拉伯伊斯兰教政治文化所奉行的一切价值观念。与自己在思想界的对手相比,阿弗拉克不仅吸收了阿拉伯伊斯兰教的词语,而且还吸收了它的道德原则。

那些信奉泛阿拉伯主义的人也可能有其它的信仰,做其它的事情。复兴党人总是用自己的道德体系和价值观念衡量

人，它不仅是检验一个人是否具备复兴党人条件的标准，而且是检验一个人是否具有阿拉伯民族特征的标准。

复兴党人的假设是：社会的存在依赖于一个不可违犯的基本道德准则。这种道德观念使人们认为，任何不同的思想和观点都是对这一基本道德准则的背叛。新的阿拉伯秩序应当是一个完美无缺的道德体系。这就是复党始终如一的根源，也是它从事暴力活动的理由。暴力高于一切社会规章制度。复兴党的道德至善论孕育了暴力，并将暴力转化成革命。斗争本身就是一种目的，“只有使用暴力手段，才能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暴力不是自卫行动。阿弗拉克曾经说过，道德不仅仅存在于党所经受的折磨和牺牲之中，而且存在于残酷之中。他说：

我们的信仰要求民族分裂，因为这个民族……只有分裂以后才能再次达到我们理想中的统一，这是目前一个最重要的原则。

尽管如此，在斗争中我们仍然将热爱所有的人。我们对有些人很残酷，我们知道只有这样做才能使他们恢复真正的自我。即使他们向我们举起屠刀，他们内心还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他们只不过没有清楚认识到这一点罢了。

一个人越是热爱自己的民族，在必要的时候就越显得残酷无情。复兴党就是要“引起人们对异端邪说的无比憎恨，直到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死亡为止”。在这场运动中，我们不必对对手心慈手软，不必询问“为什么要进行人身攻击”等问题。为

什么说对手不值得我们同情呢？因为“反动的观点不是自生的，而是体现在那些应当被消灭的人身上。这些人被消灭了，他们的观点也就消失了”。

复兴党的暴力“通行证”来自泛阿拉伯主义的道德伦理观念。换句话说，暴力高于一切，完全符合复兴党的中心思想，与一个落后国家急需发展的社会经济无关。

巴特士认为，复兴党的思想独一无二；执政的复兴党的残暴行为与其指导思想无任何联系。而卡迈勒·阿布·贾比尔则认为“阿弗拉克的革命实际上预示着暴力”。诺尔马·萨利姆·巴比克恩则反对埃里克·鲁洛的说法：阿弗拉克有“法西斯作风”。而鲁洛本人一点儿也不了解复兴党内潜在的社会主义倾向。

虽然阿贾米看待 60 年代复兴党知识分子幻想与别人的角度不同，但他得出的结论缺乏根据。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政权认为，“年幼无知的理想主义”孕育出的党派，在军队的残酷和阴谋面前只能“妥协和让步”。实际上，正是由于这一观点，复兴党才得以稳固和发展。从表面上看，复兴党的基本逻辑是完善自身。然而，仅仅认为复兴党是军事政变的发起者，不能说明复兴主义的特征，失去几位富有思想的政治家也不能说明复兴党政治的“破产”，也无法说明 70 年代开始执政的复兴党的新政治特征。

我也曾有过同样的错觉，这主要是因为我不愿意与复兴党在思想上保持一致，我不愿意从表面去评价阿弗拉克，也不愿意接受他的思想。如果说阿弗拉克的观点与现在执政的复兴党的差距有什么联系，这个联系也是在两个条件实施以后出现的：第一，阿弗拉克早期提出的观点必须由复兴党后来的

领袖来继承；第二，复兴党提倡暴力，不是空想家的游戏，而是要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人民群众中引起强烈的共鸣。人民群众起初与复兴党无任何联系，但他们最后不得不相信，暴力是必不可少的统治手段。这两个条件在伊拉克复兴党第二次执政以后终于实现了。复兴党在伊拉克的权威承担了实施上述条件的任务。

政治性一旦被当作道德规范接受，道德本身又被当作实现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的工具，那么，任何行为从原则上讲，都是属于政治组织或国家统治范围之内的事。人们也就不可避免地认为，国家政权的全面干预是合法的。作为社会问题和社会权利的仲裁者“正义”是不存在的，复兴党也不希望它出现。因为这种“正义”首先断定人从道义上讲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复兴党自然不会接受。即使人权概念不存在，要想在长时间内蓄意制造暴力，也必须使那些受暴力迫害的人认为暴力是合法的。否则，暴力就难以持久。在复兴党的思想中道德与正义成了一种不可分割的结合体，正如在一切宗教和阿拉伯伊斯兰教的历史上，道德和正义一直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一样。

世俗主义还是教派主义

许多见多识广的作家发现，复兴党的民族主义思想中含有世俗主义的内容。复兴党似乎走上了世俗主义的道路，泛阿拉伯主义成了压倒一切的准则。复兴党从来没有把转信伊斯兰教作为入党的条件。1943年，阿弗拉克仅仅是想让大马士革的一些奉行希腊东正教的人“从伊斯兰教中受到民族主义教育”。他让这些人自己思考伊斯兰教对基督教的启示。相形

之下，黎巴嫩的某个派别在 1985 年 2 月发表宣言时，要求所有的黎巴嫩基督教徒转信伊斯兰教，呼吁建立一个什叶派伊斯兰共和国。

显而易见，复兴党和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在某些最基本的问题上是有分歧的。但复兴党依靠的是一切宗教中那种绝对的道德信念。此外，复兴党接受了伊斯兰教根深蒂固的思想。那么，我们怎样来解释复兴党与伊斯兰教之间的这种调和呢？

那些称复党为“世俗主义”的人认为，现代民族主义从本质上说就是“世俗主义”，虽然它在宗教信仰面前有可能作出一时的让步。我们可以这样假定：时代、民族及国家的需要将会使宗教情感“现代化”，使宗教处于从属地位。

世俗主义

在政治上，“世俗派”或“世俗主义”的意义是什么？如果说这两个词意味着宗教与国家政治相分离的话，那么，复兴党就属于“世俗主义”，因为复兴党不吸收神职人员，在政治上不牵连他们。人民群众在真正的世俗主义政权下仍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世俗主义与社会世俗主义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不过，人们对阿拉伯主义思想的政治义务的源泉有些迷惑不解。

历史上，西方的基督教国家都是世俗性的，政治观念都已世俗化，不再依靠超越世界的道德而存在。政治被世俗化以后就有了新的存在理由。人们可以认为，信仰和道德以两个不同的形式出现：一个是个人的或秘密的；另一个是社会的或公开的。这种分离是西方世俗主义概念的中心所在。它是随 16 和

17 世纪宗教战争以后的宗教信仰自由而产生的。

宗教信仰自由虽然对于各种形式的道德绝对有利,但它本身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一旦有人不信任上帝,可以对良心等问题有自己的主张,那么,整个社会就会面临一个新问题:在精神权威消失以后,怎样来确定维持国家最高统治者合法的道德准则呢?世俗化就是西方文明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在基督教国家中,国家和宗教成了两个分割的组织。

当一种宗教被另一种代替,或者说宗教之间有了更多的宽容以后,类似的问题是不会出现的。真正世俗化的、道德上合法的政权,对中东地区各种宗教派别的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在中东地区,宗教团体从某种程度讲仍旧是政治的原始材料或工具。我们对宗教的一切幻想都被黎巴嫩内战和伊朗革命给打碎了。

过去在中东地区,宗教团体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单位。奥斯曼帝国培养出来的团体意识在 19 世纪得到了强化,因为当时不同的政权为了扩大影响,都宣称自己是这些团体的保护者。国家的建立和现代化程度使这些团体失去了传统的职能,但却强化了传统的道德价值。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打着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独立的旗号,对这一传统恋恋不舍。

复兴党人的思想深深植根于中东的传统之中。他们认为在伊斯兰教中,政治与道德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然而,复兴党的绝对主义道德观念,的确是为了实现一个非宗教的目标:辨认民族特征。对于阿拉伯人来说,这一目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复兴党坚持在伊斯兰教范围内阿拉伯人至上的原则。阿弗拉克曾经说,“伊斯兰教的力量”使泛阿拉伯主义披上了“新

装”。从这一点来看，复兴党属于世俗派。复兴党最终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传统的政治观念中找到了理由。

但人们应记住复兴党思想更为广泛的道德基础，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也想知道复兴党是怎样克服教派带来的障碍的。复兴党在建立自己的政治体系时也许会和各个教派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上发生冲突。但它最终还是成功了。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能在这方面与复兴党匹敌；没有任何一个受西方影响的阿拉伯人能令人信服地与阿弗拉克提出的基本信仰辩论。阿弗拉克的才华就在于，他善于利用自己周围的宗教环境，吸收宗教思想，建立一个不受宗教支配的世界。他能够在泛阿拉伯主义的幌子下，把人们的意识思想化，并摆脱了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阿弗拉克的思想吸引了许多阿拉伯人，这不仅是因为他并不要求人们遵循传统的道德规范，而且是因为他的思想与历史上人们对阿拉伯人地位的看法是一致的。

若是在另一时代，阿弗拉克也许早已成为预言家、先知或超脱部落习俗的人。他这种人虽然只代表一种宗教，但却能唤起其它教派的支持，组成一个以宗教道德观念为核心的大家庭，建立一种各个教派都能理解、都能接受的宗教道德思想。

从推翻奥斯曼帝国秩序的观点来看，任何一种向阿拉伯人的政治思想基础挑战的观点都未产生过任何作用。阿弗拉克既勇于超脱伊斯兰教的束缚，又敢于接受伊斯兰教最基本的规范，所以，他能够为泛阿拉伯主义提出一个既新颖而又与传统相符的辩护词。在这一点上，一切“不合法”的政权都是不能比拟的，这大概是因为这些政权都信奉的是“世俗主义”

教派主义

泛阿拉伯主义不仅在伊斯兰教徒中根深蒂固，而且在绝大多数讲阿拉伯语的逊尼派穆斯林教徒中相当盛行。因此，这种以伊斯兰教阿拉伯人至上为基础的思想自然得到了绝大多数逊尼派教徒的支持。阿弗拉克强调穆罕默德和伊斯兰革命最初的20年。在这20年中，“伊斯兰远征和伊斯兰文明”奠定了伊斯兰教的“基础”。此后，非阿拉伯人皈依伊斯兰教后引起的一系列问题玷污了伊斯兰教。然而，什叶派将阿里、阿里的后裔以及阿里为期4年的执政理想化，并强烈反对建都于大马士革的最后一个“纯”阿拉伯哈里发倭马亚政权。在伊斯兰教中，什叶派一直是逊尼派的主要抗衡者。什叶派在伊拉克站稳脚跟时，哈里发政权中的阿拉伯霸权时代已经结束；伊拉克什叶派在阿拉伯世界遇到了一些巨大障碍。

当初，什叶派掀起运动，支持某些阿拉伯候选人担任哈里发职务，强烈反对叙利亚阿拉伯部族的霸权。伊朗东北高原上的胡拉萨尼部族、伊拉克的什叶派（支持阿里的后裔担任哈里发，并邀请他在伊拉克的库法就任）和阿巴斯的秘密组织（阿巴斯认为自己是哈里发的合法继承者，因为他是先知穆罕默德·哈希姆家族的后裔）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倭马亚王朝。推翻倭马亚王朝统治后，阿巴斯王朝抛弃了同盟军，并很快得到了伊斯兰教僧侣的广泛支持。消灭了叙利亚阿拉伯部族势力之后，随着原阿拉伯远征部族与被征服后皈依伊斯兰教的新穆斯林之间差别的消失，哈里发政权的阿拉伯性质发生了改变。阿巴斯王朝第二任哈里发将都址迁至巴格达。

伊拉克什叶派和逊尼派历史上的分歧源自穆斯林教徒对

阿巴斯继位的态度和立场。伊拉克逊尼派承认阿巴斯继任哈里发的合法性,而伊拉克什叶派继续坚持早期什叶派在哈里发继承权问题上的十分固执和教条的立场。他们认为,先知穆罕默德归真后唯有阿里和阿里的后裔具有继承哈里发职位的合法性。然而,这两种教派都是随着伊拉克在伊斯兰教中地位的提高而同时产生的。

伊拉克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宗派分歧是这段历史造成的。伊拉克阿拉伯主义与这段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的出现与伊斯兰教阿拉伯霸权的消失同时发生。后来的伊拉克阿拉伯主义一直对波斯和伊斯兰远征时萨桑文化的重要地位抱有成见。但一般认为,在阿巴斯文明取得巨大成就和波斯人在伊斯兰政治中取代阿拉伯人时,伊拉克阿拉伯主义才盛行起来。

什叶派既不能支持伊拉克以外(如叙利亚)的阿拉伯主义,又不能接受阿巴斯王朝的统治(伊拉克什叶派在反对阿巴斯王朝中才形成了自己的宗派地位),这样,伊拉克什叶派就面临着严峻的政治身分危机。随着阿巴斯王朝独裁统治在巴格达的出现,伊拉克什叶派政治身分危机作为伊拉克的一种特殊现象充分显示了出来。伊拉克什叶派政治身分危机的加剧之时正是伊拉克在阿拉伯和穆斯林事务中崭露头角之日。相比之下,伊拉克逊尼派在提高伊拉克的地位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它就自然有了建立其政治身分的基础。

什叶派依然自行其是,继续重弹它的老调。在教义方面,什叶派缺乏传统的逊尼派那种“现世”的灵活性。逊尼派伊斯兰教徒将他们的宗教领袖称为“哈里发”,而什叶派将自己的宗教领袖叫作“伊玛目”。先知穆罕默德归真后,阿里成了第一

个伊玛目。伊玛目具有“不谬性”，永远也不会犯错误。什叶派的各种派别等待隐遁的伊玛目再临人世，成为伊斯兰教的救世主，为世人伸张正义，恢复真正的伊斯兰教。虽然缺乏实用的教规，什叶派改进了一些与政治犯罪、反叛等有关的教条和行为禁令（如鞭打、殉教等）。什叶派阿拉伯人对伊朗什叶派的亲近（一些什叶派圣地坐落在伊朗），既加深了波斯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仇恨，又加剧了什叶派与泛阿拉伯主义之间的隔阂。

什叶派和逊尼派在教义上并没有什么分歧，两派之间的分歧一直在政治领域。政治上的隔阂源自互不信任。两派教徒总是被“我是谁？”这个问题困扰着。讲阿拉伯语的基督教徒认为，泛阿拉伯主义与伊斯兰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对伊拉克什叶派教徒来说，泛阿拉伯主义和逊尼主义是孪生兄弟。另一方面，属于什叶派的叙利亚阿拉维人之所以在拉塔基亚省与逊尼派土耳其人打得火热，并不是逊尼主义的影响所致，而是他们同属伊斯兰教阿拉伯人的缘故。

泛阿拉伯主义在伊拉克最初的实践并非一帆风顺。伊拉克不是泛阿拉伯主义的开拓者，对19世纪泛阿拉伯主义的形成也没有做出任何贡献。胡斯里的回忆录证实，20世纪20年代的伊拉克人与泛阿拉伯主义“互不相容”。那时伊拉克最杰出的泛阿拉伯主义者还是个叙利亚人。当费萨尔1920年离开大马士革后，他就失去了充当泛阿拉伯主义旗手的一次历史机会。伊拉克不但在经济上落后于叙利亚，而且伊拉克的种族和宗教状况与泛阿拉伯主义的使命和目标相抵触。虽然两国都具有社会结构的多样性特征，但分布情况却大不相同。1932年独立后，伊拉克的社会结构分布如下：20%的逊尼派阿拉伯

人,14%的逊尼派库尔德人,53%的什叶派阿拉伯人,5%的讲阿拉伯语非穆斯林少数民族和6%的其他语言集团。20世纪40年代中期,叙利亚的社会结构分布如下:57%的逊尼派阿拉伯人,8%的逊尼派库尔德人,2%的什叶派和伊斯梅利阿拉伯人,12%的阿拉维阿拉伯人,3%的德鲁泽人,9%的讲阿拉伯语非穆斯林少数民族以及9%的其他语言和种族集团。当然,这些分布并没有揭示出颇有政治影响的地区、职业和城市状况,也不能说明重要的社会变动所造成的影响,如城乡人口迁移和游牧部落的定居(据估计,这两方面的人1867年占总人口的35%,1947年占5%)。这些无缘无故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对太平盛世的政治的影响值得重视。然而,这些数字依然表明,与叙利亚相比,伊拉克的社会状况根本不可能成为泛阿拉伯主义的策源地。

现代伊拉克政治中的许多暴力归因于政治目标与伊拉克社会教派分布之间在结构上的矛盾。1932年,伊拉克只有1/5的人口具有进行泛阿拉伯主义运动的社会基础。阿拉伯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占少数的逊尼派教徒要求库尔德人、什叶派教徒和非穆斯林教徒无条件地接受他们的霸权,并且要取得永久性多数派的稳固地位。

而对这种艰难的抉择,费萨尔的宽容和敏感是他与后来伊拉克和叙利亚政治舞台上的泛阿拉伯主义者的区别之一。费萨尔的政策及其失败是因为伊拉克社会状况不适合进行泛阿拉伯主义运动。

伊拉克泛阿拉伯主义的早期实践(1936—1941)证实了泛阿拉伯主义与逊尼派之间历史性的密切联系。总的来说,绝大多数重要的政治家和军官都是逊尼派教徒。什叶派领袖主要

是费萨尔内阁、阿里集团和伊拉克共产党成员。拉希德·阿里本人出身于萨迪(穆罕默德后裔)的盖拉尼家族。该家族是目前伊拉克最显赫的逊尼派家族。泛阿拉伯主义与逊尼派之间微妙关系最好的象征莫过于1941年4~5月事件中产生的三位一体政治:政治家拉希德·阿里、耶路撒冷的“穆夫蒂”(逊尼派宗教等级中最显要的职位)哈吉·阿明·侯赛因和四名逊尼派军官。

复兴党从泛阿拉伯主义早期实践中,吸取了关于费萨尔的失败、军队的地位、政变策划、亚述事件的反帝国主义等方面的实际教训。阿弗拉克提倡暴力,这正投合复兴党人的心意。复兴党的教派主义也起因于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并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非穆斯林少数民族、特别是伊拉克的穆斯林教徒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复兴党毫不隐讳地表露了它的教派主义理论。在政权方面,阿拉伯领导权落入了一个派别、至少数派的分支伊拉克的塔克里蒂家族、叙利亚的阿拉维军官阶层的手中。然而总的来说,阿弗拉克的著述主要限于探讨泛阿拉伯主义与伊斯兰教之间的一般关系,但有时也从各种宗教派别广泛的道德意义上和专制主义共性上对教派主义进行了谴责。此外,我们可以假定阿弗拉克是无辜的,因为他竭力向阿拉伯人表明,一个利用群众的宗教热情作为自己出发点的政党既可以谴责教派主义,又永久地打上了教派主义政治的标记。

反阿拉伯主义

复兴党教派主义者在使用这个难译的、独特的阿拉伯概念“反阿拉伯”时把它具体化了。萨迪亚·胡斯里和许多泛阿

拉伯主义者都不加分析地使用这个概念。这个概念与阿拉伯伊斯兰教史、种族恩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是一种令人感到困惑的、十分暖味的概念。一提起这个概念，泛阿拉伯主义者就会起疑心。正如在民族特征问题上肖科特与阿弗拉克观点的相差悬殊一样，用仇恨而不是“爱”来表达复兴党教派主义是再好不过的词了。

阿弗拉克和阿苏齐都把这个概念解释为外国影响在阿拉伯主义内部的表现。40年代，复兴党将它用来谴责当地的共产党组织。1945年5月1日，复兴党发表了一个题为《共产党、反阿拉伯主义的堡垒及外国人的代言人》的声明。该声明表达了这个术语所包含的强烈感情：

俄国人的胜利唤起了这些反阿拉伯残余分子的仇恨，他们竟然在大马士革城公然蔑视阿拉伯人的感情（指叙利亚共产党在大马士革举行庆祝活动）。他们集会庆祝外国人的胜利，游行示威，并且唱起了亚美尼亚歌曲……

……共产党公然单独要求与帝国主义民族建立友好关系，甘愿为他们做出牺牲，为他们效劳，称赞他们的英雄，褒扬他们的主义和胜利。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幌子下进行的。共产党混淆视听，将帝国主义政府与它的人民区别对待，认为后者与帝国主义的种种罪行无关。这样，共产党人就干了腐朽透顶的反动派和叛徒以及外国势力想干而不敢干的勾当。在阿拉伯这片土地上阿拉伯人民反抗法国帝国主义者时流下的鲜血还没有揩干的时候，共产党竟然在叙利亚阿拉伯土地上庆祝法国7月14日国庆。

共产党千方百计将少数民族和一小撮宗教少数派联合起来，伙同欧洲帝国主义者一起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

然而，与复兴党相比，伊拉克的泛阿拉伯主义者对这个术语更迷恋。巴格达大学校长、伊拉克最杰出的历史学家阿卜德·阿齐兹·杜里在1962年写了一部名为《反阿拉伯主义的历史根源》的著作。虽然该书记述了早期阿拉伯伊斯兰教史上的历史事件，属于学术著作，但杜里在前言中说，他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已经出现了攻击阿拉伯意识的倾向；有人在种族主义和地区主义的名义下制造阴谋，反对阿拉伯民族的思想”。这种动机还是建立在逊尼派的普遍性上。逊尼派泛阿拉伯主义反对教派主义的号召里隐含着仇恨。在教派主义对逊尼派霸权没有造成威胁的阿拉伯地区里，反阿拉伯主义不可能形成气候。因此，杜里承认，只有伊拉克对这个概念十分迷恋。

何谓“反阿拉伯主义者”？根据杜里的说法，他们是由各种各样的种族集团组成的一种反阿拉伯人的政治“运动”。出于对阿拉伯人的仇视，他们才在伊斯兰世界中联合起来，共同对抗阿拉伯人。这个运动开始于思想领域，戴着伊斯兰教的假面具，打着穆斯林教徒人人平等的古兰经训戒的幌子，“利用”早期伊斯兰教反对阿拉伯人，只是在后来才暴露了它的真实面目。原来这个运动是在非阿拉伯人、甚至反伊斯兰教的人（如波斯人）的授意下展开的。泛阿拉伯主义总是认为，当初“利用”穆斯林教徒人人平等的武器反对阿拉伯人和1300年之后“打着一切民族平等的旗号与帝国主义民族称兄道弟”是一脉

相承的。杜里本人也公开承认，在倭马亚王朝执政期间，“这一运动”是由阿拉伯人自己发起，或者说至少得到了阿拉伯人的竭力支持。

泛阿拉伯主义者越是走向极端，他们对反阿拉伯主义者的伊斯兰教信仰的描绘就越显得“虚假”。与复兴党的作家阿卜德·哈迪·福卡伊盖的观点相比，杜里的看法更为合理。福卡伊盖认为，反阿拉伯主义的种子早已埋在前伊斯兰教历史上“阿拉伯人与波斯人之间的斗争”之中。在第一个穆斯林政权中，这些种子变成了“喷射反阿拉伯主义毒液的毒蛇……同时他们又暗地里对他们祖先的各种宗教恋恋不舍”。拜火教教徒、摩尼教教徒（伊斯兰教以前的波斯人的各种宗教）就是形形色色的自由思想和无神论的祖师爷。他们将伊拉克作为根据地，向叙利亚和其它地区渗透。倭马亚统治时期，反阿拉伯主义者就“秘密结社”。从此以后，阿拉伯主义就与它的死敌——反阿拉伯主义之间展开了半公开化的对抗。福卡伊盖的一个引人入胜的论点是，这种反抗“阐明了阿拉伯主义的思想，加深了阿拉伯意识，使阿拉伯主义”的概念具体化了。直到本世纪，反阿拉伯主义才由阿拉伯共产党组织推到“高峰”。

泛阿拉伯主义者普遍认为，伊斯兰远征以后，对阿拉伯人的界说就不再局限于民族或某些“纯”种族。杜里和福卡伊盖的“历史”为各种可能打开了方便之门。以前，讲阿拉伯语、信奉伊斯兰教的反阿拉伯主义者是不是阿拉伯人？他们是虚伪的信徒吗？一个仅基于对阿拉伯人的仇恨、由各种集团组成的势力怎么能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组成一个特定的“派别”、发起一场“运动”呢？从意识形态上说，反阿拉伯主义这个概念只是在阿拉伯主义或阿拉伯人的性质出现问题时才被虚构出来；

它是一种认为敌人来自内部的概念；它是一种认为出现了阴险的外部敌人、需要信徒们认识其真实面目的观念。真主与魔鬼同时出现，势不两立，任何宗教都毫无例外。正如历史上的反阿拉伯主义者并不仅是波斯人一样，今日伊拉克的反阿拉伯主义者可以是共产党人、少数民族和什叶派。然而根据定义，任何一个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反阿拉伯主义者。总之，泛阿拉伯主义者不必将他们邪恶的观点过于公开化。

阿弗拉克的《我们和我们的敌人》一文是个鲜明的例子。阿弗拉克在这篇文章中一边极力颂扬“我们”的美德，一边用丑恶的语言发泄“我们”对敌人的仇恨。伊拉克复兴党第二届政权的宣传媒介也经常采用类似的做法。

建 立 组 织

根据阿拉伯民族目前的状况，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朝气蓬勃的政党，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这个党必须是一个真正的党、富于活力的党、一个为了阿拉伯民族的利益而献身的党。假使上述目标实现的话，这个党的最终目标是重建或复兴一个国家。换句话说，这个党必须是它将要复兴的健康而高尚的国家的楷模。

这个党组织旨在重新唤醒阿拉伯精神，通过“新一代”，重建一个新国家。这个正在孕育的国家将从这个党的肌体上诞生。复兴党意识到，要使暴力卓有成效，必须建立社会组织。这是符合复兴主义逻辑的最基本的设想。仅有意识形态还远远不够，建立服务于意识形态的组织才是创造新的理想公民

的有效途径。一条鸿沟将党的组织与它周围的社会截然分开了。从自身的条件出发,在与周围的社会隔绝的情况下,复兴党“在实现国家的革命以前”必须变成“革命的党”。

在复兴党看来,外界环境是堕落的。在谈论复兴主义组织理论时,阿弗拉克认为,有必要使党员认识到“邪恶”的外在世界的潜在危险。阿弗拉克强调,在革命时期,要在腐化、落后、无知和软弱的现实世界里建立根据地、影响圈和堡垒,以便使党与社会联系起来。他强调这些堡垒必须“更坚强,以防止腐化和外部敌人的侵蚀”。换句话说,正直而孤立的复兴党在不断地致力于把劳苦大众从水火之中解救出来。

在复兴主义者看来,政权只不过是一种手段——“一个毫无生气的组织”。另外,“速度是革命运动至关重要的因素”。因此,政党的规模与革命的目标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阿弗拉克于1955年写道,革命时期,国家的领导权应掌握在开明的少数派手中,这些少数派“在人民正式授权他们作代表之前就代表人民”。早在1940年复兴党未成立之前,阿弗拉克就认为,国家权力应掌握在一个人——领袖的手中。

在阿弗拉克所有关于政党的文章中,有组织的行动主义总是置于个人和国家特征的基础之上。这样,复兴主义抽象的“使命”就完全具体化了。

当这个国家的人民被自私、个人的利害、幻想、激烈而卑鄙的争论和分歧以及卑微的实利主义搞得四分五裂时,怎样才能将他们团结起来呢?我们怎样才能重新实现联合的国家呢?……必须走一条艰难的道路,经过一场如火如荼的斗争,以便使每一个人回归自我,潜入自己的灵

魂深处，千锤百炼后再重新做人。除此之外，别无他求。到了那时，真正的团结和统一才能实现。这种新形式下的统一不同于政治上的统一，这是这个国家民族精神的统一。

无论这种统一的理想在实践中多么难以捉摸，不管它对党组织是一次多么严峻的考验，这一理想是现实的，十分严肃的，阿弗拉克在另一场合强调，党员应担负起为实现阿拉伯主义目标而奋斗的重任。被扭曲的个人特征将要在党组织中重建。阿弗拉克使用“个人”和“人类”时的区别现在显而易见了。党操纵着个人，并不操纵人类。只有党的手段才能从个人的“内部”挖掘出失去灵魂后的活力，将这种活力转变成为其服务的生命力。

一旦复兴党（并非整个阿拉伯社会）变成了这个将要形成的国家诞生的机体，阿拉伯统一的圣环就失去了它的迫切性。紧迫的主张已不再具有压抑感，因为阿拉伯统一已经在党内成为现实，剩下的一切就是将其扩展到社会上。不合理的事情已经变成了发展政党、自我实现的合乎情理的事情了。

党组织先将信仰变成习俗，然后将这信仰引向了更高的阶段。推理能力的丧失并不是信仰的产物，而是郑重其事地拥有信仰的必备条件。这样，首先在党组织，然后在整个社会，信仰就变成了惯例。信仰变成惯例后就失去了笃信的必要，人们就会必然认为党与阿拉伯统一是一回事。结果必然产生出既轻信、又玩世不恭的民众。

现实与虚幻之间令人迷惑不解的关系是复兴主义“通过组织来实现”思想的固有本质。无论是执政还是在野，这种飘忽不定的特性几乎总是伴随着复兴党的一言一行。这也许是

防御邪恶的外在世界的阿拉伯主义运动最重要、最一致的特征。假若复兴党不得不面对难以应付的现实，如惨无人道地镇压反对派、在两伊战争中的大溃败等，那时，只有在那时，复兴党将面临内部瓦解的危险。在几乎所有其它的不幸情形中，最令人不能接受的真理都可以从虚幻的形式中找到答案。

领导原则和党的组织

那种认为“阿弗拉克和比塔尔的复兴党总是赞成某种集体领导”的观点是错误的，但这一问题值得探讨。阿弗拉克1974年再版的论文集与1959年的版本的区别在于，1974年版本中的文章、页码、段落、句子和词语都经过系统地删节或修改。出版者在序言中暗示了部分真相：一些文章已经过时，作者在本该使用“斯大林主义的应用”或“当地共产党运动”时却使用了“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等不合适的概念。事实上，这些变动主要是复兴党打算重写它与一般共产主义和阿拉伯共产主义关系的历史；另一个次要的意图是抹煞阿弗拉克早年对欧洲法西斯主义关于领导权观念的极大兴趣：

世界上的人不能真正地、敏捷地理解一种思想。因此，他们总是依赖那些有能力创造这一思想的个人。大众对这些个人的依赖、对这些个人道德品质和热情的依赖程度能够衡量一种得到拥护的思想的价值所在。

因此，要使一批受过教育、积极而正直的青年人紧密地团结起来，就必须建立严格的纪律和森严的等级观念，只有这样才能影响他们。实际上，大众对他们领袖的尊崇就是将他们渴望支持和传播的思想奉为神明。只要大众

具备坚强的品性和道德价值,那么,这一思想的实现是大有可能的。

按照这一模式,1947年,党内权力机构分为5个层次,最高领袖叫“阿米德”(非阿弗拉克莫属)。“阿米德”拥有任命一切领导职务的权力,是一切决策的最高权威人士。行使权力的机构由具有代表性的党员组成。在“自然”党员之中,“阿米德”当然算一个;然后是“选举”党员、“主要”党员和一般党员。“自然”党员之外的所有党员须经“阿米德”的批准。那些竭力“证明”1947年复兴党体制总体上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性质的作家们从来不重视党的这些规程。

相反,这类作家们却把重点放在1954年复兴党党内的权力章程上(章程作了部分修正,现在仍然有效)。目前的组织是由3到7人组成的小而全的纵向机构组成(比一般共产党机构要小)。在伊拉克,7个阶层代替了以前的5个阶层,而且禁止了所有的横向联络。民主集中制是党组织的基本原则。这样,“阿米德”就成了党的总书记,权力大大地缩小了。作为总书记的阿弗拉克不再具有任命权,而且只是民族领导机构(最高决策机关)的成员之一。

建立选举原则的同时,又产生了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党员类型。除了“自然”党员和“主要”党员的区分外,又产生了“积极”党员类型,它是从其他5种类型(在编支持者党员、二级党员、一级党员、候补党员、受训党员)中精心筛选出来的。积极党员可以选举领导,并被提拔到党组织机关担任领导职务;而候补党员和受训党员只拥有对党的政策的投票权;其余党员在党内没有任何权利。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伊拉克支部强调组

织建设和安全措施(与其他阿拉伯共产党相比,伊拉克共产党在这方面也很突出)。到1963年2月,伊拉克共有830名“积极”党员,其他类型的党员只有15000名;到1963年后期,其他类型的党员人数增加了3倍,而“积极”党员的人数没有任何变动。正式党员在党组织中仅占2%。

保留1947年的规章就能产生更为公平的结果吗?简明的规章有时可以产生那种效果。显而易见,1954年,复兴主义的措词开始有所改变。但是为什么要改变党的选举规章呢?许多作者认为,1954年的规章参考了当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颇有影响的共产党的做法。共产主义的声誉可以用来解释术语上的变化,但党组织的新概念却淹没在党员的各种等级和类型之中。复兴党(我们可以假定它是无辜的)极力证明党的政策是正当而合法的。同时,复兴党要确保党的意志深入到每个党员的心中。“自然”党员的观念不合时宜。然而,不管考验将有多么严峻,一个党员不能改变这个事实:正统的原则已经改变了。另一方面,规章的改变也意味着阿弗拉克的地位受到威胁,权力被缩小了。党内肯定出现了要求重新考虑规章的某种势力。这种势力究竟是什么?

1949年,阿弗拉克被叙利亚首次政变领导人胡斯尼·扎伊姆关进监狱。一些人说,阿弗拉克遭受了折磨;另一些人说,他只受到恐吓;还有人说,他既没有受到伤害,又没有受到威胁。无论如何,获释后,一封有亲笔签名的信件发表了。这封信用献媚的语言,乞求仁慈和宽厚,并透露了阿弗拉克打算退出政坛的意图,因为“我认为,我的使命已经结束,我的方法不适宜于新时代的要求”。复兴主义的追随者们感到十分震惊,党遭受了极大的挫折。显而易见,阿弗拉克早已打破了自己的

规定。他承认他是个凡人，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他不是他自己所颂扬的经过火的考验的钢铁人士。阿弗拉克敢于承认自己的弱点，这比那种永远摆脱不掉幻想的其他党的领导人强得多。

50年代，阿弗拉克的影响在叙利亚一落千丈。复兴党变成了各种新思想的陈列馆，五花八门的新思想几乎总是来自共产主义的传统。然而，在伊拉克，阿弗拉克的影响仍然是存在的；正统的复兴主义与阿弗拉克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阿弗拉克的文章对萨达姆·侯赛因影响很大。据说，萨达姆爬上伊拉克领导权的高位多亏了阿弗拉克的帮助。1963年，第一届复兴政权垮台后，复兴党内的争斗十分激烈，阿弗拉克从中进行了调停。

当时，这位年迈的复兴党领袖已经失去了对党的控制权，将要被一批新的复兴主义军官永远驱逐出他的祖国叙利亚。他成了自己门徒的对手。他身体瘦小，富于浪漫情调，是个多产的政治作家。他毫无组织能力，是一个探究哲理的老学究。然而，他首先是一个十分脆弱的人，对监禁和肉体折磨十分惧怕。与阿弗拉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萨达姆·侯赛因。年轻的萨达姆作为勇猛无畏的刺客在党内引人注目。萨达姆具有阿弗拉克需要但最终没有得到的一切品质——粗暴、顽强、铁的手腕、狡猾、果断、忠诚、勇敢、身强力壮。萨达姆完全采用米歇尔·阿弗拉克不得不打破的规章取得了成功。这只能表明，无论一个合法的原则多么重要，它最终都不是至关重要的东西。

复兴主义与共产主义

复兴主义对阿拉伯共产党的“感情”不言而喻。此处用“感情”而不用“政治立场”，是因为只有从感情领域才能清楚地认识早期复兴主义的真面目。1945年的声明没有涉及复兴党与叙利亚共产党在纲领上的区别。共产党仍然不支持泛阿拉伯主义。另一方面，其它许多政治潮流也不具备泛阿拉伯主义倾向。共产党也没有大张旗鼓、旗帜鲜明地反对阿拉伯统一。60年代，许多共产党人在阿拉伯统一问题上改变了以前的立场。在这种形势下，虽然泛阿拉伯主义是复兴主义的基本原则，复兴党也不可能对共产党的立场有相应的改变。从一开始，复兴党就是共产党的对手。可是，共产党究竟在哪一方面激怒了对方呢？

阿弗拉克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西方的东西，与阿拉伯的一切东西都是水火不相容的。”马克思可能“将他邪恶的犹太人的精神注入到共产主义思想之中”。归根结蒂，共产主义是欧洲文明中“人文主义”冲动（首次出现在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之中）的产物。阿弗拉克强调说，希腊、罗马文明的复兴、18世纪“抽象唯理论”以及19世纪科技进步的结合导致了共产主义。“欧洲人无论属于哪个民族、派别，不管他们的社会和政治态度如何，绝对没有阿拉伯人那种对共产主义的憎恶”，因为这一切文明“与阿拉伯历史、文化传统、过去和现代生活方式均毫不相干”。共产主义与“从外面侵蚀阿拉伯历史、歪曲阿拉伯思想的一切东西有着密切的关系”，包括“出现在阿巴斯统治时期的男女平等、财产平等、无政府主义、分解家族关

系和宗教教旨、诬蔑阿拉伯历史、历史英雄以及阿拉伯民族的一切品德的反阿拉伯主义运动”。

阿弗拉克虽然对共产主义如此憎恶，但他从来没有低估共产主义的潜力。阿拉伯共产党自身的实践与共产主义理论相违背。阿拉伯共产党的建立比复兴党早 10 年左右，是奥斯曼帝国之后首次建立的为被压迫的劳苦大众谋利益的现代政党。这些阿拉伯共产党建立在完整的纲领和一种新型的政治思想之上。阿弗拉克对共产党组织形式的羡慕可以追溯到他早年旅居法国时期。虽然早年深受法西斯主义影响，阿弗拉克对共产党组织的了解和 30 年代叙利亚共产党的实践经验使他深深地认识到，共产党组织方法得当，措施得力。

1958 年 7 月费萨尔王朝被推翻后，复兴党和共产党成了伊拉克两大政治对抗势力。复兴党在各个领域的发展壮大是以牺牲共产党为代价的。1941 年到 1958 年间，伊拉克共产党的力量发展迅猛，1959 年达到了顶峰。那时，共产党的“积极”党员人数达到 25000 人左右，“在编支持者”党员至少有 50 万之多。相比之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伊拉克支部 1956 年仅有 300 名党员；新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年，“在编党员”发展到 1200 人，“在编支持者”党员发展到 2000 人，“编外支持者”党员发展到 1 万人。按可比数计算，伊拉克共产党党员大概超过了 100 万。总之，伊拉克共产党当时绝对控制着群众。这就是 1958 年伊拉克政治舞台上的新特征。在那个关键的第一年，伊拉克共产党已控制着“人民抵抗力量”（民兵组织）和几乎所有的联合会、学生和青年组织。1959 年 5 月 1 日历史性的游行示威充分显示了伊拉克共产党的威力。这次游行示威由伊共中央委员会成员领导，这些人大多在 1968 年以前去世。

伊拉克复兴党党员在 1958 年后第一次出现猛增趋势，不久又平稳下来。在阿卜杜勒·卡里姆·卡赛姆政权(1958—1963 年)的前半届中，复兴党党员人数可能有所下降。1961 年 3 月，复兴党鼓动家领导的巴格达出租汽车大游行首次显示了复兴党在群众中的一些影响。从 1961 年到 1963 年卡赛姆政权垮台期间，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发展迅猛，控制了一些社团和其它群众组织，甚至领导了具有经济性质的罢工活动。复兴党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进展，主要是利用了人们对卡赛姆政权越来越强烈的失望。卡赛姆于 1960 年开始对伊拉克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压制措施后，伊共步履艰难，畏缩不前。1963 年政变前夕，复兴党已经控制了整个巴格达城区和拥护泛阿拉伯主义的城镇。然而，到 1963 年 2 月，复兴党的“积极”党员仍然只有 830 人，“在编支持者”党员约有 15000 人。总之，复兴党自始至终没有赢得伊拉克共产党全盛时期所得到的广泛支持。

然而，在伊拉克，大众开始效忠复兴党的日子还是来到了。如果说 1959 年 5 月 1 日的游行示威是 50 年代初期伊拉克共产党力量的真正象征的话，那么，复兴党在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的游行示威就是 1969 年 1 月大功告成的开场景观(复兴党 1969 年 1 月对群众的控制程度同共产党 1959 年的情形不相上下)。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泛阿拉伯主义为什么能够在第二个复兴党政权中卷土重来？

第七章 伊拉克复兴主义的合法化

一 则 自 白

当我 1969 年首次声明伊拉克共产党中央指挥部（伊拉克共产党的一个宗派）在政治和理论上犯有严重错误时，我遭受到许多人的攻击和凌辱。一些人认为我言不由衷，说服力不强。其实，我不过是在体验、辩论、评估和长期反思之后承认错误而已。我相信，自那时起，伊拉克国内进步力量的深入发展……尤其是在阿拉伯世界和国际社会中的发展已经证明我当时是正确的。就连我在中央委员会（伊共的另一宗派）里的政敌也不得不承认，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在伊拉克起到了革命带头作用，在群众运动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他们与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一起加入了进步阵线，并为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而感到遗憾。

阿齐兹·哈吉于 1979 年在巴黎撰写了自己的回忆录。那时，他作为伊拉克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方代表在巴黎工作。在回忆录中，哈吉回顾了他在 1969 年的公开自白。当时，

哈吉的自白导致了 20 多个同事惨遭复兴党杀害。

到 1969 年,哈吉的名字成了伊拉克共产主义极左分子的同义词。哈吉于 1926 年出生在一个贫穷的什叶派库尔德人家庭。40 年代初期,他加入了伊拉克共产党,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斗士,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天才的政治家和党的机关报总编在国内声名大振。他于 1948 年被捕,在监狱中呆了 10 年。当时,他向调查法官自豪地表明了自己对共产党的忠诚,严厉地谴责了警方的野蛮和残忍,并确信残暴决不能阻挡伊拉克人民从事共产主义事业。

1958 年出狱后,哈吉成了伊拉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5 年之后,在流放期间他组织了抵抗第一个复兴党政权的运动。流放回来后,他成了众矢之的,人们对伊拉克共产党的领导愈来愈感到不满。1967 年阿以战争之后,这种不满情绪达到了炽热化程度。阻止分裂的企图失败后,哈吉将中央委员会不愿分裂的所有成员组织起来。至 1967 年 9 月,伊拉克共产党出现了两个组织:哈吉组织的“中央指挥部”和亲苏的“中央委员会”。双方都声称自己是富于战斗传统的伊拉克共产党的真正继承者。

中央指挥部号召“把群众武装起来”,“在城乡进行人民武装斗争”。他们想建立一个“劳动人民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民主政权”。可是,中央委员会则谴责“分裂主义者”和他们的“人民战争”战略。中央委员会号召在反对帝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阿拉伯反动派的革命力量的“联合民主阵线”基础上建立“联合政府”。

1968 年的政变后,复兴党政权在内阁中给伊拉克共产党的两个宗派都留有位子。中央指挥部拒绝合作。以后的数月

中，中央指挥部与复兴党组织之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明争暗斗。共产主义斗士的尸体出现在黑暗的小巷，漂浮在底格里斯河上。复兴党否认涉嫌暗杀活动，并且反咬一口，宣称伊拉克共产党是有预谋的，企图破坏复兴党建立全国进步阵线。中央指挥部采取“没收财产”、“革命性的抢劫”、爆炸汽车等行动进行报复。他们甚至设法炸毁了萨达姆·侯塞因的住所。

暴力逐步升级，最后终于导致了阿齐兹·哈吉以及伊共中央指挥部政治局所有委员、无数的一般党员被捕。所有被捕者受到了纳迪姆·卡扎尔的秘密警察的残酷迫害。5人政治局中的两个委员不屈不挠，被折磨而死。其余的委员不堪折磨，屈膝投降，并被带到电视台露面，公开承认他们的反“革命”罪行。据说，哈吉刚被捕时就声称：“我再也不堪折磨了，我愿合作。”在电视上公开露面时，哈吉将自己的革命生涯比作“拿着鸡蛋去碰石头”。

将阿齐兹·哈吉的屈服用怯懦、背叛甚至“修正主义”思想的大暴露来概括，未免太幼稚了。他的背景和他在激进的伊拉克政治中的地位值得探索。哈吉的政治生涯长达25年，其间，伊拉克共产党的命运经历了最初的兴旺时期（40年代）、长期受压制但斗志不减的时期（1948—1958）以及1958年后的严峻时期。事实最终证明了它是一个不能完成历史使命的政党。哈吉在青年时期就顽强地抗争，并最终摆脱了出身给他带来的一切不公正待遇。壮年时期他遭受监禁之苦，最后担任伊拉克共产党的领袖，在动荡的形势下开展了一系列激进的活动。他只来到了权力的大门口，最终没能踏进门坎。1963年和1968年，他两次顶住了共产党濒临灭绝的危难。我们在研究这类人时必须把他们的崩溃与他们要改变社会的设想联

系起来。阿齐兹·哈吉的政治生命的终结正好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精神。

全国行动宪章

当伊共中央指挥部被复兴党穷追不舍的时候，伊共中央委员会与复兴党处于休战状态。随着复兴党政权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关系的改善，中央委员会开始对复兴党的提议有所表示。1970年7月10日，复兴党向伊共中央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条件。假如接受这些条件，中央委员会就有资格加入“全国进步阵线”。这些条件包括：承认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是“一个革命的、工联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政党”；声明1968年7月17日的“革命”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性质；承认“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在政府、群众组织和全国进步阵线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对武装力量内部反对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政治活动加以限制；伊拉克共产党有义务规劝它在国际上的分支机构与其它阿拉伯国家的复兴党结盟；“坚决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接受用人民武装斗争反对帝国主义、解放巴勒斯坦的主张；坚持阿拉伯统一“是一切目标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目标”；再次肯定在伊拉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

伊共中央委员会对复兴党的“领袖”党主张深感遗憾，但它也声明，中央委员会早已把1968年“革命”后出现的政权视为“爱国的”政权。双方在阿拉伯统一上没有任何分歧。伊共中央委员会坚决反对复兴党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案，认为这种提法是“不科学的”，因为伊拉克尚未完成“全国性的民主革命”。伊共中央委员会也不相信“革命阶段超越论”。

1970年，复兴党政权逮捕了大批共产党人，伊共中央委员会委员阿里·巴尔扎希和党的地方领导人被迫害致死。谈判步履维艰，不能达成协议。1972年4月，为期15年的伊苏友好条约正式签订。伊共中央委员会赞成这一条约，并且认为这是实现革命的“宏伟目标之一”。一个月之内，伊共中央委员会两个委员首次在政府任职。1973年7月，伊拉克总统、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总书记贝克尔与伊拉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阿齐兹·穆罕默德签订了“全国行动宪章”。伊拉克共产党接受了复兴党在1970年7月提出的一切条件。不久，复兴党表达了它对政治联盟自由的想法：

我们认为，所有伊拉克人不应该因为他们既属于其他政党，又属于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而感到矛盾。这是因为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正在领导社会和革命，又因为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已经向伊拉克人民证实，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属于他们自己的政党。

随着“全国阵线”的成立和伊共中央委员会的支持，复兴党政权于1974年向库尔德人发起了进攻。1975年库尔德人的失败为复兴党下一步镇压铺平了道路。1976年，萨达姆·侯赛因在“全国进步阵线”扩大会议上做了令人困惑的发言。他说：

据我所知，一些兄弟、特别是共产党里的兄弟，每当有人问到下列问题，就感到难堪：“你是否与复兴党政权站在一边？你是否拥护革命？”站在革命和革命政权一

边真的就那么难堪吗？每一个真正的爱国志士都会珍惜革命，革命的巨大成就是显而易见的。假如有人想推测一个人是拥护还是反对革命，这种推测只能围绕着革命目标来进行，而不能对革命评头论足。

细节上的瑕疵应该受到批评，但是细节上的失误不能成为抵制革命和革命政权的心理因素。同时，行政机关的失误不能成为谋求党派利益的手段或理由……

假定我们复兴党人颠倒事实，在讲话中或宣传媒介中攻击共产党人……共产党把它看作滥用行政权力，并千方百计地予以反击的话，诸位请想一想，那会出现什么结果呢？请大家想一想共产党将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们并非危言耸听，我们和群众的关系是建立在良好的合作和互相信任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是为什么群众愿意听我们的话。

事实上，萨达姆·侯赛因明确地告诉坐在他前面的共产党人，屠刀已经举起，数月内就要落下。萨达姆的讲话是向对“全国进步阵线”持有抵制情绪的共产党人发出的严重警告。萨达姆利用共产党人已经存在的恐惧和疑虑感，暗示他们他要采取断然行动了。1976年后期，对个别共产党人的指控和迫害开始了。所定罪状是共产党人在武装力量内部搞政治性活动，违背了宪章中的条款。接着是大规模的逮捕和处决。到1979年伊拉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不是被监禁，就是被流放。

复兴党能够促使共产党在宪章上签字这一事实表明，伊拉克共产党自1932年以来奋斗的“革命”实际上是在一个政

治暴发户的领导下进行的。1968年7月17日复兴党的“革命”被认为是1958年7月14日推翻君主制以来的一次合法的革命。这种看法为伊拉克现代政治中的头面人物所赞同。这也不是伊拉克共产党人一时的失误。多年的犹豫和对话以后签订的宪章显然是伊拉克共产党的历史和命运的不祥之兆，尽管共产党领导人今天仍然竭力阐明宪章的重要性。

他们当初怎么就那么天真呢？这一问题值得探讨。共产党毕竟是经过5年的犹豫之后才下定决心签订宪章的。这也不是伊共中央委员会的领袖人物别出心裁，故意与中央指挥部的对手们过不去。阿齐兹·穆罕默德是个逊尼派库尔德人，15岁时加入共产党。像阿齐兹·哈吉一样，他度过了10年（1948——1958）铁窗生涯。这些人都是世故的政客，一生只会耍弄权术，勾心斗角。1963年，他们最亲密的战友们被复兴党打手队残杀了。假如他们对此已经遗忘的话，那么，他们该不会忘却1970年至1971年间，共产党的许多领袖人物（如穆罕默德·卡德里、卡迪姆·贾西、阿齐兹·哈米德、萨比特·哈比卜、阿里·巴尔扎希等）被复兴党迫害致死的惨案吧！在伊拉克共产党领导人看来，一种残酷无情和难以驾驭的政治压力降临了。像伊共中央指挥部的命运一样，在伊共中央委员会采取行动之前，这种强制性的压力就将它吞噬了。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无异于政治自杀。对共产党来说，签订宪章等于在死刑判决书上签了字。这不仅意味着肉体上的死亡，更是政治生命的终结。然而，这些人之所以做出这种抉择只是因为他们认为有必要这样做。这样一来，他们不仅认可了伊拉克复兴社会党的绝对领导权，而且甘愿对它言听计从。

复兴党比它的对手计高一筹，它一直急于与其他党派建

立一种持久的政治关系。1968年夺取政权后，复兴党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真正的进步阵线，而不是形式上的组织”。复兴党“只有从精神和物质上控制这个国家……才能确保人民对复兴政策的尊重，才能赢得人民对复兴党政策的拥护”。建立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阵线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必要条件。事实上，“这种具有战略意义的”阵线已经消除了政党之间的界限。假如政党之间没有界限，政治也就随之消失了，这正符合复兴党的心意。以前，复兴党曾用暴力消灭了伊共中央指挥部；现在，它又打着政治结盟自由的幌子，吞噬了伊共中央委员会。

政治的终结

阿齐兹·哈吉的自白和“全国行动宪章”的签订是复兴党新政权最初合法化的重要标志。此外，形形色色的人物的公开认罪是复兴党政权合法化的另一个因素。大部分人承认自己是帝国主义或犹太复国主义的特务、秘密组织的成员、“经济破坏者”。当然，复兴党政权对于共产党这样的组织和那些被迫招供的人们所采取的恐怖手段是有区别的。前者企图染指政权，是复兴党在政治舞台上的真正对手。阿齐兹·哈吉在被捕时，是反对复兴党政权的政治组织的领袖人物。相比之下，那些屈打成招者（如1969年1月被处以绞刑的许多牺牲品）却无意插手政权。复兴党有意公开他们莫须有的坦白，只是为了“证明”它与群众的密切关系。

这一合法化措施是后来恐怖政权的先决条件。从此以后，政治说教将走出一切可能的范围，而且得到了那些深受复兴党迫害的政党的一致赞同。在这种情形下，政治也就完结了。

填补这一空白的将是制度化的恐怖——只有在一切其它政治消失后，恐怖才能得以实施。比如，复兴党镇压库尔德人，将20万什叶派教徒驱逐出境，并不是因为它的政权受到了真正的威胁。镇压机构的大规模增加和警察力量的加强是在政治完结后出现的现象（这可追溯到1975年前后）。

因此，第二届复兴党政权的突出特征在于，当一切政治消失之后，在猖獗的暴力环境中（这种暴力已经不是针对真正的敌人，而是针对每一个人），复兴党成功地建立了一个真正的社会基础，这种基础的标志是复兴党的壮大、公众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拥戴、武装力量的扩充和国家化政策的实施。

从阶级到群众：1958—1968

复兴党最终战胜共产党只是在签订“全国行动宪章”和阿齐兹·哈吉等人的坦白后才得以完成的。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此外，伊拉克共产党的自我牺牲表明，多党制的思想到1968年已经完全失去了信誉。这是1958年7月14日哈希姆王朝垮台后复兴党和共产党之间顽强对抗的结果。

复兴党完全可以把1958年的一系列事件看作是它在1968年夺取政权的重要开端。对复兴党来说，1958年到1968年这10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这10年中，它最终夺取了政权。与1958年的情形不同，1968年的政变在群众中反响不大，甚至有点不得人心。复兴党重新执政后不得不费尽心机，设法博得群众的欢心。然而，缺少群众支持并不影响复兴党政权后来所从事的革命，因为复兴主义思想已经在伊拉克获得了霸主地位。新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早在前10年就已经准备就

绪。群众起初对一种暴力代替另一种暴力只感到厌倦这是情有可原的,后来,他们对复兴党的言听计从,丧失了自己的一切权利。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暴力政权何时建立(1975年之后),而在于暴力本身不能解释复兴主义得以巩固的原因。像伊拉克共产党一样,群众不得不首先接受(虽然是违心的)复兴党,他们除了加入这个“恐怖的共和国”之外别无选择。

1958年哈西姆王朝被推翻后的5年是公众注意力从伊共转向复兴党的关键时期,1968年的政变毕竟只是1963年政变的重演。这10年是个多事之秋,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我在此只想探讨一下群众在感情上所发生的变化。卡赛姆政权跨台前的三件大事值得一提:1959年春天和夏天,在摩苏尔和基尔库克实施的两次大屠杀严重地玷污了伊拉克共产党的信誉;1960年后对复兴党人和其他泛阿拉伯主义者的公开审判极大地提高了复兴党的信誉。

摩苏尔事件是由一次未遂的泛阿拉伯军人叛乱引起的。这次事件得到复兴党的支持。共产党得到起义风声后,经卡赛姆批准,组织了一次全国各地的亲共分子参加的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大约有25万人突然袭击了拥有18万市民的民族主义城市摩苏尔。第二天,当大部分外来者离开摩苏尔市后,防守摩苏尔市的军事指挥官发动泛阿拉伯叛乱,复兴党带领暴徒烧毁了一些左翼书店和共产党的会场。叛乱被镇压后,大屠杀接踵而来,亲共分子当众凌辱尸体,局势乱得不可收拾。

整整四天四夜,库尔德人和叶齐迪斯人反抗阿拉伯人;阿尔卜—穆塔伊瓦特阿拉伯部族与沙穆玛尔阿拉伯部族作对;亚述人和阿拉姆基督教徒反对阿拉伯穆斯林;

贾尔加利亚库尔德部族反对阿尔卜·穆塔伊瓦特阿拉伯部族；摩苏尔乡村的农民反抗他的地主；第五团的士兵反对他们的军官；摩苏尔市郊与市中心矛盾重重；马卡维和瓦迪·哈贾阿拉伯地区的平民反抗达瓦什阿拉伯地区的贵族；在巴卜·比德区域，拉贾布家族与它的仇敌阿哈瓦特家族作对。联系社会的一切纽带似乎一下子断裂了，所有的政治权威似乎都消失了……民族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之间的争斗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国家一片混乱，濒临内战的危机。

在基尔库克，类似摩苏尔事件的暴乱发生了。库尔德人怂恿他们当地的共产党组织反对他们的夙敌——土库曼人。

1959年10月，复兴党的一个职业杀手小组在光天化日之下用机关枪突袭卡赛姆的汽车。过后的镇压使许多组织解体，或陷入混乱之中。这种局势一直到1961年伊拉克领导权被新的强硬派“左翼”人士取而代之后才告一段落。虽然组织这次袭击活动的领导人已经被人淡忘，但参与暗杀活动的刺客们却在复兴党内声名大振，其中最为显赫的人物不是别人，正是萨达姆·侯赛因。尽管复兴党党内困难重重，但在对几十名涉嫌暴乱的复兴党人进行公审后，复兴党在群众中的形象一下子变得高大起来了。复兴党大公无私、勇猛好战的形象得到了群众中好战分子的颂扬和崇拜。当卡赛姆一如既往，亲自出来调停，对复兴党的暗杀分子表示仁慈的态度后，复兴党不但毫发未损，安然无恙，而且拥有了一大批新的英雄人物。

1958年政变后数日内，群众的政治态度一下子就转变了。复兴党要求伊拉克无条件地与新成立的“阿拉伯联合共和

国”(简称“阿联”,由埃及和叙利亚联合而成)联合。同年7月24日,阿弗拉克抵达巴格达后发起了一场运动,强调伊拉克是阿拉伯统一运动中的旗手。然而,伊拉克共产党却支持卡赛姆政权,并将卡赛姆奉为民族的大救星、国家的“唯一领袖”。在游行示威中,共产党人嘲弄复兴党的要求,打出了“领袖非卡赛姆莫属”的标语牌。1958年9月3日,伊拉克共产党在巴格达街头到处张贴声明,反对伊拉克与“阿联”合并:

今天……当大部分伊拉克人听到合并的提议后,……感到不安……这是因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内没有言论自由、党派自由和结社自由的缘故……

库尔德人……也对自己民族权利的命运感到十分焦虑……

伊拉克军队和军队中英勇的军官们……对埃及和叙利亚军队的联合方式甚感烦恼……

无庸置疑,伊拉克与“阿联”之间在经济上的合作是可取的……但与“阿联”合并……只能使已经落后的伊拉克失去繁荣的机会……

有人认为在联合这样宏伟的目标面前……任何可能出现的错误都是无关紧要的,为了整体利益可以牺牲局部利益。这个论点是极其错误的。因为,假若合并给伊拉克带来不利的后果,假若合并既不能在“阿联”内实现民主,又不能博得其他阿拉伯民族的欢心,那么有什么巨大的吸引力足以促使我们迈向合并这一目标呢?

阿卜杜勒·卡里姆·卡赛姆很得人心;泛阿拉伯主义者

貌似勇猛,实则十分虚弱;伊拉克共产党在国内具有坚实的基础,但可以“为了整体利益而牺牲自我”。这一切足以说明伊拉克共产党在伊拉克政治中愚不可及的立场。伊拉克共产党也许可以依照它在长达 25 年的奋斗历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做出决策。问题是,伊拉克共产党所获得的经验在 1958 年后伊拉克的政治形势中已毫无用处了。

伊拉克共产党

伊拉克共产党和它之前兴起的民众派组织以及卡赛姆执政时成立的民族民主党一样,诞生于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之中。伊拉克共产党将反对现代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作为己任。它认为,它的任务与国家和政府的任务不同。这种差异使得伊拉克共产党能够在 1958 年后与卡赛姆并肩战斗,因为卡赛姆被认为是真正反对社会敌人的人。

君主制(1932——1958)时期,国家和统治阶级的区别是明显的。国家几乎是由地主阶级和现代资产阶级直接控制的。从 1958 年到 1968 年的 10 年间,国家是由军队领导人控制的,而自 1968 年之后,国家是由一个党控制的。从政治角度讲,议会是唯一能使一个社会阶层实行统治的机构。伊拉克的议会制是英国议会制的翻版。尽管伊拉克的议会软弱无力、摇摇欲坠,它自 1941 年之后还是为伊拉克的特权和有产阶层提供了论坛。伊拉克军队推翻君主制时也摧毁了君主制的两大支柱——统治阶层和议会。军队没收并瓜分了统治阶层的财产。

伊拉克共产党认为,它是无产阶级和其它受压迫和受剥削阶层的政党。只有愿意为受压迫阶级的利益奋斗的人才具

备入党资格。虽然工人阶级被排除在伊拉克的政治舞台之外，但它却与许多在经济上、社会生活方面和政治上占据重要地位的组织 and 阶层有密切的联系。从 40 年代起至 1958 年，在工业、教育、运输、通讯等领域就职的工人人数不断上升。尽管工人阶级在当时还没有形成一支强大的力量，然而，它的出现却是一件大事。君主制时期，无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它不仅吸引了学生、战士、低工资的职员，而且还吸引了一些下级军官。这些人构成了伊拉克共产党的基本成份。这些阶层的人被排除在议会政治之外，这点恰恰成了人们拥护无产阶级主张的契机。人们争相自愿入党，愿意为它的目标奋斗。

1958 年之前的伊拉克社会动荡不安，为伊拉克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土壤。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伊拉克成立了无数个政治派别和组织，它们今天结成联盟、明天纷纷解体，然后再结合、再破裂，循环往复，好不热闹。当时，社会上的所有阶层都有自己的代表组织：地主阶级、部落酋长、现代资产阶级、商人、亲英派、反英派、宗教团体、泛阿拉伯主义者、自由民主者、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者、当权者、极左的改革者……有些组织还注意到了社会不平等、贫富不均、滥施淫威等现象。各种观点相继出现，各种组织之间争论不休。政府曾企图制止这种现象，但没有成功。政治派别、报章杂志、名目繁多的组织、利益集团、不同的宗教派别以及思想活跃的各类人士竞相登上社会大舞台，发表演说、声明、主张……各派之间唇枪舌剑、尔虞我诈、互相攻讦。

这正是阶级形成的大好时机。不同的阶层、党派、思潮、宗教和个人组成了一个大迷团。由于个人必须与外在的“思想意识”发生联系，自我意识和自主意识悄然兴起。

整个君主制时期，伊拉克共产党都是“非法”组织。政府多次取缔这个党却没有成功。政府取缔共产党的作法不仅没有威胁到它的存在，反而为它奠定了基础，提高了它的声望，使它成了人们心目中受压迫人的和无产阶级的代言人。政府是否允许伊拉克共产党的存在成了全社会议论的主题，人们把促成共产党组织的合法化当成享受民主的象征。这正是伊拉克共产党手中的一张道德王牌。

然而，1958年之后，一切都变了。政治社会中没有了“阶级”之分，只有毫无区别的“群众”。伊拉克的共产党组织与大街上的人群毫无二致：各种各样，形形色色，无组织，无纪律。工人阶级的作用自50年代初期变得越来越小，而国家机器和第三产业迅速庞大。随着石油资源的开发，国家经济日渐强大，非工业化的城市化进程加快。伊拉克共产党的成份也起了变化。工人、学生、农民、知识分子、店员以及居住在巴格达周围、什么阶层都算不上的人陆续加入共产党，而自1958年之后，创造社会财富阶层的人数迅速减少。工人阶级原来就脆弱的社会意识这时已彻底消失了，伊拉克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领导地位也不复存在。

尽管支持伊拉克共产党的人数增加了，但工人阶级的人数锐减。支持者都是随风飘摇的“群众”，伊拉克共产党没有坚定的支持者——工人阶级。摩苏尔和基尔库克事件爆发后，伊拉克共产党就不知道该如何带领这批“群众”表达它的看法。君主制倒台之后，统治阶级和议会随即消亡，伊拉克共产党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曾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如今，它的成份变了——由工人变成了群众，它的作用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阿拉伯复兴社会党

与伊拉克共产党不同的是,复兴主义的指导思想就是同正在形成的民族国家的所有机构和制度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斗争的焦点集中在政府和各个机构的权力上。复兴党的着眼点不是某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如君主制度下的权力阶层和1958年以后军队内的秘密组织等。复兴党的好战精神和思想动力有着明确目的。他们认为,国家权限的“不合法”与政府的无能是一致的。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两者始终是统一的。这一结论很容易得出,因为人们对民族国家从来就没有一个完整的统一认识。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盛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随着议会被取缔,国家失去了控制和调合所有政党和阶级的支柱。在广大群众面前,所有的阶级都妥协让步了,复兴党恰好把握住了时代变革的脉搏,而伊拉克共产党则错过了机会。

阿弗拉克曾经说过:“群众在这个世界发挥作用的时机终于来临了。与西方不同的是,东方民族的起义首先是一种解放运动,带有人道主义的特征。这是因为他们开展的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西方受压迫的只是某个社会阶层,而东方的所有国家都是在别人的压迫和奴役之下。”复兴党认为,在阿拉伯当时的情况下,阶级是无关紧要的概念,而共产党人一直到1970年还在强调阶级的重要性:“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工人阶级是一个正在发展和壮大的阶层……其先锋队作用将随着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而不断上升。他们将给我们的革命赋予新的社会意义,加深世界革命与我国革命之间的联系。”相形之下,复兴党的指导思想略胜一筹:

目前阿拉伯的革命是某个阶级的革命呢还是整个阿拉伯人民的革命？这场革命的目的是消灭某个阶级吗？它是否朝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向发展？在目前这个历史阶段，换句话说，在民族分裂的阴影、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进攻和帝国主义的统治下，阿拉伯人民的革命不可能成为某一个阶级的革命，而是一场反对分裂、反对压迫、改变落后面貌的民族革命……

从复兴党的观点来看，在民族革命的舞台上，所有的团体、个人以及革命阶层都有地位和作用。我们所说的人民是指那些自愿组织起来的群众，他们是这场革命的坚强后盾。在这场革命中，如果说工人阶级是最主要的阶级，那么，这仅仅意味着工人阶级的作用是主要的……而阿拉伯革命象征着所有团体、个人以及各个阶层的团结和统一；万众一心为了一个目标而奋斗。

复兴党认为“群众”与“民族”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受压迫、被奴役的阿拉伯群众代表着完美无瑕的民族的真正利益，我们民族的力量和能力体现在他们身上。

在阿拉伯事务中，伊拉克共产党从1958年以后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但它看问题的角度与复兴党截然相反。伊拉克共产党不承认传统上对伊拉克国家权力范围的划分，他们实际上只承认伊拉克只是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基础。随着君主制的废除，共产党的设想在社会政治现实中也变得有些虚无缥缈了。1958年以前，伊拉克共产党的注意力集中在对国内的“非正义”事件的抨击上，此后，他们卷入到一切与伊拉克国家

权力无关的问题之中。

在实践中,复兴党提出要“立即统一”阿拉伯世界,而共产党则认为应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联邦组织。这种想法似乎被认为是形式主义,缺乏内在的说服力。1959年2月,伊共政治局思想家阿默·阿卜杜拉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列举了大量的“科学”依据,宣称虽然伊拉克共产党原则上并不反对阿拉伯的统一,但统一过程本身涉及极其复杂的辩证法。不管怎样,真正的联邦主义是以区域民族主义(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等)的充分发展为前提的。在伊拉克,共产党的存在与其说是一个有形的实体,倒不如说是泛阿拉伯主义思想的一个空架子。从理论上讲,伊拉克共产党似乎接受了阿拉伯统一这一观点,只是在行动中,它受到自身利益的束缚。此外,在国内强调民主只能显示出伊拉克共产党的虚伪。

泛阿拉伯主义者之所以得势是因为他们能够真正把握住伊拉克政治舞台变化的趋势。他们的地位在国内虽然不高,但却能成功地获得人民的信任。他们强烈呼吁马上实行阿拉伯世界的统一,他们的自信赢得了左派人物的支持。1960年到1963年,阿拉伯民族统一的烈火在伊拉克燃烧起来,这一火焰压倒掩盖了统一必然带来的各种实际问题。人们只有一个心愿:推翻目前这个愈来愈不受欢迎的政权。

与伊拉克共产党不同的是,复兴党代表的是真正的人民。它的政治主张特别适应1958年以后伊拉克的政治局势和社会动态。只有议会形式的政府才有可能与上有军官把持、下有人民支持的政权相抗衡。与以前相比,更多的人参与政治活动,这一点本身没有什么坏处。在审判参加1959年暗杀活动的复兴党人时,人民群众对受审者表现出极大的同情。这表明

伊拉克群众的变化多么巨大、多么迅速。而伊拉克共产党在同样的条件下，无法得到与复兴党相同的益处。复兴党的宗旨就是不惜任何代价，赢得广大群众的关心和支持。政治规律常常变化，但复兴党却能够应付自如，顺应潮流。

泛阿拉伯主义作为一种模式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的主张简单明了、激进、有煽动性，似乎一下子就可以把被踩在脚下的阿拉伯人扶起来。在泛阿拉伯主义的神话中，人们忘记了实际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沉缅于过去光辉历史的幻想之中，渴望重振阿拉伯民族。他们认为，富有阿拉伯精神的新一代必将出现。自我被普遍性扼杀了，人们幻想着与其他国家的阿拉伯人结为同志或朋友，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而这些人在日常生活、经济利益和命运上没有任何具体的联系，只是被一种压倒一切、至高无上的信念——阿拉伯民族的统一——系在一起。

泛阿拉伯主义的这种“共同体”观念作为一种社会学和现象学范畴迎合了广大群众的心理。正如复兴党创造的阿拉伯社会主义一样，泛阿拉伯主义使人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放弃了自我特征。这样，泛阿拉伯主义极大地改变了狭隘的地方观念，成功地把人们引入自我陶醉的乌托邦境界。所以，作为一种思想，泛阿拉伯主义的确有美妙的一面，但这种美妙将会像火苗吸引飞蛾那样把人们引入死亡的“奇境”。

观念的转变

过去，我们共产党人对阿拉伯统一的支持者采取孤立态度。我们在1958年7月革命之后所制定的政策是错误的……我们不应该提出与阿拉伯统一相矛盾的口号。

这番话是在 1964 年 4 月讲的。当时，卡赛姆刚刚垮台 18 个月；大批共产党人死于新执政的复兴党之手；伊拉克共产党正在改变立场；“阿联”与苏联之间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当初，共产党在态度的转变上有过迟疑，这不仅仅反映了它对莫斯科政策的效仿。共产党发现泛阿拉伯主义有可取之处，并且认为有必要对 1963 年 11 月推翻复兴党统治的阿里夫军人政权重新评价。新政权一方面加速了反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另一方面，新政权有助于这个国家重新加入阿拉伯解放队伍中去。共产党立场的转变是一个不可改变的逻辑，但对共产党来说，要放弃它在君主制时期的立场是很痛苦的：

共产党继续把政治民主作为它拥护阿拉伯统一的条件，这是极其错误的。民主问题，包括党内生活问题，可以通过实现阿拉伯统一、通过群众斗争、通过劝说、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对阿拉伯领导人的不断影响来加以解决。

当阿里夫总统与纳赛尔决裂、并决定实行颇受欢迎的温和派文官内阁统治时（1965——1966），共产党觉察到了英帝国主义和“石油垄断”的“黑手”。伊拉克共产党做出的一系列反应表明，它虽然在思想上站在泛阿拉伯主义一边，但在感情上已经丧失了与群众的联系。在政治领域内，群众的向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群众已经丧失了当初的真正威力。1969 年，当阿卜杜勒·拉赫曼·巴扎兹博士（曾任文官总理）被复兴党第二届政权指控为特务，并遭到惨无人道的折磨时，共产党除了证明它早就指责过他之外，并没有从这个不祥之兆中看到它的命运。

60年代期间,在一般群众看来,泛阿拉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在纲领上的界限已经变得相当模糊不清了。这个能够对1959年摩苏尔和基尔库克事件做出自我批评的政党显然是共谋者。此外,这种新思维从理论上愈来愈使民主贬值。在君主制时期,共产党在道义上的优势在复兴党1968年第二次执政之前就逐渐丧失了。

从1958年到1968年,共产党立场的转变打破了伊拉克政治中两大敌对势力力量的均衡。这对复兴党十分有利。复兴党在伊拉克政治中的企图就是获得地位和霸权。即使个人不退出共产党,共产党的合法性也不知不觉地转移到它的死敌——复兴党身上。作为组织,共产党是交接合法权的代理人。总之,这里有一笔巨大的历史遗产需要转交。伊拉克共产党是伊拉克资格最老的政党(成立于1932年)。40年代,共产党的思想“在城乡广泛传播……各种阶层中多达一半的老年人对共产党的主张十分着迷。”

在复兴党第二次执政以前,整个知识界开始处于窒息状态。此外,政治语言不仅非常单调,而且失去了自身的特色,明确与含糊之间毫无区别。人们的政治思考能力不知不觉地丧失殆尽,只剩下一个机械性的脑壳。

1958年之前,情况决非如此。那时,共产党的威望复兴党望尘莫及。共产党的组织理论,反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和自由的概念如同圣旨,深入复兴党人之心。在合法权的转移过程中(甚至之前),“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和“自由”这三个词的含义已经变得陈腐不堪了。总之,语言“已经变得丑陋不堪,因为我们的思想愚蠢至极;而我们语言的衰败使我们更易于形成愚蠢的思想”。我将在下面探讨这三个被讹传的词语怎样导

致了愚蠢的思想。

帝国主义

伊拉克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将帝国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当作一对绝好的替罪羊。然而，无论帝国主义还是犹太复国主义，都不能完全决定伊拉克的政治现实。帝国主义是从庞大的马克思主义武器库中来的一个术语（列宁首先使用它）。滥用术语者并非复兴党一家。它的概念与二战后最重要的理论体系——第三世界理论有着紧密的联系。

君主制时期，帝国主义对共产党来说总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只是共产党与苏联并肩战斗的对象；或者说，它是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结成联盟的一种动力。委任统治制是英国间接统治的一种方式，其最终目的是在伊拉克实现某种政治独立。对共产党来说，在伊拉克国内，帝国主义表现为地方的统治阶级；它的实体就是这一阶级，而与伊拉克政治毫不相干。

在共产党接受泛阿拉伯主义、1967年的战争结束之后，帝国主义在共产党的脑海中隐隐约约变得更可怕了，成了“民族民主革命的主要敌人”，但旧的概念依然保留：帝国主义“在国内有其自发的支持者，他们是封建主义者，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然而这些人已不复存在，他们有的接受了国有化改造；有的被流放在外。因此，虽然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在共产党的脑海中不断扩大，它的实体却在缩小。

犹太复国主义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中不占有重要的位置。像阿拉伯所有其它共产党一样，伊拉克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暧昧态度与苏联分制巴勒斯坦的主张有关。自1948年以

来，伊共在犹太复国主义问题上改变过几次立场。

相比之下，在复兴党心目中，帝国主义是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东不合理的秩序的罪魁祸首。从政治角度讲，中东的政治秩序是战胜国根据各自利益重新瓜分世界的必然结果。一旦使用阿拉伯人特性这一前提（而不是伊拉克人或叙利亚人），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就不再局限于领土瓜分这个历史性的解释上。现实与概念的结合使复兴党最终形成了帝国主义是国内一切罪恶之源的理论。

犹太复国主义给帝国主义的种种解释加了新的内容。帝国主义的阴险被几次阿以战争所“证实”，复兴党人从阿拉伯人的战败中看到了“第五纵队”的存在，看到了阿拉伯反动派、当地犹太人和库尔德人与帝国主义的相互勾结。这样就产生了“三位一体”的敌人——帝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阿拉伯反动派共同对抗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只要时机成熟，复兴党就可以将一切政治问题与这三个敌人挂上钩。

从意识形态上讲，60年代阿拉伯政治中的主要特征就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即使在1972年战争中以纳赛尔主义为特征的泛阿拉伯主义遭到致命的打击、复兴主义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面临分裂的时候，人们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仍然没有丝毫的改变。军事上的失败使人们感到阿拉伯政权的“进步性”虽然威力无比，但对以色列毫无办法。然而这并没有动摇泛阿拉伯主义世界观的基石。不论是反犹太复国主义斗争的巴勒斯坦化，还是复兴主义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地区化都与复兴党实行反对帝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阿拉伯反动派的政治策略不相矛盾。诸如此类的例子可以在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左翼势力中找到，也可以从阿拉伯/穆斯林方面对目前黎巴嫩内

战的解释中找到。因此，泛阿拉伯主义作为战后阿拉伯政治中的一个方面，其意义不在于它在半个世纪中未能实现阿拉伯统一的这个事实，而在于它成了一切政治主张的基础。

毫无疑问，阿拉伯国家分裂的现实必然对泛阿拉伯主义的发展产生重大阻力。这种观念的内在逻辑与它所面临的现实之间悬殊很大。假定以色列继续向两岸扩张，泛阿拉伯主义就有可能逾越这种鸿沟，实现阿拉伯统一的目标。

社会主义

不同寻常的是，伊拉克复兴党首次在阿拉伯世界中将社会主义问题与民族问题相提并论。复兴党把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当作主要的目标，而且认为三者是互相紧密联系的有机体……这三个目标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复兴主义意识形态的最大特征。

复兴党在 1947 年的成立大会上，将社会主义作为将来实现阿拉伯联合后经济组织的模式。参加大会的 200 多名党员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当时，复兴党在阿拉伯政治中影响甚微。伊拉克复兴党成立后前 10 年的主要任务是坚持泛阿拉伯主张，并认为这是它有别于它的主要敌人——叙利亚共产党的主要特征。50 年代，社会主义概念引起了更为激烈的辩论。在民族主义者看来，复兴党是强调社会主义的先驱之一，复兴党于 1952 年改名为“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象征意义就在于此。与 1947 年的情形不同，复兴社会主义的新概念远远超出了经济国有化的范畴。

复兴党的社会主义深受苏联的影响。作为一种强大的国家政权，苏联在短期内改变了沙皇俄国的落后面貌，一跃成为世界的超级大国。复兴党对此十分羡慕。与其它阿拉伯共产党不同的是，复兴党既向往苏联式的组织方式，又对苏俄的“民族主义”恋恋不舍。阿弗拉克喜欢将苏联在二战中的表现视为民族主义的最好证据。阿弗拉克创造了“阿拉伯社会主义”这个术语。看来，伊拉克共产党对苏联的效仿远远不如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对苏联的效仿。不久，阿拉伯社会主义在阿拉伯世界畅通无阻。今天，非复兴党员的阿拉伯人已经淡忘了这个术语原来是复兴党最初的创造。

许多其它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也将社会主义与苏联相等同。社会主义作为第三世界的理想、作为平等和正义的未来的象征与苏联的现实已经融为一体。在伊拉克，倘若要问什么是社会主义，答案只有一个：复兴党的统治就是社会主义。假如权力会奇迹般地转入伊拉克共产党手中，没有人会认为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与复兴党的社会主义有什么区别。滑稽的是，伊拉克共产党持有与此相同的看法。

复兴党对社会的新秩序抱有一种新颖的、甚至救世主式的幻想，它对私有财产、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幻想也是这样。革命是复兴党贴在社会主义之上的一个独创的标签。阿拉伯共产党过去和现在的一切主张与复兴党过去的主张和夺得政权后的主张比起来相当逊色。要深刻认识复兴党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就应从它的主张入手：

社会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并不局限在经济秩序内。
社会主义扩展到了生活的各个领域——经济、政治、军

训、教育、社交生活、健康、道德、文学、科学、历史以及其它大大小小的方面。

社会主义、自由和统一并非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而是一个东西的不同方面。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并非言过其实。正如拉扎兹所言，这是从“一个基本定律中衍生出来的东西”——这就是复兴党对自由的见解。

自 由

复兴党认为，自由总是、并且无条件地“体现了人民的利益”；自由只有通过“代表人民意志”的政权才能实施。人们可以尽情地嘲弄这种见解，因为伊拉克国家是一个“恐怖的共和国”。复兴党坚信他们的政权旨在实现一种真正的民主，人们也可以尽情玩味这种见解的重要“含义”。

自由是为人民谋福利的，因为国家主权是为人民谋福利的，这种认识是复兴党关于自由的出发点，也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认识。泛阿拉伯主义的反帝国主义主题就是围绕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获得自由展开的。即使从阿拉伯政治文化更为广泛的含义上说，这种自由不具有西方自由中那种强调个人主权、摆脱国家和社会束缚的内涵。构成社会各个部分的权利（个人、团体、少数派以及言论）本身就意味着国家不得干涉个人自由，个人有权选择是否加入更大的社会之中（并非绝对的，而是在某种合法的有限范围内）。这些概念意味着对隐私权、人身自由、自主意识和自主权、少数派的保护，以及其它人类福利问题从道义上的尊重。在资本主义历史中，个人主权是

以剥削他人劳动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形式出现的。一般说来,第三世界国家将个人主权减少到了极点。第三世界国家“越过了”欧洲历史上现代化之前的那段启蒙时期。原教旨主义的出现和对“圣训”不敢越雷池半步的态度表明,穆斯林世界对自由的价值有所抵制。不管原因如何,事实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投身于政治活动的目的是,在不自由的国家中以集体的形式获得他们的权利,以便摆脱被认为是自私的、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个人主义的、对社会主义有害的个人权利的束缚。从这点出发,复兴党对自由的见解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自由准则是极其相似的。

据埃萨米所言,复兴党关于自由概念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自由与社会主义相结合,也就是排斥那种歪曲自由本质、将自由扼杀的资产阶级民主。我们可以这样说……对复兴党来说,关于自由的自由主义概念多年来一直在减少,取而代之的将是大众民主的概念”。复兴党认为,“自由”已经摆脱了外人(帝国主义)的消极影响,变成了某种“积极的自由”,这是什么意思呢?指的是实现大众民主,还是实现社会主义和阿拉伯统一?

复兴党关于自由概念的第二个方面将着重点从外来干涉转移到“谁来统治”这个基本问题上了。复兴党的“积极自由”出自自我管理和实现个人“真正的”利益的愿望。无知、贫穷和自我的分解只能妨碍实现自我。

复兴党坚持列宁关于只有党组织才能正确代表人民利益的学说;政党是国家的“真正”利益的宝库;政权是实现这一切的工具;领导权是自然得来的一种地位。

资产阶级民主歪曲了自由的第二个方面,因为资产阶级

民主的实施给革命政党与群众“紧密结合、打成一片”的观念蒙上了一层阴影。正如阿弗拉克所指出的那样，“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是由“政府行使行政大权，议会进行批评、攻击和反对”的形式构成的。正在演变成为国家象征的政党是建立在“革命者”的心理之上的，假如党员心里另有所想，那么，党员就歪曲了党的形象。复兴党的革命理论总是尽力将个人集体化，使他“融入”他的同志之中。其目的就是要在党内造就融为一体的群众，他们的真正利益将由复兴党维护。党内和党外的区别在于，入党后，在党纲的指引下，群众将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而在党外时，由于处于邪恶的外在世界的包围之中，群众会迷失方向，就不能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信仰。

复兴党的自由已经变为“社会主义的”了，因为这种自由与构成“群众”、“新社会”、国家或政党的基本分子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基本分子通过誓约可以成为正统的骨干分子。誓约是他们进入新社会的通行证。成为新社会成员的条件可能是主观的和意识形态的，但对每个人来说，条件是完全相同的。复兴党在其党员身上寻求同一，结果将人们身上的一切特点都消除殆尽。从策略上看，条件的均等变成了“做一名复兴党人”，与之俱来的还有对经济不平等的根除。

对复兴党来说，均等和缺乏自主权首先始于政治领域，然后逐步进入社会。对共产党来说，情况正相反：客观上的经济不平等现象是它形成反对自主权理论的根据。当共产党反对经济的不平等时，经济的不平等存在于分明的阶级社会之中，而不在共产党内部。无产阶级专政将剥夺其它一切阶级的自由，以便建立全社会的平等。

在一个多样化的世界中，局部(个人、团体、报纸、党派)的

自主是国家政治自由最基本的先决条件。然而，局部的过分自由将威胁社会的安全，因为，人们变得相当世故成熟，不愿接受强加的意志。对作为自主的实体的个人而言，政治自由比个人自由更需要得到正式地保障，而制度化的机构才是政治自由的保障。假如没有这些“正式”的机构，一个人尽管是自主的，却无从实现个人的政治自由。

当群众观念占据一切时，自主权和制度上的自由随即消失：即每一个人消失在别人之中。在这种情形下，唯一的自由就是融合进集体之中、为了一种事业而献身的自由。自主已经不再是自由的条件，因为自由已经变成了一种单一的精神状态。另外，当“同一”变成一种融合进群众之中的不可抗拒的愿望时，就需要将一切个性特征消灭掉。从理论上讲，泛阿拉伯主义必须努力将一切地区民族主义和各种特征（部族的、教派的、甚至家族的特征）铲除干净。否则，群众中已经崩溃的原则将会死灰复燃。在复兴党看来，为了更大的自由起见，个人必须与群众结成一体，这样才能杜绝一切越轨言行。这样的目标不难实现。更为重要的是，复兴党可以向群众灌输这种观念，这就是为什么政权总是给政治以极大的方便。

在公众圈子里，那种全然融合一体的状态只是偶尔会在形形色色的“兄弟般的情谊”场合中找到：秘密组织、战场上的士兵、英雄和烈士、纽伦堡集会、足球赛场的闹事者、以及斗争中的一些战友。经过短暂的情同手足的兄弟般情谊，个人可以体验到一种更为短暂、然而真正的狂喜感觉，正如献身宗教者在罪人的世界中所体验到的那样。从这种观点出发，自由就是当大脑彻底融进“另一个”，从而产生了绝妙的完全一致的群众时所获得的那一瞬间狂喜。这就是疯狂的暴徒们于1959年

夏天、1969年冬天在摩苏尔、基尔库克和巴格达所体验到的那种自由的本质。虽然体验的机会难得，而且只有少数圣人才有资格，然而这却反映了复兴党关于真正自由的认识。从某种观点看，这才是实现自我的极致。

这里有一种强大的、无疑存在于每个人身上的原生力量。也许这种原生力量源自人类庄严的、炽热的爱（爱他人、爱主义、爱上帝、爱国家）。在政治中，这种力量只有当一大批人团结在一起，或不顾一切地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时才能表现出来。我们这些凡人之间所存在的差异一旦消除之后，这种力量就变得异常强大。从这点出发，复兴党的自由就是高度的“统一”；同时，这种自由充当了一种最重要的平衡力。复兴党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的自由”，它是一股强大的洪流，淹没了一切离析、隐私、独立、差别、自主、种类、特征和个性。

复兴党狂热地信仰它的口号和标语——“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这类标语经常出现在报刊、杂志、街头、前沿阵地、各种各样的会议厅、以及他们领袖的照片上。这些标语和口号成了复兴党的主要标志和特征。复兴党的过分宣传反而使许多人对它的宣传麻木不仁。人们似乎忘却了这一切背后的最初意图。这些人最终也将忘记复兴党的一切不寻常之处，因为复兴党总是将这种“积极自由”强加在伊拉克人民的头上。

第八章 最后的灾难

早在1980年春天,萨达姆·侯赛因就开始筹划对伊朗的战争。3月,两伊断绝了外交关系。4月,复兴党加剧了驱除什叶派“第五纵队”的活动。7月,伊朗伊斯兰政权挫败了一起由伊拉克支持的未遂政变。复兴党透露,伊拉克在8月份占领了伊朗席林堡地区的部分领土。至9月11日,伊拉克通过军事行动,占领了大约130平方公里的伊朗领土。9月17日,伊拉克单方面撕毁了阿尔及尔协议。5天之后,随着伊拉克对伊朗10个机场的袭击,两伊战争全面爆发。

尽管伊朗方面夸大了伊拉克的意图,但观察家们一致认为,伊拉克的入侵令霍梅尼政权猝不及防。博斯坦和其它地区的边界警卫部队装备极差,人员不足,难以抵御。尽管伊朗教权主义一直崇尚侵略扩张,但伊斯兰共和党和巴尼·萨德尔及其追随者当时正处在激烈的冲突之中,无暇顾及外来侵略。当时,美国人质问题进入了关键时刻,原教旨主义集团、革命卫队与解体的军队(军队中的许多高级军官刚被处决)之间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1980年9月22日以前的几个月中,两伊双方都强烈谴责对方制造边境事端,但以此为借口发动大规

模的侵略战争，责任无疑在伊拉克复兴党一方。伊拉克最初的军事战略是想采用以色列式的闪击战。整个战斗行动计划在两周内完成，以便赶去度斋月。一周的战况表明，伊拉克的军事战略落空了，以后的战争进程可以大致分为下面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伊拉克部队更加缓慢地向前推进，损失更为惨重，占据了霍拉姆沙赫尔；第二阶段为僵持阶段，一直持续到1981年春天；第三阶段，伊朗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有效的反击，最终于1982年将伊拉克部队全部赶出伊朗领土；第四阶段，进入长达3年的对峙阶段，伊朗用人海战术不断攻击伊拉克的重点防御阵地；最后阶段，伊朗缓慢地向伊拉克境内推进，代价十分惨重。

罕见的大战

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两伊战争已经证明是一次罕见的大战。据统计，死亡人数达到50万到100万之多。由于酷热和潮湿，加上医疗设备简陋和不足，伤病员中存活者甚少，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中的伤亡人数超过了过去40年间阿以战争的伤亡人数（其中包括持续11年的黎巴嫩内战期间10万的伤亡人数）。两伊战争的伤亡人数与持续20多年的越南独立战争中的伤亡人数相当。许多城镇和乡村变成了瓦砾，造成的难民人数超过以色列建国期间难民的总数。

人们对两伊战争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比对人员伤亡代价更为关注。毁坏固定石油设施价值达数百亿美元，平均每月损失10亿美元；大规模的“油船战”造成的损失、这些设施的重建以及变幻莫测的石油价格等等，都造成了一个可以估价的错

觉。上述数字可能对承包商和外国政府将来从中获益有利。对他们来说，这样的考虑在某种程度上说可能是合适的。然而参战者的观点是：“来得容易，去得快。”这一谚语概括了对石油收入的一种比较健康的道德态度，许多伊拉克人就持这种态度。两伊双方花费了巨大代价才获得了这一教训：损失一桶油并没有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因此，尽管战争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如此惨重，这一切并不能触动他们的内心。

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两伊战争的确是“飘浮”在石油价格之上的战争。石油收入可以用来购置军火，这使双方互相残杀的战斗大大增强。相对说来，这是一场流动性不大的战争，主要战场都分布在边界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在单位时间内的伤亡人数对整个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影响不大。这与因兵力增援不上而达到极限（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的情形）的情况完全不同。

全国上下齐动员，伊拉克征兵 100 多万。1986 年，51 岁以下的男性均在被征之列。要给如此众多的兵员提供食用成了一个重要的后勤问题。这涉及军队与地方之间特殊的现代关系。妇女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接管了经济和行政方面的工作。由于全国上下处于战时状态，权力高度集中，伊拉克的经济表面看来仍然运转正常。战争爆发前的好长一段时间，伊拉克就开始严格控制进口、出口、分配、消费和生产。长久以来，复兴党的经济在战时与和平时期的差别不大这一事实也许与此有些关系。然而，战争对伊拉克造成的社会影响不可低估。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过类似的经济政策，英国最后的死亡人数达到 40 万之多。换句话说，假定伊拉克的死亡人数为 30 万，那么相对来说，两伊战争对伊拉克的影响已经超过第二次

世界大战对下列国家的影响：英国死亡人数为 40 万；法国为 41 万；捷克斯洛伐克为 41.5 万人；爱尔兰为 21 万。

将两伊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一比较可能更为恰当些。英、法与奥匈一战中的伤亡率是二战的两倍。死者大多是前线的士兵，非战斗人员极少。流动性不大和后方与前方的分隔是一战与两伊战争的特征之一（虽然两伊战争的规模要小一些）。对远方城市和居民中心的狂轰滥炸是两伊战争头 6 年中的心理战术。此外，两伊战争的作战方式与一战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个战争都采用了毒气战和人海战（壕沟战不多，但双方相距较近）。

从根本上说，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两伊战争首先是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战争。不仅军队参加了战斗，而且全国上下都动员起来了。然而两伊战争不是一场殖民战争，不是一些大国争夺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扩张战争，也不是阴险的外人通过阴谋诡计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的战争。从其规模、社会上的人力和物力的调动方面来看，两伊战争是第三世界国家前所未有的一次“大战”。自从三个世界这个概念划分以来，没有哪一次战争能超过两伊战争的规模。

另外，正如欧洲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战争能在规模上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一样，在悠久的两伊关系史上，也没有哪一次战争能与这次战争的规模相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将欧洲与它的过去以某种武断的方式截然分开了。欧洲人为此一直在深刻反思这段历史。同样，两伊战争是一场现代战争，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相当武断的国家向一个正在进行一场革命的国家发起的侵略战争。如果抛开历史根源，伊拉克现代化的失败和伊朗倒行逆施的革命都不能解释两国在 20 世纪的出

路和两国兵戎相见的原因。这是一次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在殖民统治和帝国主义统治之后所建立的新政权的基础上，伊拉克人和伊朗人最终要对此进行反思。不管我们对这些新政权多么厌恶（因为它们给我们带来了血腥屠杀），它们都是我们自身社会和政治传统的真正产物；它们并非从远古演变而来，而是诞生在当今这个时代。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才是智慧的开端，虽然这个认识过程并不那么令人愉快。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大批的人员卷入战争一样，两伊战争将在伊拉克和伊朗未来几代人的意识中打上深深的烙印。这场战争在以后许多年中将决定两国人民的信仰、态度、偏见和价值观。

战争起因面面观

引起两伊战争的原因是什么？三个严肃的、但最终不能令人信服的论点广泛流传着——种族或民族仇恨、伊拉克境内什叶派的骚乱以及领土争端。

1. 伊拉克人和伊朗人之间历史上根深蒂固的民族敌对情绪是这场战争爆发的基础，虽然这种民族仇恨不能解释战争爆发的具体时间。“波斯人对阿拉伯人的仇恨……深深地隐藏在伊朗人的心理之中，”阿卜杜勒·加尼写道，“波斯人几乎已经忘记了所有外来的侵略，只是没有忘记阿拉伯人对波斯人的侵略。”这几种仇视源于民族（阿拉伯人对波斯人）和种族（雅利安人种对闪米特人种）之间的分歧与不和。这种看法在伊拉克方面相当普遍，而且有时出现在新闻报刊上，成了促成两伊战争的“原因”。

这种民族仇视最好的证据正好体现在当事者本人身上。

譬如，对伊拉克人的入侵，伊朗人立刻作出反应，攻击对方是“暗箭伤人的阿拉伯人”，并在散发的传单上引用古诗，骂伊拉克人是“饮骆驼奶、食鳄鱼肉”的“野蛮的阿拉伯人”。伊拉克人在这方面也不甘示弱。复兴党口诛笔伐，贬斥对方是“蛮族”、“拜火者”、古往今来的“种族主义的波斯人”。萨达姆·侯赛因号召伊拉克人“毁灭袄教僧”（对拜火教教徒的蔑称）。复兴党的宣传工具历来不将对方称为伊朗人，而称为古往今来总是企图推行帝国扩张、欺压被压迫民族的波斯人。

波斯人的民族沙文主义由来已久，但这种沙文主义主要指文化上的含义。当一个德黑兰人说“伊斯珀汗地方的狗爱喝冰水，而沙漠上的阿拉伯人爱吃蝗虫”时，他的内心只不过有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而已，并没有任何公开的政治倾向。在法尔西，几乎所有阶层的人都持这种态度，他们对伊朗所有其它的少数民族抱有同样的敌视态度。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79年，伊朗宗教人士致力于使伊朗“非波斯化”，“重建伊斯兰化”的伊朗。在推翻伊朗国王之前，霍梅尼的许多新政治术语来源于不为大多数伊朗人所知的阿拉伯词语。阿拉伯语在学校中取代了西方语言；“赛义德”这个名字开始被伊朗人用于取名；新月形取代了古波斯象征物狮子和太阳。1980年9月22日以后，伊朗的阿拉伯化倾向也许变得更加审慎了。即使霍梅尼“失言”说出“暗箭伤人的阿拉伯人”时，或者三番五次地号召人民动员起来消灭亚齐德（指萨达姆·侯赛因）的军队时，他的形象化的比喻出自伊斯兰教派之间历史性的传统话题（什叶派对逊尼派），而不是出自伊朗的种族主义或民族沙文主义。霍梅尼说这番话时想到了伊斯兰教早期的阿拉伯人，他们邀请阿里的次子侯赛因去

统治伊拉克人，然后又“将他出卖”给亚齐德的军队（亚齐德是穆阿维叶的儿子，而穆阿维叶本人就是一个“篡位者”）。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这种宗派性的比喻激发了波斯人的民族沙文主义。尽管如此，波斯种族主义或雅利安主义并不是两伊战争的起因，只是在战争爆发之后才广泛传播起来。

复兴党的种族主义也有文化上的根源，虽然这个根源相对弱一点。阿贾姆人在穆斯林中是一个地位低下的民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不太紧密。复兴党的种族主义开始于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他们出版小册子，如海尔罗拉·图尔法的《上帝不该创造的三种生物——波斯人、犹太人和苍蝇》，并且像巴拉克一样加强了警察力量。复兴党人费尽心机，竭力促使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教徒同情他们在伊朗的同宗派教徒，然而这一切不是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而是从政治角度出发的。没有一个国家像伊拉克境内的阿拉伯人与伊朗人那样相互混杂着。波斯“雅利安主义”和阿拉伯“闪米特主义”只不过是虚构的神话，在现实中，它只在语言的渊源上、而不是在民族的起源上产生了微弱的影响。这些基本的事实被现代新发明的概念“反阿拉伯主义”、特别是泛阿拉伯主义者爱用的“内部的敌人”的观点所证实。毋庸置疑，居住在一起的、讲阿拉伯语和讲法尔西语的人经常发生一些小磨擦。然而，这一切并非出自某种政治企图，没有必要强行拉入意识形态的范围。因此，这不足以构成两伊战争爆发的起因。

此外，如同所有其它战争一样，两伊战争促使双方变成了恶魔。今天，霍梅尼主义正在深深地渗入波斯民族沙文主义之中，而复兴党也在扩展其种族主义。一旦积怨开始形成，只要时机成熟，本来无足轻重的小事可以被任意发挥，作为借口实

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公元 636 年,阿拉伯人与波斯人曾经在卡迪西亚平原上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激战。除此之外,“历史”与这场两伊战争没有什么关系。伊拉克方面正式将两伊战争称为“卡迪西亚·萨达姆之战”。由此看来,那次事件在伊拉克人的感情上打上了极深的烙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场战争仅仅推翻了萨桑帝国,因为它已经变得腐朽不堪了。历史学家认为,阿拉伯人赢得了卡迪西亚战争是因为伊朗人成群结队地离弃了自己的军队,加入到伊斯兰远征军的行列。再者,伊拉克当时属于加萨尼帝国的一部分(帝国首府的部分遗迹坐落在今日伊拉克中部)。因此,这段历史颇具讽刺意味,不能成为任何事件的“起因”。它只能从正面证明,伊拉克人和伊朗人已经不像从前那么落后了,而且变得相当“现代化”了。

2. 一旦伊拉克装出自卫的架式,它就会自然而然地宣称,受伊朗煽动的伊拉克境内什叶派教徒的骚乱迫使复兴党采取自卫行动,防止伊朗伊斯兰革命的侵蚀。当初,复兴党就指控伊朗发动侵略战争,声称伊朗在 9 月 22 日之前挑起过 187 次边界事端,但从来不提供任何细节。到了 80 年代中期,伊拉克改换手法。它的政府发言人宣称,伊拉克在 1980 年出现了国内战争的苗头。然而分析家更注重铁的事实:伊拉克境内发生过几起爆炸事件。1980 年 4 月,有人企图谋害副总理塔里克·阿齐兹。分析家虽然不否认萨达姆政权的稳定性,但同时又相信,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和霍梅尼的不妥协政策给复兴党造成了心理上的紧张,使复兴党领导人坚信,必须提早采取断然的自卫行动,以免措手不及。

尽管复兴党如此偏执,但从许多方面来看,什叶派教徒骚

乱引起了两伊战争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到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复兴党政权使伊拉克变得比现代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繁荣和富强,而且复兴党摧毁了所有反对派组织。第二,伊拉克境内不断增长的什叶派宗派主义并不是 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主要产物,虽然那场革命是促使宗派主义发展的因素之一。无论在社会领域还是在个人方面,什叶派的宗派意识都是复兴党促成的。第三,与伊朗国内的情形不同的是,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宗派主义不是公开的、首要的或政治性的,而仅仅反映了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在社会和文化方面不断增长的憎恶。第四,成立较晚的什叶派政治组织(也许受到伊朗方面的支持)一般规模较小,大多数组织在两伊战争前就被复兴党摧毁了。

如果伊拉克境内什叶派教徒骚乱真是如此严重的话,他们为什么要去参战呢?当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叛乱并得到伊朗国王的支持时,复兴党并未向伊朗宣战。相反,复兴党主动与伊朗谈判,从而达成了 1975 年阿尔及尔边界协议。此外,复兴党为什么要从什叶派教徒居多的省份发起战争?再者,为什么复兴党宣战时要求解放“阿拉伯斯坦”全省,并要求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海岸以外的被伊朗王国于 1971 年占领的三个岛屿归还给阿拉伯人?复兴党于 1980 年 9 月所提出的种种要求是有意让对方拒绝的。另外,1982 年,虽然战争局势突变,出现了伊拉克不利的形势,但伊拉克的大部分什叶派士兵并没有叛变,仍然愿意继续打下去。尽管复兴党政权的失误使无辜的国民遭受了无尽的痛苦,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个失去了权威的政权怎么能从这场灾难中幸存下来,而且没有大伤元气,依然同战前一样强大呢?这是对伊拉克方面关于两伊战争

的观点提出的一些至关重要的疑问。能够提出质疑这一事实本身就推翻了关于伊拉克境内什叶派教徒的骚乱“迫使”复兴党发动战争的论点。

3. “两伊战争的首要起因来自领土争端,尤其是长达数百年的关于阿拉伯河的边界冲突。”如同其它诸多“起因”一样,这种论点出自复兴党人的自我辩解。然而,一旦伊拉克军队被驱逐出伊朗国土,当初所有的领土争端都可以坐下来谈判了,正如1975年萨达姆·侯赛因主动与伊朗国王达成了阿尔及尔协议一样。复兴党乐于将谁是真正的侵略者这一问题让国际社会来仲裁。复兴党做出了愿意赔偿战争损失的暗示,并准备无条件地恢复战前现状。这样,复兴党就清楚地暴露了它当初行动的目的。所有这些灵活性抬高了伊拉克的信誉,使人感到它是受害者。为了反对本国政府继续打下去,那些对复兴党不抱任何同情心的伊朗反教权主义者和反对派人士对复兴党最初的领土要求做出了部分让步。

无论是出自有意还是无意,领土问题作为冲突的原因是令人迷惑不解的。在一大堆“证据”之中,唯有政治动机不易察觉。另外,像写购物单似的罗列一系列战争的原因是非常容易的,但却不能代替深入的分析。领土问题有助于解释滥用武力的行为,这种观点在两伊战争中支持伊拉克的西方人士中相当盛行。在目前探讨的诸种“原因”中,领土问题是最普遍的观点。然而从某些方面来看,领土问题又是最不能令人信服的问题。持这种观点的人将两个互不相干的问题混为一谈。首先,是否有一个我们未涉及到的、需要解决的领土问题?假如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出现了第二个问题:这个领土问题是这场战争的“起因”吗?

塔雷克·伊斯迈尔在《伊拉克与伊朗——冲突的根源》一书中对领土争议问题作了详尽的阐述。该书以翔实的历史资料，论证了伊拉克领土要求的合理性，为伊拉克首先挑起战火的行为辩护。同时，该书宣称，受压制的世俗主义（暗指现代主义和进步思潮）与以救世主自居的宗教扩张主义之间的对立从意识形态方面加剧了民族之间的冲突。

伊斯迈尔首先描述了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德帝国之间于1555年签订的第一次和平条约。接着他叙述了一连串的战斗和其它一些条约。最后他才写到了苏丹·穆拉德四世（他“将伊朗人赶出了伊拉克”）于1638年达成的第一个“重要的”祖哈布条约。在所有民族的历史中，帝国之间的冲突一般都涉及到各个民族的冲突。而支持这一论点的论据正是这种时代性的错误。令人感到滑稽的是，持同样观点的西方人对此也很迷恋。例如，丹尼尔·派普斯在批驳了波斯——阿拉伯人之间互相仇恨的论点后，提出领土问题是两伊战争的起因。可是，除了民族之间“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冲突之外，1639年萨法维德——奥斯曼边界条约和1980年萨达姆·侯赛因与霍梅尼之间的领土争端难道有什么关系吗？作者认为自从祖哈布条约签订后，“未来边界冲突的框架”就建立起来了。作者在描述了一系列其它的与“阿拉伯斯坦”有关的冲突之后，谈到了1823年签订的第一个埃尔泽鲁姆分水线条约。这是土著强国之间达成的最后一个协定，因为“代表不同利益”的新的（宗主国）强国之间互相施加压力。众所周知，他们是怎样处理边界问题的。

这件两伊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在两伊战争爆发前鲜为人知。为了醒目起见，该书的六幅地图中的第一幅地图表明：穆

哈玛拉(从前叫霍拉姆沙赫尔)和阿巴丹两地属于伊拉克一方,边界沿巴姆希尔河向东延伸,这样就形成了整个阿拉伯河流域,该流域与巴姆希尔河之间的一片沼泽地不容置疑地属于伊拉克领土(虽然伊拉克国家的形成还是一个世纪之后的事)。遗憾的是,读者不会欣赏这幅地图所提供的资料。众所周知,这一地区的帝国之间的条约是按非常模糊的部落距离的轮廓来划定边界的。只要稍翻一下伊朗方面的历史档案,你会发现类似地图上的侵略活动,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总之,根据 1823 年的条约,教授先生划归伊拉克的领土占不到胡齐斯坦(阿拉伯斯坦)省全部面积的 10%,然而,复兴党却在 1980 年提出了阿拉伯斯坦省全部的领土要求。

阿拉伯斯坦地区的边界历来都是模糊不清的。阿拉伯斯坦或“阿瓦士地区”是复兴党的命名,有其特殊的含义。它包括阿瓦士市,可能包括、也可能不包括伊朗人称为胡齐斯坦的整个省区。如果让占这一地区绝大多数的阿拉伯人来界定阿拉伯斯坦的话,将会产生更多、更为复杂的问题,因为这些阿拉伯人并不欢迎伊拉克军队。另外,假如仍然依此标准衡量的话,伊拉克南部地区,包括纳杰夫和克尔巴拉,将成为伊朗人要求的领土范围了。如果加上复兴党驱逐所谓的什叶派“第五纵队”等其它无中生有的辩解,伊朗人的领土要求将更加合情合理了。

第二幅地图描绘了另一个在 1874 年签订的边界条约。该条约反映了“帝国主义维护自身利益,稳定势力范围的共同性”。根据这个条约,穆哈玛拉、阿巴丹、巴姆希尔河以及两者之间的沼泽地划归伊朗,而整个阿拉伯河流域属于伊拉克。基于同样的理由,两伊双方现在都拒绝这一条约,但却不能废除

这一条约。伊拉克的正式立场是，该条约是奥斯曼帝国（不能代表伊拉克）与独立的伊朗之间签订的，伊拉克有权拒绝。伊朗方面的反驳使这一争论更加复杂化了。伊朗认为自己的代表人米尔扎·穆罕默德·阿利汗无权代表伊朗在1847年签订这一条约。接着，作者不厌其烦，继续阐述冲突的“根源”——长达180页的各种条约、法律文件、解释条文、声明以及附加在文本上的讲话，等等……最后作者终于谈到了第六幅地图。这最后一幅图展现了由联合国授权、根据1975年3月6日签订的阿尔及尔协议所划定的无可置疑的边界。

伊朗要求按国际准则（即两国分界之河川航道的中线为两国分界线）调整两伊边界（此要求是1932年首次提出的）。1975年，伊拉克对这个要求正式做出了让步。这样，伊拉克就认可了两伊双方共同拥有边界河流的主权。作为回报，伊朗国王将不再支持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的叛乱，双方将互相尊重主权，终止一切侵犯活动。两伊战争爆发的前几天，伊拉克单方面废除了阿尔及尔边界协议。伊拉克在挑起战火前夕的正式态度可概括如下：

由于伊朗制造了187次边界侵犯事件，伊朗方面已经废除了阿尔及尔边界协议。伊拉克宣称，这些侵犯活动都是在战前4个月间进行的。伊拉克又宣称，任何一次侵犯活动都意味着整个协议无效，伊朗领导人所发表的许多声明证明了他们企图搞伊斯兰革命“输出”。一旦废除了阿尔及尔边界协议，根据以前所有的协议，阿拉伯河航道主权必须回归伊拉克。从此以后，所有经过阿拉伯河流的船只必须悬挂伊拉克国旗，航行费必须交给伊拉克。此外，1847年签订的埃尔祖鲁姆条约将阿瓦士地区（也叫“阿拉伯斯坦”）割让给伊朗是一个极大的错

误。该地区的绝大部分居民是阿拉伯人，他们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征服伊朗的伊斯兰远征时期。最后，伊朗王国于1971年占据的、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上的3个荒芜岛屿的主权应属于阿拉伯人。

两伊战争并不是伊朗单方面强占领土所引起的。假如领土问题是争执的焦点，从潜在意义上讲，那该是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冲突的主要原因。毫无疑问，这是伊斯迈尔、派普斯和其他许多人论点的逻辑。然而，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件，甚至一些荒唐的原因都可能“引起”战争。马尔维纳斯群岛只不过是一片岩石之地，栖息着成群的企鹅和帝国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些英国人。可是，许多阿根廷人和英国人都认为值得为此兵戎相见。难道复兴党挑起战火是为了这些领土要求？这未免显得太浅薄、太荒唐了。他们的内心深处难道是要企求那几块领土和主权的象征吗？就从领土是战争的“起因”观点来说，如上所述，最大的领土要求（即对阿拉伯斯坦的要求）是蓄意让对方拒绝的。这显然是出自“意识形态”上的企图。如果复兴党如愿以偿，他将怎样处置“阿拉伯斯坦”，这是众人皆知的事。复兴党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在这个盛产石油的省份占为己有。至于霍尔木兹海峡上的三个岛屿问题，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认为那是它与伊朗双方的事，与其它国家无关。复兴党在1975年就公开放弃了这一要求。因此，复兴党在1980年提出这两项要求的决定肯定是在准备与伊朗打一场“总体战”的前提下做出的。这种种要求只不过是个幌子而已，目的是掩盖推翻霍梅尼政权、分裂伊朗的真实面目。复兴党绝不会在伊朗恢复王朝统治。长期以来，复兴党多方购置武器，穷兵黩武，准备打仗。伊拉克发动的这场战争是一场毁灭性的战争，旨在肢解伊

朗。从复兴党的立场看来，表面上似乎合理的领土要求掩盖不了这一真正的意图。要实现这一企图，最好提出领土要求，以便得到国人的支持。这二者缺一不可。可是，在他们和盘托出这一切之前，复兴党仍然不得不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掩饰——复兴党真够聪明，熟谙审慎的奥秘。因此，复兴党关于战争的种种谎言完全是为了博得人们的信任和同情。

最后，还有一个阿拉伯河的主权问题。1975年，复兴党被迫放弃了该河的主权。他们一直对此耿耿于怀，伺机报仇雪恨，所以才废弃了阿尔及尔协议。假如重新要求整个阿拉伯河流域的主权是撕毁阿尔及尔协议的真正动机的话，9月22日的侵略战争似乎大可不必。因为伊拉克早已于9月10日单方面采取行动，夺取了它要求的领土，伊朗现在已经没有伊拉克打算征服的“领土”了。其余的问题只是伊朗船只是否悬挂伊拉克国旗，是否支付几英里长的航道通行费之事了。然而这也没有必要挑起战火，因为在1975年之前和以后，双方早已在各自的河岸上安置了大炮进行轰炸，任何船只都不可能通行

卡迪西亚·萨达姆之战

复兴党对其发动战争所做的任何辩解都无法自圆其说。分开而论，无论哪一项要求都无关宏旨，不足以达到兵戎相见的地步；整体而论，这些要求将失其重点，沦为许多邻国之间司空见惯的分歧和争议。伊拉克将两伊战争命名为“卡迪西亚·萨达姆之战”，这恰好提供了战争起因的线索。

两伊战争爆发时，“卡迪西亚·萨达姆之战”在复兴党圈

子内造成了一种气氛。这种气氛与主权的积怨、经济优越的竞争、领土的贪婪,以及所谓伊朗的阴谋毫无关系。长期以来,复兴党政权对自己的成就沾沾自喜,几乎到了不可一世的地步,复兴党穷兵黩武,武装到了牙齿,要完成“历史”和复兴党泛阿拉伯主义所赋予的一切使命。一旦时机成熟,复兴党就要将其在国内采取的一切果断措施向外施展,以显示伊拉克复兴主义在地区事务和阿拉伯世界中不断显赫的优势。复兴党唯有政治上的动机,别无其它目的。这种动机来自它在意识形态方面坚定不移的信条。大量的证据表明,它为此已经奋斗了多年。当然,经济、物质和军事上的利益(胡齐斯坦省富饶的石油资源、领土以及出入海湾的便利条件)将会随着战争的胜利自然而然而来,这不是主要的动机。然而这一切只是以后考虑的问题,因为这些利益是复兴党势力扩张的必然产物。1980年,萨达姆·侯赛因集各种权力于一身,是两伊战争中公认的伊拉克方面的总设计师。这在专家们眼中再也明显不过了。一个有理智的人绝对不会否认萨达姆·侯赛因做出了打一场总体战的决策。然而,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常常被忽视。

萨达姆·侯赛因行使权力的方式与众不同。他已经成了法律和权力的象征,几乎不受任何监督机构的制约。萨达姆的专制独裁与一大批伊拉克人的感情以及一种复杂而又和谐的方式有关,这一点被战争后期复兴党最初的自信心消失之后的情况所证实。萨达姆的专制政权已经逐渐地(然而又是残酷无情地)改变了影响社会和国家组织的暴力的性质。最终,各种暴力工具(军队、警察、各种安全机构、情报网络、复兴党民兵以及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的功能发生了逆转,暴力手段变成了目的。他们使用暴力消灭反对派,行使残酷的权力,无所

顾忌地到处插手，暴力最终变成了恐怖的同义语。战争，战争，无论任何形式的战争，不管是向谁开战，都是暴力手段滋生蔓延的必然结果，尤其是当这种暴力工具如此建构，在暴力恐吓下的人民不得不与此妥协时，战争必然发生。从“进化”意义上说，萨达姆的性格与整个政治体制合为一体，必然产生一个像萨达姆这样的一个人来行使暴力。

萨达姆的专制权威使他在这场战争中的角色格外引人注目。由于伊拉克社会内部、伊朗方面、整个国际社会以及复兴党人方面没有向萨达姆施加真正的压力，这使我们这些谈论战争“原因”的人无法对此做出“客观的”评价，或者说使我们没有任何发言权。硬将这种事态合理化，必然会对这场不可避免的冲突中的一方或另一方有利。在我看来，这场战争的起因与萨达姆当时的想法有很大关系。虽然所有政治决策与政治家的大脑不无关系，但萨达姆发动战争的决策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因为这个决策毫无道理可言。这是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萨达姆战争决策的，也就是从伊拉克复兴党政权的所作所为入手，探讨复兴党政策的演变过程的。就两伊战争来说，本书旨在分析促使萨达姆做出无缘无故的战争决策的因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作为伊拉克唯一的一个具有真正自由权力的人，萨达姆竟然干出了如此荒唐的事情，而复兴党的思想体系和复兴党政权的本质中根本不存在“驱使”他做出这种而不是那种决策的历史决定论。

历史决定论如此荒谬的一个原因与责任问题有关。如果从政治角度谈论一个自由选择的行动的“原因”，就必然要涉及谁应对此行为担负责任的问题。从其它方面对“原因”的讨论可以留给专家们去做。两伊人民迟早会扪心自问：谁应担负

挑起战争的责任？谁应担负使这场互相残杀的战斗持续下去的责任？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萨达姆“挑起”了这场战争，因而他应担负这个责任；但另一个问题也不容忽视，虽然萨达姆操纵着伊拉克方面的作战，但他不能担负将这场战争继续下去的责任。无论是幸运还是不幸，任何分析家将无法“证实”萨达姆挑起这场战争的原因。虽然人们可以令人信服地证明，伊拉克境内什叶派没有形成一种真正的威胁，但是没有人能够同样令人信服地证明，萨达姆“认为”什叶派已经或者将会成为这样一种威胁，因而先发制人，发动战争来阻止或防止这种威胁的扩展。这种论点在70年代后期是发制人难以置信的。这里，我想和读者们一起探索萨达姆的心理历程。为什么萨达姆在1979年大清洗之后发动一场总体战？

不结盟国家会议预定于1982年夏季在巴格达举行。由于大量的财力和物力用于军费开支、社会管理、基础设施开发和石化公司的建设上，伊拉克一直无暇顾及巴格达的城市建设。读者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自70年代后期决定了会议召开地点以来，首都巴格达就开始了城市美化工作。巴格达一夜之间变成了庞大的城市建设工地：修整公路、建设公园、新建大楼、大规模改建地铁和城区设施。承包商和专家顾问从世界各地蜂拥而至。复兴党颁布特别法，取消了对具有象征意义的重点工程的禁令。为了炫耀气派和实力，复兴党正在着意打扮，并一反常态，模仿海湾国家的样子从事起以前不屑一顾的事情。这是萨达姆以胜利者自居的暗示；作为即将召开的阿拉伯反戴维营协议首脑会议的东道主，萨达姆要在焕然一新的巴格达从菲德尔·卡斯特罗手中接过第三世界领袖的桂冠（萨达姆暗地里以纳赛尔和铁托为效仿的样板），做海湾的老

板，将肢解的伊朗作为战利品来处置。

我们可以做出合理的推断，当萨达姆权衡利弊时，这一切肯定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看来，一贯“审慎”的萨达姆已经将自信心转变为狂妄自大了。只要多少成功地显示一下复兴党的实力，那必将极大地抬高萨达姆的个人威望和复兴主义运动的地位，甚至可以超过苏伊士运河事件后纳赛尔得到的地区性声誉和地位。当然，与萨达姆不同的是，纳赛尔的超凡魅力来自埃及国内的巨大成就和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衷心拥戴。在纳赛尔的崇拜者中就有年轻的萨达姆·侯赛因。在震惊世界的苏伊士运河事件的影响下，十多岁的萨达姆步入政界。1956年，当外国侵略埃及领土时，纳赛尔不畏强暴，虽然在军事上失利了，但赢得了政治上的胜利，从此他声名大振。然而他的亲密战友萨达姆在“创造”他自己的“苏伊士运河事件”以前就已经爬上了专制统治的顶峰。萨达姆不是在抵抗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和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而是主动挑起了侵略战争。通过侵略活动，萨达姆可以一举两得：既可以声名大振，又可以镇住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恶魔。假如这场赌博得胜，萨达姆就会得到纳赛尔1956年所得到的一切。不过，新的恐惧和不安又将来临，他迟早还会大动干戈的。

1956年和1980年的这一段时间将殖民扩张主义的历史时代与萨达姆开辟的新的历史现象（第三世界内部首次真正的“大战”）分开了。伊拉克政治中的萨达姆主义与伊朗政治中的霍梅尼主义同等重要。这是一种源于暴力、使用暴力工具和手段达到特定目的的现象。萨达姆主义不是简单的谋财害命（正如许多人误解的那样），绝对不是帕帕多克或伊迪·阿明式的暴行。萨达姆主义含有十足的政治目的。

要搞清萨达姆与“他的”国民之间的特殊关系，必须透过个人动机，进入那个允许萨达姆这样的人实践其狂妄梦想的一个广阔的社会环境。当两伊战争在 1981 年和 1982 年出现了对伊拉克不利的大转变时，为什么萨达姆和复兴党政权没有垮台呢？对伊拉克人来说，这场战争提出了一系列令人苦恼的问题。为什么大多数什叶派士兵不叛逃呢？为什么整个伊拉克人愿意打下去呢？一个政权发动战争本来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何况它已经使国民遭受了惨重的灾难，那么，为什么这个政权还如此稳固呢？即使复兴党明天倒台了，这些问题依然有存在的价值，因为战争造成的损失无法挽回，战死的人无法复生。

“战争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密切联系是现代国家的中心问题”，福阿德·阿哈米在论述 1976 年阿以战争失败时写道。战争往往是验证一个政治秩序合法性的试金石。持续 6 天的阿以战争表明“阿拉伯国家未能培养和造就出现代国民，未能使国民具有为国而战、为国而死的勇气和愿望”。假如这种国民在阿拉伯国家还没有造就出来的话，为什么两伊战争中会出现“战争与国民的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密切联系”呢？一批又一批的伊拉克人为一场毫无道理的战争而死，并乐于为此献身，这是为什么？

伊拉克国民已经丧失了自我，他们仅以专制的复兴党政权所赋予的形式而存在。这是国家化、政党发展以及上述标志的必然产物。用伊拉克国民人格的丧失来解释复兴党的军事成就未能影响国人对复兴党的忠心，是再好不过的原因了。战争初期，伊拉克公认对复兴党的忠顺不是建立在复兴党对战争目标的承诺和战争的得失上，而是建立在对它的言听计

从上。1975年以前，伊拉克人根本不相信两伊之间会有“领土”争议。复兴党政权在签订1975年阿尔及尔协议时态度上的逆转实在令伊拉克人吃惊。伊拉克人的震惊并不在阿拉伯河的主权问题上。在很大程度上，伊拉克人对复兴党政权突然转变态度、“站”在伊朗国王一边而感到意外。三个岛屿问题更使伊拉克人恼怒，因为这是多年来反伊朗运动的一个重要议题。复兴党1975年在实质性问题上的让步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这还是一件大丢面子的事情。对这种不光彩的事感到最难堪的不是别人，正是当事者本人——萨达姆·侯赛因。

1980年，形势突然起了变化，但也没有维持多久。当初高昂的战争热情换来的只是对偶像的崇拜。人们感到从未有过的愤懑和不平。正如1969年的公开审讯间谍一样，这些抱怨只不过是更强的社会预感的瞬间显现。这种社会预感源于人民与复兴党之间的微妙关系。现在，人民与萨达姆个人之间的新型关系更明朗化了。这种不满情绪随着伊拉克军队进入伊朗领土和伊拉克对这场战争的正式立场的转变逐渐消失。人们普遍认为，两伊战争是“萨达姆十字军”的一次远征。这一方面证实了萨达姆与公众之间牢固的联盟关系，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复兴党的目标与其当初的动机之间的悬殊和差距。

在伊拉克，恐惧是把整个国家凝结在一起的粘合剂。不受复兴党直接控制的各种组织均被铲除。人民被肢解和分裂，这就是国民任意受人摆布的原因。从前喜欢参政的人民不但在复兴党的压抑和征服下保持沉默，而且变得对政治漠不关心、甚至讨厌了。恐惧感是这种转变的主要因素。这种恐惧感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一个人不得不在邻居面前守口如瓶，在家

人面前也得谨言慎行。恐惧感已经变成了国民心理结构的一部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伊拉克式的奇特恐惧竟然成了这个国家的国民逞能好强、耀武扬威的资本。随着这种恐惧侵入人们的一切领域，作为潜能隐藏在社会集团的文化潜意识中的暴力就暴露无遗了。结果必然产生一个十分恐怖的政权。这种恐怖政权的最深刻的根源就在于人与人之间恐惧感的不断加剧。

复兴党统治下的伊拉克社会的这些特征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这种最终的堕落行径、最终的人类灾难——战争。伊拉克社会的紧密团结是因为这个社会陷入黑暗之中，人们无法找到光明的缘故。人们最原始的自卫本能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打了败仗，等待他们的将是复兴党残酷的镇压。复兴党仍然是胜利者，因为它可以从他们的死亡中得到满足，获得一种胜利感。从某种程度上讲，复兴党在国内实施的更加残酷的暴力将使黎巴嫩内战相形见绌。这就是为什么当战局急剧转变时，伊拉克军队仍然顽强抵抗的缘故。那种认为复兴党的泛阿拉伯主义造就了一个真正将军队和政府团结在一起的伊拉克民族主义的观点与伊拉克社会内部基督教派的发展、忠孝家庭的传统、种族仇视和宗教主义完全相抵触。复兴党一面灌输这些东西，同时又遏制这些东西，这样就可以造就理想的国民了。在我看来，面对这种新型的野蛮主义，那个在 1967 年因为丢掉武器、在西奈沙漠临阵脱逃面遭到非议的埃及农民士兵不失为美德的典范。

毒气战与人海战

当复兴党走出自己的圈子、涉足军事战略时，我们就可以从新的角度分析复兴党政权的特征及其真实面目。伊拉克最初的军事战略由萨达姆本人筹划，大事小事全由他一人操纵。有时候前方的指挥官也无法道出自身行动的奥秘。军事分析家们对伊拉克方面的军事部署感到迷惑不解。伊拉克在使用占绝对优势的空中实力方面过于保守和胆怯；在别无选择、只有使用步兵作战的情况下也不想投入步兵力量。一位军事分析家总结道：“伊朗在一开战没有被击溃的首要原因……在于伊拉克人愚不可及的战略战术，而不在于伊朗士兵的勇猛反击。”

对这个结论笔者不敢百分之百的恭维，但所有分析伊拉克军事行动的专家们对伊拉克的战略战术迷惑不解。伊拉克最初的三叉式进攻方案是：向胡齐斯坦大规模的推进；在迈哈兰附近实施封锁移动；占据北部的席林堡，以防伊朗军队包围巴格达。这不失为军事上的上策。可是伊拉克在冲入胡齐斯坦后战略上出了差错。伊拉克未能采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传统战术，大规模挺进胡齐斯坦，将伊朗军队赶出去。他们既不想夺取城市，又不想放弃城区。相反，伊拉克采用包围城市的办法，以为用大炮轰击，加上空中袭击就可以迫使伊朗军队投降。伊拉克在战术上也出了差错。流动性重型装甲部队（伊拉克在这方面有优势）没有被用来猛攻对方的防御阵地，也没有被用来摧毁顽强抵御的障碍物如城市等。相当尖端的坦克仅仅当作大炮使用，有时还将坦克埋入沙中伪装起来，用于防

卫。复兴党有意这样低效率地使用它在装甲武器方面的优势，大概是为了避免步兵直接相遇。

人们都认为，伊拉克在夺取城市中奇怪地部署装甲部队这个战略是出于避免伤亡过重的考虑。伊拉克毕竟只有伊朗三分之一的人口。虽然伊拉克首战得胜，成功地占据了霍拉姆沙赫尔，但伊拉克的“伤亡率……似乎迫使伊拉克的最高统帅决定采取围攻阿巴丹，而不直接挺进”的战略。然而阿巴丹并没有被攻克。一年之后，伊朗人将它作为跳板进行了一系列反击，迫使伊拉克节节败退。结果，7到14天的“闪击战”最终变成了没完没了的对峙战。下面是《纽约时报》的描述：

悲壮的献身精神使伊朗前线显得一片混乱。戴头巾的毛拉（伊斯兰教徒中对高僧、先生的敬称）背着枪，骑着摩托车到处跑动，向部队鼓劲打气。到处都有宗教宣传标语。增援部队雄赳赳地开赴前线。他们有时抬着棺材，以示“殉教”的决心。前沿阵地后边毫无军事行动的迹象。

伊拉克方面与此形成了鲜明对照。前沿阵地后边，战区绵延十几英里，布置了许多防御工事——沿途埋伏着许多坦克和大炮，大量构筑第一次世界大战式的地堡和战壕，倒垃圾的卡车也被用来开凿网络型防御设施。

把萨达姆的所作所为视为避免伤亡过重，未免太天真了。一个受国人拥戴的政权使用了一切可以想象的战术——狂轰滥炸、重炮轰击、毒气、大规模的土木工事和人工湖泊、绵延数英里的撤退工事等等，为什么偏要避免步兵直接相遇呢？

如果透过军事战略战术现象，从政治角度分析，就不难找

到问题的奥秘所在。假如凝结伊拉克政体和军人的纽带不是爱国主义,也不是作为指导思想的复兴主义,而是恐惧的话,那么,只要这种纽带稍微有点松动,整个社会将不堪一击。战争创造了产生恐惧感的特殊条件。对复兴党来说,士兵的恐惧对这种纽带的威胁更大。如果伊拉克士兵对面前敌人的恐惧超过对身后复兴党的恐惧,他们将会干出任何有理智的人处在同样境遇下都会干的事情来——落伍和逃跑。落荒而逃是两伊战争中伊拉克每次撤退时司空见惯的事。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伊拉克战俘至少是伊朗战俘的3倍,虽然双方的战术大相径庭:伊拉克采用枪炮战,伊朗使用人海战。

恐惧使伊拉克战地指挥官十分呆板和胆怯。这是人们广为谈论的两伊战争的另一特征。正如德国在世界大战中所证实的那样,官僚政体下或国家控制下的社会生活本身与战场上的军事活动关系不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战争中英国的军事指挥倒十分呆板)。萨达姆深知联结其政体的纽带是什么,虽然他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做出了极其错误的判断。

要想深入了解复兴党挑起战争后有何打算这个问题,必须从政治角度、而不是军事角度来加以分析。显而易见,伊拉克既缺少一套怎样打好这场战争的军事思想,又缺乏一套具体的战略战术方案。分析家们一致认为,假如最初的设想被证明是行不通的,那么将没有其它战略上的选择余地。萨达姆当初的如意算盘必定是,一旦伊拉克军队攻入伊朗境内,就足以推翻霍梅尼政权,或者至少可以迫使伊朗方面接受自己的条件,屈辱地与他坐下来谈判。然而伊朗人并没有被打垮。这样,萨达姆的“全盘计划”就被彻底打乱了。

伊拉克在军事思想上的思考模式不仅仅局限在地面作战

上。伊拉克在开战前的第一天就暗示道，石油区应排除在轰炸范围外。不久，伊朗炮舰摧毁了位于伊拉克法奥海港的、由计算机控制的石油输出终端。接着，伊朗空军袭击了基尔库克和摩苏尔附近的油田。这样，伊拉克全部的石油出口暂停了。到1987年，伊拉克的石油产量仍未达到战前水平。在整个战争期间，伊拉克在海湾的石油出口口岸一直处于瘫痪状态。随着伊拉克石油产量的暴跌，伊朗的石油产量（战争初期跌落到最低点）却在上升。虽然伊拉克也毁坏了伊朗的一些炼油厂和其它经济设施，但由于战略上的失误，复兴党无法弥补开战第三天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复兴党似乎没有预见到战争会影响到整个经济，它还以为伊朗方面会接受它的暗示，然而后者并不准备讨好复兴党。

两伊战争中最令人感到莫名其妙的军事决策也许来自伊拉克的空军部署。9月22日之前，伊拉克空军的大半分布在阿拉伯半岛国家（南也门除外）的机场上。显然，伊拉克这样部署是企图智胜对方，因为伊朗的空军力量仍然十分强大。复兴党一方面想实施闪击战术；另一方面，复兴党满有把握地认为这样至少可以有备无患，不致重演阿拉伯人在1967年阿以战争中的悲剧。分析家们对伊拉克空军力量的使用迷惑不解。为了弄清伊拉克的真正意图他们费了很多心思。一些分析家甚至认为，伊拉克控制空中只是一种威慑作用，企图恐吓伊朗的大兵团反击。地面作战缺少空中配合，这是二战以来的一种普遍现象，两伊战争中的情形也不例外。恐惧是导致这种局面的主要因素，因为双方都过高地估计了对方的空中实力。有一个比较简单的解释可能更妙——伊拉克的空军防御部队经常打错飞机。《卫报》对此作了描述：

在沙漠中部……伊拉克方面向我们展示了一大堆伊拉克情报部门收集的战斗机的残骸碎片。导游如数家珍，趾高气扬地描绘说，这些都是伊朗“鬼怪”式战斗机的残骸。但一位波兰记者发现，一块碎片上带有用俄文写的“太平门”字样，并且十分客气地让大家辨认，我们马上看到了这一切。原来这是一架伊拉克的“米格”战斗机。伊拉克人一下子变得窘迫不堪，耀武扬威的架式消失殆尽。脸色窘得发紫的官员将我们强行推上了公共汽车。

事实真相是，一架大型苏式运输机在巴格达机场上空准备着陆时被自己人击落。

伊拉克空中力量主要用于攻击民用和经济设施。这是两伊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相似之处。在巴斯拉地区，1982年和1984年3月至4月，伊朗方面的人海战术使这种相似之处更为明显。两次战争的相似性贯穿于整个战争之中，包括伊拉克首先攻入伊朗领土、后期伊拉克有组织的防御在内。军事战术和装备决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特点（大炮和固定机关枪足以打垮步兵，但装甲部队和火力缺乏流动性），而在两伊战争中，作战部队的打法根本不适合本身的装备，完全不是自身的特长。

问题是多方面的。士兵和下级军官没有熟练运用明显占优势的尖端装备是战争的失误之一。然而，缺乏熟练性并不能完全解释这种失误，因为这不能反映最高统帅的所作所为和战略上的决策。不能将失误仅归咎于士兵和下级军官的无知和无能，因为他们完全被蒙在鼓里。在两伊战争最初6年中，

双方都未能完全了解对方的优势和弱点,更不用说学习和吸取对方的优点了。起初,这是伊拉克军事思想的主要特点,后来,它完全变成了伊朗军事“部署”上的特点。实际上,这是两伊战争最初6年中唯一的特征了。两伊双方都缺乏系统的军事战略,导致了一场精疲力竭的消耗战,造成人员大量伤亡。两伊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相似之处也表现在这一点上。

判断失误和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是一切战争中司空见惯的现象,全然失误和可悲的愚蠢更为常见,然而对自己的军队也一无所知的情况却不常见。两伊双方相当无能,有时甚至不愿意对对方的实情加以分析和判断,制定出击败对方、夺取战争最后胜利的战略方案(伊朗方面尤其如此)。这种天生的心理障碍十分罕见。

萨达姆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周(即招募预备军之前)才开始认识到这是一场与他当初的想象完全不同的战争。当时,萨达姆没有缩小战争的范围,而加大赌注,决定将战火扩大到平民区。当伊拉克意识到不可能一举击败伊朗后,除了继续对城镇进行狂轰滥炸外,开始向迪兹富勒发射地对地导弹。

导弹摧毁了三个城镇,包括成百上千座房屋和商店,除了一堆堆的石头和铁块外,什么也没有留下来。

导弹之后……重炮狂轰滥炸。重炮每天晚上轰击城镇,但没有轰击空军基地。

对迪兹富勒的轰炸是在领导阶层陷入失意、而非失败或挫折的情况下进行的。伊拉克部队当时仍在突进,尽管速度很

慢,漫无目标。一些评论家认为,伊拉克在战争后期使用芥子毒气和神经毒气是在绝望的情况下作垂死挣扎。这是天大的误解。从萨达姆的内心来讲,毒气战满足了他的战争欣快症。从军事上讲,对城镇的狂轰滥炸和对迪兹富勒的轰击明显地起了反作用,因为它加速了伊朗大规模的征兵运动。霍梅尼战前曾扬言要征集两千万军队,但这只是掩人耳目。现在,这个预言可以付诸实践了。

从事一场毁灭性的战争需要两种疯狂:挑起战争的疯狂和把战争持续下去的疯狂。我主要关心的是前者,一方失去理智的战争与双方都变得疯狂的战争结果大不一样。这种差别表现在伤亡人数、战斗结果、战争的性质以及人民在道义上的态度和立场等方面。它也极大地影响人们对那些制造屠杀以及使屠杀继续下去的人的动机和判断力。假如单方面从事这种疯狂活动,就容易出现士气低落、情绪不安甚至反抗的局面。一旦双方都热衷于这种疯狂的屠杀,并没有明确的目的,那么双方的信心、士气和义务感将会增强。起初,出于对外国人的憎恨和反伊朗民族沙文主义,伊拉克部队的士气十分高涨。后来,由于战略目标的失误和伊朗人的顽强抵抗,士气一落千丈。然而,当伊朗的人海战术失去了它当初惊人的新奇感,显示出本质上的思想性后,部队的士气又一下子恢复了。那些一再强调这是伊拉克民族主义力量的恢复的分析家们根本不懂这场战争疯狂性的本质。

据多方面报道,当伊朗人保卫家园、保卫城镇、摆脱了教权领导、孤军奋战时,他们总能以少胜多。在霍拉姆沙赫尔和阿巴丹保卫战中,顽强的自卫是动摇伊拉克军队最有效的途径。防御性和游击战是这种作战方式的特点。阻击手可以利

用分散的凹地不断抵抗,打退装甲部队和步兵的突进。防御战的性质决定参战者必须保护自己的生命,自卫的战术随之出现。但是一旦教权领导参与战斗,军事观念就随之发生了转变。战争成了验证一个穆斯林教徒品质的手段,胜败问题也就有了全新的意义。

在博茨坦战斗中,伊朗采用人海战击退了伊拉克部队,大批伊拉克士兵当了战俘。小道消息透露,当伊朗密集的人海向伊拉克部队疯狂涌来时,伊拉克官兵停止了机关枪扫射。无论这种消息的可靠性如何,必须承认,在一大批甘愿牺牲的人面前,任何牢不可破的阵地也会被攻克。伊朗于1982年夏天在巴斯拉地区采用了这种人海“战术”,其中两次就送掉了成千上万个成年男人和男孩的性命。他们最终没能夺回城市,没能切断通向巴格达的道路。不过,伊朗人不甘心失败。来日方长,凭着可观的石油收入、最初的几次胜利对士兵的鼓舞以及对伊拉克稳固阵地几次进攻的经验,他们决定继续采用人海战术。1984年2月和3月,伊朗投入了大约50万大军,进行所谓的“最后防卫”。在最初的几次战斗中,复兴党使用了当地制造的芥子毒气和神经毒气对付伊朗的大兵团集结。伊朗队伍中有十几岁的热血青年,他们是新近招收的新兵,未受过任何军事训练。一些记者用现代新闻报道中罕见的语言描述了尸体遍野的情景。经验丰富的记者在报道中,使用了诸如“尸体地毯”和“人间地狱”之类的语言描绘古尔纳附近的战斗。在参战的毛拉的劝诫和鼓动下,伊朗的部队、革命卫队和十几岁的“志愿军”绝望地冲向伊拉克的防御阵地。《星期天时报》的记者写道:

伊拉克的机关枪用强火力不断地扫射蜂拥而至的人群，伊朗人如同镰刀下的麦杆纷纷倒地……最后，伊拉克的装甲部队穿过自己的雷区，长驱直入，从侧翼包抄，击溃了伊朗人……

“我们打死伊朗人就像踩死蚂蚁一般”，一位伊拉克士兵不无自豪地说道。这个士兵蹲在前线的战壕里，身边躺着三个尘土满面、血肉模糊的伊朗人尸体。两天后这些尸体仍然搁置野外。

在炎热的阳光下，伊拉克人的尸体也没有掩埋。死者的四肢大多因死亡时的痛苦而扭曲变形了……这种对死亡的冷漠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一场激战爆发在巴斯拉北部的一片沼泽地里。成百上千具伊朗人和尸体漂浮在发黑的泥水上。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多的尸体。当我从1数到500具尸体时再也数不下去了。

西方记者赶到时，这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已经平息好几天了。一位前线的伊朗医生陪同中毒气的伤员前往欧洲治疗。耳闻目睹的惨状深深地触动了这位医生的心灵。他讲述了自己的见闻：尸体遍野；战俘被当靶子射死；伤员被弃之野外，变成了沙漠上胡狼和兀鹫啄食的一堆堆臭肉；同情心和怜悯心已丧失殆尽。“我亲眼看见年轻的士兵被活活烧死，”他说道，“我亲眼看到伊朗和伊拉克青年互相撕打，尖锐的指甲和锋利的牙齿都成了对付对方的武器。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其场面惨不忍睹。”

并非结尾的结尾

人们在强调复兴党政权和德黑兰的教权统治“神经失常”、毫无理智时，还必须承认它们具有某种共同的情感。这种情感并不是指智慧、军事经验、深刻的理论悟性和同情心，而是指简单、平庸的常识。常识的机能不是指人用大脑进行抽象推理、考虑后果的内在特质，而是指人对世界进行一系列判断和感知的能力。人类共同拥有这个世界，并以此为基础对现实加以判断。当然，复兴党政权和德黑兰的教权统治是一种涉及人类行为和事务的政治情感。

萨达姆和霍梅尼在处理他们各自创造的世界时，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常识。他们对付自己的国民时表现出来的精明和狡诈令学者和权威们吃惊。一些问题随之而来：为什么复兴党政权没有倒台？当战局很早就出现突变时，为什么伊拉克什叶派士兵没有投奔敌方？在伤亡如此惨重的情况下，为什么霍梅尼还能成功地发起大规模的征兵运动？

他们俩一样，在各自创造的世界里树立了绝对的权威。不论是在复兴党统治下的伊拉克，还是在教权统治下的伊朗，人民已失去了简单的常识，成了役使的工具。当然，出现这种情况并不能说明萨达姆和霍梅尼失去了理智，也不能证明两国人民都失去了理智。这种情况正是他们俩假想的目标导致的必然结果。他们将自己封闭在虚幻世界里，与现实隔绝，反而成了人民顶礼膜拜的对象。

不论复兴党是否在朝，这种虚幻的目标始终存在于复兴主义之中，但一般比较隐晦。一旦复兴党上台，通过整顿社会、

建立了绝对权威之后,这种虚幻目标的核心就变为萨达姆·侯赛因的专制统治了。

对复兴党来说,国家权力也有它的局限,因为国家权力要受其权限的制约。这种权限的真正含义并不在于它划定了复兴党的民族主义范畴,而在于它模糊了“现实”与“虚幻”世界的界限,使复兴党能够将现实世界也纳入它的虚幻之中。复兴党清除了伊拉克国内的一切反对派,建立了一个恐怖政权。复兴主义的无限扩张反而违背了运动的初衷,以致于它看不到未来的目标。复兴党成功地使它与世界隔绝了,这是它长久以来保护其霸权地位不受威胁的策略。但是,现在它的偏狭性和与世界隔绝的策略则变成它的对立面了,复兴主义当初根除的一切阴谋都变成了梦想。当初的虚幻纯粹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而已。围绕这个阿基米德支点,复兴党建构了一个真正的宇宙。这个宇宙将不再扩展,除非复兴党能找到并站在这个根本不存在的支点上。萨达姆·侯赛因扮演了唐·吉珂德的角色,充满着幻想,决心冲向并不存在的目标。然而不幸的是,萨达姆身上缺少那位可爱的游侠所具有的一切讨人喜欢的品德。

在萨达姆看来,伊拉克以外的世界是以伪装的面目出现的。萨达姆认为,伊朗伊斯兰革命腐朽透顶,伊朗人民正等待他发出起义的号令。他不需要伊朗国王的前将领们和巴赫蒂亚尔告诉他这个信息,因为他从“历史”中早已明白了这一切,其次,他将两伊战争命名为“卡迪西亚·萨达姆之战”也恰如其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正如伊拉克群众在1969年1月庆祝他们粉碎了犹太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阴谋一样,在萨达姆看来,伊朗伊斯兰革命(千百万人为此游行、战斗和牺牲,人们将一切希望和抱负寄托在了霍梅尼身上)从一开始就是堕落的。

萨达姆给自己创造了一个虚幻的世界。他想当然地认为，胡齐斯坦阿拉伯人会热烈欢迎他的解放部队，并揭竿而起，甚至可能脱离伊朗，投入阿拉伯世界的怀抱，就像他们的祖先在卡迪西亚平原上背叛强大的萨桑帝国一样。然而事与愿违，胡齐斯坦阿拉伯人并没有这样做。相反，他们在阿拉伯人口占优势的阿瓦士和胡齐斯坦两省对伊拉克入侵部队进行了顽强的反击。萨达姆认为，这不能归咎于他的判断失误，而是这些阿拉伯人的不忠所致。肢解和控制伊朗的乌托邦式的白日梦与肃清所谓的反复兴主义阴谋是一致的，都可能是他发动战争的借口。即使萨达姆挑起战火的借口是什叶派在伊拉克形成了真正威胁，我所论述的关于这场战争的其它论点均可成立。

萨达姆成了狂人。他的疯狂性表现在每一个事件、战场上的每一个变化、每个人的性命以及为了模糊、遥远和虚幻的目标而付出的无数的生命代价之中。这里存在两种正常人无法理解的矛盾的世界观。当萨达姆·侯赛因向世人宣布，在自愿让位之前，假如他有能力，他将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时，他说的是心里话。对于萨达姆这种人，要区分他的真正意图与花言巧语是困难的。总之，这种人倾向于相信自己的言词，这的确是荒诞的，是正常人无法理解的。重要的是，世人不可被这种自欺欺人的假象所迷惑，忽略这种假设的疯狂性。

总之，用正常人的观点以及我们判断是非的标准探索萨达姆式的人的所作所为是很困难的。用一般的常识去理解复兴主义和霍梅尼主义的内在世界是徒劳的。譬如，阿拉伯人和西方人都普遍认为，复兴党诉诸于毒气战只是出于绝望。事实并非如此，当时伊拉克的军事形势并没有到不可收拾的绝望程度。伊拉克早些时候没有使用毒气，是因为它在当时没有足

够的毒气。复兴党使用毒气除了大批杀伤对方外,另有企图。使用毒气可以涣散伊朗人狂热的殉教精神。手持武器,在枪林弹雨中死去,或倒毙在平原上,奄奄一息时喊出真主的名字是一回事;在医院的病床上躺上数周,眼巴巴地看着内脏腐烂是另一回事。

使用杀伤力很强的化学武器涉及一个重要的道德问题:假如任何一方拥有核武器的话,是否也会付诸使用?如果伊拉克拥有原子弹,复兴党早就扔到伊朗境内了。对此很少有人会提出异议。拥有杀伤力很强的武器的意义(以区别于在有目标和与军事战略有关的情况下进行作战的普通武器)在于防御,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付诸使用。那么,任何政府如果用武器不择手段地大量屠杀非作战人员就是犯罪。协助或默许一个由暴力机构组成的政府使用这种尖端杀人武器就是暴行的同谋。法国历届政府自1975年以来一直给伊拉克提供这种武器。

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有必要探索萨达姆·侯赛因在这场战争中的所作所为的合理性,同样,也有必要对霍梅尼利用战争、保卫他的革命果实的教权战略加以分析。这种探索和分析能否说明两伊战争的本质?探索和分析是否意味着不愿接受战争的现实?潜入到萨达姆和霍梅尼的内心世界被他们的思想迷惑是否意味着限制和败坏了我们作为人的完整性?那些支持战争中的一方或另一方的人们,无论出自何种理由和目的,也不管在战争的哪个阶段支持了哪方,都要陷入这种道德的困境中。其实,不管他们是在这两个国家之内还是之外,是参战者还是观战者,无论他们是谁或是干什么的,这一切都无关紧要,因为问题的实质是,政治与两伊战争惊人的疯狂性

毫不相干。

政治属于公众言论和人类交往的领域。令人不解的是，虽然政治原因可以导致战争，但是，一旦战争爆发，政治本身就不存在了。两伊战争爆发后，两伊之间的政治随之消失。在伊拉克国内，政治消失得更早一些，这与战争的起因有关。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克劳赛维茨写道，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然而两伊战争决不是政治的继续，而是将肆无忌惮的野蛮暴行扩展到了未知的新领域。这就是两伊战争的实质所在。这个实质来源于两种世界观之间根深蒂固的仇视，这种仇视还波及到人类政治领域以外的领域之中。

用人海战和毒气战概括两伊战争的特征再好不过了。两种战术都不是围绕政治目的展开的。以死为其特征的两种战术本身是非政治性的，无论是毫无目标地对非作战人员实施大屠杀，还是将自己的士兵置于死地，都与政治无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毒气战和壕沟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展示人类愚蠢性的永久的纪念碑。地球上人类尸体堆得最厚的地方恐怕莫过于大屠杀之后的凡尔登战场了。两伊战争完全可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类比，但类比的理由并非十分恰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毒气战和壕沟战是战术上的创造发明，有远距离重炮和机关枪配合，这些构成了那次大战特殊的杀人模式。相比而言，两伊战争中的毒气战和人海战是出自恐惧感。伊朗的人海战是对死亡的庆典，但绝对不是基于现世的目的，而是关于来世的观念。因此，毒气战和人海战是两伊战争的基本特征，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特征貌合神离。

在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小说《寓言》中，威廉·福克纳描写了这样一种情景：法国军队的一位师长指挥一场攻坚战，

只有师长本人和他的上司事先知道，这场战斗难逃失败的厄运。一个团决定在进攻时举行兵变，结果全团官兵拒绝冲出战壕。仿佛预先发了信号似的，先是整个师、然后是法国前线的全体士兵都效法这个团的样子，不愿出击。这个寓言还在于下面这个事实：德国并没有抓住战机，进行反攻；没人知道其中的奥妙，但整个德国前线一下子变得死一般寂静。困惑的军官向双方前沿阵地的空旷区装门面似地发射掩护炮弹。一位大队长解释道：“我们有时听任自己的士兵干出令我们失望的事情。他们可以阻止战争，正如他们从前已经干过、并且将来还要干的那样。我们的任务只是看护他们，不让他们知道实际上是他们干了这一切。”两伊战争的可怕之处在于，诸如此类的情景绝对不可能发生。在福克纳看来，这不是一个可能性的问题（福克纳寓言的文学魅力来自其绝对的不可能性），而是一个绝对不可思议的问题。

为了某些无生命的东西（领土、石油资源、航海权、战略优势）而战时，至少从抽象意义上和总体上讲，当事者能够保持理智的判断。因为无生命的东西处于危急之中，双方战士权衡利弊后，将他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要比为了物质利益、复国主义或其它东西而把他们置于势不两立的厄运中更好。再者，战争可以改变两国之间的“实力关系”。这种实力关系是两国之所以参战的可以预测的政治原因。这并不是说可以预知战争的结果，或决策有没有失误；而是说，战争决策和战略战术都源于一系列的政治判断；而政治判断需要付诸实践，或接受检验，因而原则上士兵可以了解这一切，而士兵的行动可以从这些判断中准确地检验出来。因此，这种战争才是“政治在另一种形式下的继续”。这样，送死的士兵还可以认识到将他们置

于死地的人总是十分精明、不露声色的。

从反面来讲，假如双方都错误地估计了对方的形势，并采取了错误的对策，那么找到双方共同性的希望就更加渺茫了。表面看来，两伊战争无论从起因上，还是从动机上都酷似斗殴的两个人紧抱一起，互相撕打，各不相让，不决个雌雄决不罢休。这种简单的类比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因为萨达姆和霍梅尼的权威来源不同。一个来自恐惧，而另一个来自宗教信仰。恐惧和信仰是人类最基本、最原始的本能。在某些情形下，这两种本能能够驱使人们甘愿付出无谓的牺牲。这两种本能也赋予了萨达姆和霍梅尼无比强大的力量，而两伊战争正好为他们释放这种强大的力量提供了机会。两伊战争与黎巴嫩内战有相似之处，而与几次阿以战争则没有共同点。总之，两伊战争的最终意义在于下面一个简单的真理——战争的爆发已经使人类残留不多的一点人性荡然无存了。

大 事 记

委任统治时期(1918—1932)

1918年10月3日

奥斯曼帝国对阿拉伯人的统治结束。希贾兹的统治者谢里夫·侯赛因的儿子费萨尔率领他的贝督因军队进驻大马士革。

1920年6月2日

遍及整个伊拉克的反英民族大起义爆发。

1920年7月24日

法国军队驱逐费萨尔,占领大马士革。法国对叙利亚的委任统治开始。

1921年8月27日

在英国人的一手操纵下,费萨尔被“选举”为伊拉克国王。该政权的许多要员都是1916—1918年阿拉伯起义的参加者。叙利亚的泛阿拉伯主义思想家萨迪亚·胡斯里得到费萨尔的重用,并逐渐成为教育部门的负责人。

1922年10月10日

英伊条约签订。根据该条约,伊拉克的内政和外交由英国人掌管。

1930年11月6日

伊拉克议会通过新的英伊条约。根据该条约,英国人决定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条件下结束对伊拉克的委任统治。

君主制时期(1932—1958)

1932年10月3日

伊拉克宣布独立,加入国际联盟。

1932年12月13日

伊拉克共产党起草了第一份共产主义宣言。

1933年8月

亚述人事件。贝克尔·西德基将军不顾费萨尔王的反对,在政府的怂恿下率领部队对亚述人实施集体屠杀,西德基因此成为“民族英雄”。

1933年9月8日

国王费萨尔去世,其子加齐继位,他坚决支持军队对亚述人的屠杀。

1936年10月29日

贝克尔·西德基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政府,这是阿拉伯世界的第一次军事政变。他许诺进行广泛的社会改革。左翼的民众派组织进入政府。

1937年4月28日

萨达姆·侯赛因出生在沙漠小镇塔克里特。

1937年8月11日

西德基遇刺身亡。从这时到1941年,相继发生了6次军

事政变。

1941年4月1日

“金方阵”政变成功，以拉希德·阿里·盖拉尼为首的国防政府成立，并立即得到轴心国的支持，亲英的伊拉克政治家逃亡。

1941年5月

英伊军队5月2日在巴士拉发生冲突，5月19日伊拉克军队溃败，拉希德·阿里及其他军政要员于5月29日逃到德黑兰。摄政王以及亲英的政治家重新掌握伊拉克政权。

1941年6月1日

数百名伊拉克犹太人因与伊拉克军队的一些低级军官发生冲突而遭到杀害。

1943年7月24日

一个不足10人的团体在大马士革自称开始阿拉伯复兴运动，并提出了第一个纲领性声明。

1947年4月

拥有几百名党员的复兴党在大马士革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告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成立。叙利亚教师广泛宣传复兴党的思想。1951年复兴党着手建立组织。

1948年1月20日至27日

伊拉克城镇居民示威游行，强烈反对伊拉克政府与英国签订的朴茨茅斯条约。伊拉克共产党是这次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

1949年2月14日至15日

伊拉克共产党的三位领袖在巴格达被公开处以绞刑。

1956年

纳赛尔因对苏伊士运河实施国有化而招致英法等国侵略埃及。不久，年轻的萨达姆·侯赛因加入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伊拉克支部。

军人统治时期(1958—1968)

1958年7月14日

200余人的“自由军官”秘密组织在人民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了费萨尔王朝。巴格达枪战数小时之后，群众涌上街头欢庆革命的胜利。新政府废除了旧议会，清洗整顿了军队，成立了以法迪勒·阿巴斯·马赫达维上校为首的人民法院，对旧政权的要员进行审判。旅长阿卜杜勒·卡里姆·卡赛姆出任政府总理兼军队总司令。

1958年7月24日

复兴党的创建人米歇尔·阿弗拉克来到巴格达，呼吁伊拉克与新近成立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合并。伊拉克共产党极力反对卡赛姆独揽大权。

1958年9月30日

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泛阿拉伯主义的自由军官组织成员、1958年军事政变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被罢免副总理和内务部长职务，并于11月4日被捕。

1959年3月

对卡赛姆不满的泛阿拉伯主义自由军官组织在摩苏尔起义，并得到伊拉克共产党的支持。起义被镇压，数百名涉

嫌的民族主义者被处死，尸体遭到凌辱。接着，卡赛姆清洗了政府中许多民族主义者和复兴党员。

1959年5月1日

约50万人在巴格达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共产党参与政府事务。

1959年7月

在基尔库克发生了库尔德共产党人屠杀土库曼人事件。卡赛姆乘机大规模逮捕伊拉克共产党员，直至8月末。

1959年10月7日

复兴党人刺杀卡赛姆未遂。行刺者之一、时年22岁的萨达姆·侯赛因男扮女装逃到叙利亚，随后又到埃及。78名复兴党人因此事受到牵连，被送上马赫达维人民法庭。他们在法庭上的反抗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0年1月1日

卡赛姆宣布允许除伊拉克共产党之外的所有政治团体存在。他在执政期间一直推行反伊拉克共产党的政策。

1961年3月

复兴党成功地领导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反对卡赛姆政权的示威游行。

1961年9月

伊拉克军队第一次在山区地带镇压库尔德人。双方的冲突到1962年春天转化成一场国内战争。库尔德人的游击战从此开始，卡赛姆无能为力。

1962年12月24日

复兴党成功地组织了一次包括大、中学生在内的全国范围内的罢工罢课活动，该活动持续到卡赛姆政权垮台为止。

止。

1963年2月8日

经过几天的战斗，卡赛姆政权被推翻，第一个复兴党政权宣告成立，该政权仅维持了9个多月。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出任总统。

1963年11月18日

复兴党内激进派与温和派的唇枪舌剑之后，阿里夫推翻了复兴党政权，得到了复兴党温和派的支持。他任命前自由军官组织成员、资深的复兴党人侯赛因·贝克尔为副总统。

1964年2月

米歇尔·阿弗拉克提拔萨达姆·侯赛因为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伊克地区领导机构总书记。

1964年7月14日

国有化法律颁布，这是走向社会主义和与埃及合并的第一步。

1963年4月18日至8月6日

阿布杜·拉赫曼·巴扎兹总理宣布，暂时停止对库尔德人的战争，并对军队的特权作了某些限制。

1967年6月

6天战争给阿拉伯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军事灾难，几乎所有的阿拉伯国家政权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阿拉伯各国人民的谴责。

1967年9月17日

伊拉克共产党分裂成两个组织：阿齐兹·哈吉领导的中央指挥部和亲苏的中央委员会。

1968年7月17日

复兴党和非复兴党军官发动政变，一举推翻了阿里夫政权。

第二个复兴党政权(1968—)

1968年7月30日

复兴党将其同盟党派清洗出去。最高权力机构革命指挥委员会的领导权掌握在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手中。这位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总书记不但是伊拉克的总统而且还担任伊拉克军队总司令。早已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助理总书记的萨达姆·侯赛因担任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主管内部安全部门。

1969年2月

伊拉克共产党中央指挥部领袖阿齐兹·哈吉被捕并公开向复兴党当局承认错误，从而导致伊共中央指挥部政治局全体成员被捕。

1969年8月8日

伊拉克军队在摩苏尔的库尔德人村庄达坎肆意迫害库尔德人，镇压库尔德人的战争不断升级。

1969年10月

前任总理阿布杜·拉赫曼·巴扎兹被捕，被判刑15年，其罪状是他充当了犹太复国主义的代理人。

1969年12月14日

伊拉克电视台详尽而生动地报道了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

间谍集团煽动散居在巴士拉的犹太人的情况。

1970年1月5日

新政权公审了第一批“间谍”，17个被告当中有13个是伊拉克犹太人。不久，他们在解放广场被处以极刑。数万名群众目睹了这一惨景。

1970年1月21日

新政权宣布又挫败了一个新的间谍集团。一周之后，44人被处以极刑。

1970年3月11日

复兴党与库尔德人签订了库尔德自治协议。从理论上讲，库尔德人作为一个民族似乎拥有了比以前更多的权利。对付库尔德人的战争停止，复兴党为巩固政权赢得了时间。

1970年7月10日

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宣布共产党加入全国进步阵线的条件，伊拉克共产党对此没有明确表态。

1971年8月

复兴党党员、曾经参与1963年政变的阿布杜·卡里姆·纳斯拉特在家里遇刺。

1971年10月15日

复兴党党员、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哈丹·塔克里蒂在科威特遭到枪杀。

1971年9月

伊拉克国家安全局企图暗杀库尔德人的领袖巴拉扎尼，未遂。

1971年11月

复兴党的早期领袖福阿德·里克卡比在狱中被杀。

1972年4月

伊苏友好条约签订。

1972年5月

共产党第一次进入政府任职。

1972年6月

伊拉克石油公司国有化。

1973年7月8日

伊拉克国家内部安全局局长纳迪姆·卡扎尔被处以极刑，被处死的还有35名“企图发动政变者”。

1973年7月

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与伊拉克共产党签订了全国行动宪章。伊拉克共产党接受复兴党于1970年提出的全部条件。

1974年1月

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第八次地区代表大会在巴格达召开，大会总结了取得政权以来的经验和问题。

1974年3月

1970年签订的库尔德自治协议无效，伊拉克国内对付库尔德人的战争再度爆发。库尔德人的城镇扎克荷和卡拉特一迪扎被夷为平地，成千上万的库尔德人逃离家乡。这次镇压的残酷程度前所未有。

1974年12月

5名什叶派“乌莱玛”被莫名其妙地处死。

1975年3月6日

复兴党与伊朗巴列维政权签订阿尔及尔协议，伊拉克放

弃对伊朗的领土要求,以此换取了巴列维王朝停止对伊拉克的库尔德人的支持。库尔德阵线的供给线被切断,他们的抵抗随之失败,随后政府推行大规模驱逐和迁移库尔德人的政策。

1977年2月

什叶派牧师在什叶派的圣城卡尔巴拉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2000多名群众被逮捕,8名什叶派“乌莱玛”被处死,当局开始大规模驱逐什叶派第五纵队的运动。到70年代末,共有20万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被驱逐到伊朗,并被取消国籍,剥夺财产。

1978年10月

霍梅尼被驱逐出伊拉克。

1979年2月

伊朗伊斯兰革命开始。

1979年6月

萨达姆·侯赛因就任伊拉克总统。艾哈迈德·侯赛因·贝克尔被免除一切职务,软禁起来。

1979年7月

复兴党最高层进行大规模清洗,革命指挥委员会书记穆赫伊·拉希德屈打成招,随后他和他的家人全部被处死,革命指挥委员会中1/3的成员被处死。到8月1日,复兴党的高级官员中约有500余人被处死。

1980年4月9日

伊拉克反对派什叶派的代表人物穆罕默德·巴吉尔·萨德尔和他的姐姐宾特·胡达被处死。

1980年9月22日

萨达姆发动了对伊朗的全面战争。

附录 2 1968 年以来被清洗的党政军高级官员名录

姓名	清洗时间	清洗方式	职务	职业	党派
阿卜杜勒·拉扎克·纳伊夫	1968 年 7 月 30 日	被捕,后被流放。1973 年在伦敦险些遇刺。1978 年在伦敦遭枪杀身亡。	总理、革命指挥委员会(以下简称“革指会”)成员	军官	无
易卜拉欣·多梅	1968 年 7 月 30 日	流亡约旦	国防部长、革指会成员	军官	无
纳西尔·海尼	1968 年 11 月	夜间被复兴党抓走,弹痕累累的尸体被抛在水沟里	外交部长	职业外交家、学者、文学家	无
易卜拉欣·费萨尔·安萨里	1968 年 12 月	解职、被捕,因涉嫌阴谋活动被判处 12 年徒刑	陆军总参谋长	军官	无

姓名	清洗时间	清洗方式	职务	职业	党派
阿布杜·拉赫曼·巴扎兹	1969年 10月	被指控为以色列特务而受迫害,被判处15年徒刑	无	职业外交学者	无
阿卜杜勒·阿齐兹·奥卡伊利	1969年	被捕,后被判处死刑	无	将军	无
哈丹·塔克里蒂	1970年 10月15日	解职,1971年3月30日在科威特被暗杀	副总理、国防部长、陆军副总司令、革指会成员	军官	复兴党员
哈桑·纳基卜	1970年 10月	解职,派往西班牙任大使,离开军队	陆军副总参谋长	军官	复兴党员
阿卜杜拉·萨卢姆·萨马赖	1970年	解除一切职务,后被派往印度任大使	信息部长、国务部长、革指会成员	党的工作者	复兴党员(地区领导机构成员)

姓名	清洗时间	清洗方式	职务	职业	党派
萨利赫·迈赫迪·阿马什	1971年 9月28日	解除一切职务,后被派往芬兰任大使	副总理、内政部长、革指会成员	军官	复兴党员(地区领导机构和泛阿拉伯指挥委员会成员)
阿布杜·卡里姆·穆斯塔法·纳斯拉特	1971年 8月	在寓所遇刺身亡	部长	军官	复兴党员
阿卜德·卡里姆·谢赫里	1971年 11月	解职,后在联合国任 职,被杀死在汽车内	外交部长、革指会成员	党的工作者	复兴党员(地区领导机构和泛阿拉伯指挥委员会成员)

姓名	清洗时间	清洗方式	职务	职业	党派
福阿德·里克卡比	1971年 11月	在狱中被害	无	工程师	1950年加入 复兴党, 1952 年—1958年 任党的领袖
萨拉赫·奥马尔·阿里	1972年	解职, 后被派往瑞典任 大使	部长、革指会 成员	党的工作 者	复兴党员(复 兴党地区领 导机构成员)
哈马德· 谢哈布	1973年 6月30日	在未遂政变中被击毙	国防部长、陆 军总参谋长、 革指会成员	军官	复兴党员
纳迪姆·卡扎尔	1973年 7月8日	处决			复兴党员

姓名	清洗时间	清洗方式	职务	职业	党派
穆罕默德· 法德勒	1973年 7月9日	处决	复兴党军事 局局长	军官	复兴党员
纳伊姆· 哈达德	1973年 7月	监禁	不详	不详	复兴党员(复 兴党地区领 导机构成员)
阿卜德·哈里 克·萨马赫	1973年 7月	无期徒刑,1979年清洗 时被枪毙	革指会成员	市政职员, 后为党的 理论家	复兴党员(复 兴党地区领 导机构成员)

姓名	清洗时间	清洗方式	职务	职业	党派
哈桑·穆斯塔法	1974— 1975年	监禁	陆军将官	军官	不详
萨迪克·穆斯塔法	1974— 1975年	监禁	陆军将官	军官	不详
塔哈沙·克尔基	1974— 1975年	监禁	陆军将官	军官	不详
侯赛因·哈亚德	1974— 1975年	解职,后任驻巴基斯坦使馆陆军武官	空军将官	军官	不详
达乌德·贾纳比	70年代 中期	解职	共和国卫队司令	军官	不详

姓名	清洗时间	清洗方式	职务	职业	党派
伊扎德·穆斯塔法	1977年 3月	解职, 监禁	卫生部长、劳工部长、城市部部长、革指会成员	医生	不详
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	1979年 6月	软禁, 逐渐解除一切职务	总统、三军统帅、国防部长	军官	复兴党员(地区领导机构总书记、泛阿拉伯地区指挥部成员)
穆赫伊·阿卜德·侯赛因·拉希德	1979年 7月20日	被迫向革指会“坦白”, 后与全家一起遭杀害	革指会书记	党的工作者	复兴党员(地区领导机构成员)
哈里德·阿贝德·奥斯曼	1979年 7月	处决	库尔德事务部长、革指会成员		

姓名	清洗时间	清洗方式	职务	职业	党派
阿德南·侯赛因	1979年 7月	处决	不详		复兴党员(地区领导机构成员)
穆罕默德·马哈朱卜	1979年 7月	处决	教育部长、革指会成员		复兴党员(地区领导机构成员)
穆罕默德·阿耶	1979年 7月	处决	工业部长、革指会成员		复兴党员
贾宁·阿卜杜勒·贾利勒	1979年 7月	处决	副总统办公室主任、革指会成员	党的主要组织者	复兴党员(地区领导机构成员)
穆罕默德·阿伊什	1979年 7月	处决	革指会成员		复兴党员(地区领导机构成员)

姓名	清洗时间	清洗方式	职务	职业	党派
阿德南·哈姆达尼	1979年 7月	处决	总统办公室主任、计划部长、革指会和石油事务委员会成员		
里亚德·易卜拉欣	1982年 6月	处决	卫生部长	党的工作者	复兴党高层人士